

四川文艺出版社

# 瞿秋白 评传

鲁云涛

著



Lu Yun Tao Zhu □ □ □

SICHUAN KUNYI YI CHUBAN SHE

# 瞿秋白评传

鲁云涛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01·成都

(川)新出登007号

责任编辑:朱成蓉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瞿秋白评传

作者 鲁云涛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1991年11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0.625

印数 1—1,500册 字数 239千

ISBN 7-5411-0733-6/I·675

定价:4.90元(软精)

# 目 录

<b>第一章</b>	<b>心灵的探求</b> .....	<b>1</b>
一	人杰地灵 .....	1
二	衰败的家境 .....	3
三	人生疑问 .....	7
四	卷入时代漩涡 .....	17
五	驳杂的宇宙观 .....	27
<b>第二章</b>	<b>执著的追求</b> .....	<b>43</b>
一	光明的使者 .....	43
二	内心历程 .....	56
三	《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的艺术特色 .....	68
<b>第三章</b>	<b>勇猛精进（一）</b> .....	<b>72</b>
一	革命重任 .....	72
二	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 .....	86
<b>第四章</b>	<b>勇猛精进（二）</b> .....	<b>145</b>
一	紧急关头 .....	145
二	关心文学事业 .....	158

第五章	再接再厉·····	166
一	历史的回顾·····	166
二	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	172
三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	179
第六章	在文化战线上·····	183
一	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	183
二	建设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91
三	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210
四	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	228
五	关于语言文字的研究·····	237
六	鲁迅的知己·····	244
第七章	最后的斗争·····	258
一	在中央苏区·····	258
二	被俘以后·····	266
三	关于《多余的话》·····	279
第八章	秋白形象·····	289
一	才学与爱好·····	289
二	性格气质·····	295
三	感情生活·····	310
	简短结语·····	331
	后 记·····	334

# 第一章 心灵的探求

## 一 人杰地灵

常州，自春秋吴季札受封以来，<sup>①</sup>已有二千五百年的悠久历史。由于它“襟带控三吴，舟车会百越”的优越地理位置，历来为朝野人士所注目。设郡县，辟交通（古运河穿城而过），兴商业，办文化。因此，不仅形成了“苏常熟，天下足”的农副业优势，而且，绸、绢、纱、皂布、龙凤席等织造工业处于领先地位。此外，造纸、冶炼等行业也相当发达。常州，实乃鱼米之乡，繁茂之地。

悠久的历史，富饶的土地，繁荣的经济，哺育了、启迪了它的人民。常州，人材辈出，堪称文化古城。清代著名的常州籍诗人赵翼名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便是对故乡代代人才的真实写照。南朝时编写《南齐书》的萧子显，主编《昭明文选》的萧统，明代编纂大百科型全书《永乐大典》的总裁陈济，清代，复兴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奠基者庄

<sup>①</sup> 春秋时名延陵，《史记·吴世家》：“吴余祭之年，季札封于延陵。”又，《左传注》：“季札让王，居于延陵。”

存与、刘逢禄，还有舆地学家、人口学家洪亮吉均为常州人。在文学艺术方面，自南朝至清末，一千五百年间，仅以有诗集刊行的诗人计，就有四百七十余人之多。清末的李伯元，办报刊，写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末以降，还产生了一批绘画人才，其中，恽南田，王原祁，王时敏，王翬，王鉴，吴厉等为当时的六大家，在画苑中颇负盛名，人们用“四王吴恽”的称呼来表明他们在画坛上的集团地位。

常州，还是一座多次受到革命洗礼和战斗熏陶的城市。太平军起义之初，苏、常一带农民便在太平军的直接影响下，揭竿而起。后东王李秀成等更率精锐辗转鏖战于丹阳、无锡、常州、苏州一带。清朝末年，以屠元博为首的同盟会会员曾在这里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立军政分府。明季的东林党人，其骨干分子亦多为常州人。他们提倡的博学之、明辨之、审问之、慎思之的学风，他们追求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境界，他们抨击时政，褒贬人物，万死不辞的斗争精神，给后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极深远。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崭新一页的时候，常州人民的革命传统得到了更大的发扬。常州三杰：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不仅是常州人民的骄傲，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敬仰的革命先烈，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著名的革命家。

常州这个地方，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瞿秋白便由这块宝地孕育而出。

## 二 衰败的家境

1899年1月29日（农历戊戌年12月18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城内青莛巷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里。瞿秋白小名阿双，亦写作霜或舫。据说，秋白生下时发际有双旋，故名双。霜，可能表明出生在霜雪之天。舫，可能来自袁宏道诗《和小修》：“黄笙藤枕梦吴舫”。入学后改霜为爽，又由霜演变为秋白。

根据1913年第六次修订的《瞿氏宗谱》的记载，瞿秋白的祖先从瞿昉由湖北黄梅迁入常州算起，到他这一代，已传16世，在常州已形成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用瞿秋白的说法，是世代读书和做官，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家庭。不过，到了祖父一代，就江河日下了。祖父瞿廷仪虽为江西候补知县，实际上常常赋闲，“得厘一次，而赋闲四年”。而且，正当45岁壮年之时就去世。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1875—1932）字稚彬，廷仪第四子。廷仪去世时世玮仅7岁，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做布政使的叔祖瞿廷韶的接济。但瞿世玮幼年时仍受到较好的教育，读经书，习丹青，学剑术。根据他已经学得的知识 and 掌握的技能（如绘画），他是可以在社会上谋个一官半职的。但他终生未仕，一直在家赋闲，后来又浪迹他乡，最后客死异地。这对于他本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但对他的家庭而言，他的赋闲却明白地象征着衰微和败落。在以男性为主的旧式家庭里，男子无官无职，无一定收入，就直接导致家庭的困窘和艰辛。瞿家正是如此。瞿世玮成年生儿育女之后，他不可能再在大树之下享清福了，必须担起供养家庭的重担。但他又无力承



担，于是，瞿家的生计就非常困难了。祖母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四伯父瞿世琬每月以赡养老人的名义按时寄回一笔款子，大姑母家也时有接济，一家生活尚可维持。后来，祖母移居杭州四伯父家，这个家庭断了财源。在田无一丘、地无一亩、房无一间的情况下，先是靠典当衣物，后是靠借债来勉强维持一家近十口人的生活。借债之多，据说，秋白的母亲曾悲伤地说：“要等我到70岁，才能还清这些债呵！”

瞿秋白的母亲金璇（1875—1916），字衡玉，江阴西乡大岸村人。她的父亲出任过广东盐大使。金璇资质聪慧，不仅对古典诗词有一定修养，而且写得一手好字，还能作文。但她的才智并未能够在文墨方面发挥出来，一生精力全部花耗在家务和子女身上。她在繁重的家务之余，还注意教育儿女，甚至亲自教诲秋白等人背诵古典诗词。秋白兄妹不仅在她那里得到了深情的母爱，而且受到情操上的熏染。这是瞿秋白一生永难忘怀的。长期的超负荷的运转使她在精力上和精神上都彻底瓦解了，她不得已选择了一条绝望的自我解脱的道路。1916年2月7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五日）深夜，在讨债声、抱怨声（一些不明事理的亲戚埋怨她：“把丈夫逼走了，把婆婆搬死了……”实际债况是，1913年世玮带着阿尧去湖北黄陂周福孙——秋白的二姑父——家做帐房，是一家人商议的结果，想以此减轻家庭负担；而祖母去杭州则是秋白的四伯父主动接去供养的）、儿女嗷嗷待哺声中服毒自尽了，于次日下午悲惨死去，享年41岁。母亲死后，秋白四弟景白和一位许氏阿妈留在宗祠，妹鞅群同六弟坚白前往贤庄投奔舅舅金声侣家，父亲仍携五弟阿尧继续去武昌二姑母家做帐房，秋白自己去无锡钱于桥江陂小学教书，从此一家星散。

作为士大夫阶级的成员而绝于仕途，这是瞿家衰败的关键。瞿世玮终生未仕其原因有三：一是个人气质关系。世玮生性抑郁，沉默寡言。这种性格的人，一旦形势逆转，或环境气氛与本人思想不谐和时，往往退而让之，心灰意冷。要做官，总难免一场奋斗，乃至倾轧，世玮可能是没有那个决心和勇气的。许多资料都说世玮当年酷爱老庄，笃信道教，这与他的性格气质，与他的生活境遇是相宜的。二是侍奉母亲的需要。几乎所有资料都谈到之所以世玮未外出谋事，是由于要在家中侍奉风瘫的母亲。但是，这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家中尚有既懂事明理而又贤淑的金夫人，瞿世玮要离家做官，完全是可行的。三是机遇不佳。由于世玮父亲去世很早，还未不及为他的仕途做些清扫道路、打通关节之类的工作；尽管世玮的叔父瞿廷韶有这个能力，但在血缘上毕竟隔了一层，未必会那么尽心竭力。此外，当时士大夫阶级要做官，必须首先要取得相当的学位身份，而世玮同他的父亲在这台阶梯上尚处于最低层，都属“国年生”，那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除非靠某个大人物的提携和某种巧遇，而世玮当时似乎没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总之，世玮之未仕，既是瞿家进一步败落的原因，也是作为士大夫家庭在历史行进过程中的必然结果。瞿世玮在家闲居时，读读老庄，画画山水，有时还参禅打坐，修身养性，日子倒也过得清闲自在，到金璇去世之后，他失掉依赖，带着阿尧离开黄陂远去山东平原县投靠时为平原知事的堂弟瞿世玖，充当帐房，聊以糊口。后来，瞿世玖因事丢官，世玮只得另谋出路。1920年秋，去到济南，在一个叫王璞生的朋友家暂住。不久，便先后寄寓悟善社、正宗坛等道教人士集中之地。从1922年到他去世的十一年中，受聘“私立山东美术学校”为山水画

教师。最后病逝在济南南门外东燕窝街“正宗救济会”，是时为1932年5月16日，享年57岁。

瞿秋白兄妹共八人。其中，三弟阿兴二妹红红均早夭。五弟阿尧自幼脑子迟钝，约在二十来岁死在济南。大妹瞿轶群文化水平不高。二弟瞿云白、四弟瞿景白、六弟瞿坚白都在瞿秋白的影响和带领下参加了党的革命事业。

瞿云白年幼时曾同秋白在北京住过三年，因秋白关系，受过“五四”运动的熏陶，以后参加革命。曾在上海党的中央印刷厂工作，工厂被国民党侦破后，云白被捕，关在苏州反省院。后由在外交部做官的堂兄瞿纯白保释出来，以后脱党。约于1935年在武汉航空委员会为苏联军官做翻译。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瞿世英在成都办报，云白就去做编辑，还为成都名医董宾琪当过家庭教师。抗日胜利后返回上海，做过生意。解放初，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工作，经周总理同意去华北干部学校（后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先在俄文编译室，后在图书馆作一般干部。1958年病逝。<sup>①</sup>

瞿景白是秋白1924年夏带到上海安排到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的，在这里参加了党组织。他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写文章，散传单，参加游行。在游行队伍中高呼口号，鼓舞同志：“同学们，勇敢些，前进呵！”<sup>②</sup>当场被军警逮捕。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当面嘲笑帝国主义者。1927年随秋白到武汉做党的工作。1928年4月，秋白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时又将景白带去，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sup>①</sup> 1983年笔者访问瞿云白儿子瞿勃记录。

<sup>②</sup> 姚天羽《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上海大学》，载1980年8月《党史资料丛刊》第2辑。

这期间，还协助秋白编辑了一本《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当时在中大，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中大校长米夫为了控制中共党组织，不容许不同意见存在，支持王明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宗派活动，而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瞿秋白坚决反对米夫等人的错误行为，他们就诬蔑秋白是机会主义，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瞿景白突然失踪杳无音讯。

瞿景白1935年听到哥哥秋白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不已，同时下定决心去完成长兄的未竟事业。1938年经徐特立介绍，进入陕北公学，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大约在1939年奔赴抗日前线。在太行山地委调查研究室工作期间，1944年日寇大扫荡时英勇牺牲。

总之，瞿秋白兄弟四人都先后走上革命道路，除瞿云白中途脱党之外，秋白、景白、坚白都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为革命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虽然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但他们背叛这个阶级，投身革命，并用自己的鲜血去浇灌革命之花。

### 三 人生疑问

星移斗转，当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的时候，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程。在中国，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压迫下，在国内封建政治的束缚下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无产阶级还不强大，但是，由于世界形势已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时代，历史已经呼唤中国人民跟上它前进的步伐，已经将中国人民的觉醒纳入它前进的轨道。所以，尽管中国无产阶级尚处幼年，但他已同全国人民一道清醒

地意识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的政治压迫，已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先觉醒，继而有无数进步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接着便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至于发生在广大城乡的各式各样的抗捐、抗租、抵制洋货，“收回利权”、“扫清灭洋”等等斗争，更是连绵不绝，不可胜数。总之，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干预，由于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广泛觉醒，中国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传统的宗法式的小生产经济制度也不能不随之土崩瓦解。成千上万的农民家庭，中下层地主家庭，官僚士大夫家庭，首当其冲，在这股历史洪流的冲击下纷纷破产，没落，乃至消亡。瞿秋白出身的那个士大夫家庭便是其中之一。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说：“二十世纪的开始，是我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中国香甜安逸的春梦渐渐惊醒过来，一看已是日上三竿，还懒懒的矇眊双眼欠伸着不肯起来呢。从我七八岁时，中国社会已经大大的震颠动摇之后，那疾然翻覆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当，非常之明显了。”又说：“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

瞿秋白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注定了他能够较早地较直接地看到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难，看到饥饿、贫穷、疾病，感到人生之多艰。虽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有着向上、向美的一面，但是而面对的现实却是令人沮丧的。阴暗、污秽的社会环境过早地给瞿秋白的心绪涂上一层苦涩、悲

凉的色调。他说：“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sup>①</sup>

然而，秋白的幼年生活，亦有欢愉与快乐，母爱与亲情，滋润着、陶冶着他的心灵，护卫着他身心的成长，也给他留下深刻的感情烙印。他后来在《赤都心史》中深情地说：“我的母亲为穷所驱，出此宇宙。只有他的慈爱，永永留在我心灵中”，他在后来一些困难日子里常以母亲的爱为慰藉，为鞭策自己奋发的力量。秋白大姑母家所在的江阴贤庄，距常州不远，而且外祖父家后来也搬到贤庄，所以秋白幼年时，常去贤庄游玩。那里的环溪风光，那里的童伴友谊，都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当他后来踏上去苏途程之时，还以欣慰的心情回想这段生活，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他写道：“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淞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啾啾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滋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sup>②</sup>

瞿秋白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5岁（1904年）入塾，<sup>③</sup>在常州西门织机坊星聚堂庄氏塾馆接受年仅18岁的庄怡亭先生的启蒙教育。使瞿秋白第一次感受到学习必须严肃认真，对师长必

①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

② 《饿乡纪程·二》

③ 关于瞿秋白的学历，论者说法不一。常州博物馆贺忠贤同志经过考证，撰成《瞿秋白学年考》一文，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笔者认为可信的，从之。瞿秋白在狱中写的《记忆中的日期》，可能是记忆上的差错，也可能是出于对敌人的敷衍，真真假假，不可全信。

须礼貌恭敬，同学之间应当团结友爱。8岁（1907年），转入常州冠英两等小学堂（今常州觅渡桥小学校址）读小学。堂长庄荅甫（庄彝鼎）虽系举人出身但颇具维新思想。学校制有校歌和其他歌曲，以激励学生奋发向前。〈校歌〉的歌词是：“欧风美雨，飞渡重洋，横来东亚兮。睡狮千年，誓将惊醒兮。大有为兮，冠英学生兮。”〈春季旅行歌〉的歌词是：“方春之时作旅行，足力更奋迅，名区胜地恣遨游，处处好印证。花花草草有精神，莺燕都成阵。少年世界春世界，努力向前行。”〈春秋季运动会歌〉则是：“天择由来因物竞，运动要竞争。胜固可喜，败欣然，都是弟兄们。胜不相让，败相救，团体要坚韧。合群起兵视此行，勇哉我学生。”学校开设了一般新学课程，还注意进行一定的实验教学，由本地人杨骥荪教授的博物课，就用小狗做过解剖实验。在这里，瞿秋白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科学，受到科学、现代文明的初步启蒙。这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无疑是起到了有益的启迪作用的。11岁（1910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今常州中学前身），在这里，他不仅进一步获得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有幸接触到进步思想，受到革命思潮的熏染。校长屠元博，思想进步，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同盟会。他聘请的教师，不少人都具有进步思想。庶务长朱稚竹、兵操教员刘百能也是同盟会员。这位屠元博还在当地积极开展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筹建武装队伍，同时在中学堂内设置军事体操课。因此，校内思想比较活跃，敢于议论时政，抨击弊端。当时在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新民丛报〉等进步报刊也能在校内公开流传。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译的〈群学肄言〉以及〈中国近世秘史〉、〈太平天国野史〉等书籍，瞿秋白便是在

这个时期读到的。这些进步报刊和著述对中国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对西方文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介绍，对瞿秋白有着巨大的震惊和启示。幼小的瞿秋白便有一颗正真、善良的心。一次随母亲到北门外贤庄外祖母家小住，他外出归来，身上穿的褂子没有了，追问之下他才说：“看到村上一个小朋友光着背在风里发抖，脱下给他了。”他母亲说：“这种事好是好，就是我们也不多啊！”秋白不高兴的反嘴道：“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后来他同杨之华谈起这件事时不安地说：“我一生就只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在冠英小学堂时，在一次题为《说蟹》的作文中，用“横行无忌”一词表示他对当时黑暗势力的憎恨。国文兼级任教师谢仁炘对这篇文章极口称赞，在课堂上说：“一个十来岁的少年竟能在文章中写出这等语言，有如此奇思妙想，实为不易。进入中学以后，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正直、善良的心灵逐渐发展为憎恨邪恶的反抗个性。还有一次，瞿秋白同羊牧之到常州东门外太平寺一带游玩，看见一个头上插着一根稻草结的小孩站在一家店堂前正在被一个农民出卖，秋白拍拍羊牧之的肩头说：“走吧，那个小女孩低垂着脸，好象在出卖我的妹妹似的。”又指着过一个路的戴阔边礼帽的大胖子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瘦了，天下就好过了。”他在同小朋友闲谈《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时，也慨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在中学堂里，瞿秋白在一篇文章中赞扬了敢于反抗官府的农民，思想反动的国文教员陈雨农在批语中指出要他“纠正”，瞿秋白不仅不纠正，反而在批语后而加上批语，以驳斥老师的谬见。陈雨农恼羞成怒，告到学监那里，给予瞿秋白记



过处分，但瞿秋白并不屈服。一次，瞿秋白同张太雷同学谈到辫子时他气愤地说：“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行。”当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马上就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并且高喊道：“皇帝倒了，辫子剪了！”对于辛亥革命，瞿秋白同当时一般青少年一样，是热忱欢迎的，以为打倒了皇帝，中国从此就能进步、发展和富强。然而，现实很快就暴露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人们很快就失望了。年幼的瞿秋白也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1912年10月10日“国庆”时，瞿秋白便独出心裁地在自家房门口上挂上书写“国丧”二字的白灯笼，以表示一个少年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切忧伤。

虽然瞿秋白幼年时就萌发了民主意识，而且这种民主意识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增长，随着道路的坎坷不断加强，但是，由于缺乏正确思想的引导，当他个人和家庭遭受不幸，遇上意外变故时，他的不满现实，他的希望个性解放等民主意识，就未能从正面表现出来，而体现为一种变态形式。导致这一变化的，一是当他14岁的时候，祖母被四伯父接去杭州同住，经济来源断绝了，全家陷入困窘之中，只有靠典当、借贷渡日。二是一二年前他曾为之兴奋、欢呼过的辛亥革命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不彻底性，仅有的一点革命成果也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家如斯，国如斯，瞿秋白感到十分苦闷。在苦闷、压抑之中厌世情绪渐增，转而在个人内心去寻求安慰，寻求解脱。因而出现对“性灵”的崇尚。此时的瞿秋白企图在旧诗文、古典经籍中去寻觅安慰与解答，从而染上一种“名士化”的气息。这种从现实转向内心，由今而转向古，是由积极向消极的转变，这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瞿秋白也曾明白承认他当时这一思想状况。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

婢匪徒寇盜的獨裁制。‘自由’‘平等’‘民權’的口头禱，在大多數社會思想里，即使不生復古的反動思潮，也就為人所厭聞，——一激而成灰世的人生觀：或是有託而逃，尋較遠于政治科學的安頓心靈所在，或是竟順流忘返，成綺語淫話的爛小說生涯。所以當我受歐化的中學教育時候，正值江南文學思想破產的機會。所謂‘歐化’——死的科學教育——敵不過現實的政治惡象的刺激，流動的文學思潮的墮落。我江蘇第五中學的同學，揚州任氏兄弟（任乃訥、任乃闓）及宜興吳炳文都和我處同樣的環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時‘名士化’，始而研究詩文古詞，繼而討究經籍；大家還以‘性靈’相尚，友誼的結合無形之中得一種旁面的訓育。”<sup>①</sup>而家庭發生的第二個變故又使他不能不由縹緲空幻的“性靈”再回到現實中來。這第二個事件便是他母親由于貧困、債務、怨責而自盡的事。1915年春，瞿秋白只差半年就要中學畢業了，但由于家庭經濟實在無法維持，他不得不輟學謀生，16歲的瞿秋白經他在無錫的表姨夫秦耐銘的介紹，去到無錫南門鑊子橋邊的江陵小學教書。而正在醞釀準備此事的時候，秋白母親突然自辭于世。這一事變使瞿秋白悲痛不已，同時也使他必得正視現實不可。雖然少不更事，但作為長子，他對於一家生計、對於弟妹的安置，是不能不考慮的，更何況他父親又長期不理家政。所以，當他料理完母親的喪事後便去到無錫，辭去“精神上判了無期徒刑”的教職，另謀出路。1916年8月，回到常州，在北門外舅舅金聲侶家暫住，同時給武昌的堂兄瞿純白寫信，請他幫助進學校再學習。時，瞿純白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京漢鐵路局任通譯。在瞿純白的關心下，是年12月便離開家鄉，向西行去尋求新的生

<sup>①</sup> 〈懷鄉紀程·四〉

活。正如他后来所说：“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际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饭碗问题间接的解决法。”<sup>①</sup>到武昌后，在瞿纯白的帮助下考上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该校教学水平太差，不能满足秋白的求知欲望。不久，便退学，去黄陂二姑母家小住。二姑母家的表兄周均量又娶瞿世珪的五女瞿兰冰为妻，因此，瞿家与周家是双重亲戚关系。瞿秋白这段时间里思想上的矛盾、曲折、反复，在他寄居周均量家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里，周均量辅导他学习旧诗词，使他对古典诗词的研究得以更深入一层；这种研究，不仅增长了他的知识，也陶冶了他的心性；周均量还同他谈论政治时事，使他对淡远了的社会政治问题又重新发生了兴趣；然而，也是这个周均量，又引起他旧时研究佛学的兴趣，在这里，他读了《成唯识论》、《大智度论》等佛经典籍。出世观的佛学与入世观的政治见解是极端对立的，于是，由佛学兴趣的复燃，又把刚刚复甦的政治兴趣给淹没了。

在湖北黄陂，虽然不愁衣食，但毕竟是客居，终不是长久之计。虽然在旧诗词，在佛学里寄托了一点悲凉的感情，但毕竟是缥缈的幻境。虽然黄陂名胜——铁锁龙潭的清波皓月也给予他一些心情上的安慰，但那总是过眼烟云。1917年春，又随他的堂兄瞿纯白到了北京。并住瞿纯白家里。去北京，本想到北京大学攻读文学，因经济问题无法解决，未能如愿。是年9月，考上了外交部经办的俄文专修馆。该校系公费，不愁经

<sup>①</sup> 《饿乡纪程·四》

费问题。瞿秋白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刻苦，常常攻读至凌晨二三点钟才睡觉。每次考试总是一、二名。其中文更是佼佼者，每次的作文都被油印出来在全校传观，以至名震全校。这期间，除了在校主攻俄语外，还自修法语和英语（他在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过短时期英语）。瞿纯白通法语，工余在一个法语补习学校兼课，备有讲义。秋白得这一方便，经过他的刻苦学习，几个月之后，他的法语水平竟然高出补习学校的正式学员。

从1917年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在这二年多时间里，瞿秋白的的生活是简单的，甚至是单调的：闭门读书。生活也艰苦，瞿纯白的经济能力无法使这一大家人过得稍好一点。秋白常常是饿了便买两个烧饼就着白开水咽下。衣履单薄，俄专发给每人一套黑制服，他不论春夏秋冬都穿在身上，一穿就穿了5年，补了又补。但是，交际可以断绝，清贫可以自守，环境形势，时代气氛是无法隔绝的，心灵对环境气氛的感应是无法阻止的。在这二年多的时间里，瞿秋白的的生活看来相当平静，而思想却在活动，在变化。一方面，在黑暗的观实面前，由于苦闷、痛苦，情绪低沉，原先的厌世情绪有增无减，不愿参与现实斗争，企图回避、远离污秽糟乱的现实。另一方面，奋进的志向并未泯灭，而且还在发展，总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因此，继续在探索人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具体行动上，表现为：一方面迷惑于“出世间”的梦幻，在佛学中去寻求精神寄托，另一方面，却又在脚踏实地做着为了生计的实际准备工作，即刻苦学习俄文，以图解决饭碗问题。他将这种矛盾态度称为“二元的人生观”。然而，“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的兴亡，人

民的疾苦，自身的饥寒，时刻都刺激着每个有志之士。在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也感到“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便是由先前对“人与人的关系”、“人生的意义”等问题的空泛感喟渐渐进入实际。他说：“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sup>①</sup>即是说，此时之研究旧诗文等国故，已怀着使新文学得以发展的动机，这一动机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正确的。想通过对佛学的研究去解决人生疑问，方向是错的，但在对佛学的研究中产生出“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望，用意则是良好的，目的也是现实的。如何使佛教人间化呢？他以为，大家奉行一种菩萨行的人生观，就可以使佛教经义为人间造福。所谓“菩萨行的人生观”，大致可以概括为：生活清苦，行为廉洁，乐善好施，刻苦努力。他以为只要人人如此，社会就会好转，众生就能安居。他自己当时，由于本人思想上是这种状况，客观上经济条件拮据，所以倒真是在实践这一人生观的。他说：“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题，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sup>②</sup>虽说这种人生观并不可取，但可以使自己不同流合污，使自己在浑浊混乱的生活中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此外，佛学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回答，是唯心主义的，但佛学认为人生无常，这其实就是一种发展观。瞿秋白在佛学研究中，就受到这种发展观的启示，使他领悟到社会是变化的，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当时，俄专使用的俄文教材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伟大作家的

① <饿乡纪程·四>

② <饿乡纪程·四>

俄文原著。正在寻求人生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瞿秋白在这些饱含民主思想的文学作品、政论著述中受到启迪和鼓解更是不言而喻的。

#### 四 卷入时代漩涡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瞿秋白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五四”运动的狂风巨浪，轰毁了瞿秋白寂静的书斋；使他从个人的心灵思索中惊醒过来，面对社会，走向现实。从此，瞿秋白的人生探索便从求诸内心转向考察社会，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

“五四”运动一爆发，瞿秋白便同他的同学们一道以极大的热情参加这一伟大运动。瞿秋白在运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上街讲演，发动学生，组织联络，游行请愿。他是“俄专”的学生代表。6月3日，在第二次请愿中瞿秋白同其他一些人被反动当局拘捕，关在北京大学。在各界进步人士的声援下，反动派不得不很快释放被捕学生。<sup>①</sup>关于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的坚定、机智和才干，郑振铎曾有过清楚的回忆，他说：“我们几个人（鲁按，指俄文专修馆的瞿秋白、耿济之、汇文大学的瞿世英、许地山，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代表的都是小单位，而且在那些单位里，做工作十分困难，群众意见

<sup>①</sup> 一般资料都说瞿秋白1919年6月3日被捕。许德珩对当时情况曾有以下回忆：“学联”开会时，经常出席的人中有俄专的瞿秋白。而关于被捕一事，只说5月4日当天有32人（31名学生，市民1人）被捕，未谈到瞿秋白。这32人于5月7日释放。又说，6月1日至3日，由于上街讲演，被捕二、三千人，4日被捕七千余人。6月5日，当局在全国声援下全部释放（《“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61辑）许说似可参考。

多，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主要原因是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面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的天才，越到后来，我们的活动越困难，北大、高师都无法开会了，只好到东城根的‘汇文’去开。开的时候，老在夜间。悄悄的个别的溜进来开会。散了会之后，也一个个的悄悄的溜出去。军阀的走狗们变得更狡猾了，说不定越埋伏在附近，叫一声你的名字，如果回头一答应，就会被他们捉去。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已经捉了好几个人。秋白是很机警的，曾经被一个走狗追踪了半天，跟上了电车，又跟上了人力车，但他转弯抹角的兜圈子走，终于甩掉了那个狗子。自此之后，秋白的行动显得更小心了。”①郑振铎曾同杨之华讲过，说“五四”期间瞿秋白还到上海去活动过。②

瞿秋白之所以越投入“五四”运动，并且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大约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憎恨黑暗的现实，虽然不知道怎样医治社会的无名毒症，但在黑暗现实面前，总感到不安，而且无法压抑这特精神上的躁动。再加之，在研究佛学中，认识到社会是无常的，是变化的，这对他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他说：“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③这条“光明的路”，就是“变”的要求，

①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12期。

② 《杨之华的回忆》，载《“一大”前后》。

③ 《饿乡纪程·四》

就是寻找和追求社会的变化。而如何使社会发展、变化，他当时是茫然的。但总觉得必得给予社会一震惊刺激，以推动它的变化发展。乃至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克鲁包特金说的“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也是对的。第二，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引起思想上的进一步觉悟。正如他所说：“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sup>①</sup>第三，〈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他曾说：“〈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想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sup>②</sup>总之，瞿秋白之投入“五四”运动，有其主观上的思想基础，但主要的是客观形势的推动，或者说，是历史洪流的带动。这一点，他自己是很明白的：“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漩涡。”<sup>③</sup>

“五四”运动既使瞿秋白受到震惊、鼓舞，又使他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索中国究竟应当怎么办。“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sup>④</sup>为了深入、系统地探讨这些问题，也为了继续发扬“五四”运动中爆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瞿秋白便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一道组织筹办〈新社会〉旬刊。

〈新社会〉是作为北京社会实进会的会刊印行的。北京社

① 〈饿乡纪程·四〉

②③ 〈饿乡纪程·四〉

④ 〈饿乡纪程·四〉



会实进会是1913年成立的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该会的宗旨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依靠会员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为社会服务的事情，以期对腐败醒盹的社会做一些补救工作。会内设学务、演说、游艺、调查、交际等部，到1918年秋，又增添了一个编辑部。出版《新社会》便是编辑部工作的具体体现。他们探索社会问题、想为社会、为民众服务的要求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实施的机会。从他们欣然接受《新社会》的编辑任务，并成为该会成员一事看出，他们当时的思想认识同社会实进会的观点、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新社会》的编辑部完全由他们几人掌握，每期的主要撰稿人又都是他们几位，所以，与其说《新社会》是北京社会实进会的会刊，不如说《新社会》是他们几人的同人刊物。瞿秋白等人的倾向就是《新社会》的倾向，《新社会》反映的观点基本上就是瞿秋白等人的观点。

《新社会》旬刊从1919年11月1日创刊到1920年5月1日，共出19期。《新社会》的宗旨及其基本观点和态度，在郑振铎执笔的《发刊词》中有着明白的表示。发刊词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社会实进会，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期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什么是我们改造的目的呢？我们向那一方面改造？我们是向着德谟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我们的改造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

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圇的新旧调和论；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sup>①</sup>《新社会》发表的文章，大抵可归为四类。一类是社会问题研究。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外交、家庭、婚姻、劳动等方面的理论探讨，以及用“随感录”、“旅行杂记”等形式出现的对各种社会弊端的揭露。二类是外国社会科学的介绍。这一方面的内容就十分宽泛、杂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白拉克麦、孟德斯鸠、奥古斯丁、孔德、斯宾塞、罗素，以及列宁、托洛茨基、倍倍尔，各种主义、各种观点都加以介绍，并无一定。第三类是翻译介绍外国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第四类是少量的文学创作。

《新社会》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刊物，发行较广，在奉天、上海、济南、南京、长沙、温州、杭州，乃至日本东京都有它的代办处，在四川、两广都有它的读者。在社会上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正由于它敢于揭露社会问题，鼓吹社会改造，就为反动当局所不容，终于被扼杀。警察局拘捕了《新社会》的经理孔君，于是，刊物被迫停刊。《新社会》停刊后，瞿秋白、郑据铎等人紧接着又筹办另一个刊物。两个月后，一个新的刊物《人道》月刊在是年8月又问世了。《人道》的编辑宗旨是：宣传和提倡与畜道对立的人道。其《宣言》说：“我们愿敝同人的笔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将世间一切的苦

<sup>①</sup> 《新社会》第1号。

乐描写出来，教人人有所归向。……教这世间虽是一罅一孔之微，也能受人道的光所充满。……教一切人类都受了平等的宠惠和进化的幸福。这就是本刊出版后的愿望。”郑振铎的《人道主义》一文进一步发挥了《宣言》的观点，说：“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人类的将来，系于此一语了！”“救人类于灭亡者，实在只有‘己所欲者施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即可。此一语即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有这种精神，而后人类始能捐除意见，协力工作，以自拔于灭亡之途。”由于经济上、背景上等方面的原因，这个刊物在名义上自然仍属青年会的刊物。然而，青年会此时迫于形势，已无心再冒风险，无意再办刊物，他们几人也无承办一个刊物的经济能力，所以，《人道》只出一期便停了。

从“五四”运动后到1920年10月赴苏之前这一段时间，瞿秋白的主要精力仍是继续俄专的学习。他在学习和编辑《新社会》等社会工作之余，又以勤奋的精神写作和翻译了不少文章。从1919年7月到1920年10月的年余时间内，据初步统计，先后在《新社会》、《曙光》、《新中国》、《晨报》、《改造》、《人道》等报刊上发表了54篇翻译和论著。其中政论21篇，他的第一篇政论《不签字后之办法》，发表在1919年7月17日的《晨报》上。文论3篇，他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文是写于1920年2月的《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发表在1920年10月出版的《妇女评论》第二卷第二期上。杂文7篇，他的第一篇杂文是发表在1919年12月11日出版的《新社会》第5号上，题为《自杀》，同期还有一篇《唉！还不如》。诗1首，即《远》，发表在1920年8月5日出版的《人道》创刊号上。文学作品翻译15篇，191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上发表的托尔斯泰的

《闲谈》是为第一篇。政论及社会科学论文等翻译7篇，即托尔斯泰的《告妇女》、《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论教育书》、伯伯尔的《社会之社会化》、马德志尼的《论“不死”书》等。他这时期的小说译文同耿济之的译文辑录在一起，题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由蒋百里主编的“共学社丛书”于1921年12月出版发行。

瞿秋白这期间的政论文章和政论方面的翻译作品，涉及面相当广泛，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妇女问题，劳工问题，社会学，文化教育等等。所反映的社会观点也十分驳杂，有科学社会主义，有空想社会主义，有蒲鲁东的机会主义观点，有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有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论，等等。而其中心思想则是主张科学与民主的救国论，这同当时的时代思潮是一致的，当时的瞿秋白未能超越这一时代格局。他仍不过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瞿秋白这期间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文学翻译，基调同他的政论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自杀》、《唉！还不如》、《错误》、《战争与和平》、《爱》、《劳动？》、《心的声音·绪言》等杂文表现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和抗争，也表现了他对章来的朦胧的追求，同时也表现了他在迷惘中的淡淡哀怨。然而基调是热情的，向上的，文笔自由活泼，思路开阔。所翻译的托尔斯泰的12篇小记（《闲谈》、《祈祷》、《三死》、《风雪》、《丽城小记》、《伊拉司》、《呆伊凡故事》、《三问题》、《难道这是应该的么》、《阿撒哈顿》、《人依何为生》、《野果》）和果戈里的2篇小说（《仆御室》、《妇女》）以及都都的《付过工钱之后》，也是反映民主思想的，揭露社会的压迫与欺榨，显露人生的种种不幸，特别是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表现出作者的同

情和愤恨。

瞿秋白这时的文艺论著不多，但反映出的文艺思想却值得注意。他在1920年3月15日、16日连续写的《序沈颖译〈驿站监察吏〉》和《〈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两篇短论中，提出了以下几个文艺观点：

一、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主要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从俄罗斯进步文学中认识俄国社会发生变动的原因，从而明白自己前进的道路。他说：“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确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这里，瞿秋白明确地认为，翻译介绍反映社会大变动的进步文学就是为着启迪中国人民的革命觉悟，就是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可见，瞿秋白之于文学，一开始便意识到文学同政治的联系。他没有经历过“为艺术而艺术”的阶段。尽管他这时还没有正式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但这种自发的认识却接近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二、借鉴外国进步文学还为了创造和发展中国的新文学。他在评论普希金的《驿站监察吏》时指出：“情节非常简单，而作者艺术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不但如此，而且读此类俄国的小说，还可以知道当日俄国国情，却和中国差不多，‘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的简陋，歌鄂黎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

鄙齷齪，都是如此，这一篇还不大显明深切。’因此可以推及中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得着新文学的感动。”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当是“民族的文学”；中国新文学作家应当在作品中表现出中国的国民性，象普希金那样。他引述果戈里的话说：“普希金子俄国的天性，俄国的精神，俄国的文字，俄国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后期便提出新文学应当是“民族的文学”，这是极有远见的。当时，人们纷纷介绍外国文学，模仿、学习外国文学，却往往机械地生吞活剥地照搬，忘了、忽视了新文学也是对民族传统文学（特别是其中的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必须很好地反映民族的精神和特质，有的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

三、文学是社会的反映。他说，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是社会的喉舌。”这一点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观点的。他不仅看到文学是社会的反映，而且还认识到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制约作用是经由人们思想而实现的。他说：“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这一观点也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学说的。他发挥他这一观点说：“因为社会的不安，人生的痛苦而有悲观的文学，譬如人因为伤感而哭泣，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的情感所寄之

处。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瞿秋白还看到，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人们思想的变化，而人们思想的变化又引起文学的发展变化。他在与此文几乎同时写的《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出版）一文中就指出，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的疾苦，而且还应当起到影响社会，支配社会心理的作用。他说：“女子既然是受着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的影响变成这种样子，似乎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文学家不过是他描写出来罢了。殊不知文学的作品——诗，词，文章，小说，戏剧——多少有一点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始终要担负这点责任。”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使瞿秋白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使他初步认识到了“社会”的意义，人生的意义，而编辑《新社会》又使他对社会生活有了广泛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从1920年3月起他参加了李大钊同志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这个研究会是在1920年3月在北大成立的，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研究会成员除了阅读《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评介文章外，还阅读、讨论了1920年4月出版的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河上肇等人所写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研究会还筹集资金购买了一批图书，设置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Communism 共产主义）。在研究会里，他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

的著作，而且有李大钊等先驱者的指导，有同志们的彼此切磋，这就能较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因其如此，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这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读的并不多，又停留于书本上，还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清晰的认识，但是，这一初步学习对于他却是思想发展上的一个新起点。

## 五 驳杂的宇宙观

瞿秋白早期的宇宙观，可以从他的片断文字中看到。《饿乡纪程》的前面几节约写于1920年10月到12月，这几节对他的家庭，对他的思想有较多的记叙，这些文字是我们研究瞿秋白早期思想的重要资料。他曾用这样的文字表明了他当时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基本观点：

生活也好似行程。青山绿水，本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疾风迅雷，清阴暖日，就是乎平常常一时一节的心绪，也有几多自然现象的反映。何况自然现象比社会现象简单的多，离人生远得多。社会现象吞没了个性，好一似洪炉大冶，熔化锻炼千万钩的金锡，又好象长江大河，滚滚而下，旁流齐汇，泥沙毕集，任何鱼龙变化，也逃不出这河流域以外。这“生命的大流”虚涵万象，自然流转，其中各流各支，甚至于一波一浪，也在那里努力求突出的生活，因此各相搏击迸涌，转变万千，而他们——各个的分体，整个的总体——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转变在空间时间中生出了什么价值。只是蒙昧的“动”，好象随



“第三者”的指导，愈走愈远，无尽无穷。——如此的行程已经几千万年了。

人生在这“生命的大流”里，要求个性的自觉（意识），岂不是梦话！然而宇宙间的“活力”，那“第三者”，普遍圆满，暗地里作不动不静的造化者，人类心灵的谐和，环境的应响，证实天地间的真理。况且“他”是“活力”，不流转而流转，自然显露，不着相而着相，自然映照。他在个性之中有，社会之中亦有，非个性有，非社会有，——似乎是“第三者”而非第三者。

“生命大流”的段落，不能见的，如其能见，只有世间生死的妄执，他的流转是不断的；社会现象，仍仍相因，层层衔接，不与我们一明切的对象，人生在他中间，为他所包涵，意识（觉）的广狭不论，总在他之中，猛一看来，好象是完全汨没于他之内。——不能认识他。能认识他的，必定得暂舍个性的本位。——取第三者的地位：

“生命大流”本身没有段落，可以横截他一断；社会现象不可认识，有个性的应和响；心灵的动力不可见，有环境为其征象。

这一段话包涵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宇宙间存在一种“活力”。这“活力”无处不在，充盈于万物之内（“普遍圆满”），它统摄万物，驱策万物（“暗地里作不动不静的造化者”，“好象长江大河，滚滚而下，旁流齐汇，泥沙毕集，任何鱼龙变化，也逃不出这河流域以外”）。第二，这宇宙间的“活力”，犹如“生命的大流”，按照自己的轨道不断地永远前进。所谓“自然流转”，就是不受外界的或人为的条件限制的。

制，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进。“活力”不仅在流动，在前进，而且“愈走愈远，无尽无穷”，“他的流转是不断的”，它已经前进了几千万年，而今后的行程更是无穷的。第三，这个宇宙间的“活力”的存在及其对万物的统摄、驱策作用，是不着痕迹的，没有一个感性表现形式。它的存在和它对万物的统摄、驱策作用，都是“自然显露”，“自然映照。”它“不着相而着相”，即是说，它本身不具形相而使万物具有形相，因此，虽然感觉不到它的感性形式而它又是确实存在的。它与万物同在，它与万物融合在一起，你不能将它与具体事物分离开。第四，要想认识这“活力”，必得舍去“个性的本位”，即舍去个别，而从若干个个别之中将它抽象出来。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活力”，或“生命的大流”，就是自然法则，自然规律。他认为，宇宙间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规律虽然看不见，却体现在各个具体事物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尽管千变万化，纷繁复杂，但总受制于客观规律，而且这客观规律不断流转、前进，永无止境。由此，我们便可以得知瞿秋白关于宇宙万物的基本观点是：第一，世界万物是客观存在的；第二，世界万物都处于“动”之中；第三，世界万物的发展变化是由自然法则、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第四，这个客观规律是能够认识的。从这几点来看，瞿秋白当时的宇宙观是属于唯物主义的，但是尚属于旧唯物主义范畴，因为他虽然看到了事物的变化发展，但不明白事物的内部联系，不明白事物的发展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不明白他的这个“第三者”实际上就是事物的矛盾运动，而把“第三者”、“活力”看作一种神秘的力量。尽管他看到世界总是在不断地活动、前进，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运动是物质存在的

形式，因此，他不认为世界的动是绝对的，永恒的，而认为是相对的，暂时的。认为动是为了静，求静、求安而有动，动只是手段，静才是目的，动只是过程，静才是结果。他说：“宇宙的意志永久引导人突进，动的世界无时不赖这一点‘求安’的生机。”“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动而至社会主义，至‘新式的’现代的无产阶级化。全宇宙不过只这一‘求安而动’的过程。”<sup>①</sup>若说自然界的事物和人类社会生活现象有一个相对平衡和相对稳定的状态和趋势，那是对的，但瞿秋白把平衡和稳定看成是一种绝对现象，是绝对趋势，那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了。

瞿秋白“五四”运动前后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是比较芜杂的，甚至是矛盾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虽然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的进步，是世界的发展方向，但是他的社会理想实际上仍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在1920年1月所写的〈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新社会〉第9号）一文中认识到，流入美利坚的社会主义的两大派别，乌托邦派与历史派相比较，还是历史派正确。他说：

“前两三个月报上登载美国的罢工消息非常之多，是非常之利害的阶级竞争；更有美国全国产业会议中康巴士的失败，也是阶级间调和不了的现象，现在听说美国捉捕布尔札维克党非常严厉，这都是历史派的运动，约略看来，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瞭的——世界的进步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究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瞿秋白对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认识，虽然不是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切实理解上，却是深深

<sup>①</sup> 〈饿乡纪程·八〉

感动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对瞿秋白的震动是巨大的，他在好些文章里都把这次革命比作震撼世界的人类创举。他用文学语言写道：“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我在亚洲初听见欧洲一个妖怪的声音。他这声音我听见已迟了。——真听见了么？——可是还正在发扬呢。”“那洪大的声音，全宇宙都弥漫了，金星人，火星，地球人都快被他惊醒那千百年的迷梦了！”<sup>①</sup>瞿秋白在这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响中惊醒了，看到了那是人类的方向。但是，这仅仅是朦胧的意识。他曾说过，那时“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sup>②</sup>他当时了解得较多较具体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和民主，正如当时一般进步青年所向往的一样。因此，当他深入思考自己国家的出路时，没能超出当时的时髦口号：科学和民主。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新社会》第1号）一文中，他大声疾呼中国人要“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号召“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什么是“真正的觉悟”呢？他认为，首先是去掉“中国人的根性”。这根性，“就是懒，就是不肯负责任，遇事推诿。”而应该“要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打起精神，往前干去”。其次，要求重视民治主义，人道主义，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的解决，并且认为英法美日的同盟罢工，英美各国的妇女选举权，就是顶好的证据。说这些国家的这些运动显示了世界的新潮流。在《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

① 《心的声音·绪言》，《新社会》第15号。

② 《饿乡纪程·四》

第3号)一文里,提出革新社会的具体措施是:“我们应当(一)竭力传播德谟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三)竭力谋全人类生活的改善;(四)到穷乡僻县——远至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五)实行‘工学主义’‘学工主义’;(六)研究科学,传播科学。”这六条革新办法的基本点就是民主和科学,只不过还带上一些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成分罢了。他还明确指出他的社会理想“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

他当时已看到了工人、农民的贫困,但认为贫困的原因是工业不发达,工业不发达的原因是无科学知识。他一方面看到“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但他又认为,“如若世界上经济的发展得有一种近似的平衡,资本家也就不再用竭力的压迫劳动界,去行使他的侵略主义了。现在中国放着白茫茫一片大地,怎么能够叫人家的资本家不眼红?”所以,他认为要避免外国资本家的侵略,要解决工人农民的贫困,首先是振兴实业,使用机器。而要能使用机器,关键又是让工人学习科学知识。这便是他在《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第4号)等文中提出的解决贫困的办法。

他当时一方面看到阶级压迫、阶级竞争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提倡绝对的爱。瞿秋白在《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新社会》第9号)、《谁的利器?》(《新社会》第17号)、《世界底新劳动节……中国底新劳动节》(《新社会》第19号)、《心的声音·劳动?》(《新社会》第19号)等文章中都指出各式各样的压迫和剥削,并且赞成工人用罢工作为对抗手段。但是,同时又提倡一种廉价的泛爱主义,希望资本家同

情和救济工人和穷苦人民。他说：“我的意见以为这功德，罪恶的‘共同的固定的标准’，只是‘爱’与‘不爱’。‘爱’就是‘善’，‘不爱’都是‘恶’。”又说：“爱”——绝对的，是‘直觉’，定人生的现象，与人以最大幸福。”<sup>①</sup>他的所谓“直觉”的爱，指不参与任何功利观的本能的爱，他把这种直觉的爱看得十分重要，说：“‘爱’！……宇宙建筑在你上。”<sup>②</sup>

他虽认识到要改革社会，要有社会运动，但却将社会运动与群众运动分离开来，把社会运动看作是少数纯粹学者的事业。他在《社会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一文中认为，改革社会，是从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再到社会运动的。而中国当时，“正到了群众运动与社会运动杂糅的时代。”“而改革社会又不能单靠一时的群众运动”。“因为改革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而这件事决非一时的群众运动所能做得到。”谁能做得到这些事呢？他认为唯有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才能做到。因为他们“没有无限的轻信心，没有极端的感情，不受无意识暗示，而有积极的怀疑心，有沉静的研究心，有强固坚决的毅力。”他所理想的这种社会运动的牺牲者，实际上就是知识阶级中少数有觉悟、有批判精神，但又恪守中庸之道的有坚强毅力的人。这一点，他在《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号）一文中讲的更明白。显然他把社会运动的希望放在这少数学者身上，并且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创造”出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新的道德观念，这就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淖了。

① 《社会与罪恶》，《新社会》第13号。

② 《心的声音·爱》，《新社会》第19号。

总之，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个时期内，瞿秋白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要求改革社会，但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是不明确的；他对社会主义有所了解，但并不清晰，不深刻，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向往带有相当的朦胧性；他当时所能提出的社会改革办法，不外仍就是当时一般仁人志士所热衷、所倾慕，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那一套理论：发展科学，振兴实业，民主政治，平等泛爱，等等。因此，从思想体系上讲，从他思想的基本方面上讲，当时仍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瞿秋白经过“五四”革命运动的洗礼，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熏陶，他在人生态度上一扫过去那种厌世的消极倾向，变得积极而坚定。他这时认为，一个真正有了觉悟的人，不要昏睡，不要止于愤疾，更不要弃绝社会，要进取，要奋斗，要积极地改造社会，并且要有乐观精神。他在《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一文中认为不满于社会而采取自杀手段是不可取的。他说：“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一步一步的做去。”

瞿秋白当时的思想之所以呈现出上述芜杂的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二是家庭教育和环境熏陶，三是文化思想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封建的宗法式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已而临全而崩溃，旧中国的彻底瓦解，已是注定无疑的了。然而，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这个古老而又落后的国家，人们的意见莫衷一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在文化思想界，各种学说，各种主义，齐集杂汇。所谓社会主义学说也是五花八门，有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亦有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有德国妥协式的社会革命，以及蒲鲁东等人的机会主义。这些杂乱的，有些是彼此对立的学说、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杂呈并列。瞿秋白这一时期的思想无疑也受到这一时代特点的影响。

瞿秋白早年的思想状况同他的出身、家庭、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由于家庭败落，他出生以来便亲身领受到生活的困窘，世态的炎凉；在少年时便感觉到人生蒙昧，世事奇秘。人生意义何在？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什么？他困惑，迷惘，茫然。早年的心境极苦闷，抑郁。早期所受熏染和教育，又带有明显的二重性。而瞿秋白的父母所给予他的影响又是矛盾的。母亲竭尽全力维持一家人生活，教抚子女，务实又随俗，而父亲则耽溺于道教的修行；母亲教育他为人要正直，要同情人民，启发他看到世间的不平现象，而父亲则要他静坐养性，<sup>①</sup>不问世事。在中小学里，一方面从进步老师和进步报刊中获得一些新知识，而另一方面，又广读旧诗文词，喜爱老庄著作，更将他的思绪引向遥远的古代和对抽象的灵性问题的探索。在湖北黄陂时，表兄周均量既引起他对政治的兴趣，又指导他阅读佛学典籍。在北京时也同时受到截然不同的两种熏陶，他说：“在北京整整的住了四年，虽纯哥是按‘家族的旧道德’培植扶助我，我又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坐在‘旧’的监狱里”。<sup>②</sup>以上教育和影响使瞿秋白早年的人生态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崇尚性灵，重视感情，尊重个性，寻求爱心。又由崇尚性灵到希冀个人品性的完善，这便是

<sup>①</sup> 根据笔者1983年10月18日对羊牧之的访问。

<sup>②</sup> 《饿乡纪程·三》。



他早年奉行“菩萨行”的人生观的个性基础。这一个性在他以后的生活经历中还有所发展，乃至成为他的个性特点之一。在瞿秋白的一生中，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解剖自己，严格到过分苛求的地步，遇事总是反射自省，责备、谴责自己，甚至诅咒自己，否定自己。这一品性的根源，就来自早年对性灵的崇尚，加之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所以，激情之所至，言辞就往往过头。言虽如此，心地却未必是那么严重。不过，好在他只是在解剖自己，责备自己时才这样苛求，而对于别人，倒往往过于宽大，容忍，很少见他非议、责怪别人，更不见他诿过于人。对别人的宽容其实正是严于责己的另一个侧面。二是在感情上不时处于矛盾状态。比如，他一方面感到社会的黑暗，腐朽，憎恨人世间的和平，意识到他的家庭的败落是大势所趋，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本家族的成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都怀着较深的感情，他同情他们，为他们没有一个理想的生活和前途而惋惜。换句话说，他早年的感情上，有着“士的阶级”的烙印，瞿秋白有些纤细、哀婉、多愁善感，善感到有些感伤。而他感情上的矛盾，正是这个家庭、环境熏染的性格的必然表现。事实上，瞿秋白感情上的矛盾也反映在他的兴趣和爱好上：既关心时事政治，又有“名士化”的倾向；既正视现实，有忧国忧民之心，有想干一番事业的打算，又对出世的佛学和老庄哲理发生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二元的人生观”。由于他在兴趣、爱好上的动摇不定，二重性，矛盾性，导致他在进一步涉猎、学习文化思想，取舍政治主张之时就无一定准则，往往是随见随闻，兼收并蓄。这种吸收态度自然又反过来加深了他感情上乃至观点上的矛盾性。比如，在他的一生中，直到他辞别世界的前夕，都念念不忘文学事业。即

使是在他一帆风顺、满腔热情地进行着政治工作、阶级斗争的时候，他都眷恋着文学，都想有朝一日脱离政治工作岗位，专门从事文学活动。有时甚至感到他并不适宜做政治工作，更不宜于做政治领导工作，因而，不时陷入矛盾的、乃至是苦闷的思想境地。

对瞿秋白早期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还有他当时所接触的文化思想。在这一方面，除了社会主义学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外，在哲学思想上还有瞿秋白本人一再提到的佛学、老庄学说和斯多葛派观点。下而就这些学说对他的影响作一些初步考察。

在宇宙观方面，如前所述，第一，瞿秋白认为宇宙间存在一种“活力”，它无处不在，它实在而完满，它统摄万物，驱策万物，不断前进，永不停息。这个“活力”同《老子》所说的“道”是很相似的。《老子》二十五章阐释“道”时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寂兮寥兮”，就是无声无息却存在于无垠的宇宙之中的意思。“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即说它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按照一定轨道往返不停地运动。《老子》三十四章讲，“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指出这个“道”博大无边，无处不在，万物都从它而出而不能脱离它。《老子》五十一章更明确讲，“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说万物都得遵从它，顺乎它。第二，瞿秋白说这“活力”不具形相而又具形相，即“活力”本身没有形相，但由它制约的万物却是有形相的，因而也可以说它是具有形相的。这也合乎《老子》的观点。《老子》十四章说，“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

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这个“不皦”、“不昧”的“无状之状”，说得很玄，说没有形状的那个“形状”就是它的形状。其本意指“道”虽无感性形式，却是真实的存在。瞿秋白受此启发并改造了这个观点，既沿用了不着相的那个“相”就是它（“活力”）的相这一观点，还指出，“活力”本身虽看不见，但它统摄的万物是有形相的，是看得见的，因此，也可以说“活力”是具有形相的。瞿秋白这一说法与《庄子》的说法更为相近。《庄子·庚桑楚》说，“万物出乎无有。……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但瞿秋白的“活力”与老庄的“道”也有区别。瞿秋白的“活力”、“第三者”，指的是自然规律，而老庄的“道”，既是指的自然规律，又是指的万物的本原。瞿秋白正是在自然规律这一点上承规老子的唯物观的。

瞿秋白的“不着相而着相”的说法，显然还受到佛学某些观点的影响。如东晋僧肇的《不真空论》就说：“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规自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又说：“《摩诃衍论》云：诸法亦非有相，亦非无相。《中论》云：诸法不有不无者，第一真谛也。”<sup>①</sup>这里的“法”指“物”。僧肇认为，从现象上看，万物是有相的，从本质上看，它们又是无相的。

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两次提到他是一个斯多葛派（他译为“斯笃矣”）的信仰者。分析起来，斯多葛派的观点对他有一定影响。在宇宙观方面，瞿秋白认为宇宙万物处在运动发展中，而且是受一种自然规律所制约。斯多葛派就是这样认识的。瞿秋白使用的一些词语同斯多葛派著作都极为相似。如奥

<sup>①</sup>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第1卷，144页，145页。

勒留在《沉思录》中说：“时间好象一条由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构成的河流，并且是一条激流；因为刚刚看见了一个事物，它就被带走了，而另一个事物又来代替它，而这个也将被带走。”又说：“我认为，整体的各个部分，自然地包含在宇宙里的每一事物，都必然要毁灭；但是要在这样的意义下来了解，就是：它们一定经历变化。”<sup>①</sup>另一斯多葛派者爱比克泰德强调万物都得遵从宇宙的意志。他说：“一切事物：大地、海洋、太阳、星球以及地上的植物与动物，都侍奉和服从宇宙。”<sup>②</sup>斯多葛派在自然观上虽然带上唯心主义色彩，但其基本方面是唯物的，它承认自然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看到自然界的发展有必然性，有规律性。而瞿秋白所受的影响，也正是这一方面。

在外国哲学中，除了斯多葛派以外，近代某些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对他也有影响。如法国的柏格森。瞿秋白在《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一文中，以赞赏的口吻介绍柏格森的理论说，生命的进化，不外意识的激潮……。生命的巨流本来是‘瀑流恒转’，意识和物质的激战息息不已，所以有进化。这生命的持续Duree（强制）实在没有一刻息的，没有一刻不进化，没有一刻没有破坏，也没有一刻没有成功，我们人生的生命，也是这持续中间的一份，我们的意识应当向上发展，也没有一刻不向上发展，竭力往“爱”的一方面去，万万不可以堕落到昏睡一方面去。”瞿秋白赞赏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的进化观，而不是其非理智论。他接受的是其积极的一面。这一影响汇同其它学说（如上述）的影响，便形成了他所谓“生命大流”的宇宙观。所谓生命的“活力”，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450页，451页。

② 同上，446页。

近于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所谓“生命的大流”“无穷无尽”，也近似于柏格森“生命巨流”“绵延”不绝的“创造进化”过程（瞿秋白将“创造进化”译为“瀑流恒转”）。

在社会问题上，瞿秋白早年追求的宁静和谐的社会理想，也受到了老庄学说，佛学思想和斯多葛派观点的影响的。佛教以现实社会、人生为罪孽，为苦难，为虚无，认为至寂至静的佛性、佛国才是乐土，才是最高境界，才是永恒的存在。因此，佛教以空无、寂静为本，要人们超脱远离现实，通过自身的静寂以实现虚无的佛的世界。瞿秋白认为社会和自然界都是“求安而动”，而佛教就是主张“求静于诸动”的。<sup>①</sup>老庄学说在许多方面与佛学是相通的，特别是在通过无为实现安宁的理想社会这一点上。《老子》的清静观，是将自然观同社会观结合在一起的。《老子》十六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说万物的自然本性就是静。《老子》从自然界说到人类社会生活，三十一章有：“恬淡为上，胜而不美。”三十七章又说：“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四十五章：“清静为天下正。”他认为，人类社会生活也是尚静的，恬淡为上乘之境，只要无欲无为，天下就自然安定宁静了。斯多葛派在自然哲学上也是否定“动”，只承认“静”。斯多葛派创始人芝诺就曾提出“飞矢不动”的命题。由于他们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静止不动的，所以在社会理想和伦理观念上就轻视肉体快乐而追求精神上的安宁和坚定。塞内卡在《论幸福的生活》中写道：“要知道，肉体上的快乐是不足道的，短暂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不要这些东西，就得一种有力的、愉快的提高，不可动摇，始终如一，安宁和睦，伟

<sup>①</sup> 僧肇《物不迁论》，《中国佛教思想资料》第一辑。

大与宽容相结合。”<sup>①</sup>斯多葛派认为要实现幸福生活，社会成员必须要有良好的教育和坚强的个性。塞内卡就认为：“幸福的生活，就是符合自己的本性的生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精神健全，而且要经常保持健全；它必须坚强刚毅，有良好教养，坚定不拔，必须能够适应情况，必须考虑到身体的需要，又不为担心身体而过分忧虑。”<sup>②</sup>瞿秋白当时几乎完全承袭了这些看法。他以为，要改造中国，就必须使中国人“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打起精神，往前干去，方才有万一成功的希望”。<sup>③</sup>斯多葛派既否定动，又认为世上一切事物都受宇宙间的必然性所制约，所以，他们就主张闲适无为，乃至节欲，禁欲。这种人生态度与老庄的无为观，佛学的出世观是一致的：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现实社会。所以，瞿秋白就很容易将这几种学说融会起来，而成为他当时的一种社会理想，一种人生态度。他的社会理想已如前述。他的人生态度主要表现为他所说的“菩萨行的人生观”，即生活清淡，工作刻苦，不问外间世事，只求心田的宁静。其实，生活清淡，工作刻苦他是做到了，每天工作学习11个小时以上，物质生活也很低劣，但想把社会生活完全置之度外，则并未办到。他后来说，当时寄人篱下的“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sup>④</sup>

佛学、老庄之学、斯多葛派观点对瞿秋白早期思想都有明显的影响，但很难分清其中哪一种学说对他的影响是主要的。

---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190页。

② 同上，190页。

③ 《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新社会》，第1号。

④ 《饿乡纪程·四》。

广闻博识，兼收并蓄，是瞿秋白早年对待文化思想遗产的一大特点。但杂中有同，瞿秋白所接触的这几种学说有着相通之处：它们都教人们顺应自然，服从天命，清心寡欲，乃至禁欲出世，绝圣弃智，通过自我静心养性去解除现世痛苦。这种主张，统治阶级正好利用它来欺骗和愚弄人民，麻痹和解除人民的反抗精神，而人民群众在无可奈何之时也可以利用它来进行自我安慰，或者以此作为对腐朽社会的消极反抗。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以前，其思想虽有所觉醒，然而十分迷惘，心绪恶劣，生活困窘，使他感到枯寂，哀愁，悲凉。这样的精神状态自然就很容易接受上述思想学说。小时，他笃信道教的父亲的言行举止对他也会有一些影响，因此，他较早地接触老子的思想，阅读老庄的作品，是很自然的事。由老庄思想而接触佛学，也是很自然的事，二者在许多地方都是相通的。接受了老子、佛学的一些观点之后，一遇斯多葛派的著作就觉得很契合了。不过，“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渐了解，上述思想观点在他脑子中就逐渐淡化，逐渐为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代替。

## 第二章 执著的追求

### 一 光明的使者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苏联，这是他一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从此，瞿秋白一步一步坚实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瞿秋白到苏联去，是北京《晨报》当时需要派人到苏联去采访，瞿秋白被选中。当时，他对社会主义苏联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识到苏联是人类的曙光，感到自己一直追求的理想社会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希望去进行实地考察，把它的成功经验介绍到国内来，借以拯救腐败的祖国。他在《饿乡纪程》里多次叙述到苏联十月革命对他的影响、震动和吸引。他说他在出国之前，总感觉到有一种东西萦绕着自己。“‘他’使我醒，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儿，他变成了一个‘阴影’朝朝暮暮的守着我。我片刻不舍他，他片刻不舍我。这个阴影呵！他总在我眼前晃着——似乎要引起我的视觉。”<sup>①</sup>这里的“他”，就是指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

<sup>①</sup> 《饿乡纪程·绪言》



对苏联的革命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所以当《晨报》招聘记者前往采访时，他欣然应招。他去苏联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去了解、认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刚踏上旅途时便热情地写道：

同伴们，我亲爱的同伴们呵！请等着，不要慌。阴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同伴们，请等着。这就是所谓阳光，——来了。我们所看见的虽只一线，我想他必渐渐的发扬，快照遍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请等着罢。

……

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从来没有看见的阳光，居然露出一线，那“阴影”跟随着他，领导着我。一线的光明！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红花染着战血，就放出晚霞朝雾似的红光，鲜艳艳的耀着。宇宙虽大，也快要被他笼罩遍了。……

……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饿乡纪程·绪言》）

尽管苏联当时由于革命刚刚成功，万事待兴，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社会秩序混乱，经济萧条，物资匮乏，我国反动派对此又大肆渲染，一般人都认为苏联面临严重的困难，是饥饿之乡，瞿秋白的不少亲友也劝他三思而行，不可贸然前往，甚至认为他要去苏联，简直是“自趋绝地”，然而，瞿秋白毅然决然，毫不动摇。他说：“我既挣扎着起来，跟着我的‘阴影’，舍弃了黑甜乡里的美食甘寝，

想必大家都以为我是疯子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知道：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乡；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饿乡’。我没有法想了。‘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我愿去，我不得不去。”<sup>①</sup>他认为他之去苏联采访，不仅是主观的热情，而且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即便生活艰苦，甚至可能会遇上什么不测的危险，为了祖国的未来，他愿为先锋，愿为前驱。年轻的瞿秋白，此时大有普洛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间的壮志激情。

当他决定承担《晨报》驻苏记者之后，十月初，先去山东济南探望流落在那里的父亲。夜里，与父同榻，整整谈了半夜。随后在天津、北京等地向亲友告别，并抽空整理旧时写的诗、文章留给父亲，作个纪念。10月16日同俞颂华、李宗武一道离京启程。10月20日到达哈尔滨，在哈尔滨滞留五十多天。12月10日离哈尔滨继续前行，13日到达满洲里。16日离开满洲里，18日到达赤塔。在赤塔作了有意识的停留，以便了解苏联当地情况。1921年1月4日离开赤塔，1月25日到达莫斯科。

从1921年初到1922年底，瞿秋白在苏联渡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为了便于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在这两年里，瞿秋白除了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兼任了一段时间的政治理论课翻译和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的助教工作外，主要工作是采访苏联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向国内读者报道苏联现状。从1920年10月18日在哈尔滨写的第一篇报道《哈埠见闻中之珲春事件》起，到1923年1月25

<sup>①</sup> 《饿乡纪程·绪言》

日回到北京写的最后一篇报道《赤俄之归途》止，先后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章上发表了50篇通讯报道和专论，计20余万字。此外，还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俄罗斯革命记》等4本专著。

瞿秋白在苏的两年，工作认真，刻苦，十分勤奋。在国内已经严重的肺病，到了苏联后，愈加严重了。1921年3月，他就感到“奄奄有些小恙”，至7月，整整卧床1月。8月4日再度吐血。体质上的衰弱影响到精神萎靡，常常有心神不定，焦热烦闷，恍恍惚惚的感觉。医生诊断说，他的一叶肺已经腐烂，最多还能支持二三年，劝他“回国为是”。但他仍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在医院里仍千方百计地学习、思考和写作。出院后，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坚持调查访问，阅读和写作。不久，病魔再次将他击倒，不得不于1921年12月15日住进莫斯科高山疗养院。而此时，正值共产国际在苏联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之际（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他觉得必须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于是不斯重病，从莫斯科高山疗养院赶到值得堡参加会议。但病情不断恶化，不断吐血，大会快要结束时又再次被送回高山疗养院。他不禁大声疾呼：“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

瞿秋白在他50篇通讯报道、述评、专论和报告文学《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中，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的状况，热情地赞颂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苏联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苏维埃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有力的革命手段清除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又以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抗击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平定国内的白匪叛乱。创业是艰

难的。瞿秋白广征博引各种文件、报告和著述，扼要而全而地阐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的这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文章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光明，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苏联，信仰马克思主义，以苏联的今天为中国的明天，并为实现这一美好的未来而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这是瞿秋白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虽然在他以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苏联革命情况也已有人著文介绍，但是，如此系统的，真实的，生动的而且是倾向明显的介绍，他还是第一个。因此，他的这一功绩具有筚路蓝缕的历史意义。

瞿秋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指出时事甫定，经济形势是严重的。

瞿秋白等人还未进入苏联，尚在满洲里的时候，便从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长刘绍周口中听到苏联当时经济生活的困窘情形了：“欧俄经过三年大战四年内乱，经济状况破坏得不得了，那时却正是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的关键。弗兰格尔已经败退，东的煤区已入赤军之手，从此波兰战事亦已停止，可以努力于经济改造了。当时——据刘君说——已比一九一九年冬天，人民生活要好得多。国内三种人：一、兵及工人，播家所最注意的，二、农民，是当时俄国中最富有的，三、智识阶级，也有很苦的，也有受优待的。至于一九一九年冬天刘君还吃过两个月马食料呢。”<sup>①</sup>他们进入苏联后的第一站是赤塔，而赤塔的萧条就十分突出，他写道：“出车站空场上，远远就看见东零西落的房屋，战争时烧毁的建筑，残石剩础，凄然的

<sup>①</sup> 《饿乡纪程·九》

哀诉资本主义的破产呢。”“赤塔上乌金斯克一带，从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来，常常闹乱子，有钱的人——资产阶级——都已逃走了。军事时代中，经济上向例是起恐慌的，何况几次三番的这样乱呢。我们到时，正值乱事刚刚平静，还没恢复，黄昏时分静悄悄的街上，只偶然见一盏两盏电灯，寒气侵人，脚下是冰雪，飕飕的风声，越显得市面的萧条。”赤塔如此，伊尔库次克也是如此。“只见荒凉的街市，一片雪影，足迹都非常之少，可怜的店铺掩着双扉，从外面看去，好象都是没人住的。”在这里，他们吃到的黑面包，“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①

瞿秋白在《饿乡纪程》和其他一些报道中，用了不少篇幅反映苏联在吃、穿、用等方面存在的严重匮乏情况，而且写出部份知识分子的责难和不满情绪，一些敌视分子借此散布敌对情绪，人民群众也时有怨声。瞿秋白在反映这一现象的同时，探索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连年战乱，刚刚平定，奄奄一息，正如久病之后，勉强得一点生机，元气亏耗，病根还没有全去。”②其次还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物资奇缺，货物很少，为了避免商业上的投机，避免通货膨胀，也为了保证政府机关和城市居民起码的粮食需要，“所以不得不以食粮等营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凡是商人都必须呈报存货的数量，并受政府监督卖价。”③政府对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严格监督和集中购销，有好的一方面，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人民的基本需要，但也有不好的

① 《饿乡纪程·十三》

② 《饿乡纪程·十二》

③ 《饿乡纪程·十一》

一面，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瞿秋白在文章中多次写道，当时的商业事实上已被禁止，一切小买卖都不准做。于是，市场就更加萧条；群众所需要的许多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盐，糖，布，烟等十分紧张。总之，苏联当时的经济情况是很不好的，真乃饿乡之地。瞿秋白毫不掩饰苏联当时的严重困难。

## 二、指出情况正在好转，前途是光明的。

瞿秋白既真实地写出苏联政府在军事威胁解除之后所面临的严重的经济问题，又写出苏联现实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形势不断好转，前途是乐观的。当他由东而西，日渐靠近莫斯科的时候，他就愈来愈感觉到形势一日好似一日。他写道：“西来渐渐觉着有生意，车站上往来的行人也穿着得比较好些，整齐些，不象东西伯利亚的穷窘形状了。”<sup>①</sup>

瞿秋白在报道中表明，形势好转主要体现在，首先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瞿秋白1922年4月19日写的评述性报道《赤俄之第四年》（《晨报》1922年8月16日——18日）就指出，经过革命政权多方努力，特别是十次共产党大会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政局的稳定。文章指出：在新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团结力复现，行向经济的恢复，努力共同担任最困苦艰难的责任”，“农民暴动因麦粮课税法的公布，逐渐平息”。“同时外交状况改了局面，三月十六日土耳其条约签字，三月十七日俄波和平条约及俄英通商条约签字。”总之“新经济政策实行，革命史上另开一篇了。”几天以后写的《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晨报》1922年8月19日—23日）中也指出：“十月革命的新时期到了，国内战争国外封锁已定，

<sup>①</sup> 《饿乡纪程·十四》

劳农政府的政治上的基础稳固，——国家的新形式成就，法学上的意义当更进一层，从怒潮时代入于正轨的‘过渡国家’。”

其次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由于内外战争和富农、资产阶级的破坏，经济状况很不好。后来，由于苏维埃政府随着形势的变化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尤其是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就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活力。瞿秋白1921年5月1日所写的《赤都心史·十二：劳工复活》里对这好转作了具体描述：“复活节是俄国旧历中最大的一佳节，家家户户都相庆贺，今年恰巧和国际的五一节同在一日。俄俗凡逢复活节的一星期，每家设着盛筵，种种食物，鲜美丰盛。……革命后战祸相承，政府行集权制及劳动券，已经两三年没有大大的过这佳节，食物菜膳不容易取得。今年第一年行新经济政策，开放商业，民间值此佳节，突现活泼泼的气象。”

“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人家里，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面包是常餐便饭唯一的食品，中国茶是请客的佳味。现在丰富得多了，可是非得有钱不可。”当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之后，经济形势就愈来愈好，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了。瞿秋白在《劳农俄国之经济前途》（《晨报》1922年10月12日）一文里对下一年度（1922年夏至1923年夏）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展望，让人感到欢欣鼓舞。他说，下年度“全俄当有纯粹的余粮五万万七千一百万蒲（特）”，他认为，这样一大批余粮“已经大足以舒展俄国的经济生活，利用之振兴实业，创办电话，购取国外的机器等，来年的经济状况大可乐观。”

### 三、是指出苏联重视文化建设

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三：兵燹与弦歌》中，引用卢那察尔斯基回答他们的提问的话，以概括说明建政初期文化界状况

以及苏联党和政府的文化政策。“革命后我们即日促学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最近几年来学术上的发明也还不少，比如：X 光线，化学原子锂的成分，医学上癌病治疗法等。”……“荷兰科学院曾经派过学生来。我们亦派学生到欧美留学，国内处于破坏状态，纸张印机都很缺乏，所以又设法在德国开了一俄文书籍印刷局。”瞿秋白报道说，苏联政府不仅努力建设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且十分尊重历史文化，尽力继承和发扬文化遗产。如距离莫斯科四百余里的列夫·托尔斯泰邸宅，在革命时也保存得完完全全，革命胜利后，辟为托尔斯泰陈列馆，并专设一事务所管理。此外，尽管无产阶级政权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上有他的党性原则，有着明确的阶级性和艺术标准，但是，也并不盲目排斥其他阶级和其他流派的艺术。而是让各派艺术同时存在，互相竞赛，让人民群众去鉴别去取舍。戏院上演的戏剧，有卢那察尔斯基的《国民》等政治性很强的作品，也有将来主义（现译为未来主义）派的剧本。诗坛上，未来主义派诗人玛雅可夫斯基也很活跃。这些做法表明无产阶级和他的政权对人类文化这一复杂现象的深刻理解，以及无产阶级博大的胸襟。瞿秋白指出，由此可以看出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污蔑的是对人类文化的残害，刚刚相反，无产阶级最懂文化，最尊重文化，他要任何一个阶级所不能比拟的更高阶段上充分发展人类文化，要建设出此前任何一个社会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

#### 四、苏联积极推行和平外交政策。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世界各国对于这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很不理解的，加上帝国主义列强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对苏联政府进行武装干涉，并进行经济封锁，企图扑灭这一势必燎原的



革命火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党和政府为了争取各国人民对他的了解和支持，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也是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瞿秋白在他的采访活动中对此十分关注。1920年12月13日，他们一行刚到达满洲里时，便访问了中国边防处派驻俄军事代表张斯磨。“我们见张斯磨，据他说，中俄外交本是极有希望的，可惜中国政府畏葸，没有确定的计划方针：‘俄莫斯科政府，很愿意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开始友谊的谈判，恢复通商’”。<sup>①</sup>瞿秋白由此表明苏联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它不需要奴役、侵略别的民族，它要放弃沙皇帝国政府所抢夺到的权利，而同一切民族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瞿秋白还进一步指出，苏联政府愿意同中国这样的被压迫民族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瞿秋白在赤塔访问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时就得到这一明确认识。沙都夫告诉他们：“中东路，赤塔政府决定主张以条约的形式归还中国，中俄有密切的邦交，必须协力抵抗日本的帝国主义”。远东共和国食粮部长葛洛史孟也强调指出：“俄国认为中国为全世界最亲密的友邦，愿意和中国为同盟国——远东共和国尤甚，——竭诚希望和中国通商。”<sup>②</sup>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苏联政府并不急于争取他们的承认，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商务往来是需要的，这有利于活跃国内经济，尽快摆脱经济困境。所以，苏联政府当时的外交重点即放在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建立通商关系上。他在《晨报》1921年9月连载的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希望是暂由政府 and 资本主义各国妥协，利用外

① 《饿乡纪程·九》。

② 《饿乡纪程·十一》。

资，发展工业，然而世界大势能否如共产党之愿，还是一大疑问。”一年以后，他在《晨报》1922年9月9日上发表的《海牙会议与俄罗斯》一文中又报道了苏联这一方针：“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方针，乃在于竭力达到与世界资本家订总契约，以一定限度以内的让步，求得从速恢复俄国经济的可能。假使世界资本家磨折过多，劳农政府也就不客气，自能订单独契约”。从瞿秋白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战略考虑与策略措施相结合、相统一。

#### 五、报道了共产国际运动和苏联国内党派斗争

从瞿秋白的一系列文章中看出，瞿秋白把共产主义国际运动既看作是国际间的一件大事，又看作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为苏联当时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指挥所，后盾力量。所以瞿秋白将国际共运作为他重点报道的内容之一。他1921年6月23日写的《赤都心史·十六：莫斯科的赤潮》热情地描述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有关集会。他写道：“十月革命爆发，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这几天正是赤潮高涨的时候。一九一九年以来万国革命的社会党已经屡次会集于此。现今，一九二一年的六月，在此城里又要开四个国际大会：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二次大会，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十七日，各会各国代表差不多都到齐了；在赤场行阅兵典礼欢迎代表团。”“昨天共产国际行第三次大会开会式。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

瞿秋白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晨报》1921年6月22日至9月23日）这篇三万余字的长篇报道中，对国际共运的产

生，历史，现状，方针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评述。

他首先分析了苏联共产党为什么热衷于共产国际运动。他写道：“俄罗斯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的围困之中，既因本国工业发达程度的浅，又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窘急的状况已到极点，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障碍，非常之多，所以唯一的‘出路’只有世界革命，——何况俄罗斯十月革命本含着世界的国际之性质呢？因此在俄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有政府的外交及共产党的外交之分别。共产党的外交机关就是第三国际会，——以联络各国左派的社会党运动全世界的社会革命为职志。”瞿秋白以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决议案为根据；评述说：“俄共产党一方而为振兴本国的工业，救济目前的经济恐慌，——立共产主义建设的基础起见，使苏维埃政府和各资本主义政府接洽妥协，行租借地政策。一方而以第三国际会为利器，联络各国的社会党，抱定左派的宗旨，促进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革命。”

其次，介绍了“国际会”（Internationa）的发起与沿革，以及当时世界各国共运情况。他在分别介绍了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捷克斯拉夫，巴尔干半岛，史刚犹纳维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吉利，美利坚等地区的共运情况之后，评论说：“对于右派社会党的态度，俄共产党是早已决定绝不妥协的”，而他们“对于更左的无政府党及工团主义派的态度”，则由于看到这些人在反对克伦次基政府、反对少数派（孟塞维克）时帮过忙，所以当时是对他暂时联络，后来他们的一部分人仇视现政府，所以就不能再那样对待他们了，而对国外的这些派别，也还要暂时联络。

瞿秋白通过以上报道力图说明：二十世纪以来，共产主义

革命运动已在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只要把握住正确航向，坚持不懈地斗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是定能胜利的。

瞿秋白在采访中还注意到苏联党政生活中另一个重要问题，以让国内读者对苏联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反对各种右派政党的斗争，已成为当时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他还在旅途中的时候，便觉察到这一问题，并作了如实反映。他在1920年11月写的《俄国远东之统一问题》、《赤塔统一会议与右党》、《远东统一之将来》等通讯中就明确指出，在成立远东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孟塞维克、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左派、西伯利亚社会革命党、国民社会党等右派政党的反对、阻挠。这些右派政党同苏联共产党形成公开的对峙局西。

各右派政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反对是多方面的，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的反对更加猖狂，不择手段。因此，对于右派政党的斗争就显得十分必要和严重。瞿秋白有感于苏联当时的斗争，写了专论性质的通讯对右派政党的历史和现状、本质和危害进行了系统的反映。《反对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党》（《晨报》1921年8月24日、25日）一文以社会革命党为例，解剖了它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反动性。

瞿秋白在有关苏联党派斗争的报道和专论中，十分清楚地表明，在苏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只有苏联共产党，即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方针才是正确的，才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才是合乎苏联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只有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可能取得胜利。瞿秋白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很不容易，这说明他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革命实践的能力都已达到相

当的高度，这为他世界观由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二 内心历程

瞿秋白在《饿乡纪程》的后记中说：“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的确，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既反映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又记叙了自己在思想上的感受。但是，《饿乡纪程》的内容，主要的还是如实地报道苏联革命后在各方面的现状，尽管自己从苏联现实的变化中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肯定它、赞扬它，然而并未用较为集中的笔墨写下自己有些什么具体的思想变化。真正较为具体而又较为直接地反映他思想上的变化的著作是他到了莫斯科以后写的《赤都心史》。他在《赤都心史·序》中说过：“《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思所感”即他思想感情上的变化和情状。《赤都心史》长达7万余字，其中几乎有一半的篇幅是记叙自己的“所思所感”的。在这期间，他还写有几十篇通讯报道。

所谓“心程”或“心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认识，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启示下所引起的思想上的震动、感想和思考。这两方面虽然并未清晰地呈现出一条思想发展脉络，但却明显地反映出瞿秋白的思想正在经历一场严峻的新与旧的矛盾斗争。

思想变化的第一种情况主要反映在他的几十篇通讯和专论中，这些文章十分清晰地表明，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和认识，已由出国前的朦胧状态逐渐变化为一种清晰的具体的观念和理论；已经由出国前的一般性倾向发展到明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与伟大，公开地热忱地支持和拥护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方针，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胜利；已经从出国前的一般印象、笼统感觉进入对社会主义的具体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切实理解，并认定它们的优越性。

思想变化的第二种情况主要反映在《赤都心史》中。在这部著作里，瞿秋白专门用了一些篇章和诗词表白自己的心迹，发抒自己的感情。这些诗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自己出身的阶级，对旧我的解剖认识，一部分是坦率地表露自己在世界观、人生观新旧交替中的苦闷和愿望。

对于他出身的那个“士的阶级”，一年以前，即他刚离国之时，在《饿乡纪程》中只认识到这个阶级必然没落，现在，他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进一步分析出它的历史发展和这一阶级既剥削人又被人剥削的二重性，还能看出这一阶级的分化。他在《赤都心史·二九家书》中写道：“中国曾有所谓‘士’的阶级，和欧洲的智识阶级相仿佛而意义大不相同。在过去时代，中国的‘士’在社会上享有特权，实是孔教徒的阶级，所谓‘治人之君子’，纯粹是智力的工作者，绝对不能为体力劳动，‘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现在呢，因为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加以外国资本的剥削，士的阶级，受此影响，不但物质生活上就是精神生活上也特显破产状况。士的阶级就在从前，也并没正式的享经济特权，他能剥削平民仅只因为他是

治人之君子，是官吏，现在呢，小官僚已半文不值了，剥削方治换了，不做野蛮的强盗（督军），就得做文明的猎贼（洋行买办）；士的阶级已非‘官吏’所能消纳，迫而走入雇佣劳动队里；那以前一些社会特权（尊荣）的副产物——经济地位，就此消失。并且，因孔教之衰落，士的阶级并社会的事业也都消失，自己渐渐的破坏中国式的上等社会之礼俗，同时为新生的欧化的资产阶级所挤，已入于旧时代‘古物陈列馆’中。士治阶级于现今已成社会中历史的遗物了。”在这一段文字里，可贵的是他不仅指出“士的阶级”随历史的发展必然破产，必然分化，而且由此产生一种推断，相信破落下来的、分化出来的“士”迟早是会无产阶级化的。他说：“总有那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那时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

对于他自己的解剖和认识，不仅是真诚治而且是严厉的，也合乎实际。他认为：

第一，从思想体系上讲，“‘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在《饿乡纪程》里，他就对自己早年的思想根源作过分析，认为自己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动摇崩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大量侵入的时代，因此，“幼年的社会生活受这影响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国文化的产物”。及长，又广泛地接触西方文化，继而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影响，所以，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而对于社会问题，已有自己治独立思考了，已不可能去做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他说：“固然西欧文化的影响如潮水一般，冲破中国的‘万里长城’而侵入中国生活”，“然而这一青年的生活自幼混合世界史上几种文化的色彩，他已经不能确切的证明自己纯粹的‘中国

性’，而‘自我’的修养当有明确的罗针。”<sup>①</sup>“当有明确的罗针”，是自他参加“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后在思想上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所谓“新时代”的活泼的稚儿，就是愿意做一个积极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而当时他最直接的愿望是将国外进步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他所说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政治理论，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等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这时他已明确意识到自己已“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sup>②</sup>即是说，他这时所要传播的新文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革命理论以及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等等。由此可见，他所说的“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实际上就是立志做一个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步青年。

第二，从人生态度上讲，主张积极的奋斗。瞿秋白从青少年时期以来都主张发展个性，但早年的发展个性，只不过是听任个人心灵的自由驰骋，在社会实践中，无非是讲求泛爱、绝对的爱，等等。而现在认识到个性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它们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他说：“‘我’的意义：我对社会为个性，民族对世界为个性。”又说：“无‘我’无社会，无动的我更无社会。无民族性无世界，无动的民族性，更无世界。无社会与世界，无交融洽作的，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与世界，更无所谓‘我’，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文化。”<sup>③</sup>这里，瞿秋白一方面既看到无“个性”，无“我”，

① 《赤都心史·“我”》。

② 《赤都心史·“我”》。

③ 《赤都心史·“我”》。



就无社会，社会正是由积极的、发展的、不断进步的若干“我”组成的；同时又看到假如无环境，无社会，无协调合作的、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也无“我”，无所谓民族，文化也不会存在。即是说，瞿秋白这时已将注意力放在社会的改造问题上去了，放在正确处理个性与环境的关系上了。

他认为处理个性与环境的关系有三种情形。一种情况，“有人既发展自我的个性，又能排除一切妨碍他的主观的困难环境而进取，屈伸自如，从容自在”；第二种情况是，“有人要发展自己的个性，狂暴忿怒面红耳赤的与障碍相斗，以致于失全力于防御斗争中，至于进取的创造力，则反等于零”；第三种情况是，“有人不知发展他的个性，整个儿的为‘社会’所吞没，绝无表示个性的才能。”他认为，第三种情况是应当否定的，这是一种无知，他们不知应当发展自己的个性，而对于环境，或对于外民族的什么东西，只是盲目地崇拜，不问好坏，他们“如蝇之附臭，汨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第二种情况也不足取，这种人虽然也要求发展个性，发展本民族的特点，但是不辨好坏，往往坚持落后的民族文化，结果导致个性的毁灭及民族性的消失。不言而喻，他本人是采取第一种。他说：既然要“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他就要“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即是说，他要在新旧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博采各家之长，去掉各家之短，成就一种进步的新文化。用这种办法去使环境为发展个性服务，同时又在发展个性、民族性之中促进环境，外民族的发展。这就是他说的“既发展自我的个

性，又能排除一切妨碍他的主观的困难环境而进取”。总之，他的态度是：“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很的奋斗者。”<sup>①</sup>

从理论上他认识到他必须做一个新时代的活泼稚儿，他必须做一个积很的奋斗者，然而在实际上他又觉得自己同这一理想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因而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严厉的反省和批判。

瞿秋白在《赤都心史》的三十四节《生存》、三十五节《中国之“多余的人”》等章节里严厉地批判自己人生态度还不够积极，思想上还存在若干剥削阶级意识。在《生存》一节里，用屋里的一只白猫代表自己的深层意识责问自己：“哈哈！你以为你‘活着’么？懂得生活的意义么？……你并没有‘活着’，你不过‘生存着’罢了；你和一切生存物相同，各有各的主观中之环境，而实际上并不懂得他。”接着又指出，“你”现在生活在一个由别人劳动所构造的环境里，清闲，享受，还自鸣得意，还认为非常之好！殊不知“你”的享受正是建筑在毁坏别人应当有的享受的基础之上的，甚至于为了自己的享受而残杀别人，或者互相残杀。而且不满足，还“想再多得一些，再多得一些，再多得一些！”于是，一方面既然要积聚许多别人的劳动成果，一方而就必然失去一个人的“天然的本能”，以及“与天然奋斗的本能”，即是说，一个人为了满足享受的欲望，就要去剥削人；就会失去人的本性，就会失去向自然界索取的斗争精神。他这一反省使自己大为震惊。

瞿秋白对自己的批判有一些过头，1921年至1922年间，瞿秋白思想上虽然还残存着“士的阶级”的某些旧意识，但毕竟与

<sup>①</sup> 以上引文均见《赤都心史·三三：“我”》。

“五四”运动前大不一样了。但他能如此严厉地批判自己，表明他思想上已出现一次新的觉醒。他的新觉醒不仅表现在对自己残存旧意识的批判上，而且还表现在思想的矛盾上。这个思想矛盾，便是他说的“心智不调”。心，批感情，智，指理智。产生“心智不调”的原因，他认为有两个。一是个性气质问题，二是社会环境问题。从个人的性格气质上讲，他说：

“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情性的动，无限量，无限量。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亦坚固得很，‘总应当’脚踏实地，好好的去实练明察，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sup>①</sup>从社会环境上讲，他认为，他们这样一批进步青年所从事的传播进步文化、改造社会的工作，“是开天辟地草创的事业”，然而，“此中的工作者，刚一动手，必先觉着孤独无助，工具破败，不堪适用，一切技术上的设备，东完西缺，”总之，“社会不助个性。”他认为，本来个人气质上就存在“内的不协调”，再加之“社会的无助”，于是“更斲丧‘我’的元气”。于是虽然自己有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远大理想，有批一番伟大事业的满腔热忱，但又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现实同理想，能力同热情，都很不一致。进而对自己的才能，对自己的作用也发生怀疑，乃至否定。

瞿秋白“心智不调”的产生，除了以上讲的个人性格气质和社会环境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情况不可忽视：他的健康状况。可以说，病体难支，是他感到力不从心，无所作为的直接原因，或者说是这一苦闷、矛盾思想的心理因素。瞿秋白的肺病，在国内时就已经很严重，多次咯血。到了苏联后，由

<sup>①</sup> 《赤都心史·三五，中国之“多余人”》

于气候不适，工作太重，饮食营养较差，病情更加发展了。这一情况他在一些文章里有不少记载。仅以《赤都心史》中《南国》一节说：“我回寓来觉着更不舒服。前几天医生说左肺有病，回国为是。昨天不是又吐血么？七月间病卧了一个月，奄奄的生气垂尽，一切一切都渐渐在我心神里磨灭”。“还我的个性，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唉，北地风寒积雪的气候，黑面烂肉的营养。”《归欤》一节里更明白地反映出由于病体深重不能很好工作的苦恼。“病体支离，要做的，应当做的，也都不能做。”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都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我一个病人，为精力所限，为才力所限，为学识所限，在这八个月内的成绩如此而已！”瞿秋白当时正满怀热情，急于做出一番惊人的事业，却受到疾病如此沉重的打击，而又欠缺“既来之则安之”，泰然处之的养病哲学，于是，不免烦躁、苦闷，感到力不从心。

瞿秋白这个时期思想上的矛盾，很明显地反映在他这期间所写、所译的那些诗篇中。收录在《赤都心史》中的有六首创作，四首译诗。这些诗，一方面表示他要如大海行舟，勇于搏击，不断进取的精神，一方面又发出“人生空泛”的感叹，重新勾起以前对自然、对宁静无为的向往。《秋意》（1921年3月12日）赞赏“果毅沉潜的活力，”人生要如秋意萧萧中的月光，穿过纤云薄翳，放射出它万丈光华。《皓月》（1921年4月10日）也赞赏人生应当象广照沧海的明月，它的光波应当是广阔无际的。《安琪儿》（1921年6月8日）赞美给人间带来福音的安琪儿，并由此想到自己应当“长抱赤子心”，即便可能是“悲泪盈洪荒”，也要将清纯的歌声永留人间。《东方月》（1921年9月16日）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永远友爱相处，“原

万族共‘婵娟’，但愿‘婵娟’年千亿。”他祝愿欧洲和亚洲，苏联和中国，团结一致，永不分离。《海》（1922年3月10日）的思想更为深邃：人生应如大海行舟，尽管浪声汹涌，狂澜无垠，也要如复生的魔舟，再接再厉。他翻译的高尔基的《阿弥陀佛》（现译为《市侩颂》），也是讽刺那些庸庸碌碌的醉生梦死的人。但是，通过他的译诗又反映出他思想上仍有消极的一面。虽然这些诗的思想倾向是原来就存在的，但瞿秋白要将它们翻译出来作为他的《赤都心史》的一部分，显然是对这些诗有所共鸣，以为它们还能代表自己某些心意。如《烦闷……》（莱蒙托夫作，1921年4月5日译）对眼前暂时的快乐不满足而对永久的希望又感到不可捉摸，觉得“人生空泛”，因而产生烦闷。1922年1月9日、12日相继翻译了邱采夫的《一瞬》和《寂》。前者宣扬崇拜“自然”，认为人与“自然”亲近就能纳宇宙于胸怀之中，就能获得清福。而后者则宣扬一个人应当沉于自我意识之中，人生是不可说明的，理论是虚假的，只要你自己会生活，自己尊重自己，一切就具备了。因此，绝不要让外界的事物扰乱你宁静的心灵。除了以上译诗外，他还于1922年2月13日写了一首《俄雪》，叹息人与自然界隔绝了。表现一种倾慕大自然的意趣。

应当看到，尽管瞿秋白当时思想上有矛盾，有苦恼，但在实际行动上仍然是积极的，向上的，对生活，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即便住进医院，他也一刻不忘工作，一刻不忘努力学习。1921年10月12日写的《智识劳动》一节中说：“……肺病是要‘养’的。可是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他在《赤都心史》的最后一节《生活》中更鲜明而又强烈地表现自己的积极态度。他说：

“世界是现实的，人是活的。”“五四”前后，他强调“静”，以为“动”是为了“静”，人生、社会虽然充满不安，动，但动是为了求安，求静。将“静”、“安”视为目的，视为归宿，视为终结。现在虽然仍然认为动是为了求静，但认识到生活中永远不可能达到“静”，因此，动是永久的，绝对的，生活就是“动”。他说：“生活是‘动’，求静的动，然而永不及静的。”在生与死，积极与消极之间，他鲜明地主张：“‘动’而‘活’，活而‘现实’。”这意思是说，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就会有真正的生活，有了这积极的生活，就会有现实的世界。他认为，这“乃真正的生活”。瞿秋白这时对于宇宙间动与静的关系的看法，已与前期观点截然相反，前期带上明显的形而上学烙印，这时已属于唯物辩证法。

综上所述，瞿秋白从1920年10月离国赴苏到1922年底这二年多的时间内，思想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主要表现在：

第一，旗帜鲜明地歌颂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坚信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完全胜利。并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的光，它将照亮寰宇，它是中国的榜样，中国应当向苏联学习。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有了更多的了解，更深的认识，坚定了对它的信念。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表示信赖和拥护。

第三，能够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和回答问题。

第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的革命现实的启迪下对自己思想上的旧意识，剥削阶级意识，对所出身的士大夫阶级、对中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认真的、严厉的批判。

第五、尽管思想上还残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某些哀婉，冲淡情调，思想上还有矛盾，但人生观的基本方面仍是积极的，向上的，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满怀信心。

总之，在这两年里，瞿秋白的思想已经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隔着纱窗看晓雾”，到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有了一个切实的、具体的认识 and 了解；其社会理想由早先的多种学说、多种观点集中到科学社会主义；其人生态度由早先那种空泛的议论、感叹转变成为传播新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说）做着实际的工作；而更主要的一点是此时的瞿秋白，前进的方向、奋斗的目标明确了，那就是立志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因此，我认为，到1922年底，瞿秋白已基本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即由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了。对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进步知识青年来说，考察他们世界观是否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有两点是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看是否初步具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是否初步懂得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能够初步运用这些观点分析一定实际问题。另一点是看是否在实际上赞成和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实际参加一定的革命工作。我以为这两点大致能够概括我国“五四”时期、乃至二三十年代进步知识青年思想转变的基本面貌。用此考察瞿秋白，大概也是恰当的。此外，瞿秋白参加中国共产党，也是他世界观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存在着有的人在组织上入了党而在思想上并未完成世界观的转变这样一种情况，但就一般状况来说，组织上入党确乎表明一个人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至少是表明一个人已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当然，绝不能说入党之日便是世界观转变的完成之时，因为思

想转变是一个发展过程，不可能用某日某时来截然划分。瞿秋白世界观的转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五四”运动高潮时期，即1919年4、5、6几个月，这是他思想上的真正觉醒阶段。第二个阶段，“五四”运动后期至1920年10月出国时，这是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这个阶段决定了他的基本倾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向往社会主义革命。第三个阶段，1921年至1922年，这是他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完成期。

关于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一般都是说1922年2月。陆定一同志195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就说“他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尚昆同志1985年6月18日在党中央举行的纪念瞿秋白就义50周年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也说瞿秋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的附记〈记忆中的日期〉里却写道：1921年5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9月，任东大翻译始正式入党。具体情况大概是这样：1921年5月，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但是，从1920年8月起，共产党小组（或称共产主义小组）就陆续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张太雷在1920年9月就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早期党员之一。由于张太雷同瞿秋白均为常州人，又是中学同班同学，曾一块抨击时政，议论救国道理，后来在“五四”时期又相互鼓励，因此，张太雷对瞿秋白十分了解和信任，所以当张太雷1921年5月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三国际）期间，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组织是很可能的事。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此时尚未正式宣告成立，张太雷介绍参加的仍只是共产主义小组之类名目的成员，当时在“东



大”这样的中国同志集中之地也可能没有建立这样的党的小组，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之后，才在“东大”有中共的正式组织关系，这时，即1921年9月，瞿秋白才“正式入党”，但可能到1922年2月，瞿秋白才补办了正式入党手续，所以均以1922年2月为准。有的著述说，1920年5月为预备党员，9月转正。此说不可信，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会有什么预备期。有的又说瞿秋白1920年5月参加的是俄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才转入中国共产党。此说也不可信，因为张太雷怎么会在他刚去莫斯科的时候就介绍瞿秋白加入俄共（布）呢？而且张太雷本人也不是俄共（布）成员。

### 三 《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的艺术特色

《饿乡纪程》以娓娓而谈的笔调形象而又真实地报道了作者赴苏途次的所见所闻，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集。全书以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为中心，旁及人情风物，自然景色，个人感慨，轶闻趣事，全而地反映了苏联社会的现状。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感到生动、亲切，受到启发和教育。

《赤都心史》也是一部报告文学集，只不过较之《饿乡纪程》来，它的议论更重于叙述，许多篇章是由一个事件生发开去，着重阐明它的历史沿革，现实意义和革命价值，有的篇章则完全离开对苏联社会的报道而直接抒发自己当时的感想，解剖自己的深层意识，表明自己的愿望。因此，《赤都心史》具有杂感的成分。但不管它议论色彩如何浓厚，它在整体上并没有脱离报道的性质，它所有那些议论都是由苏联现实的具体事件，由苏联当时的某一问题引发的。每篇中的议都与苏联当时

生活中所发生的某一个事件联系着，这些文章既议了自己的志，也论了苏联的政，还反映了苏联的某一事件，某一问题。除这些以外，无论是《饿乡纪程》还是《赤都心史》，感情色彩都十分浓厚，它们既是对苏联现实的反映，又是作者同苏联现实产生共鸣以后的感情产物。总之，它们的文学性是突出的，明显的。作为两部文学著作，它们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

一、严峻的真实性和鲜明的部向性相结合。瞿秋白在写作这两部作品的时候，始终不忘自己的新闻记者身份，他总是力图在自己的一切报道中向国内读者真实地反映苏联当时的情况。在他亲眼目睹的和他所采访到的事件中，有的令他高兴，有的令他不高兴，有的合乎他的预料，有的则出乎他的部象，但他绝不以个人的喜恶为转移，任加掩饰或夸张，而只要是能表明苏联当时的真相的，能体现苏联革命实质的，他都一概予以如实地反映；有的地方，有的事件，真实到几乎不顾情面，不计后果，使人难堪的程度。比如，两部作品都以主要笔墨写出苏联革命的、光明的、朝气蓬勃的情状，但同时也直截了当地写出苏联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饥荒，粮食匮乏，生产荒芜，群众的怨声时时可闻。还写出社会骚乱，不满分子、反革命势力在一定场合还气焰嚣张，公开发表反抗言论，煽动不满情绪，乃至举行暴动。还写出无政府主义的盛行以及它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对抗性。除了这些外部的敌对因素、困难条件以外，还写出新生的苏维埃政所自身也存在许多产重问题，如干部的失职，官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阴暗面，足以使人感到苏联革命虽然成功，但面临的现实却十分产重，革命成功了，并非一切皆好，尽如人意。瞿秋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严肃到近乎严厉的眼光写出苏联的各个方面，以求读者对苏联的革命有一

个全面的、整体的了解和认识。这是很可贵的，使他的报道具有无容置疑的真实性。然而，瞿秋白在这些文章中也并非纯客观地报道，更不是有闻必录，作一种镜面式的反映。瞿秋白对于他的采访对象有着明显的选择，对于他的报道内容有着鲜明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所有报道中都体现出一种激情，一种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对苏联党的信任的激情。因此，即使在他叙述那些阴暗面时，也从不给人以沮丧而是激发人们去思考：如果我们进行这样的革命，如何才能避免或战胜这些消极面。他的报道能给人以力量，给人以信心。总之，瞿秋白笔下的事件是真实的，真实到严峻的程度，没有任何粉饰，但有着鲜明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又绝不只是一种主观意愿的陈述，而是通过对事实的比较，通过现实的发展趋势，通过各界人士思想上的转变，特别是通过政治、经济上的日渐好转来显示的。因此，瞿秋白的这两部报告文学集做到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它的倾向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二、反映现实与分析问题相结合。瞿秋白的任务是报道苏联现实，但他却时时不忘写出自己的感受，自己所受到的启发以及自己由此产生的思想变化。这种情况在《饿乡纪程》中有，在《赤都心史》中更为显著。在这些篇章中夹杂了不少文字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旧中国必然崩溃的原因，剖析封建家庭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侵扰下的解体过程，特别着重表现一个出身旧家庭的知识青年在新思潮的启蒙下同封建阶级、同旧文化、同旧意识告别过程中的矛盾、苦闷但仍然挣扎着勇往直前的真实心理。在这些篇章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一颗新生稚儿猛烈跳动的心。由于瞿秋白在反映苏联现实时，将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庭以及个人思想联系起来考察和分

析，进行比较，并且融议论于叙事之中，因此，在我们从这些篇章中认识了解苏联时，也认识了解了我们苦难的国家，明白了她的现状，也明白了她面临的前途，还明白了二十年代青年人所肩负的历史重任。《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都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

三，强烈的抒情性。报告文学虽然应当有文彩，但真实性、具体的客观性却应始终占着首要地位。而《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却有着强烈的抒情性。这抒情性表现在一是以浓墨重彩描绘山林水色，展现出自然界的壮观、变幻与力量，以衬托苏联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的震撼性和吸引力，使人心绪为之舒展，平和，获得一种愉悦和兴奋。其次表现在严肃的记叙和评述中时时流露出作者纤细的、敏感的、多情的情怀，使读者倍感亲切，而不觉得呆滞和生硬，因此在感情上受到打动。当然，这当中也流露出某些感伤情绪，损伤了作品的积极力量，但瑕不掩玉，作者的主体情怀是健康的，向上的，奋发的，因此作品的总倾向，总的情绪是革命的，是令人鼓舞的。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报告文学专集。虽然在报告文学的形式方面尚有某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比如不大讲求事件的原委，议论和抒情份量过重，削弱了叙事内容，有的章节近于抒情散文或杂文；但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却是很突出的，即文学性和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我国报告文学的勃兴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又有进一步发展。而瞿秋白的这两部集子早此整整十年，是导先路的开创之作。

## 第三章 勇猛精进(一)

### 一 革命重任

瞿秋白是1922年12月21日从莫斯科动身回国的，于1923年1月13日到达北京。

瞿秋白为什么在刚刚两年之后就要结束他的访苏工作呢？他在1923年1月25日于北京写的《赤俄之归途》一文说：“临走前一星期，我还不能决定：——回国的川资已经来了，此后若要继续留学，经费或者不愁，——不必一定要国内接济；可是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决定回国一次。”由此可知，他回国，是为了研究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他要将学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革命理论用于中国的实际。同时，《晨报》这时也要召他回国。上文说的“川资”就可能是《晨报》寄给他的。当时他的家庭、亲友以及党的组织都不可能“川资”给他寄去。《晨报》当年出钱派他去苏联采访，如今出钱召他回国，是正常的事。而且，看来并不是由他决定回国

而通知《晨报》并由《晨报》寄路费去，而是由于《晨报》决定要他回国之后才引起他此时对回国问题的考虑的，所以才出现“临走前一星期，我还不能决定”的情况。由于考虑到只有在国内才能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他决心回国。当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陈独秀、刘仁静等人去莫斯科出席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在彼得堡—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鉴于瞿秋白的知识才干，出于当时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商请他回国工作也是完全可能的。总之，瞿秋白之回国，主要出自他渴望投身中国现实的革命斗争的愿望，同时也有环境和外界的促成因素。因此，不能象一些论著那样，将他的回国笼统地说成是“奉调”。

在瞿秋白的一生中，这二年苏联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如果说参加“五四”运动是他走向革命的关键性一步，这二年的访苏生涯则是他决心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定性一步。在这二年时间里，他较多较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他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较全面地了解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了直接的具体的感受；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如1921年6月，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9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担任翻译和助教工作；1922年1月，参加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各民族革命团体和共产党代表大会；1922年11月，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等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问题有了初步的思考；特别重要的是他在苏联巨大变化的现实面前，在聆听到列宁几次讲话并受到列宁的接见之后，<sup>①</sup>他受到极大的鼓舞，精神振奋。瞿秋白在理

<sup>①</sup> 瞿秋白还同列宁合影过。据羊牧之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介绍，他1926年在瞿秋白寓所见到过秋白同列宁合影的半身相片。说“列宁立在中间，秋白紧靠着站在右边，看那饱经风霜的列宁，却具有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令人一望这个革命导师，顿时有着肃然起敬的感觉。”

论上、感情上产生的巨大变化，是他访苏两年的成果，是他渴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基础。

正是由于他在当时的党内具备有上述特点和长处，使得他汇合到党的主体队伍中来的时候，一开始便以巨大的政治热情担负起党交付给他的一系列革命重任，很快便成为党的中坚分子和领导者，成为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

瞿秋白这一段生活历程，已经显示出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所以他回到北京后，断然拒绝堂兄瞿纯白替他在外交部谋得的差事。但一个人以什么一种具体方式进行革命活动就具偶然性了。当时，李大钊同志曾推荐秋白去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授《俄国文学史》，他答应了，后由于北大教务长顾某反对，未成。不久，大约在1923年4、5月间，他在革命热情的推动下去到上海，接受党的任务，主编中共中央刊物《新青年》和《前锋》，同时还参加党的另一刊物《向导》的编辑工作。<sup>①</sup>瞿秋白既是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又是这几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他运用这几个阵地发表了大量政治理论文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探索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做了大量的理论宣传工作，是当时党内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sup>②</sup>

<sup>①</sup> 瞿秋白到上海的时间，一般都说成是1923年夏或初夏。有的说是他回到北京的几天之后。按《新青年》季刊第一期是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瞿秋白作为刊物主编，组织稿件、审稿、发稿，至少需要20天以上的时间，何况他本人还要写发刊词和其他文章。因此，推算起来，他到上海的时间可能在四月底或五月初。虽然他在7月30日给胡适的信中有“到上海又有十天”的话，却不能以此证明7月20日左右是他第一次到上海。很可能是他当时曾几次往返于京沪之间。

<sup>②</sup> 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6月19日。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同志参加了大会，并主持起草党纲。瞿秋白在大会上发言，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指示，分析当时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联盟。会后，被指定同李大钊、林伯渠等同志一道就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同孙中山进行会谈磋商。

“三大”之后不久，瞿秋白同志又接受党的派遣，到上海大学工作。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创办于1922年春。由于师资缺乏，虽然以“提倡新文化”相号召，学生并不满意，于是驱逐了原校长，改请当时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于右任当校长。而于右任的主要精力是从事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又缺乏办学经验，学生仍然不满。时处国共两党酝酿合作之际，又恰逢李大钊同志因事于1923年4月到上海，于右任便邀请李大钊商讨办学问题。结果，派邓中夏同志担任总务长，7月又派瞿秋白同志去担任学务长。在此前后，党还先后派遣蔡和森、安体诚、恽代英、张太雷等同志任教。8月，于右任主持推定学校最高议事机构评议会，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伦，陈望道、邵力子、陈德征等9人被推举为评议员。12月，改评议会为行政委员会，瞿秋白等8人为委员。于右任虽然仍为校长，但他并不常到校视事，学校领导权实际上已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邓中夏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瞿秋白同志还就办校方针、发展规划等问题写成《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发表在1923年8月2日、3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他明确认为：“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这个旨在促



成中国真正的社会科学之诞生的办学指导思想，具体体现在他构思的院系设置和课程的开设上。他建议大学分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院。社会科学院设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哲学系、史学系。文艺院设中国文学系、英文系、俄文系、法文系、德文系、绘画系、音乐系、雕刻系。而所开课程，注重科学性、革命性。如社会学系，将设置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社会问题、社会学史、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政治学大纲、政治学史、法学通论、法制史、政治史、生物哲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历史哲学、心想学及社会心理学、第一外语、第二外语等。课程虽然庞杂一些，但试图建立一个系统的社会科学学科的想法无益很好。这一课程的提出也反映出瞿秋白对最新科学成就、最新社会动态的了解和认识。为了办好这个系，瞿秋白同志亲自兼任这个系的主任。为了办好学校，他们延聘了一大批有学问、有名望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来校任课，如邵力子、陈望通、刘大白、沈雁冰、田汉、施存统、肖楚女、蒋光赤、杨贤江、周建人、何世楨、俞平伯、周越然、洪野、丰子恺、杨明轩等等。瞿秋白同志还亲自讲授《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等课。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深厚，知识渊博，讲起课来，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常常吸引外系的学生听课，甚至连恽代英、肖楚女、侯绍裘等人也抽时间去听他讲课。他的讲义由上海书店于1924年春以《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的书名在《社会科学讲义》中印行了。而《社会科学概论》于1924年6月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再次讲授之后，仍由上海书店于同年10月用同一书名出版。这些著作在当时影响颇大，茅盾1926年在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讲课就是

使用的这本《社会科学概论》。李维汉同志1924年在湖南读到这份讲义，认为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阐述。正好这时湖南有个专门学校要李维汉同志去教社会学，他就用这个本子去上课，也很受欢迎。

上海大学在邓中夏、瞿秋白等领导下，组织进步青年、党员师生直接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进步师生在上海工人区兴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通过这些形式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培养工运骨干。“上大”师生发动和组织了1924年10月10日的天后宫群众大会，受到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右派的冲击和破坏，“上大”学生黄仁英勇献出了生命。1925年2月，学校党支部派出邓中夏、刘华、杨之华、郭伯和等同志领导和组织持续20余天的罢工斗争。接着的“五卅”运动中，“上大”进步师生也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上大”组织了近400人的38个组的演讲团，分赴街头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受到残酷镇压后通电罢课，扩大斗争声势。致使帝国主义者惊呼：“鼓动此次引起扰乱之学生或学童，皆来自过激主义之大学——西康路之上海大学”。<sup>①</sup>于是，“上海大学”便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租界巡捕对学校进行搜查，并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强行占领了校舍。“上大”不得已又搬回闸北青云路，再次成为“弄堂大学”。至1927年方被白崇禧用武力封闭。瞿秋白在“上大”期间，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是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热情组织者和指导者。他亲自收集材料，指导有关同志编写有很强针对性的工人夜校教材。指示做工运的同志一定要重视从工人中发展党员。他说：“我们党内，工人出身的党员太少了，现在面临这样伟大的运动，再不

<sup>①</sup> 见1925年7月发行的《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

发展，到什么时候发展呢？”<sup>①</sup> 这段时间，是瞿秋白第一次接触工人运动，也是他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尽管他这时还没有直接指挥工人群众进行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但是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对于他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于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于他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帮助，因而，这一阶段的锻炼对于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具有切实的促进作用。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根据“三大”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决议精神，派出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李维汉、张国焘等参加这次大会。此时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途有了较清醒的看法，同意共产党方面提出的挽救革命的革新措施，于是在这次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革命意义，确定了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等等。瞿秋白对于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有功劳的。当党的“三大”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瞿秋白就坚决表示拥护共产国际1923年1月作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赞同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促进国民党实现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任务。这年10月，接受党的派遣，他到广州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在广州，他担任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并参与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由于瞿秋白对国共合作的贡献，在国民党的“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

<sup>①</sup> 杨之华《忆秋白》，收入《忆秋白》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员。会后，又参加由孙中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参与研究军事、北伐等重大事项。此后，瞿秋白同志常常奔波于上海——广州——北京之间。一方面仍负责“上大”的领导工作和上课。1924年春，“上大”成立共产党支部，瞿秋白同志为书记，①发动和指导“上大”的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受命继续同孙中山保持联系，进行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此外，还常去北京，同李大钊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②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除了上述工作外，他还要继续办好《新青年》、《前锋》和《向导》等刊物，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瞿秋白对革命的赤诚，与他在革命群众中的重要影响，使反动派对他十分仇恨。1924年10月10日“上大”在天后宫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冲击破坏会场，打伤学生，一面通缉瞿秋白，搜查他的住所和西摩路上海大学，由于瞿秋白及早避进秘密住所才幸免于难。但是，从此他就不可能再公开进行革命活动了，被迫转入党的地下工作战线。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同志参加了大会，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并在大会上发言，就政治决议草案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并决定以上5人

① 黄美真等《上海大学——一所新颖的革命学校》，上海《党史资料》1980年2期。

② 见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文汇报增刊》，1980年2期，杨之华《忆秋白》。

驻中央局，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从此，瞿秋白同志正式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成为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以后几年的实际情况证明，彭述之虽然身为宣传部主任，但由于他思想上的一贯右倾，宣传方面的许多工作，要么是言而不行，行而无果，要么是放任自流，根本不抓。于是，大量工作就落到了瞿秋白身上，瞿秋白同志成为当时党的宣传工作的实际负责人。<sup>①</sup>

上海“五卅”运动中，瞿秋白作为常驻中央的领导人之一，积极参与了这一运动的领导工作：党中央在5月28日、5月30日连续两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斗争，争取胜利。“五卅”惨案发生后，31日清晨，中共中央在闸北横浜桥附近一幢旧式楼房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瞿秋白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反帝斗争；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号召全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决定以中央名义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掀起全国性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了从思想上进一步动员无产阶级，同时也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阴谋与罪行，党中央决定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总编辑并负责领写社论，郑超麟、沈泽民、何公超参加编辑，并担负撰写文章和新闻。<sup>②</sup>瞿秋白同志几乎是全力投入这一工作。从组织工作到编排、校对文稿，从题写报头“热血日报”几个大字到写作社论，无不浇铸着他的心血。在他的具体组织下和领导下，这张工人阶级的战斗报纸，

<sup>①</sup> 参见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茅盾《回忆录》之九，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sup>②</sup> 郑超麟《我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42辑。

只用了短短的几天时间就诞生了，于1925年6月4日出版了第一期。瞿秋白在发刊词中写道：“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民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热血日报》社的地址设在宝山路一座房屋的客堂里，设备十分简陋。瞿秋白同志当时身体非常不好，但他除了写稿（仅以《热血日报》而言，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最多时，一期上有他6篇文章）以外，还要了解工人情况，回答工人群众的问题，听取记者的汇报，向干部们作报告。有时还亲自找工人核对材料。忙碌得没有时间休息，同杨之华也只有在吃饭时见上一面。由于《热血日报》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心声，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种种侵华事实，批判了买办阶级、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深受群众欢迎，销售3万份以上，发行至江西、山东诸省。然而反动派绝不容忍它继续存在下去，这张革命战报，只出刊24期。便终于被查封了。

瞿秋白同志从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到1927年初，主要是从事理论战线的工作。这期间，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和编译的文献，将近60万字。内容十分广泛，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阐述；有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驳；有对中国社会形势和各阶级状况的分析；有对帝国主义侵略事实和侵略手段的揭露；有对国民党右派反动言论的批判；有对无产阶级革命性质、任务、策略的阐述；有对党内一些错误观点的

驳斥和批评，等等。瞿秋白同志所有这些著述充分反映了他的革命坚定性和毫不妥协的战斗性，表明他是当时党内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活动家。

在这期间，瞿秋白作为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自然也参与了党的集体领导，参与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还参加了一些具体的革命斗争活动：1925年10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瞿秋白在这次会议上，“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sup>①</sup>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会后的2月27日，瞿秋白同李大钊等同志一起共同发起和领导了在天安门召开的有4万多人参加的反英讨吴的国民大会，瞿秋白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sup>②</sup>7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扩大执委会。这次会议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支配下指责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犯了“包办”的错误，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毛病”，反对农民武装，认为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等等。瞿秋白同志有可能参加了这次会议。从他8月在广州农民讲习所讲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来看，他同陈独秀等人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他认为：“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因此，最具体的办法是：“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明确‘耕地农有’的标语。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

<sup>①</sup> 瞿秋白《关于“三大”党纲》，《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sup>②</sup> 见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202页。

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四，严厉地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对于领导权，他明确提出，“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必定不能使之落入资产阶级的手里。”<sup>①</sup>

瞿秋白同志一向很重视工人革命运动，总是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和领导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从1925年初起，瞿秋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述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发展以及在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如发表在1925年2月7日出版的《向导》101期上的《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一文就明确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具有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两种性质。发表在1925年5月3日出版的《向导》113期上的《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进一步确认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而且应当成为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阶级。从1925年2月至5月，瞿秋白在《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等报刊上，还发表了《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民族的劳资斗争》、《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评职工运动中的反对派》等十数篇文章，一再强调工人运动的重要性，热情赞扬工人运动的巨大作用。“五卅”运动期间，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上发表数十篇文章热情讴歌工人的革命精神，充分肯定他们的革命功绩。通过“五卅”运动，瞿秋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绝不能依靠资产阶级，而只能依靠无产阶级，因此，从“五卅”运动以后，瞿秋白在所有著述中十分突出地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此，他更重视工

<sup>①</sup>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人运动，时时都将工人运动列入他思考的中心课题之一。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复阐明工人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并且尽可能亲身参加工人的实际斗争，站在工人运动的斗争前列中去。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同志亲临暴动指挥所（拉斐德路启迪小学）参与组织领导。次日，起义失败，当天晚上，党中央和上海区党委举行联席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斗争问题。杨之华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那天晚上，秋白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袍子，告诉我今天晚上要开一个中央和区委的联席会议，听听区委同志关于暴动情况的报告。在这个会议上。大家听了身材魁梧、性格活泼的罗亦农同志和沉静、稳重的赵世炎同志的报告，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研究了工人群众的情况，大家的意见是由总工会发出复工命令，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那天晚上，秋白睡得很迟，第二天写好了一个给中央的书面意见书——〈对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给特别会议讨论。会议上对暴动问题讨论的很热烈，决定从广东调来两位同志，调周恩来同志加强军事上的指导，调陈延年同志加强江浙区党委的领导。”<sup>①</sup>瞿秋白在〈意见书〉中首先总结前二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主要是领导不力。接着他提出以后组织起义必须注意的问题，首先是“亟宜集中政治领导”。其次是要正确对待各个阶级——对于大资产阶级，“逼迫他们服从‘民意’”，对于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中的友军”；再次，在策略上，要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心理——革命情绪”，“尤其要造成一种武装斗争夺取武器的革命意志”。此外，还对一些具体的起义准

<sup>①</sup> 杨之华〈忆秋白〉。

备工作提出了建议。①上海工人后来在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的领导下，终于在是年3月份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控制了上海。瞿秋白同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第三次起义的组织和领导，但他对第二次起义失败的总结和今后意见，对于进一步从思想上发动工人群众起了明显作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在1927年3月21日，是时，瞿秋白同志可能已经离开上海随中央迁去武汉。②

瞿秋白同志1927年3月中旬到武汉之时，国内革命形势正处于严重关头，在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军队控制的江浙一带，四处潜伏着一触即发的危险，反革命势力正在寻找杀机。一场反革命的疯狂屠杀迫在眼前。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瞿秋白到武汉后，由于党在此时的特定情势，也由于瞿秋白同志具有的革命胆识和才干，他被推到政治斗争的最前列，他的革命生涯于是开始了新的一页。瞿秋白走上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领导岗位，这是革命历史在特定情况下的选择，而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

① 见《六大以前》。

② 关于瞿秋白同志去武汉时间，我分析，既不是如羊牧之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中所说是在第三次起义前很久，也不是如杨之华在《忆秋白》中说的是在第三次起义二个星期之后，而可能是在第三次起义前夕，即三月十几号去武汉的。根据是：一，杨之华在《忆秋白》中明确记得瞿秋白是在上海写完《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并且说写了一两个礼拜。而这本小册子中已涉及到彭述之发表在《向导》1927年3月6日出版的第190期上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的观点。这说明三月初瞿秋白仍在上海。二，若是写在第三次起义之后，又写了一二个礼拜，那么，当在四月初才写完。可是，在小册子里瞿秋白本人明明写着写于二月字样。实际写作时间可能是二月底到三月初，写完之后便去武汉了。同时，杨之华在同一文中提到，她是“四、一二”当天或次日离开上海去武汉的。她见到瞿秋白时秋白曾说“我们离别一个月的过程中，革命进展比一年还多”，可见，瞿秋白是在三月十几号去武汉的。

## 二 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1923年春到1927年春，即从瞿秋白回到国内到大革命失败前夕的4年时间里，瞿秋白一方面从事党的实际政治斗争活动，另一方面，又用了大量精力从事党的理论思想建设，4年中，理论著述达百万字。平均每月有2万字。有时，几乎每天都有文章问世。秋白同志身体不好，病魔常常折磨他，仅1926年春天发病就持续了二三个月，并住进了医院。这次住院，是党中央的命令。住院月余，他花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编译了三分之二，而且将这份8万多字的稿子亲自复写成一式两份。为了让我们的党员、革命群众更多地阅读到马列著作，他认为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工作，所以置病体予不顾去进行编译。他当时对杨之华说：“中国共产党员连我在内，对列宁主义的著作读得太少了，要研究中国当前的革命问题，非读几本书不可。我想将俄国革命运动史分成四部分编译出来……这些都可作为中国革命之参考，非常重要的参考”。<sup>①</sup>瞿秋白同志这番话，当时还有另一个针对性，那就是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对农民运动的轻视。

瞿秋白同志这期间的百万字著述有一个基本特点：全部是对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探讨和回答。其中一部分是从战略的角度，就中国革命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证，一部分则是就当时已经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意见，或是就阶级敌人蓄意制造的理论混乱所做的揭露和批判。所有文章无不具有针对性和战斗性，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sup>①</sup> 杨之华《忆秋白》

义。在中国，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研究中国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走向，瞿秋白还是第一人，有开创功绩。

下面，试将瞿秋白同志从1923年到1927年初这个期间的著述分成以下几个问题予以扼要评介。

### （一）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

瞿秋白认为，中国社会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革命运动，虽然推翻了封建皇帝，批判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旧文化，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剧烈变迁的过程，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得到自由和平等。二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依然存留着宗法的封建残余，另一方面又深受世界资本主义的侵略。他在1923年5月所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中就指出：“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这个社会有这样几个特点：1，经济上处于宗法社会的半自然经济。他说：“农家手工业本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一。至于农业上之土地制度、义庄制度、族有制度等之宗法社会的色彩，尤其明显”。“中国当初因民族斗争的结果，经济文化屡屡受外族的破坏，并为地理状态所限，经济上的发展至近代尚停滞于宗法社会之‘半自然经济’”。<sup>①</sup> 2，政治上仍然是封建政权。他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反动政局，直到现在，根本上并没有变更：满清贵族已推翻了，然而代替他而统治中国的仍旧是反动的军阀阶级和士绅阶级。”<sup>②</sup> 3，深受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他说：几十年来，“帝国主义无孔不钻的渗入中

<sup>①②</sup>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中国的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sup>①</sup>中国不同于其他殖民地的地方，是对中国殖民的国际性，这一国际性使得各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在中国的均势，互相牵制，中国统治者反而得以苟延残喘，保持其“主权”，而不致使中国成为完全的殖民地，“实际上中国的所以不亡，仅仅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力敌势均，无一敢首先发难，而又互相牵制罢了。”<sup>②</sup>这一国际性还形成另一个特点：帝国主义分别同一些军阀相勾结，“各强国得以勾结各经济区域内的事实上的政府（军阀），以至于新生的大资产阶级，间接实行其统治权；其结果，军阀为互相争夺势力范围而时起战祸，列强亦因互争势力范围而阴谋倾轧、贿赂、威吓，令中国顾东失西，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sup>③</sup>由此“所引起的政治上的纷乱，尤甚于完全的殖民地。”<sup>④</sup>由于20世纪20年代之中国处于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地位，所以，中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很明瞭的革命口号——反对一切军阀，推翻帝国主义。”<sup>⑤</sup>“这一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sup>⑥</sup>

瞿秋白同志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任务的认定，以及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必须争取世

①③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②④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前锋》第一期，1923年7月1日出版。

⑤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新青年》月刊第2号。

⑥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号。

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民族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等思想，同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示，同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当时党内其他同志的文章都是一致的。然而在同党的总的观点相一致的前提下，他也发表了若干独特的意见，对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曾经起过指导作用。这些意见，有的是不恰当的。有的则是正确的，是瞿秋白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级原理的成功运用，其中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反帝反军阀的两大任务中，他特别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他的看法是：“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是屈服于满洲贵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中国；同时，亦就是受英、法、俄、日等资本国家侵略的中国。从一八六六到一九二五年（从清同治丙寅到民国乙丑），六十年中的中国历史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远东史。在这六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因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外债的增加，赔款的勒索，路矿实业权利的攫取，领土，租界，港口的割让，不知道经过多少变更，六十年前的中国与六十年后的中国，在经济上简直是完全两样的国家。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也因此经过巨大的变更，士大夫‘贵家’已经完全消灭；买办阶级已经大半变成所谓‘中国’的体面商人；小农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之中，已经一部分变成现代的无产阶级。中国国际关系上的变更，日日促进中国社会里的阶级分化；统治者压迫者已经掉换了十好几次；各帝国主义对远东侵略的形势转变了种种花样，可是有一件事是至今还没有改换的：便是中国民族大多数的平民始终还是受着压迫和剥削。”<sup>①</sup>瞿秋白认为，正是帝国主

<sup>①</sup>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

义的侵略，才带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才促使中国阶级关系的变更和阶级的分化，因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矛盾。“我们可以说，从孙中山出生直到现在，中国民族的历史职任，一直是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sup>①</sup>由于他认为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他花了很多精力从事这方面的调查研究，约略估计一下，他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文章，占了他这时期文章一半以上。

第二，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如前所述，瞿秋白是明白认识到当时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军阀，他在“五卅”以前的一些文章中还认为当时的革命是以资产阶级为主，无产阶级只是参与。这一看法与当时党内的流行观点也是一致的。比如陈独秀发表在《向导》22期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就说：“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瞿秋白的观点同陈独秀等人观点又有很大区别，因为瞿秋白又一直认为，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作为实现最近目标的步骤，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赞助资产阶级革命是为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这种赞助必定不能永久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新青年》季刊第1期上发表的《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一文中说：“并不是无产阶级格外爱斗争，而是资产阶级不容你不斗争。”又说：“若不经阶级斗争而行无产阶级独裁制，资产阶级也决不容忍你们来从容不迫的行‘社会主义政策’。”他的这一认识，经过几年的革命实

<sup>①</sup>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

践，特别是经过“五卅”运动，更加深了，更坚定了。他在1925年9月写的《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亦是必不可少的，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1925年8月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也说：“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争”，“工人农民有阶级觉悟之后，有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后，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正是出于他这种认识，所以他每分析一个事件时，总是注意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对待同一事件上的态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尽管当时两个阶级都是国民革命<sup>①</sup>的参加者，有着共同的敌人和革命对象，但两个阶级的矛盾一直存在着。比如在“五卅”运动中，被大资产阶级掌握着领导权的上海总商会，就同工人、学生的态度迥然不同。瞿秋白写道：“在这个时机，商会经过群众的哀请跪求，方才答应罢市。罢市之后，差不多有一个礼拜，总商会始终没有什么表示。一方面，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会及上海总工会，努力的进行，组织了工商学联合会，商议定了应当提出的最小限度的要求条件；别方面，总商会却拒绝加入这一联合会，对于提出的要求绝对没有正式表示。”为什么呢？“总商会要的是保障件人在华利益！”“总商会完全牺牲

<sup>①</sup> 所谓“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恽代英《何谓国民革命？》（《中国青年》27期）说：“靠国民拆旧政府的台，所以是国民革命。”陈独秀1924年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载《六大以前》）中的解释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合这两种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军阀阶级——便是国民运动。”



民众利益，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sup>①</sup>之所以出现这样两种对立的态度，根本原因在于：“工人阶级能为民族利益而勇猛的斗争，因为他的利益与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是相同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求自己利益的满足，而赶紧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因为他的利益是与大多数民众相冲突的。”<sup>②</sup>既然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有一致的一面（大资产阶级也赞成反帝反军阀）又有矛盾的一面；既然大资产阶级往往成为革命的阻力，怎么办呢？瞿秋白提出，唯一的办法便是，无产阶级一方而要反对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同时也要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同资产阶级出卖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的利益的背叛行为作坚决斗争。瞿秋白正确地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对于大资产阶级这种种背叛民族利益的行为，无一次不联合一般革命民众竭力抗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阶级斗争。”<sup>③</sup>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瞿秋白较之当时其他同志认识得深刻一些。对于第一个问题，瞿秋白谈论得很多，很突出，很具体，但类似的精神在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中也有。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只有瞿秋白同志的论述才如此的明确而又具体。陈独秀1924年9月17日写的《我们的回答》（《向导》83期）虽然也提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那只是为了批驳国民党的“消弭阶级斗争”的论调而作的纯理论说明。他说：“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不幸的事实，也是历史上必然的事实，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正是要消弭阶级。但是，若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张消

① 《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是什么？》，《热血日报》，1925年6月14日社论。

②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向导》，129期。

③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弭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意思；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过那非人的生活而不必起来奋斗的意思。”显然陈独秀并未认识到无产阶级当时就应该进行阶级斗争，也未看到当时已经存在阶级斗争。恽代英1925年4月4日发表在《中国青年》第73期上的《与李瑄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一文虽也谈到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进行阶级斗争，但多停留于从理论上阐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必然性，以批判国家主义用“生之欲望”否认阶级斗争的谬论；而未从现实的革命需要着眼，没有指出无产阶级在当时进行阶级斗争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而较为认真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是1925年5月产生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该决议案的第一部分的第一条便是：“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它着重指出：“阶级争斗就是一种战争，我们无产阶级在此战争中重要的武器，就是团结，不分国界、省界及手艺、宗教、性别的阶级团结。自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自争自由的政治争斗到夺取政权的政治争斗，都要依靠这武器。”至此，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意义并指出如何进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成为全党的统一认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瞿秋白一直强调要反对资产阶级，要进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他并不认为无产阶级当时就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十分清楚，中国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第一步要实现民权主义，即资产阶级政治，在此基础上才进入第二步，实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应当明白“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逻辑上历史上的差别”，“并不因为中国革命

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以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sup>①</sup>

他认为革命要分两步走，但并不主张先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再进行所谓“二次革命”以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有先后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实现“资产阶级政治”，即他说的“民权主义”——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国民在政治上的自主权。要作到这一步，首先，“在封建军阀政治之下无产阶级必定参加或进行民权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必须参加民权革命的运动，当然要和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关系，甚至于在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可以加入革命政府，在代议制范围扩大时候，可以从事于选举运动。”<sup>②</sup>这就是后来积极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并争取召开国民会议的原因。其次无产阶级在民权革命运动中要积极主动地引导革命，争取实现最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权主义，即是说时刻不忘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所以他提出，不仅要参加国民党而且还要改造国民党。他说：“我们现在必定要有明切的政治主张来号召，不纯分子的行动如不能与之适合，就立刻请去。……换句话说，便是根据于现时实际经济动向而改造国民党，使从模糊的革命主义进于真正的民权革命及民族革命主义。”<sup>③</sup>同时，他认为无产阶级在民权革命运动中应当保持独立，并且要用严厉的阶级斗争手段克服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逐步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他说：“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

①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

②③④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

⑤ 以上均见《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

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压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应当“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sup>①</sup>再次，无产阶级应该在民权革命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逐步进行武装革命。应当说，瞿秋白同志是党史上最早指出武装斗争的必要性的入。他发表在1923年《新青年》季刊第1期上的《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与《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两文便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说：“恩格斯论革命说：革命是天下最有威权的事，是历史的大事，简言之，就是一部分的平民以刀剑或枪炮强制另一部分人服从其意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如此。”他还明确地认识到军事斗争是必然的，“劳资冲突时，自然要发生的。所以要求移转军事武装机关于有职业有组织的工人。”瞿秋白在同期写的《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期）一文结合中国的革命，指出武装革命与群众运动应同时进行，互为促进。他说：“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相互为用”。

“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他从帝国主义对工人群众的血腥镇压中迫切地感到，要彻底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就必须立即着手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要用革命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在《热血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论述武装平民问题。他说：“欲御外侮而靖内奸，必须有平民之武装”。“有平民之军队而后有平民之政权，然后可以雪耻，可以立国，可以求得我四万万人梦想中之自由与独立。”<sup>②</sup>

①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

② 《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

瞿秋白这一认识日益坚定。1925年9月3日写的《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128期），1926年1月22日写的《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导权》都反复表述了这一思想。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瞿秋白更坚定地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组织训练革命的军队，吸引敌人军队的群众，扩大武装势力，才能武装工人农民，实行革命战争”，他认为，反革命势力的猖狂进攻“紧切的逼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军队和工农军，准备直接革命。”<sup>①</sup>他于1926年4月12日写的《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新青年》月刊第4号），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可能性及领导权问题。他说：“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革命军队既有这样的必要，同时也有充分的可能。”这是因为有数量很大的失业农民、工人、小商和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将他们组织起来，加以训练，成为革命军队；其次，可以利用小军阀同大军阀的矛盾，做分化瓦解工作，使其中一部分人转向革命。他说：“这种军队在革命战争里只能做军事上别动队的策应，决非主体。”再次，对革命军队的训练和武装，还可以争取得到无产阶级国革的必要赞助。同时，革命军队和革命战争必须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平民必需在革命政党指导之下，积很从各方面下手，去建立国民革命伟大的联合战线，实行总解决的革命战争——国民政府的北伐，运用胜利的策略，使敌人武力分散削弱，而革命武力少所牵制，而后能响应或造成革命运动的最高潮：总同盟罢业和城乡各地的武装暴动。”瞿

<sup>①</sup>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号。

秋白认为建立革命武装，特别是武装工农，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想，在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更为发展、更具体化了。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他在《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中指出，农民革命运动正在迅速发展，他们要求掌握乡村政权，要求武装自己。瞿秋白这些关于革命武装的必要性、重要性的看法和建议，对于促进全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视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特别是对于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上强调武装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迭次强调武装暴动，不顾客观可能性，一味要求在城乡进行暴动起义，以致形成盲动主义错误；但另一面，他对武装斗争的重视，对于党的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又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问题上，瞿秋白的有些看法欠妥，表现出一种机械论的色彩。比如，尽管他认识到资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已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胜利必然属于无产阶级。但是，他又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所以革命胜利之后，即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后，应当发展资本主义，以为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物质基础。他说：“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能生出社会主义来，只有他能造成社会主义公有生产资料之技术上的基础，只有他能造出数量多而觉悟深的革命无产阶级。……要知道：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民权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种子才能开始萌动，……因此，凡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成就的地方，‘资产阶级还能做革命的进取’的地方，无产阶级应当和资产阶级联合面反

对‘君主诸侯及军阀’，同时亦就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最高的目的固然是社会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上，随时有切近的目标和利益，就是政治自由及经济改善。”<sup>①</sup>这一观点，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显然不妥。因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应当以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何况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强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能够领导革命的政治力量，并不需要一个阶段去发展资本主义以“造出数量多而觉悟深的革命无产阶级”。瞿秋白在1926年写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党内刊物《我们的生活》第4期）中仍然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建设资本主义的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后来，他逐渐认识到这个看法不妥，便不再这样谈了。在1927年2月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一文中就用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与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进行经济联盟的办法去发展经济，而不再提发展资本主义了。

## （二）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是进行革命、特别是领导革命的重要一环。当时一些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这一工作。瞿秋白同志也很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他对各阶级的主要观点同当时其他同志的看法大体上一致，他对各阶级特性、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阐发，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实际问题的创

<sup>①</sup>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

造性分析，其中有不少见解非常精到。

### 关于资产阶级

中国现代资本主义是怎样形成的？他认为，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产物。“中国的宗法社会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而起崩溃，方开始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亦可称‘资本主义的发展’。”<sup>①</sup>这当中又有两种情形，使资产阶级分为两大部分。一种情形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割占领土、掠夺富源、投货投资的侵略下，中国原有的手工业日渐衰落，使一部分的手工业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由商人组织生产，进而形成“工场手工业”。“中国工场手工业及工业既有片面的发达，市场之上发现所谓‘国货’，亦就造成与外货对抗的形势，与外国资本家对抗的商人阶级。”这个商人阶级不仅在国内有，还有侨居外国的商人。这个“商人阶级”，便是瞿秋白同志后来称之为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他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与外货、外资、外国资本家对抗的形势，但毕竟还很幼稚，资本既不雄厚，势力也不发达，因此，“外国巨大的财政资本与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之间，无所谓自由的竞争，列强单刀直入径借政治、外交势力掠夺范围，对矿山、铁路的投资无不带政治意味，欲使中国资本之发达径成为帝国主义的发达”。<sup>②</sup>即是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有一定发展，但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的控制和压迫下，它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它还处于幼稚阶段，既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也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基于他的这种看法，他没有详细考

<sup>①</sup> 《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1923年7月出版的《前锋》第1期。

<sup>②</sup> 以上均见《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



察这部分资产阶级在当时革命运动中的具体表现。瞿秋白论述最多的是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一方面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极欲向中国工业投资，“于是借款官营，千方百计自取其管理权，成就中国特有的所谓‘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官僚资产阶级不仅“官办”各种工业，商业，而且私营各种公司。“私人公司也往往先归那处于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以官为业的官僚阶级，以及少数巨商，大半仍是官商合办等类的把戏”，官僚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依靠政权行商，因此，他们“处处惯于借政权作弊，绝不能发生资产阶级最初期所当有的纯粹商品经济，就是不能全靠真正的经济力量来‘自由竞争’”。<sup>①</sup>官僚资产阶级虽然有款治权力作为他们经商办全业的后盾，但实际上不过是外国资本主义豢养的一批寄生的商人阶级，命运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仍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总之，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或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需要的原料及机器被列强垄断，财政被外国资本主义控制，还受到关税的限制，国内农业倒退，国内市场被外国商品霸占。由于这些原因，瞿秋白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发限，导源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或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当然，对帝国主义的对抗性，资产阶级内的各个阶层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所决定的。瞿秋白认为，“资产阶级之中，大商阶级依赖外国资本，每每易于妥协，或者想一个军阀来统一太平，以应其经济需要，或者竟想利用外国势力驱逐军

<sup>①</sup> 以上均见《中国资产阶级的发限》。

阔；海外侨商（鲁按瞿秋白认为海外侨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则受外国的直接压迫，比较的革命些；至于小商人虽然能力太小，却因所谓‘国货’的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很普遍；新兴的工业阶级亦必被逼而不得不反抗”。①瞿秋白通过商团事件，北京屠杀（即“三·一八”惨案）和五卅运动等重大政治事件清楚地看到，作为资产阶级，无论哪一部分都有其共性：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做局部的抵御，利用所谓列强之间的冲突而苟延残喘；想镇压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处处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而希望以反对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须的惠恩”。②但瞿秋白也看到资产阶级各部分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也是有差别的，他认为，其中“买办与大商人更是一种反动的力量，是非常讨厌的东西。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他可以表示些倾向改良政策的论调；到反动时机到来时，他立刻会压迫工、农、小商人等革命分子。”③瞿秋白在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论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既不满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又不赞同工农的革命斗争。其中，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和侨商）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性大一些，但是也常常处于动摇、畏怯之中，半途抛弃革命；而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则由于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必然向帝国主义妥协，乃至投降，背叛革命，镇压革命。正因为如此，瞿秋白反复指出，中国革命当时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革命主力却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而必然是无产阶级。

① 以上均见《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

②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新青年》月刊第3号。

③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 关于无产阶级

对于无产阶级，瞿秋白同志首先指出，辛亥革命前中国尚无产业工人，只有由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所组成的“游民的无产阶级”，他们“实是革命运动的中枢”，辛亥革命后，才“有真正能代表中国民族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彻底革命的阶级”。<sup>①</sup>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论述得最多也最为透彻的是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二是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职责。瞿秋白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又常常是将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论述的。

瞿秋白对无产阶级的本质特性及其历史重任很少从理论上推论，而主要是通过对比中国各阶级在历次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来阐明的。早在1923年5月，于《新青年》季刊第1期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中他就清楚地、确切无疑地指出，“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借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sup>②</sup>就在这一篇文章中，瞿秋白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尚还幼稚，但它能进行彻底的坚决斗争，它要“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在《新青年》季刊第1期上的另一篇文章《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也强调：“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

①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新青年》月刊第2号。

② 《〈新青年〉之新宣言》。

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是年6月，瞿秋白在党的“三大”上为大会起草的“党纲”上提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但被陈独秀删改。<sup>①</sup>在同年9月撰写的《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更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资产阶级出于它的阶级本性，它的民权革命只能是一种改良主义，而无产阶级则要以革命的手段进行彻底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是使社会的腐败部分慢慢的烂掉”，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手段就是用果决的行动和群众的势力有组织有系统的努力扫除一切封建君主时代的遗迹。”因此，无产阶级绝不能放任资产阶级让他单独去干，而必须由无产阶级“竭力引导革命到底。”瞿秋白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一个基本原因。随着革命的发展，瞿秋白愈益认识到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1925年3月写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新青年》月刊第2号）一文又一次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比中强调：“民族革命运动中便得着了一支生力军——革命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做革命的先锋的、而且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级”。通过“五卅”运动，瞿秋白更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如何实现领导的具体意见。

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点，他既重视原则也重视策略。早期，他提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又指出，当时只能从政治思想上指导革命，还不能马上实现组织上的领导。他认为，一方面，无产阶级当时还不够强大，要立即担当

<sup>①</sup> 瞿秋白《关于“三大”党纲》。

起领导者的重任似嫌不能胜任，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当时必须竭力促进资产阶级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认为共产党当务之急是促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让革命的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无产阶级这时的任务是支持、赞助和参加国民革命，用马克思主义引导国民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方向逐渐发展，通过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以影响国民党，改造国民党，实现彻底的民权革命，即让劳动人民享有真正的权力。他认为，中国当时的革命类似俄国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应当采取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的态度：既要积极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忘记无产阶级自身的最终目标。总之，他认为，从原则上讲，无产阶级应当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从策略上讲，当时只能从思想上实现领导，无产阶级当时只能实现革命的最近目标：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权。

第二点，他不仅认识到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而且还着重研究如何实现这一领导。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自然形成的，要通过斗争才可能实现。瞿秋白从他开始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起就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直在互争革命领导权，这个斗争一直延续到大革命失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联合战线正式破裂时才结束：各自分道扬镳。瞿秋白认为，从党建立时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间关于领导权的斗争，谁胜谁负，一直存在两种可能性，由此，革命也就存在两种前途。1925年8月撰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

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在1926年1月写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再次对此进行了剖析。他在大革命失败前夕，1927年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仍然认为：“现在中国的革命有两个可能的前途：第一，是资产阶级取得领袖权；而使中国的革命毁于民族改良主义之手，其结果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旧受帝国主义的支配。第二，是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而使中国的革命彻底的实行民族、民权的职任，其结果可以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与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结成经济的联盟，继续反抗帝国主义之一切种种侵略，一直到完全推翻他。由于他认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自然形成的，要通过斗争，因此，必然有一个争取和斗争的过程。而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壮大阶级力量，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和不断战胜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及投降主义的过程。他说：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取得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于城市贫民及兵士，不断的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妥协主义的影响，隔离民族资产阶级而使之孤立。如此无产阶级方能争得革命的领袖权。”他的这一思想早在1923年便初步形成了，反映在是年写的《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后来他根据无产阶级的斗争发展情况，将争夺革命领导权划为两个阶段：1923—1924年，“是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之胚胎”期；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已有具体的初步表现”，但并未完全解决，斗争还在继续；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这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已经迫近成败存亡的紧急关头。”<sup>①</sup>瞿秋

<sup>①</sup> 1927年2月：《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选集》。

白如此划分是否恰当，有待研究，但他看到1926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领导权问题上斗争很激烈，也即是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很激烈。在关系革命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具有敏锐性，较一般人提前预见到了革命形势的危急，这是难能可贵的。

### 关于农民阶级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上，瞿秋白同志是较早重视农民问题的一位。早在1922年，他从苏联革命的经验中就明确地认识到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在是年写的《赤俄之第四年》（北京《晨报》1922年8月16日）和《赤都心史》中级分别指出：苏联“革命之伟力各方面的贵展，几十次困苦的战斗，全赖两个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无产阶级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1923年回国后，他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指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在《大家都是良民，那里来的土匪！》（《向导》35期，1923年8月8日出版）一文中指出，中国农民身受几重压迫。他在为党的“三大”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提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无产阶级应当“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但是，当时他也只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并没有对农民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更没有提出切实的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因此，影响不大。而且当时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相当轻视，压制了瞿秋白在党纲草案上表达的正确意见。后来，瞿秋白同志同党的其他同志一样，是在革命斗争的实际感受中才进一步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把农民问题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来加以研究。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全党重视农民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广东，湖南，河南，陕西，湖北，江苏，直隶等地的农

民运动相继开展起来，使中国革命深入到广大农村，动摇了封建地主政权赖以生存的封建经济基础。当时党内的一些著名理论家和负责人都注意到农民运动在整个革命运动中正在产生的伟大作用。因此，在1925年10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农民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进行了研究，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正式将“耕地农有”作为农民斗争的最近目标提了出来。会议的《告农民书》号召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政府，以实现“耕地农有”的革命要求。全党在这次特别会议上表现出来的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既是“五卅”运动对全党同志的直接启示，也是全党同志对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经验、特别是对彭湃、毛泽东等同志开展农民运动经验的总结。瞿秋白同志在1927年2月写的《关于“三大”党纲》中对自己关于农民问题看法的回顾，也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在农民问题上的认识过程。他说：“我自己的严重的错误，正在于没有具体的认识农民问题之解决，所以党纲草案原文上虽有‘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一语，然而农民要求中，只有减租，而没有土地问题。当时谭平山同志与国民党谢英伯‘耕地农有’之争，已经过去。我在争论时虽然很赞成‘耕地农有’，或广东文法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然而起草党纲时，我屡经思索，始终不敢写上去，而平山同志也没有提起。这可见当时大家都在无意之中恐怕认清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会使农民的阶级斗争过于激烈，或是根本不承认中国有土地问题。我不过在说明党纲草案的报告时，曾经特别指明农村自治的运动，农民应当力争参政权，反对‘包办地方事务的乡董’，然而我这种‘民权主义的倾向’，始终受大家的腹诽，也就无足重轻了。”又



说：“这党纲草案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切实的、勇敢的解决农地问题。我直到五卅之后的北京十月的扩大会议，才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这是因为我爱着实际的革命时势及群众的教训了”。瞿秋白这一段诚挚的检讨，说明他也是在“五卅”运动以后才充分重视农民问题的。从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前，瞿秋白同志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以下几个有关农民运动的问题。

1. 指出农民运动正在迅猛发展，并且热情歌颂这一革命运动。

1926年4月7日写的《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号）一文指出：“五卅之后，不但广州、湖南的农民组织发展起来，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并且一般的经济恐慌，预征田赋和灾荒，使农民的地位窘迫到万分，反抗运动自然而然到处的爆发。农民群众自己又继续中国向来所有的秘密组织，如红枪会（河南、山东等省），大刀会（江苏、安徽等省）等，虽是迷信，虽是无计划无策略的组织，然而一有些须组织，便不能不暴动起来。国民革命之中，如今已经有无产阶级领导，又有真正革命政党的工作，这种农民运动如果纳入农民协会的轨道，有相当的农民政纲，立刻便可以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不用说耕地农有的运动，便是减租减赋的运动，直接就是给地主土豪，间接给军阀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这一革命的伟大力量正在滋生猛长呢。”同年8月写的《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再次指出，五卅运动以后，农民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虽然发生了北京屠杀，但是，“北京屠杀后的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少遭受

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来做’的。”

瞿秋白同志还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歌颂农民运动，支持农民运动。当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重要著作受到机会主义者彭述之的阻挠未能在《向导》刊完之时，瞿秋白果断地决定由党主办的长江书局立即出版单行本，题为《湖南农民革命》，并为它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说他们是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

## 2. 深刻阐明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工农联合的重要性。

瞿秋白在《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等著作中，通过对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革命态度的具体分析，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特别是近代革命史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要获得成功，必须充分重视农民运动，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阶级并与其结成牢固的联盟，同农民一道，将革命进行到底。能否领导农民，能否实现农民的革命要求，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大事。他说，这是由于：“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并且是帝国主义剥削的最大的对象和最深的基础。”<sup>①</sup>“中国农民受的痛苦最深，但他们的数目占

<sup>①</sup>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号。

全国人口的绝对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因此，“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又说：“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少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至五卅运动没有结果。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的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sup>①</sup>瞿秋白同志认为农民运动不仅对于整个革命十分重要，而且推而广之，农民问题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几千年来的革命史就是农民革命史。他说：“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候写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所以以前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sup>②</sup>用农民革命史概括中国几千年革命史，并勾勒出中国农民革命的代表人物，瞿秋白同志是第一个，这一观点很快被公认，被一致接受。

### 3. 提出发展农民运动的具体措施。

瞿秋白同志认为发展农民运动的具体办法应当是：

①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确定‘耕地农有’的标语。

②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

③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

④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

① 以上均见《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我们的生活》第4期

②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其政权。

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提出的上述主张，他在《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等文章中就已提到。除了土地、政权、武装等几项之外，瞿秋白还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无产阶级必须充分重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同时还再三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组织农民，才能为农民指出“耕地农有”的奋斗目标，才能指导农民进行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

### （三）对机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一个进行革命的阶级在理论战线上总是进行着两方面的战斗，一方面正面阐述革命理论，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还要批判各种危害革命的错误观点和反动思潮。破与立，总是结合在一起。中国无产阶级自从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它的理论家们就一直面临着这两方面的任务；不少优秀的理论家十分卓越地同时进行着两个方面的战斗，瞿秋白同志便是其中之一。瞿秋白同志从20年代初指起，既以满腔热情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原理，又以指大愤慨严厉的批判各种错误观点和反动思潮，许多论著不仅显示出他坚定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党性，而且表明他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渊博知识。

20年代，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散播了种种主义、学说和主张，归根到底，是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散播的一些错误观点，则是集中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

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以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

地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且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只能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虽然还处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阶段，但是已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中国当时所进行的国民革命，其前途必然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形形色色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却企图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倒退为封建主义的国家。瞿秋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反动论调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害性，因此，进行了及时的尖锐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都不是中国的出路。

众所周知，二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十分混乱，其中有一批人奉孔孟的儒家思想为中国的固有文化，认为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方为治理中国的根本途径，瞿秋白称之为“东方文化派”，包括鼓吹东方文化的梁漱溟，宣扬固有精神文明的梁启超，欣赏宋明理学及玄学的张君勱，以及主张农业立国的章士钊等。这些人当时大多反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有的甚至反对现代科学文明。然而他们多为饱学巨儒，在文化思想界颇有影响。瞿秋白撰写专文，从他们的共同性上予以严厉的批判。几篇主要文章是《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1923年3月）、《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1923年9月）、《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1923年11月）、《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1923年5月）等。瞿秋白在这些文章中对东方文化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一是指出所谓东方文化是一种落后文化。他认为东方文化根心爱的东方文化有三大元素：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第二种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第三种

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这三大元素便是东方文化的核心和实质。至于这三元素在20世纪初叶如何依然存在，他认为根本原因当然是中国的生产力太落后，具体来说，中国虽经“辛亥革命”，但很不彻底，封建制度还有很大的势力，再加之“中国当初因民族斗争的结果，经济文化屡屡受外族的破坏，并为地理状态所限，经济上的发展至近代尚停滞于宗法社会之‘半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军阀割据制度成，而所谓‘统一的’中国遂崩坏分裂”；“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既落后，及渐与先进（文明）国家相接触，迎受西方文化——资本主义，遂不得不成为此等国家的殖民地”。<sup>①</sup> 瞿秋白指出，这种畸形的封建政治，即与帝国列强相勾结的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诸侯更可怕”。瞿秋白气愤地斥责道：“由所谓‘自由’贸易（经济学上谓之“简单的商品生产制”）变成小诸侯辖制的商业，由所谓‘自由’劳动变成公开的武力强逼的力役，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总而言之，“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而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学者还在竭力拥护”，这是不能容忍的。<sup>②</sup>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瞿秋白对“东方文化派”的政治方向的批判是对的，而对于东方文化，或者说对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在评价上并不很全面，有其片面性。虽然瞿秋白是出于革命义愤，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虽然他也用“宗法社会的文化”，用“三大元素”对“东方文

<sup>①</sup>、<sup>②</sup>均见《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

化”加以限定，但“东方文化”或中国固有精神文明等概念毕竟有着客观的内涵，这一概念总是让人意识到中国基本的传统文化。而中国基本的传统文化，即以孔孟学说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不管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抑或是从社会学、特别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应该看到都有不少可取之处。瞿秋白同志在思想方法上有这样一个缺陷，即由于对某一点的强调，或显示对某一点的彻底性，往往过头，过正，失之偏颇。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乃至对他本人的缺点、不足处也是如此。其实，他并不是不能洞察事物的全貌，不是不能全面地深入地分析问题，而多半是出于对革命的误解，以为革命就要过激，过头，以为矫枉就必须过正，这大概与他最初在苏联耳闻目睹革命的暴力性、严厉性有关。

二是指出这是一种反动的对抗。瞿秋白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存在着两种性质的对抗，一“是更新的阶级，不能享受文明而想导此文明更进一步的”对抗，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一“是古旧的垂死的阶级，吆喝着‘向后转’的对抗，这便是东方文化派这类人的对抗。前者是要使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向前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因此，这是进步的、革命的对抗，后者则是妄图拉转历史，使资本主义文明向后转，恢复封建主义的文明，因此是反动的。瞿秋白从两方面论述了它的反动性。第一，他们是反历史主义的。瞿秋白指出，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文明是人类进步的结果。他说：“文明是人类劳动的创造。原始时代的人初向自然进攻，便制成极粗的工具，如石斧以至于弓箭，那时便是技术的开始，亦就是文明的开始。当时若说不要这种文明，便是愿意葬身虎腹或是活活饿死。”总之，科学技术是不断进步的，

文明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只能引导文明向前发展，而不能倒退，或者不要文明。诅咒文明，或倒退的观点，都是违反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因而是反动的。瞿秋白指出，的确，在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因人与人之间关系反因此新文明的影响而更不平等，所以思想上的民权几乎等于纸上谈兵。科学使人享法律上的平等而消失事实上平等的可能，科学文明使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划得更清楚”，但是该如何解决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不平等呢？他说，应当采取无产阶级的态度：使文明更进一步。第二，他们否认物质文明。东方文化派的学者口口声声要发扬中国固有精神文明，以为那千古不变的“精神文明”就可以拯救中国的贫穷与落后。这是错误的。瞿秋白说，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主要的是靠物质生产力的提高。思想文化等精神力量对物质基础有一定促进作用，但绝不能夸大这一作用，而且，任何一种精神文明都是受制于物质文明的。他说：“诚然不错，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社会思想往往较其经济发展落后一步，所谓历史的‘惰性律’，然而最根本的动，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而此种物质力的自然发展，决不能以一纸唯心论而打消，决不能以仁爱的空名来限制，其实已经容不得你‘预’防，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长成，外国的已经现成。帝国主义无孔不钻的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sup>①</sup>瞿秋白这一段话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指出，虽然精神对物质有一定影响作用，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物质，因此，不能忽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不能否认物质基础是首要的。除此，瞿秋白还指出，物质

<sup>①</sup> 以上均见《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要否认也否认不了，要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历代各种观念、学说也都是建立在一定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都是对一定物质生产力以及在此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怎么能否认物质文明呢？他说：“托尔斯泰根据贵族式的思想，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实在讲起来，托尔斯泰的农村，以至于后时的章士钊之‘农村立国’里的农村，至少要用一把锄头一把犁，那便是物质的技术文明，他的发展不是清心寡欲论所能阻滞的，始终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而后止。贵族式的精神‘文明’，譬如禅悦或者神悟，礼教或者仪式正是封建时代生产方法和技术内容的反映。那时的技术是祖传的或者偶遇的，是师傅秘授的或者纯任‘天工’的。庄子以庖丁解牛喻养生，列子说‘人巧与造化同工’，正是这种关系。”又说：“且说最极端的否认物质文明派，要求恢复‘无为’的世界。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为最幸福的，亦不能于现实生活里寻到恢复他的方法。我这句话的物证便是整部的世界史。单说中国：中国没有进取的思想，没有极端提悟物质文明的学说，只有老庄以及释道的无为，可以称之为‘向后转派’；此外便是孔孟和程朱乃至二十世纪的新宋学，可以称之为‘立定派’。然而物质文明仍旧在可能的范围里进步，譬如清朝广东进贡的方法，比那‘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唐明皇采荔枝的方法就聪明得多了。而且每次发展的结果，如陈项、赤眉、黄巾、黄巢、李闯、洪秀全等的‘屠杀’，‘四海之内皆狗彘也’！精神文明未必十分高尚；到那时一切无为、清静、礼教或‘宋学’都已失去威权。这样看来，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最沉滞的

中国式的发展尚且不见得有什么精神文明，中国社会史里始终还有一派‘动’的实力——平民，庸俗的市侩乡农，不过不见得是前进的动罢了。宋学的破产遇见这种非前进派的动力尚且彻底暴露，何况现代的中国里，‘最高尚有道德知识的精神文明派’自己日常的行为，刚刚与口头的议论相反，时时刻刻在那里促进他们所反对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如买火车票，点电灯，用自来水，吃酒席，穿洋布等……反对最激烈的人自己尚且如此！新宋学当然未产而先‘流’了。”<sup>①</sup>瞿秋白这一段话用物质生产始终制约着精神生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用章士钊、张君勱、梁漱溟、梁启超等人的实际行为充分证明高谈抽象的精神文明否认物质技术的重要性的论调是虚伪的。

三是指出必须破除这种精神文明。瞿秋白认为，东方文化派所鼓吹的东方文明或精神文明，实在是宗法的、封建的社会意识，它既是宗法的、封建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是维护宗法的、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的，若依了这种文化或文明，中国必然倒退；这种宗法的、封建的意识形态早已为帝国主义所攻破，但又成为帝国主义从经济上、从政治上、从思想文化上侵略中国、控制中国的精神枷锁，因此，必须破除这种东方文化派的精神文明。他说：“伦常纲纪，孝悌礼教’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会的反映，不必多论；‘和平好让’更是因宗法社会中经济发展薄弱，虽争亦必不能多得，祖孙、父子、兄弟、伯叔在同一经济单位之中，求分配的相安，除此更无别法。中国的‘天下四海观’，尤其是古旧的封建制度崩坏，而经济发展刚

<sup>①</sup> 《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东方杂志》21卷第1期，1924年1月出版。

到‘简单的商品生产制’，不能前进，加上宗法社会的经济组织，所以大家只觉得要‘安居乐业’，各人管各人的家事，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用不着集权的国家，如何能有国家观念？只当着其他各国，其他各民族也和中国一样呢。若更说玄妙些，讲到东方人的习静、养心、绝欲、诚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请问：在如此恬静的农村生活里，威严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么‘物’，所以只好‘养心’，不会满欲，所以只好绝欲，是不是东方文化的优点？”<sup>①</sup>帝国主义倒是希望中国保存这种文明而不希望中国掌握真正科学的。“帝国主义不但为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并且扰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明而强盛。”因此，“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sup>②</sup>

瞿秋白认为，要振兴和发展我国固有文化，只有通过革命，通过发展物质生产力才可能实现。“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才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sup>③</sup>他认为，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能由资产阶级的技术文化进入到社会主义的技术文化。“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sup>④</sup>

---

①②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③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④ 《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

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组织形式上派别很多，有戴季陶这样的国民党理论家，有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有贺衷寒、缪斌等的孙文主义学会，有曾琦、李璜、左舜生等的国家主义派，还有冯自由之流，等等。他们都是国民党中的右派，都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基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取媚于帝国主义，以及都以民族文化中和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在这些人中，戴季陶的理论很有代表性。瞿秋白选择了戴季陶主义作为批判重点，撰写了《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一系列论文，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瞿秋白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整个国民党右派的批判，也是对所有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

瞿秋白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戴季陶主义由国民党倡导为一个运动的反动性：“理论上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之宣传。”<sup>①</sup>接着层层剖析戴季陶主义的反动实质：第一，“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德论。”戴季陶认为，中国自尧、舜、禹、汤以至周、孔，存在着一种以仁爱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的传统观念，这一观念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生存发展的文化基础。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中说：“仁爱是人类的生性”，“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

<sup>①</sup>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六大以前》。

科学的文化，都建筑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便是这种道德，而他戴季陶等人则又是在继承孙中山的道都。瞿秋白指出，说“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秋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用不着什么哲学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这是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现状明切的解释。现在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知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sup>①</sup>第二，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用三民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戴季陶等人鼓吹说，农民工人也要团结组织，但组织起来是为了帮助国民党掌握政权，建设起“三民主义的民国”，不能搞阶级斗争，不准要求改善工农自己的生活状况，等到政治权力掌握在三民主义青年

<sup>①</sup>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手里之后，工人农民的生活到那时自然会改良了。瞿秋白严肃指出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

“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地主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其次，瞿秋白指出用什么“纯正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就存在着内部的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假如一定要用纯正的三民主义即旧三民主义来建立什么“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央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从而使国民党完全丧失工人农民群众，完全丧失尚存的一点革命气息。再次，指出戴季陶只是不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却主张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事实上“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戴季陶希望中国的国民党象土耳其的国民党那样，利用农民工人的赞助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压迫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瞿秋白指出，戴季陶所要的就是这样的高压政策，“戴季陶简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战术都应有尽有！”第

三，瞿秋白指出，他们要在组织上清洗共产党，进而消灭共产党，使其资产阶级专政顺利实现。因为戴季陶一方面主张要用纯正三民主义统一思想，不容许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另一方面，叫嚣清洗C、P出国民党，所以，戴季陶是“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诬蔑说C、P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会打破国民革命，瞿秋白驳斥说，事实上，从1921年的海员大罢工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表明“工农的阶级斗争的力量愈增高，国民革命运动也愈扩大。国民革命中有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工农阶级的斗争足以发展国民革命也是事实。”针对戴季陶宣扬的C、P的主义不戴实现，不适宜于中国的谬论，瞿秋白说：“这种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戴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针对戴季陶污蔑C、P自己不能公开，不敢拿出名义的胡言，瞿秋白说，组织上不能公开，是军阀政府压迫的结果，而政治主张则一向彰明较著，心口如一。

瞿秋白最后总结说，戴季陶想不偏右不偏左，纯粹站在“民族”、“国家”的利益上面，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他一直在攻击左派。总而言之，中国的出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

季陶，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sup>①</sup>

为了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理论，瞿秋白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的同时，还对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也进行了批判。实验主义哲学是20年代在中国颇有影响的一种资产阶级哲学，它对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瞿秋白为此撰写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季刊第3期）一文。从四个方面剖析实验主义哲学的非科学的反动性：指出，中国的实验主义是，适应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处境的需要而出现的。因为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实验主义哲学，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哲学，是资产阶级市侩心理的反映。“‘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彻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其次，指出实验主义哲学的根本弱点是轻视理论，否认理论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瞿秋白指出，从语源上考察，实验主义的语根来源于“实用”。实验主义也即实用主义。因此，实验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这种哲学，固然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如它“不愿意做锁闭的系统”，它“时时刻刻注重现实生活的实用方面及积极性质”。但是，这种哲学的根

<sup>①</sup> 以上均见《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本弱点是轻视理论。以为“一切理论不是解释疑谜的答案，而只是工具罢了。”因此，“一切学说的价值，照实验主义的意思说来，只要看他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某种学说假使是有益的，便是真实的；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一切真理都应当合于我们的需要。”瞿秋白批驳说：“一种思想，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方能是有益的；思想的积极精神必须反映现实里的积极精神。譬如说：中国现在要一个好政府（鲁按胡适提出中国有一个“好人政府”就对了），你们只要承认这一个意见，动手去干就好了，不必细问这一种意见，是否客观上有实行的可能。”再次，瞿秋白指出实验主义哲学的宇宙观是建筑在多元论的唯心主义上面的。在实验主义者看来，“所谓现实世界只是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在他们看来，“外物自外物，我自我。我凭我的捷要，择取外物的观念，我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别人所见的，我现在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我将来所见的。于是外物都成了我们任意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凭着自己的捷要而设想出来的。”“因此，对于实验主义，不但没有绝对的现实，并且亦没有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完全是唯心论的宇宙观。他的真理便成了主观的。所以，一切‘真实’只是为我们思想的方便而设；一切‘正义’亦都是为我们行为的方便而设。”最后，瞿秋白指出真理主观性的荒谬。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阶级对自己有益的真理、学说自然是特别欢迎的，但“却并没有承认一切有益的学说都是真理，亦没有承认人的愿捷和目的可以做外物的标准、真理的规范，更没有承认知识的内容是主观的。”又说：“互辩律的唯物论（鲁按辩证唯物论）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我们对于外物的概念确能与外物相符合。”瞿秋白

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我们亦在时时刻刻变易外界的现实生活，然而只能依着客观的趋向。”瞿秋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剖析实验主义哲学的非科学性的同时，又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使他的批判富有深刻的理论性。在1924年的当时，在中国能如此正确地阐明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瞿秋白尚属第一人。

#### （四）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

“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反军阀的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得更为迅速更为深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参与下，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9日誓师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打垮了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两湖及中南数省。这一形势也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本身的分化，这就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右翼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随着老牌军阀的行将垮台，逐渐丢掉早先的一点革命行为，逐步转变为革命的对立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从“五卅”运动以后，便日益明显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在理论上用“戴季陶主义”进行系统的反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为清共作好舆论准备，在行动上，继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谋划之后，于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他们又策划了“整理党务案”，迫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分子便从此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权。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同国民党右派遥相呼应，一致对付革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大沽口，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显然国民革命已而临十分危险的局势。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党员清

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1926年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正确地指出国民党存在着左中右三派以及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革命领导权，联合国民党左派，巩固革命联盟。但是，由于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有着严重的右倾思想，会议作出了有明显指误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指》中，不分析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反而认为国民党右派之进攻共产党是由于共产党本身的行为错误，说什么：“国民党右派，以至于中派之所以容易向我们进攻，提出要求我们退出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前此指导国民党的方式错误”。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认为要解决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只有共产党自己反省，自责，自我收敛。此外，该决议还反映出当时党内存在的一种严重的指误观点，那就是陈独秀等人机械地形式主义地认为国民党一直是各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而看不清国民党已由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变化成为国民党右派所把持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因而，始终坚持认为共产党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就得参加国民党，共产党绝对不能担负独立领导革命的重任，这实质上是认为共产党只指参加革命而不能领导革命。此决议及其他文件中虽有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提法，但那是指的一种战略性质，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该决议还说：“如果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关系，现在就要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确独自领着无产阶级，使其它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会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思想有增无减，在192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发展到了

更严重的程度。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认为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反对党的“左稚病”，他所说的“左稚病”，指共产党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会议根据陈独秀的右倾投降思想所作的《政治问题议决案》公然写道：“以为我们党之独立，即是组织工农、小有产阶级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和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抗，这样解释我们党之独立，必定走向和国民党脱离，而危及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不论是7月中央扩大会议，还是12月中央特别会议，一些严重的错误思想之能写进党的决议文件中，说明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已经十分严重地影响着党的领导机构，并在实际上影响着革命的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绝不是一时失误。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发展到1927年初，已经形成统治局面。虽然党内也有同志意识到右倾的存在及其危害性，作了种种努力，包括从理论上和在会议上进行多次论争，但终未制止住这一倾向。这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党在当时，在整体上还是幼稚的，持有正确观点的同志，在理论上也并非十分成熟，往往带着观点的多元性和不彻底性。所以在斗争成效上就显得相当微弱。不过，这些同志的正确观点，特别是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密切关注，总也表明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坚定的较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才有后来扭转革命逆势，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的出现。

认识到陈独秀等人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并及时予以公开系统批判的就是瞿秋白同志。1927年2月他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就是批判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作。这篇长达9万余字长篇论文以小册子的形式在1927年4月下旬印发给参加党的五次代表大会的每位代表。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

响。瞿秋白在文中的批判对象是他称之为彭述之主义的错误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彭述之主义实际上应称之为陈独秀——彭述之主义。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党内一切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这部著作论及了许多问题，但主要是就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革命领导权、革命策略几个问题阐述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批判彭述之主义的右倾投降实质。

### 1. 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

彭述之身为党中央的宣传部长，却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存在着十分错误的看法。他在《向导》86期上发表文章说，辛亥革命时与辛亥革命以后，都无非是几个土匪头子——军阀混战而已。即是说，从1911年到1925年“五卅”这14年间，中国根本不存在革命。“现在国民党之军事行动，并不是武装群众，而是武装强盗——军阀”。因此，14年的国民党运动，完全是假革命。瞿秋白为了驳斥这种谬见，详细地分析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各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对于军阀的政治态度，分析了各阶级之间关系的变化，分析了各阶级在政治斗争中所发生的阶级力量的起落，从而有力地说明：“中国革命是在进行着，表而上看是‘土匪头儿’的混战，实际上实含有阶级分化及阶级斗争的意味。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一方面，部分的受这革命战争的影响，而很容易的开始自己的斗争，发展自己的运动；别方面，客观上早已亦是推动这种革命战争之一种势力。”瞿秋白指出：“辛亥革命后十六年来的历史事实是如此的。”只不过由于中国是小农国家的缘故，在革命运动的形式上与欧洲式革命不同罢了。“的确是先有武装暴动，而后有宣传（辛亥时的新闻政策），最后再有组织（军队），——恰好和彭述之所

谓‘科学的革命方法’（鲁按彭述之的革命方法是‘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武装暴动’）相反”。瞿秋白认为彭述之把“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相混了，把反革命法西斯式的土匪和失地农民式的‘土匪军队’相混了”。于是看不到实际上存在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和革命战争。

中国革命是存在的。瞿秋白为了具体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这种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他将中国革命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逐一考察。一是辛亥革命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五四至五卅运动之间这个时期。他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的主要点是：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使小资产阶级客观上形成革命中之领袖阶级。”然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能领导任何革命”，“无产阶级尚未强大而取得领导权，于是便是无产阶级想在背后推着小资产阶级去革官僚巨商阶级的命。”第三个阶段是五卅运动以后，这时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工匠等小资产阶级制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之影响，而来革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命。”瞿秋白这里的“中国革命”是以辛亥革命后为起点的包括部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革命对象的提法也不如他在其他文章中的提法全面，这里只提反对官僚买办阶级，未提反帝反军阀，这样的论述是不严密的。这可能是只为驳斥彭述之的国内军阀混战的观点，才这样论述的。不过，他在这里的主要意思是要说明：随着各阶级状况的变化，中国革命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历史的趋向：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头上。瞿秋白最后概括地说明，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但必须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顺利进行。它的前途将超出资产阶级范围，是无产阶级的胜利。

彭述之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中说，中国无产阶级“一方面须竭力领导国民革命，推动国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彭述之的“国民革命到底”，是指实现纯粹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他设想国民革命的民权主义胜利之后，再去进行无产阶级的第二次革命，革去民权主义，实行他的所谓独裁专政。瞿秋白指出，“这种学说，的确是中国式的杜洛茨基主义，是非常之错误的。殊不知中国的国民革命同时是资产阶级性及社会主义性的，中国革命之民权主义是应当和革命独裁相结合为一的，——对于劳动平民是民权，对于官僚买办土豪军阀便是独裁（就是讲到苏维埃制度，列宁也是这样说明是工人的民权主义）。——这都是一件事物的两方面，决不是两个互相独立互相对待的‘主义’。”即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因为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已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革命结果不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实现劳动平民的民权，因此，它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国民革命胜利之后实现的民权主义是劳动人民掌握政权，这个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独裁（专政）。因此，国民革命胜利之后，即实现平民的民权主义之后，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是瞿秋白同彭述之观点根本分歧所在。瞿秋白说：“认为中国革命虽由无产阶级领导，仍不免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一革命的胜利，仍旧是无条件的开发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那么，亦是错误的。”

## 2. 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瞿秋白在许

多文章里有过反复的论述，我们已在前节作了评介。这里主要是介绍他批判彭述之等右倾投降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误。

瞿秋白一直认为，“中国革命即使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也非由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不能胜利”，但是这领导权绝不是自然地、天然地就会实现的，要通过斗争才能取得。因为中国的国民革命中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他们在革命中就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瞿秋白说，这从“五卅”运动、从中山舰事件等等一系列斗争中看得十分清楚。由于存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所以中国的革命的前途一直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不可盲目乐观。一是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中国革命毁于民族改良主义之手，其结果是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受帝国主义的支配。一是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中国革命彻底地实行民族民权的革命任务，其结果是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瞿秋白认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战术”，第一种前途是可能出现的。因此，绝非如彭述之所说的，革命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手里。彭述之认为：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只有无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但是中国并无民族资产阶级，而只有买办阶级；买办阶级是只能霸占国民革命军的军权，而不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因此，革命领导权仍旧客观上已经在工人阶级之手。于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现在只要利用一切“商民”攻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新右派（军政），这就算“领导国民革命到底”；然而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北伐之胜利，不是革命之胜利，所以还要准备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永续革命”。瞿秋白尖锐地指出：“这是何等模糊混淆的观念！这种战术是翻译杜洛茨基主义到中国



环境里来的很坏的译稿。中国的彭述之主义，比俄国的杜洛茨基主义更坏，更明显的是孟塞维克主义的一种幻化。”瞿秋白接着以具体事例剖析彭述之主义的根本错误，“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已近杭州，彭述之的政策是利用上海大商人抵制国民党新右派的军队势力，更在北伐军未到上海之前，使上海工人和大资本家协商定了‘民治’主张，去抵制将到上海之北伐军的‘军权’，因为他认为国民党新右派军人是代表买办阶级的，而上海某大商人是代表些须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所以应当利用他们之间的冲突。关于上海的工人群众尚且没有说到，至于大多数上海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他更没有谈起。这样，可见彭述之主义的实际应用，完全是孟塞维克的战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以实行他所谓‘引导国民革命到底’，自然是抛弃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甚至于抛弃工人群众。这种战术如果完全施行，就等于双手拱送革命领袖权于资产阶级。”

瞿秋白认为，彭述之战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的根本“理论”。瞿秋白将彭述之的根本理论概括为四点：第一，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势力，因而忽略小资产阶级群众；既然只有买办阶级，则反对新右派自然亦以反对买办阶级的方法反对之。因为买办阶级根本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所以彭述之的反对新右派，只知道痛骂买办阶级，而不知道指出民族改良主义对于革命的危险。第二，彭述之认为在革命高涨时买办分子加入革命队伍等于买办阶级加入革命队伍，于是他反对新右派，便不是反对新右派的改良主义而只是反对他们的买办出身，殊不知新右派的危险不在于他的出身，而在于他的妥协主义。第三，彭述之认为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都在买办阶级之

手，要反对这种买办阶级的军事专政，无须乎吸引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是“天然”地、“绝对”地跟无产阶级走的，只须联络大资产阶级的首领，形成“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战术便可。第四，彭述之自己也觉得此种战术不能战胜，于是，“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永续革命”。瞿秋白指出，“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可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针对彭述之主义的孟什维克战术，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战术应当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工匠联盟作为进攻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主力军，同时决不可以忽视民族资产阶级及店东小资产阶级，而要认清店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中的中立势力，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终究是要妥协改良而出卖革命的；必须努力取得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于城市贫民及兵士，不断的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妥协主义的影响，隔离民族资产阶级而使之孤立。如此无产阶级方能争得革命的领袖权。”

### 3. 关于策略及其他

瞿秋白认为，不论是在“五卅”以前，或是在“五卅”以后，党的策略都是不对的。他例举了17条历史事实来证明策略上的错误。瞿秋白这一看法有些偏激，并不全对，但他却指出了党在当时在策略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历史已经证明瞿秋白的策略观点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他认为，“五卅以前五四以

后，是革命进展的时期，但是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党的战术方针，应当是以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勉力做主干，形成并巩固国民党之中心，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扩大联合战线，准备工农的主力军以攻击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统治。但是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我们的政策处处只有本能的‘自我保存’，没有进取的只象小孩子似的和当时的左派赌气”。瞿秋白这一批评基本上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但是，也不能说党在当时那样做就完全错了。因为当时党在幼年，组织力量比较弱小，思想水平也不很高，以保存和发展自己并不错。事实上，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就是共产党帮助左派、领导左派的显著成效。

瞿秋白接着说：“五卅以后，中国革命之进展，已经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不过因为中国革命的正式军队担负了一大半武装暴动的作用，形式上隐蔽了些。此时期有新的战术计划，其策略上的口号，当然是革命战争和革命政府之巩固。然而党内‘大多做’的意见，以为这是革命的躁进说。正在这个时候，反对单纯左派国民党之创造，反对共产党积极赞助左派在组织上政治上发展并领导国民党。于是策略上的总原则是：唯恐新右派生气，唯恐联合战线之中没有了新右派，唯恐新右派不能参加政府及国民党之指导机关。”在这里，瞿秋白将“五卅”运动以后的革命形势估计得太高了，以为“五卅”运动开始了直接革命的趋势，即开始了以革命战争的形式推翻反动派的新阶段。这个估计显然带有急躁性和盲目性，这是由于他过高评价“五卅”运动的意义所致。但是另一面，党内又确实存在看不见革命力量在不断发展的右倾思想，对左派重视不够，没有积极地领导左派力量开展反对右派的斗争，而在很多地方

迁就，姑息右派，以至右派势力得以扩充和发展，以至发展到1926年时右派公开进行一系列反共反革命活动，到1927年，他们便公开全面扑杀革命，使大革命失败。瞿秋白对“五卅”以后策略问题的分析，虽有躁进的一面，但严肃指出不应妥协，指出对左派势力领导不够，却是正确的。

瞿秋白还着重批判了彭述之主义的独立观。瞿秋白指出，彭述之主义在组织上的独立观，也是一个由左而右的过程。先是主张一种谨慎的甚至是“清高的”绝对的独立，而后来竟让共产党去迁就资产阶级右派。瞿秋白说：“无产阶级要独立的斗争，不能受资产阶级的恶化，要有独立的政党，独立的阶级意识。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然而彭述之主义机械的了解这些真理。最初只要做劳动运动，不要国民革命；进而要做国民革命，可是不要加入国民党，进而自己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工人不要加入，南方可以加入国民党，北方不可以加入；进而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进而加入了不要做军事行动，还要孙中山停止这种运动；……最后进而竭力劝告忠告新右派领袖左倾些，我们自己右倾些大家将就将就。这是一条路：从‘本能的自我保存’走起，不知怎么样越走越不对，走到几乎要将革命的命运交给右派资产阶级！”瞿秋白这一批评是中肯的，既切合实际又道出了彭述之主义组织路线的右倾实质。

瞿秋白同志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是正确的，深刻的，至今读起这些文字来仍觉得很受教益。尽管《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正式同读者见面的时间稍稍晚了一些，未能及时唤醒全党同志起来制止陈独秀的投降路线，避免大革命失败（由于陈独秀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他长期形成的权威性，单凭批判文章也难能起到这个作用），但它毕

竟是党内系统批判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最早文献，对全党同志的震动是很大的。瞿秋白的这篇专论以及他在“五大”上的发言，直接地促进了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大会形成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就明确指出党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在联合战线、在土地问题等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并相应地做出有关决定。

### （五）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社会学原理

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原理方面，瞿秋白这期间撰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sup>①</sup>等专著和《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等论文。瞿秋白在这些论著中较为全面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剖析社会现象，简要地阐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也阐明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如下问题上：

1. 唯物论与唯心论的问题。他指出，哲学自古以来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回答“‘秋’与‘非秋’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但不论哲学家们的回答如何千差万别，总不外两种基本观点。即“一方面的思想家，都以客观为出发点，或者是所谓实质（鲁按实质乃物质之意）、自然。”“他一方面的思想家，却以主观为出发点，或者是所谓意识、灵魂。”“凡以客观为出发的，——只要他是一贯的思想家，有这勇气一直推究下

<sup>①</sup> 《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均系在上海大学的讲义，由上海书店用《社会科学讲义》名称从1924年2月起分辑连载出版。《社会科学概论》系1924年6月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的讲义，由上海书店1924年10月印行。

去，——他必成唯物论中之一派。而以主观为出发的，——便是唯心论中之一派。”瞿秋白在谈到唯物与唯心的区分的时候，提出一个“一贯性”概念，意思是我们所说的唯物论是彻底的唯物论，在宇宙观与认识论上都坚持唯物的观点，而不是在宇宙观上承认物质的存在，但在认识论上又否认物质的可知性，比如康德的观点。康德企图调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一方面承认在我们意识之外存在着实物世界，即“自在之物”的世界，而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瞿秋白正确地指出，“康德的批评哲学有二元论的弊病。二元论总是带折衷派的色彩，所以批评哲学所给的人生观，好一似孔丘的‘未知生焉知死’，始终不是一贯到底的。”瞿秋白用了大量篇幅回顾了唯心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指出，唯心论最初起源于初民的“万物有灵论”，而这一信念发展而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就很难从人们的思想中消除了；另一方面，自然科学进步得非常缓慢，人们未能认识到“万物有灵”论的荒谬性；何况，由于唯心论有利于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因而历代各国统治者都竭力阻止自由思想的发展，巩固唯心主义的思想地位。由于这几方面原因，唯心主义得以长期生存下来。此外，瞿秋白对塞林、勃尔克莱、康德、休谟、赫胥黎、斯宾诺莎等人的唯心论观点或不彻底的唯物观一一作了批驳。

2. 关于宇宙起源和生命之发展。关于这一问题在其《社会科学概论》中，主要是根据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观点，介绍了康德的“星云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

3. 关于社会的发展。瞿秋白从哲学思想的角度集中考察了欧洲近代史，指出法国启蒙主义学派的哲学思想和德国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革命的一面，但又未能揭示历

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他说：“法国启蒙学派于思想上是大革命的先声，他们自己便是革命者。他们不承认一切‘威信’。宗教、宇宙观、社会观、国家观，一切都受他们严格的批评；一切都应当合于所谓理性，不然，便不应当存在。理性因此便成一切的准则。……直到现代（二十世纪），我们才明白那理性世界不过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社会：永久的正义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平等只是人人在法律之前的平等；最高的人权便是资产阶级的财权；最理想的国家原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也和以前的学者一样，跳不出当时社会的时代范围。”由于如此，“法国大革命之后，实现了那理性的社会，……贫富之间的矛盾，不但不消灭，反而更加厉害了。……一言以蔽之，启蒙学派所预允的人道正义丝毫没有实现，引起社会的大失望。综合这种‘社会的失望’的，——便是十九世纪的乌托邦派。”“乌托邦派否定资产阶级的社会，以为是非理性的不正义的，然而他们不能解释他，不能发见真正的动力足以毁灭此社会而创造新制度的。”及至黑格尔哲学出现，“方才认宇宙是永久的动、变、改造、发展之过程，同时竭力研求此动与发展之‘内的关系’。……然而黑格尔是唯心论派。‘思想’对于他，并非实在事物之反映，却说事物及其过程乃是思想之反映于现实者。他所谓‘思想’是先天地而生的。因此，一切因果都是倒置。”“那些从前的经济学家以为劳资的利益是相同的，劳资之间有谐和的可能，自由竞争可以得到全国的共同福利等等观念，都受事实的驳诘，暴露他们的虚妄。大工业使潜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内的阶级矛盾发展到极点，——这种生产方法的破灭已成必不可免的事实。”总而言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相斗

的阶级都是生产和交易之关系的产物。……社会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是历史的现实基础，法律、政治、宗教、哲学以及其他思想只是社会的筑物，——他们的变迁是随着经济结构而变迁的。”“生产力的发展及进步的阶级斗争必定能使他（鲁按资本主义制度）败灭。资本制度的秘密发露于剩余价值论，——那是他经济结构里的根基。”瞿秋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学说，进一步阐明在阶级社会中，善与恶的道德观念、平等观念都是有阶级性的。它们“绝对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而只有跟着实质变迁而进步的意识。”

4. 关于互变律。瞿秋白将辩证法译为互变律。瞿秋白在这里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矛盾运动的观点。他说：宇宙现象的根本便是物质的动，而动表明了事物的矛盾，矛盾性是宇宙、社会的根本属性。由于矛盾性，事物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生命的意义本是一‘物’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物（生物机体的新陈代谢）”。由于这种矛盾运动，事物不断地否定自身，从量变到质变，这便是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和量与质的互变。“自然界、社会关系以及思想都是连环不断的‘否定’。……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肯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社会现象的根本是经济的（生产关系）动——亦就是‘社会的物质’之互变。所以我们研究社会哲学，应当从经济关系的哲理入手。”

5. 社会学的对象和性质。瞿秋白指出：“社会学应当答复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社会的发展或衰灭之根本原因在那里？各种社会现象相互的关系如何？此等现象的发展之原因在那里等等。”因此，社会学在理论上和实用上都是很重要的。瞿秋白将社会学与理化科学、生物学、心理学、集体心理学和



其他社会科学一一作了比较，指出社会学与它们有联系然而绝不能说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

6. 关于因果论。他首先指出“宇宙的现象必定有相当的规律，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日月山河，草木禽兽，自古以来变化非常之多，相互的影响非常之复杂；然而并不因此可以说一切都是杂乱无章无以整理的。……一切现象之中都有线索可寻，此等现象之间的关系都有一定的相互影响。”“社会现象之中亦是如此。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论他怎样复杂各不相同，始终我们能考察得一定的规律。譬如不论甚么地方（美国、日本、非洲或是澳洲），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有工人阶级生长发达，就有社会主义运动。”接着指出那种以为“一切都有一定目的”的目的论，是不能解释宇宙间所有现象的，而只能用原因论，因为一切事物都存在因果关系。“每一现象必定有他的原因。人类社会行向共产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必然有无产阶级生长发达；而无产阶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的，他必然要超越一切范围而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瞿秋白进一步论述说，原因论是一种客观规律，它是必然的。“假使热度增高，物体便膨胀；……假使资本主义存在，便对外发生战争；……总而言之，一切‘原因的公律’可从下列的界说表示：假使有甲种现象，那就必定有乙种现象与之相应。”

7. 有定论与无定论。所谓有定论，是说一切事物都有其客观的必然的发展规律。这是对因果律的进一步发挥，他说：“不论是经常的现象，是异常的现象，一个人的意志、感觉、行动都有一定的原因，是有定的，是有所联系的——因不具，果即不现。”按照这一观点，他着重分析了历史的偶然性和必

然性。他指出，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在共产主义社会，严格而论，天下没有无因之事，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偶然的事。从最小之事到最大的世界政局，都在因果律的连锁中。一切都有着必然性。但必然性有两种，“一种是原因的必然，一种是愿望的必要”，“科学里的意义始终只是因果的必然，而决不是‘愿望的必要’。”“譬如法国革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封建制度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第三阶级的革命；同时法国革命是历史的必要，——因为没有他资本主义便不能充分发展。……社会主义之为历史的必要，正是这样的意义：——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便不能往前发展。”

8. 互辩律。瞿秋白所讲的互辩律就是辩证唯物论。他在“互辩律”这一章中较详细地阐述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事物的矛盾运动、突变与渐变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瞿秋白没有止于介绍结论，而是予以科学的论证：“第一，我们所知道的范围以内，所谓‘精神’仅仅是一切现象里的一小部分。”“第二，我们知道人是别种动物进化而来的，动物（活的东西）发见于地球上仅仅在最后的几万年内。……先有物质，而后发生能思想的物质——‘人’。可见物质先于精神。”“第三，‘精神’的发生正在那一种特别的机体发生之后，——这种机体是已经组织成一种特定形式的物质。……能思想的只是人，是人的脑筋，是人的机体之一部分。人的机体是什么？——是组织得很复杂的物质。”“第四，由上述而论，已经明白——可以有无精神之物质，而不能有无物质之精神。……物质是客观上存在的，不用精神去认识他。精神却永远与物质有关：无物质便无精神。而且精神仅只是某种组成特定形式的物质之功能（属性）。譬如人。”瞿秋白的可

贵之处在于运用这种唯物论观察研究人类社会问题，阐明了社会科学中的唯物论。他指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也有唯物与唯心两种观点。“一方面可以这样想：——社会是人组成的，人能想，有愿望，有理想，有意见，因此，……——意见统治着世界；意见变动是人类社会中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是社会科学中的唯心派。”如法国的白须埃的《世界史论》就说历史之中可以发见“神意的引导人类”，德国唯心派莱辛说历史是“神对于人类的训育”，非希德（鲁按现译费希特）说历史乃理性之行动，黑格尔便以为是“宇宙精神之理性的必要的发展”，等等。但“另一方面亦可以这样想：——人的意志并非自由的，他受人生外界环境的规定，社会的意志当然亦是如此。……社会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亦是如此。社会只能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只能采取自然界里对于自己有益的东西以求生存。他采取的方法便是经济的生产。……那物质的生产及其资料（物质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存的根据。”总之，“社会的精神生活，受物质生产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的程度之束缚。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大足以规定精神生活。”关于事物的矛盾运动，瞿秋白将它看成是唯物辩证法的一项基本原理。他说：“总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动’与‘变’之中，没有一种东西是停滞不变的。天下没有固定的形态，一切都是所谓‘历程’。”“这种动力观叫做‘互辩法’或‘互变律’。”瞿秋白阐述说，运用互辩的唯物主义研究社会生活，应当探究的问题是：每一种社会形式的个性是什么，不可笼统的一概而论，各种社会形式各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其次，还要研究各种社会的内部发展过程；第三，要研究每一种社会的发生及其消灭的必然性，表明“每一种社会的新形式都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前一形式发展之必然的结果。”他说这就是“历史观”，“因为一切现象，不当做永久的看，而只是历史的过渡的形式，有生有灭的。”即是说，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产生在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是暂时的，也就是发展的，有产生，有消亡。总之，宇宙间一切都在动，“所谓‘动’就是斗争，就是矛盾。”“动的历程，便是内部矛盾的发展。”瞿秋白还指出事物矛盾运动过程的三个阶段：“一，均势状态；二，此均势之破坏；三，均势之恢复，而成新的局面。”瞿秋白说，运用互辩的唯物主义观点就可以明白：“社会之中常常有许多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原动。”关于突变与渐变的问题，瞿秋白阐释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都存在量变与质变问题，数量变易到一定程度便能发生质量上的变易。从量变到质变，是一种跳跃，事物的发展便出现一个新的阶段。并指出社会里与自然里的一切渐变都必行向突变——一切进化必定走向革命。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一方面从概念上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又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为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依据。这是名符其实的革命哲学，他用自己的理论著述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二是不单纯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某一观点，而是提出一个观点后，纵横联系各个时代（上至古希腊罗马、孔丘孟柯，下至20世纪的最新思潮）、各个国家的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哲学观点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或是佐证，或是驳诘，使文章不仅带有雄辩性，战斗性，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颠

扑不破的普遍真理。以上两点既是瞿秋白哲学论著的特点，也是瞿秋白的重大理论贡献。单就这两点而言，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就具有巨大功绩。

## 第四章 勇猛精进（二）

### 一 紧急关头

面对中国北伐革命的节节胜利和中国工农运动的新高涨，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的革命势力十分仇恨，必欲再次扑灭中国的革命烈火。帝国主义调集数万军队和90多艘军舰布防在上海、南京一带，虎视眈眈。当北伐军占领南京时他们便制造了有名的“南京惨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加快了反革命步伐，并且逐渐丢掉伪装，明目张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公开地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1927年3月6日，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以武力解散了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3月23日，捣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蒋介石一面用武力控制江西、安徽等地，一面公开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保证与租界当局以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接受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的资助，同时同桂系军阀、同上海各反动地方势力也勾结起来，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制造了凶恶的、无耻的

“四·一二”事变。紧接着，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著名的革命家肖楚女、熊雄等人被害。北方军阀也同时采取行动，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于是年4月28日被残酷地绞杀了。一时，中国天空乌云翻滚，阴霾笼罩，血腥遍地。蒋介石尚未洗去双手血污便急匆匆于4月18日在南京挂出标志着反革命政权的“国民政府”牌号，以图代替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而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在本质上同蒋介石也是一丘之貉。因此，当蒋介石在江浙一带公开举起屠刀的时候，汪精卫必然要与之配合行动。5月19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师夏斗寅率部叛变，5月21日，武汉政府所辖许克祥部又在长沙叛变，20天内杀害长沙一带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万余人。6月5日，汪精卫集团解除国民政府中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的合同。6月6日，朱培德部在江西叛变，驱逐共产党员，封闭江西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和其他革命团体，活埋工农运动领袖。6月10日，汪精卫、顾孟余、孙科等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商议武汉的“分共”问题。6月19日，冯玉祥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主张“宁汉合作”，一致反共。6月29日，武汉政府所辖25军军长何健发布反共“训令”，命令部队同共产党分裂。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举行“分共”会议，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血腥镇压口号。至此，从1924年到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内革命战争就这样失败了。

显然各种反动势力对革命的镇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这旷日持久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中，我们是可以争取到这场革命的更多胜利的，至少可以争取较少的损失，然而，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愈来愈严重，发展到1927年党的“五大”

前夕，陈独秀右倾思想已成为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对反动派一再容忍、退让，并认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是应当的，是当然的，无产阶级只有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再进行第二次革命。因此，放弃了许多应该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放弃了对农民运动、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丢失了一些可能争取到某些胜利的可能性。其间，许多共产党人既看到革命形势的严重性，也看到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危害性，认识到陈独秀右倾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反对，必须制止，为此，作了许多努力：1927年4月初，瞿秋白、吴玉章等便提出将第4军调到南京，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箝制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因鲍罗廷反对未能实现。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人从上海致电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因中央内部主张不一，也未能实现。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形势，也为了积极筹备召开党的“五大”，当中共中央委员从3月底以来陆续集中武汉以后，从4月4日至20日，在武汉连续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彭述之、邓中夏、罗易、威金斯基、鲍罗廷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委员会为“五大”准备文件，瞿秋白、毛泽东主持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李立三主持职工运动委员会，张国焘主持组织委员会。会议还决定电催陈独秀速往武汉，将中央也迁往武汉。可是，陈独秀却迟迟不行，并于4月5日同刚从国外返沪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涂脂抹粉。直至4月12日蒋介石大屠杀后，陈独秀才于中旬到



达武汉，并且至此仍然执迷不悟，在“五大”召开前的预备会上，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观点。“五大”前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同志中，以瞿秋白的态度最为坚决。<sup>①</sup>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同志散发了早在这年2月撰写的长篇论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公开地尖锐地对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作风进行系统批判，不少同志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7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精神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评，并通过了主张实行急进的土地革命，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派的土地分给农民等内容的几个决议案。但是，由于陈独秀错误思想的影响，加之当时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的局限，大会也未能对当时严峻的局面作出有效的决定。大会之后，不少共产党员又进行了许多具体的救急工作，比如调叶挺部队回师击溃武汉叛军，等等，但也难挽狂澜。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白热化的反革命气焰面前更是有增无减。6月28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借口避免争端，解散武汉工人纠察

<sup>①</sup> 连叛徒张国焘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12篇第5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作参考。“在‘四·一二’以后，中共中央的分歧，就更形激化起来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陈独秀领导的主张，……在‘四·一二’后的几天（陈先生尚未到达），由于瞿秋白的主动，约集罗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谈话时，瞿秋白曾以愤怒的语气，表示中共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同志们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严重打击，广东同志们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了中央领导威信的严重危机。但这种危机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盖了，莫斯科因而无法知道详情，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也连带指责威金斯基。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只轻轻答辩说，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

队。在6月30日于武昌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居然提出一个11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彻底地放弃了革命领导权，认为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讨论时，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代表团中央提出一个批评这个“议决案”的书面意见，当面交给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地下，并用脚踏上。任弼时要求发言解释意见书，也遭拒绝。由此可见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他的家长式的统治作风的庇护下，已发展到十分固执、极端的地步，试图通过批评使陈独秀改正错误以挽救革命，已是不可能的了。

革命形势非常危急，面对更多的革命志士即将流血牺牲，面对艰苦斗争得到的革命成果即将失去的严酷形势，我们党应该怎么办？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年轻，但却不乏坚定的有胆有识的优秀党员。7月上旬，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这实际上是免除陈独秀的书记职务（陈独秀本人于7月15日曾给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他已无法再主持中央工作，要求解除他的领导职务），另组织一个5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这5人是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5人常委代表党中央于7月13日发表对政局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所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退出。这一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必须着手纠正陈独秀的错误路线。5人常委还在一个月的掌权期内做了三项重大决定：一是同意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等同志在九江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举行南昌起义。二是决定组织秋收起义。三是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研究当前斗争和今后任

务。

瞿秋白同志在党的“五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7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6月3日，瞿秋白被补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5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当时，瞿秋白同志在党内有很高的声望，而在7月上旬却没能进入改组的政治局5人常委。对此，李维汉同志在《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党史研究》1980年4期）一文可供参考。该文说：“在5人常委里头为什么没有瞿秋白，我至今搞不清楚。”该文引述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和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写的《党史报告》两篇文章，以揣测当时情况。所引蔡文是：“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威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所引李文是：“当时国际对于中国的指导有不少电报来，可是党没有看到，都到了老鲍袋里去了，并且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的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威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就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显然，鲍罗廷未让瞿秋白进入5人政治局，是为了应付陈独秀而不是冷落瞿秋白。我认为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一个重要佐证是成立5人

政治局不几天，瞿秋白就同鲍罗廷一道上庐山。据李维汉同志回忆，5人政治局常委会是7月4日至7月12日之间的一天成立的，鲍罗廷同瞿秋白上庐山是7月13日。他们上庐山，名为休养，实是研究下一步工作，或许还带有工作回顾、总结经验教训的性质。所以，此行表明鲍罗廷对瞿秋白特别信任的。当时，可能5人政治局常委也看出左右我党重大行动的苏联顾问实际信任瞿秋白的意图，所以，李立三、邓中夏等还特地上庐山征求瞿秋白同志对建议举行南昌起义的意见，并同时商定由瞿秋白同志回武汉向中央汇报。在7月25日、26日连续两次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瞿秋白汇报了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并同常委一道对起义做了具体的分析和安排。由此看来，瞿秋白同志虽不是常委，实际上在当时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当他在7月21日同鲍罗廷从庐山返回武汉后，便立即参加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由于常委会责成瞿秋白主持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这在实际上就等于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也大概由于瞿秋白已在实际上主持中央常委工作，所以在“八七”会议上才由瞿秋白同志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

中央紧急会议原订7月28日举行，由于当时形势非常紧急，交通不便，直到8月7日才举行。会议只进行了一天。会议有三项议程：一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报告，内容是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接着，罗明纳兹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第二项议程是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瞿秋白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指出当前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而不能由国民党消灭我们，

我们应当用革命方法争得民权，我们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提出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其次，提出实现这一策略的三条具体方针：一是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二是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三是要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最后，瞿秋白提出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交会议讨论通过，同时要求会议对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追认。在讨论这3个议决案时，都由瞿秋白同志宣读草案全文，并由他或国际代表对代表们发表的意见作出答复。会议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7人为候补委员。在8月9日举行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瞿秋白、苏兆征、罗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任党报总编辑，由苏兆征兼管工委，由罗迈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瞿秋白同志于是便正式成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主要是从1927年4月党的“五大”前夕到11月中央扩大会议这一期间），瞿秋白同志对中国革命有着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当形势危急之时，及时指出问题的严重性，竭力避免革命遭受更大损失。瞿秋白同志在党的“五大”期间向大会散发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早在是年2月间就写成。尽管这篇重要文章正式发表稍稍迟了一些，在在大会上毕

竟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引起到会同志和未与会的其他同志对若干严重问题的关注。避免了某些尚能避免的损失。此外，这篇文章以及瞿秋白的其他文章、言论，对于党内认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停止其错误领导，也起到引导作用。

第二，于狂澜既倒之际勇担重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局势是十分严峻的，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许多人此时明显地倒向蒋介石反动势力，而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人出现思想混乱，乃至动摇。一些不坚定的党员在报上公开发表脱党声明。在此形势危难之际，瞿秋白同志勇敢地坚定地担负起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重任，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胆略和气魄领导全党迅速地重整队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面对白色恐怖，做好应急工作，发动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为开创革命新局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首先是主持筹备和领导“八七”紧急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如同后来的遵义会议一样，也是一次转折性会议。它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并且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sup>①</sup>

其次是及时恢复和整顿各级党组织。鉴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和全党面临的白色恐怖，“八七”会议上所作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指出党的组织自上至下都要“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瞿秋白主持的8月9日政治局会

<sup>①</sup>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513页。

议上专题研究了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问题。会议决定派蔡和森、王荷波等前往北方，组织北方局，管理河北、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并负责报告“八七”会议决议案，以会议精神整理所属各省党组织。委派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等前往广东，组织南方局，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并负责报告“八七”会议决议案，按会议精神整顿该三省党部。会议还决定改组湖南省委，以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接着，中央政治局于8月12日和19日先后发出《中央通告》第1号、第2号，阐明“八七”会议的重大意义，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全党。在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八七”会议各项决议和主要精神很快传达到全党，使全党同志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有了清楚的认识，并明确了今后的总方针是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此后不久，中央又决定成立以罗亦农为首的长江局，管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7省各党部。至此，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基本上都得到整顿。接着，还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了党的秘密机关报。中央还先后派人巡视各地，指导工作。

再有，积极领导工农运动，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早在7月下旬，中央5人常委就已做出组织农民秋收起义的决定，并于8月3日前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3日，中央正式做出决定并通知有关省委。“八七”会议上充分肯定了上述决定，并且向有关省委重新发出通知。各地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以及发动农民秋收起义是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的

精神，先后发动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在工人运动方面，尽管各地工会被查封，工人领袖被捕被杀，但各地工人群众在“八七”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仅1927年9、10两月，郑州、汉口、上海、广州等地的工人就举行了数次游行、请愿、罢工等斗争。这些工农运动虽然大部分都未获成功，但是它却有力地在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并没有被反动派剿灭，相反，革命正在走向深入。蔡和森同志于1927年9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记录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转折。他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sup>①</sup>“八七”会议给全党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新的希望。

瞿秋白同志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对党做出的重要贡献是显著的，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同时，由于瞿秋白同志本人的缺点和错误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也应当明确地指出，这就是几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所滋生的左倾盲动主义。

党的“八七”会议就已出现左倾问题，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

<sup>①</sup>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



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这种左倾错误在“八七”会议后继续发展，到该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时，就在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中形成了统治局面，以至影响全党，使党的革命事业损失重大。当然，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对于当时的左倾，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意见就明显地起着指导性作用，罗明纳兹来华就负有转变中国革命政策的使命。他来华后，主张很激进，他的主张对“八七”会议和中央11月扩大会议都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当时党内部分同志急于挽回形势的躁进情绪无疑地促进了领导人的错误决策，等等。然而，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同志对从“八七”会议开始的左倾错误也有责任。如果说瞿秋白对“八七”会议期间的左倾错误只负部分责任的话，那么他对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及其以后半年时间内的左倾错误就应负主要责任了。他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塞维克》1卷5期）一文中说，中国革命虽然经过了三次失败（“四·一二”蒋介石的反动，7月汪精卫的反动，10月叶贺南征失败），“但是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他以此作为理论依据，在11月中央扩大会议后，制订了一系列总暴动计划，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以及上海起义，武汉起义等，结果都一一失败。而且，从全党工作来看，在瞿秋白主持下，从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28年4月，贯彻了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瞿秋白左倾思想的产生，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运用上的局限。虽然他利用学习俄文和访苏之便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在苏二年又亲闻目睹苏联革命的实绩，更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但是，他在实际运用时，对形势的分析往往偏离实际，由此制定的方针自然就欠妥当。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些本本主义，缺乏活的辩证思想。能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却缺少革命的灵活性（他后期就做到了），遇事就容易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由片面又容易导致绝对化。比如在1927年8、9月间，不分情况一律强调暴动起义，乃至要造成各地的红色恐怖。二是世界观的局限。从基本立场和政治态度、基本观点等方面来说，瞿秋白早已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任何一个人的思想绝不会是全然纯粹的，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存在思想感情上的某些缺点。瞿秋白这时虽然已被历史的潮流推到党的领导岗位上，身负重任，但他的身上仍然留存着一个从旧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走出来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某些心理特质、思维特点和感情特色。如他的主观性——对事物的分析判断往往偏重于主观推论，而忽视实地考察。如他的强烈感情色彩——对他感兴趣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往往以愿望代替了冷静分析。加上革命经验上的局限。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7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在笼统的“国民革命”的口号下进行发动工农、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革命斗争的，斗争方式又主要是以国共合作的面貌出现，因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如何反帝反封建军阀，如何巩固和完善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等方面探索了许多成功经验，而缺乏在“苏维埃”旗帜下独

立战斗的经验。所以，当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屠杀革命时，就显得相当被动了。从全党的角度来讲，如此，从瞿秋白本人的角度看，也缺乏经验。他从苏联回国后，一开始便在党的上层机关工作，缺乏基层工作、前沿斗争的实际经验，缺乏实际斗争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唯其如此，可以说，瞿秋白当时担负的工作超过了他的主观条件，很难胜任。他后来在总结他这段工作时用无牛则使犬耕田的比喻来说明他力不胜任、勉为其难的困境，显然是符合实情的。瞿秋白有自知之明。

## 二 关心文学事业

瞿秋白同志1923年从苏联回国后立即投身于党的政治斗争，几乎是全力以赴。但他在繁忙的政治活动中仍不时挤出一些零星时间关心革命文学事业，在这条战线上做了许多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也是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是他翻译和撰写了一批文章。主要是文艺性政论（杂文、随笔等），其次是文学评论和文学作品翻译。涉及内容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谴责帝国主义、军阀等反动势力，批判反动谬论；二是赞颂革命，鼓动无产阶级革命；三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有这些文章都体现了一个基本倾向：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因此，这些著译的基本特点是：鲜明的党性、针对性和战斗性。

瞿秋白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以文艺作为斗争的武器，用以揭露敌人，打击敌人，颂扬革命。《浪漫的狱中日记》（1923年8月）运用文艺随笔的形式

揭露曹锟、吴佩孚等军阀镇压“二七”工人运动的血腥罪行。在以《鞘声》（1923年——1924年）为总名的一组12篇杂感中，对所谓“东方文化”以及鼓吹这种文化的“无用的人”对反动派鼓吹的所谓政治先必治己的谬论，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反对共和、反对进步固守落后文化的思想，对“国学”派、“研究系”等种种反动观点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批判。而《欧文的新社会》一文则明确指出欧文的社会学说是行不通的，实际生活昭示工人应当用别一种方法即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争取到自己的福利，才能建设人类将来最光明的新社会。在《过去的人——泰戈尔》一文中通过评论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批评泰戈尔否认政治斗争，指出他的书“是当时一部分落后的印度市侩的‘革命’情绪：又要反抗英国，又怕犯了杀戒。”此路也是行不通的。而在《新的宇宙》以及所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劳动的汗》和《那个城》等作品中，则热情洋溢地颂扬革命家卢森堡的伟大心灵和革命精神，热烈地赞颂人民向往革命的崇高志向，对工人阶级自尊、自重、自主的主人翁精神表示了衷心的敬佩。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上，瞿秋白着重阐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文学的性质。他指出文学应当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应是民族心灵、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文学家的心灵必须融洽于社会生活，并由此陶铸锻炼生活中的“美”而予以真实地描画出来，以达到艺术真实。他在《郑译〈灰色马〉序》一文中写道：“文学是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之映影；而那所谓‘艺术的真实’正是俄国文学的特长，正足以尽此文学所当负的重任。文学家的心灵，若是真能融洽于社会生活或其所处环境，若是真能陶铸锻炼此生活里的‘美’而真实的诚意的无

所偏袒的尽量描画出来，——他必能代表‘时代精神’，客观的就已经尽他警省促进社会的责任，因为他既能如此忠实，必定已经沉浸于当代的‘社会情绪’，至少亦有一部分。”<sup>①</sup> 瞿秋白这样理解文学，至今看来也是对的：既看到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又看到文学对社会情绪——主观精神的表现，不仅强调作家心灵同客观世界、同所处环境要融洽一致，而且强调作家心灵对客观生活的美进行陶铸锻炼——即加工改造，以达到艺术真实。瞿秋白在20年代初期就看到文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看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是难能可贵的。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学之于苏联，而苏联当时文坛以机械唯物论为主要特征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占统治地位，在关于文学性质的问题上，瞿秋白未受其影响，是十分不易的。正是基于对文学性质这样的看法，所以他在《最近俄国的文学问题——艺术与人生》（1924年）一文中，斥责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认为为艺术的艺术是不可能出现的，“生在社会潮流汹涌时期的诗人，虽是纯艺术派，也不能不为奋勇咆哮的浪花卷去。”即便是生活在恬静时代的作家，譬如中国的“避世诗人”，他们孤芳自赏，以“与鹿逐游”的人生为艺术，而“其实又何尝真能超脱”现实生活呢？文学总是离不了现实生活的。二是关于文学的革命性。瞿秋白在《劳农俄国的新文学家》及《荒漠里》等文中高度赞扬了马雅可夫斯基、谢美诺夫以及劳工派的作家们的革命性，认为他们“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用自己的创作真实地反映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生活，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歌颂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

<sup>①</sup> 《小说月报》第14卷11号。1923年11月出版。

民。因此，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同时，严厉地批评了当时一些诗人、作家沉湎于对“爱”、对“幻想”的抒写，而无视对人民大众困苦生活、对革命群众如火如荼的斗争的反映。瞿秋白辛辣地质问道：“唉，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瞿秋白严肃指出，革命文学应当具有现实性和民族性，反对一切脱离现实，脱离中国实际，生造词语，以模仿外国人写“爱”为能事的“外古典主义”。

瞿秋白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之外，还花费了很多精力编辑报刊杂志。瞿秋白所主持编辑的报刊是党在当时的主要舆论阵地，是无产阶级的重要文化建设之一。从1923年6月起，瞿秋白先后筹办、主编过党中央的报刊《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编辑过《向导》。从1927年10月起，又主编党中央另一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此外，据茅盾回忆，他1927年4月接编《汉口民国日报》以后，得到瞿秋白的直接指导。那时的党中央宣传部长虽然是彭述之，但彭在上海。武汉的宣传工作则由秋白兼管，而且大家都喜欢去请示瞿秋白。“五大”以后，瞿秋白曾指示茅盾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可惜为形势所逼，未能实现。

瞿秋白同志还热情关心进步文艺的发展。1923年，当曹靖华将他的第一篇译稿（契诃夫的《蠢货》）送请瞿秋白指教的时候，秋白同志予以积极支持，并在他主编的《新青年》第2期上发表了。他对曹靖华说：“中国文艺田园太贫瘠了，你应当做一个引水运肥的农夫。”次年，瞿秋白看阅了曹靖华翻译的契诃夫的《三姊妹》，做了些修改，就交给郑振铎，列入文学研究会的丛书出版。此后，曹靖华每当在翻译上遇到什么疑难

就去请教秋白同志，瞿秋白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帮助，有时竟是长长的回信。1928年瞿秋白到莫斯科后仍叮嘱曹靖华：中国极需要苏联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的介绍，希望他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并且说，应当把介绍苏联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工作当作庄严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这些希望对曹靖华日后坚定地努力于这方面的革命工作起到了明确的指引作用。<sup>①</sup>瞿秋白还曾同蒋光慈一道去访问过郭沫若。在谈话中，瞿秋白建议郭沫若翻译《战争与和平》，说这部小说有反波拿巴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瞿秋白的建议，郭沫若接受了，3年之后郭沫若动手翻译这部名著，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译稿。<sup>②</sup>著名革命作家蒋光慈更可说是秋白家的常客。蒋光慈要写一部小说的时候，动笔之前往往要去征求秋白同志的意见，而完稿以后又将原稿送去请他审阅。蒋光慈有名的小说《短裤党》就是以秋白给他讲述的党的活动情况作为素材的，连书名也是秋白同志给取定的。<sup>③</sup>从以上二三事便可大体看出瞿秋白同志当年对进步文学事业的关心和重视。

这里还需讲到瞿秋白同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太阳社》的关系问题。杨之华同志在《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原载1953年第1期《党史资料》）一文中曾说：“一九二三年秋白又与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这个说法不确切。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是1920年11月29日在北京大学开第1次筹备会的，而瞿秋白已于本年10月16日离开北京去苏联，自然是绝没有参加此会的。12月4日，在耿

① 见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忆秋白》。

② 见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7卷。

③ 见郑超麟《我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济之家又开第2次筹备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因此，在公开发表的12个发起人中没有瞿秋白。在郑振铎、茅盾等文学研究会的中坚的有关回忆文章中也未谈到瞿秋白参加发起之事。瞿秋白1923年从苏联回国之后倒是参加了文学研究会的。茅盾回忆这一情况说：

“他与郑振铎在北京就是老相识，通过振铎，我与秋白接近也多了，又渐渐觉得，他不只具有文人的气质，而且，主要是政治家。他经常深夜写文章，文思敏捷，但多半是很有煽动力的政论文，用于内部讲演，很少公开发表。间或他也翻译点文艺作品，写点文艺短评，因此，郑振铎就拉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sup>①</sup>可见，瞿秋白成为文学研究会成员是文学研究会成立两年以后的事。不过瞿秋白虽然不是文学研究会正式发起人之一，他对文学研究会的产生却可能起过一定的作用。我们知道，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等人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而这几个人又正是1919年在北京同瞿秋白一道主办《新社会》及后来的《人道》等刊物的同人。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研究会的12个正式发起人中，《新社会》原成员就占了4个。从事理逻辑上讲，这一批进步知识青年，恐怕正是在《新社会》、《人道》等刊物都遭挫折的情况下，才萌发成立文学研究会的。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及其刊物是《新社会》和《人道》在某些方面的继续和发展。思想基础和办刊方针基本上一致，只是越来越显露出进步色彩和文学色彩罢了。可能在《人道》被迫停刊之后，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就非正式地议论过另辟蹊径的问题。不然，不会在《人道》停刊仅两个月之后，郑振铎等就能正式召开文学研究会的

<sup>①</sup> 茅盾《回忆秋白烈士》，《忆秋白》。



筹备会议。假如他们在瞿秋白离国之前议论过重新组织文学社团之类的事，瞿秋白则一定是参与其事的。这一点，是瞿秋白当时在他们那一群人中的威信所决定的。郑振铎曾回忆说：“秋白在我们几个朋友里面，是有‘少年老成’之称的。许地山、耿济之、瞿世英和我的年龄都比他大。地山在入大学之前，还曾‘饱经世故’，到过南洋，做过教师。但比起秋白来，似乎阅历都没有秋白深。秋白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够得上是‘老大哥’。他说的话，出的主意，都成熟、深入、有打算、有远见。他的中国书念得很多，并大量的刻苦的读着哲学书。对于‘老’‘庄’特别有研究。我那时只读些刘知几《史通》，章实斋《文史通义》之类的书，见解很幼稚，对于他的读学和思想的深刻是十二分的佩服的。有许多事，都要去请教他。”<sup>①</sup> 瞿秋白对文学研究会的出现起过一定的孕育作用大致是可以肯定的。恐怕也正是他同文学研究会有着思想观点的一致性、组织沿革的相关性以及人事关系的亲密性，所以他尽管未能参加正式的筹备会、成立会，但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也仍然将他视为不是成员的成员。所以他的《饿乡纪程》一书在1922年9月就列为文学研究会的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瞿秋白同太阳社的关系。最早披露瞿秋白参加太阳社一事的是阿英。阿英1938年6月9日以鹰隼的笔名在《文汇报》的《世纪风》副刊中发了一篇文章《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文中谈道：“一九二八年，太阳社成立于上海，当时中央干部参加的，有秋白、杨匏庵、罗绮园、高语罕等。秋白在工作上，有许多的指示，因为政治工作繁忙，却没有写什么东

<sup>①</sup>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12期。

西。”①阿英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中再次提及此事：“太阳社全都是党员，有自己的党组织，秋白同志还亲加指导。”时至1977年，当别人询问有关情况时，他再次肯定了原先所谈内容并作了如下补充：秋白同意参加太阳社是光慈去动员的，据光慈说，征得了组织的允可。太阳社成立春野书店，出版《太阳月刊》是经秋白同意的。当时秋白是总书记，不便常出面，太阳社的成立会和一般活动他都不来，光慈常有机会去找他，有时我也一同去，杨之华有时也捎来过秋白的意见。考虑到秋白当时的地位和处境，太阳社的大多数成员并不一定都知道和了解秋白与太阳社的这种关系。①阿英作为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对于太阳社的情况是了解的，他谈的情况自是可信。

---

① 《阿英文集》407页。

# 第五章 再接再厉

## 一 历史的回顾

瞿秋白同志在1927年党的“八七”紧急会议期间及其以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重要工作。如领导全党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挽救革命，重整队伍，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革命方针等，都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原因，瞿秋白同志在这段时间里又犯了左倾错误，他对“八七”会议以后，特别是对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全局性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负有无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所幸的是，这一盲动主义左倾错误由于受到一些战斗在工农运动第一线上的同志如毛泽东等人的抵制，在事实上亦教训惨痛，再加之共产国际1928年2月25日举行的第9次扩大执委会的批评，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它未能延续很久，到1928年4月，发表〈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便被制止了。为了更好总结大革命失败以及“八七”会议以后的经验教训，明确今后的革命任务，

接连不断地争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由此实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快速转变。这一理论是形成他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原因之一。直到1928年1月，他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第14期）一文中都还认为：“中国革命，可以说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之模范。亦就是所谓‘由民权主义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模范。”通过“六大”会议的讨论，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才明确认识到：“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还有的问题，在“六大”时也未获得正确的认识，这就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他一直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有妥协性，主张同他们既要联合又要斗争。而大革命失败后，他却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完全丧失了革命性，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了。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认为党的策略应当是以资产阶级为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并与之斗争。在1928年7月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就进一步是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瞿秋白之所以对资产阶级如此看法，是因为他认为1927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是所有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他没能分清楚，大革命后期背叛革命的只是其中的大资产阶级和买办官僚阶级，蒋介石代表的只是这一部分资产阶级，而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即仍有其倾向革命的一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

接连不断地争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由此实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快速转变。这一理论是形成他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原因之一。直到1928年1月，他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第14期）一文中都还认为：“中国革命，可以说是马克思所称为‘不间断的革命’之模范。亦就是所谓‘由民权主义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模范。”通过“六大”会议的讨论，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才明确认识到：“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还有的问题，在“六大”时也未获得正确的认识，这就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他一直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有妥协性，主张同他们既要联合又要斗争。而大革命失败后，他却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完全丧失了革命性，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了。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认为党的策略应当是以资产阶级为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并与之斗争。在1928年7月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就进一步是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瞿秋白之所以对资产阶级如此看法，是因为他认为1927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是所有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他没能分清楚，大革命后期背叛革命的只是其中的大资产阶级和买办官僚阶级，蒋介石代表的只是这一部分资产阶级，而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即仍有其倾向革命的一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

同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合作的一面，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这一错误认识早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就已显得十分突出。他于27年11月16日写的《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写道：“中国革命要彻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总之，瞿秋白虽然认识到中国当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又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已经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急转直下为社会主义革命。这自然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偏颇理解。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瞿秋白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提出，客观原因有5条，即：①中国革命底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底力量强大。②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底联合战线。③反动派有着数量上占很优势的武力。④革命运动发展底不平衡，特别是农民运动发展不够。⑤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动摇而背叛革命。显然，除②、⑤条欠妥外，还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其中，主要是反动派的强大以及对农民运动的忽视。在主观方面就是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正确地指出：“然而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革命失败底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底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底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

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底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底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底领导权，这都是机会主义底最高表现。”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他认为，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至于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应负何种责任，也应具体分析。他说：是否责任由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这是法律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sup>①</sup>瞿秋白的这些看法表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他的无产阶级的博大胸襟，对任何一个犯错误的人不一棍子全盘否定，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更不落井下石，置人于死地。

关于盲动主义错误。

经过失败的教训，经过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党内的批评，瞿秋白对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六大”时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六大”的开幕词中就将批判盲动主义列入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政治报告中，又进一步对盲动主义的错误事实

<sup>①</sup> 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326页。

和错误性质作了具体的分析，既有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其他人的错误。他说：“八七后认‘过火’或‘阻止革命’为机会主义，禁止杀土豪劣绅是机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是杀人放火，杀人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会主义，最共产主义了，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倾向。新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盲动主义有关。盲动主义是机会主义反过面来。马日事变，不准备暴动，固然是机会主义，但有的只几十人，亦要来暴动，说今天不能不暴动，主张暴动即社会主义，不暴动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sup>①</sup> 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批评了在土地问题上主张没收所有一切土地的盲动主义观点。他说：我们的党纲是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没收自耕农的土地。<sup>②</sup> 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又进一步从理论上对盲动主义的错误做了分析，他说：盲动主义“由于过分估量反革命营垒崩溃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武装起义应有的条件，不去认真地准备武装起义”，“结果往往变成散乱的零碎的恐怖行动。这是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费力量，损失工人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伍。”对于产生盲动主义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他也作了分析：“盲动主义是代表非阶级化（鲁按，非无产阶级化）的分子，乡村底及城市底贫民（失业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开始加入革命的雇佣兵士，这是他们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底表现。所以盲动主义，可以表示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这是与无产阶级底纪律性和组织性相反的。”<sup>③</sup>

总结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是“六大”的主要任务之

<sup>①</sup>，<sup>②</sup> 均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322页、323页。

<sup>③</sup>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瞿秋白选集》。



一，为此，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左倾盲动主义是大会的两项中心内容。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于“八七”会议以来已做了不少，所以实际上，这次大会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纠正显得特别必要。大会对左倾盲动主义的分析批判，使瞿秋白受到深刻教育，他检查了错误，提高了思想。大会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瞿秋白同志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未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职务则由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这一变更，与共产国际的意见很有关系。共产国际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布哈林认为要让工人干部代替大知识分子做领导工作。<sup>①</sup>从此，瞿秋白同志便离开了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岗位。

## 二 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

在党的“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布哈林在向中共“六大”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国际执委制定了一个计划，要中共派代表常驻莫斯科，以便共产国际通过常驻代表同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也有利于共产国际同中共代表共同实现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六大”以后，在莫斯科就设置了以瞿秋白为团长（张国焘为副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团由5人组成：瞿秋白、张国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从1928年7月到1930年8月，整整两年时间瞿秋白同志一直战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线上，基本上脱离了国内党的领导工作。在这两

<sup>①</sup>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

年里，瞿秋白主要是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参与研究和总结有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东方各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出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关会议。其次是在理论上继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期对国内的革命斗争起到指导作用。

1928年7月11日，中共“六大”闭幕。6天之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便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开了一个半月，至9月1日才结束。瞿秋白、苏兆征（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书记）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还被选为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此外，瞿秋白同志又被指定为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的三位补充报告人之一，于8月15日、21日两次作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问题的补充报告，于8月4日、23日两次作了讨论发言。大会结束时，苏兆征、瞿秋白、向忠发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张国焘为候补执行委员）。紧接着，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瞿秋白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的长篇报告和讨论发言，同他在中共“六大”上的书面报告和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相比，并无理论上的新发展。所不同的是他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所作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以及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的结束语，是对中国大革命全过程的一次完整回顾，中心是要阐明民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妥协性，一方面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另一方面则总在伺机背叛革命。因此，无产阶级绝不能相信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必须坚决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推

翻资产阶级，而同农民结成坚定的联盟，进行土地革命。瞿秋白立足于本国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想由此总结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具有的普遍意义的规律。他说，他要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分析一下“关于殖民地问题中的几个共同点”。因此，他在报告和发言中所作的一系列结论，不仅应看作是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总结，还应看作是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一般原理的认识。他所提出的结论，其要点有：①“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力量的接近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接近必定是暂时的。”②；“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联合时，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应把着重点放在农民身上，以便从共同斗争的第一天起就使民族资产阶级失去活动能力，从而把农民引向前去。”③，“与资产阶级同路时，与资产阶级联合时，我们千万不可忘记，资产阶级随时都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变为无产阶级的敌人。”④，“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的背叛乃是历史的必然。”⑤，“不推翻同封建或半封建式的豪绅土地关系紧密勾结的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有任何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①

瞿秋白在斗争中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认识，他对两个“六大”的感受以及对今后党的工作的考虑，可以从他1928年9月14日从苏联疗养地巴库寄给尚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同志的一封长信看出。对于这两个大会，他说：“两次大会所给我们的确是不少，技术上的原因使我们不能迅速广泛地传播此次所得教训于广大群众，这实在可恨可恨。”而“政治上的认识，我自觉‘自信力’增加很多，党的政治上之生长是异常的明显，两

① 以上引文均系瞿秋白1928年8月15日、21日两次报告，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次大会之中，至少使一般参加的同志，得到了更深的了解。”对于党的工作，他认为，“肃清一切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余毒，必须根据两次大会期间的决议坚固反对盲动主义复活与机会主义，发展党内群众的讨论。”“苏维埃区域中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创造红军，领导一般农民的琐小斗争到推翻豪绅政权的斗争——游击战争。”“农民的地方暴动，还只是收集革命力量取得群众的斗争，还不是争取一省或数省政权的斗争。所以一方面要注意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需要避大击小的红军的游击策略。”“现时特别要注意盲动主义情形的余波与再生，特别要注意忽视农民革命作用”<sup>①</sup>无疑这些认识都是很正确的，可见瞿秋白通过两次大会，认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认真总结了近一二年的经验教训，并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正确吸取了两次大会的正确意见。在这封信里，他还讲到自己近期的工作计划，尽管他当时正在病中，但考虑到党内干部培养提高的重要性，自己必须为此做些实际工作，准备编译：马列选集、国际经验、国际时事、苏联时事、中国革命问题等。不久，他就写出了一本通俗小册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莫斯科出版），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经验教训，讲解了当前的革命任务和政策，策略。对于计划中的几项工作，以后也陆续地做了一些。由于精力不允许，他未能全部完成。他对于自己衰弱多病的身体，十分苦恼，叹息说：“我又要养病，又想做许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苦闷在瞿秋白的一生中，不时都有明显的反映。

<sup>①</sup> 转引自杨之华《回忆秋白》，88页、89页。

瞿秋白作为共产国际执委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于1929年7月3日至7月19日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第10次全会。同时参加全会的还有蔡和森（蔡是1929年1月到达莫斯科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增补成员之一）、陆定一（陆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大”上产生的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1928年底到达莫斯科。仍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在这次全会上，瞿秋白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7月6日的大会上发了言。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要求各国共产党内展开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库西林和曼努意斯基等人的报告宣称，要开除各国共产党的“右派”，“清洗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派式的分子”。瞿秋白在7月6日的发言中表示支持这一主张。他说：“我以为共产国际中右倾危险不仅从宗主国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从殖民地问题中表现出来。”“机会主义者的殖民地弟弟，比其宗主国的哥哥，走得更远。”<sup>①</sup>

瞿秋白除了参加共产国际有关会议外，1929年夏，还率黄平出席了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在会上发表反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演说。<sup>②</sup>1930年8月1日在回国途中同周恩来一道参加了柏林失业工人的示威大会。

瞿秋白在这二年里还撰写了近40万字的著作，发表在国内的《布尔塞维克》和苏联的《真理报》、《共产国际》等报刊上。这些著作进一步论述了中国革命性质和当前的革命任务及斗争策略。如《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中国到哪里去？》、《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等。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党的思想建设问题。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

<sup>①</sup> 据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109页。

<sup>②</sup> 参见黄平《往事回忆》，68页。

产党》、《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揭露批判。如《论国民党改组派》、《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等。在这二年里，瞿秋白还翻译了共产国际的纲领，校阅了列宁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如《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瞿秋白还对中国共产党党纲，对中国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和婚姻法等都进行过研究。还抽暇研究中国汉字的拉丁化问题，并草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在莫斯科出版。

这里需要讲到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事件中的态度及所受影响问题。从1927年夏天开始，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就在中山大学学生中扶植亲信，制造宗派，为日后派遣亲信回国掌握党权以使中共完全听命于他们做准备。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等人在米夫等人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大”支部局，进而形成“支部派”，在中大寻衅滋事，借以打击不同意见的人，意欲控制整个中大。他们一手制造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组织”一案，通过苏联当局的情报机构进行立案侦察，并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逮捕4名留学生，决定开除12名学生的党籍、团籍。这一冤案案起中大学生和其他在苏中共党员的义愤。1928年8月以后，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自然十分关切这一严重政治事件。他在认真听取学生的反映意见以后，同局恩来、邓中夏等同志一道对“江浙同乡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纯属捏造诬陷。而苏联有关当局竟然拒绝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前往查阅核实有关材料。在此情形下，瞿秋白主持起草了《中共代表团致联共中央政治局信》，提出对“江浙同乡会”的意见

及事件解决办法。瞿秋白同时还向中共中央寄呈了关于“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报告。然而联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共代表团的报告置之不理。由于联共中央用拖延手段支持王明等人继续对“江浙同乡会”的斗争，致使中大学生群情激愤，1929年夏天，在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上终于公开爆发了多数学生反对王明宗派小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坚持正义，在会上发表演讲，支持多数派学生的正确意见，使王明集团及其扶持者米夫等人十分狼狈。从此，米夫王明集团对瞿秋白就怀恨在心，必欲报复。指控中共代表团对中大多数学生的支持是错误的。当时，联共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清党运动，中大自然也在其中。米夫王明集团借此机会对反对他们的人实行打击报复，将反对米夫等人错误做法的工人出身的学生李剑如、余笃三等人说成是“工人反对派”，诬蔑他们进行派别活动；而且说他们的派别活动受到瞿秋白等的支持。1930年4月中大清党结束时，米夫代表共产国际向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人宣读了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的议决案》。该决定说：“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大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的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多数解体的行动。”“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会有鉴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份，并与国

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份。”<sup>①</sup>于是，瞿秋白就被解除代表团团长职务，改派周恩来去莫斯科接替瞿秋白的团长一职，并决定调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陆续回国。

### 三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

中共“六大”虽然同时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但是，全党尚未从理论上和思想根源上对左倾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全党同志并未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也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少人肤浅地认为左倾仅仅只是一个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问题，似乎动机是好的，好心办了错事。因此，并未真正认识到它的严重危害性，因而对左倾错误并不象对右倾错误那样气愤。总之，全党在当时未能从思想体系上彻底肃清左倾意识。应当说，这个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党在当时的一个严重疏忽。这一疏忽给党的思想建设，给党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当时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这便是左的思想始终绵绵不绝，有时甚至十分盛行，统治全党，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当然，事实上，单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是无法从思想上彻底根除左倾思想的，因为中共一些领导人所执行的左倾路线，左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当时中共领导人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很成熟，在一些问题上不能识别马克思主义的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般总是认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看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即便有一些异议，当时也不可能对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

<sup>①</sup> 转引自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375页。



主张。因此，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尚未从思想上、从理论上肃清左倾思想以前，中共是难以肃清左倾思想的。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六大”以后仍然潜伏着左的思潮，一有机会，它便会再次抬头。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出现便是如此。六届二中全会以后，革命力量有一些新的发展，部分同志误认为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加之共产国际多次指示说，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国危机时期，即进入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时期。于是，在193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接受国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之后不久，李立三（“六大”后，总书记虽由向忠发担任，但实际上主持中央政治工作的是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的李立三）就提出组织全国武装暴动计划。1930年6月在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形成〈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样的左倾盲动主义文件。左倾盲动主义于是第二次统治了党的领导机关。其结果，是又一次使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损失。对中国革命指导意见上的错误，共产国际也有一些觉察。。当共产国际收到李立三等人于1930年7月1日发出的〈中共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之后，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便于7月23日召开了中国问题讨论会，并邀请瞿秋白、周恩来参加讨论。讨论会面对中国红军进攻大城市遭受严重挫折的严酷现实，不得不修正共产国际1929年10月指示信中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作出〈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决议较为冷静地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涨只是在个别区域里成熟起来，此刻还没有形成全国的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也还没有汇合起来。因此，目前还不能占领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可是李立三这时已听不进这些正确意见，继续实施攻占大城市的盲目行动，让红

军从长沙退出后又去攻占武汉。在此紧急情况下，共产国际便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新的指示精神，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包括驻共产国际的其他成员）于1930年8月下旬回到国内后，便同党内其他同志一道着手研究和解决当时的问题。从8月底到9月中旬，作出一系列纠正左倾错误的决定，如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停止武汉、上海同盟罢工，恢复党、团、工会独立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等等。制止了左倾盲动的发展。接着，便于1930年9月24日至9月28日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

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1930年7月决议精神，着重讨论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形成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一九三〇年九月，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决议》。该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在许多重要问题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总起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现在的事实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力量，还没有平衡，还没有汇合，农民战争之中还缺乏充分的无产阶级领导和组织作用；政治局亦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决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7月对中国革命形势的

估计，即中国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但是目前还未形成全国的革命形势（武装暴动的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还没有保证必需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三中全会严肃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冒险主义行动，制定了党的工作任务。会议确定的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各个苏维埃革命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积极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各种方式的群众斗争，争取广大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在会上，李立三也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全会最后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等7人为正式委员，罗爽（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罗迈、顾顺章、毛泽东等7人为候补委员。

六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只不过，三中全会同“六大”一样，它着重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事实，纠正左倾冒险的有关决定，而未从理论上和思想上探究左倾的产生根源，没有严肃指出左倾冒险主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而且制定的任务仍有左倾的内容，如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以及为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的提法都是缺乏现实可能性的。因此，三中全会也是有缺点的。然而，这一缺点的产生，主要仍是由于全党当时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因此，无论是瞿秋白或其他领导人，个人都难以承担这一缺点的主要责任。

# 第六章 在文化战线上

## 一 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

瞿秋白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可是，米夫、王明等人却严厉地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支持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说李立三“提出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路线相对立的路线”，而“党的个别领导同志”又“支持”李立三这条错误路线。<sup>①</sup>但在实际上，李立三并未提出一条同共产国际相对立的政治路线。无庸讳言，在李立三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第70号通告认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因此，党在目前的总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并说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目前总的政治路线。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

<sup>①</sup>《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决议案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基于此，决议指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要求“组织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士暴动，号召红军积极进攻”，以“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如此等等过高估计革命形势，显然是盲动，左倾错误十分明显。然而这条左倾路线并非李立三的独创，无非是李立三对共产国际当时的左倾路线的机械发挥，李立三路线和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共产国际于1928年7月至8月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按照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论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所作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左倾的“第三时期”理论，1929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又要求各国党内反对“右派”，1929年先是联共（布）发动的反布哈林的右倾，后是全苏展开的肃反运动，都直接引起共产国际的连锁反应，将“左倾”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明确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因此，“党应当推翻统治各地区的一切军阀集团的政权（南方的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等，北方的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奉系集团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斗争。”又说：“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心理和倾向”，等等。<sup>①</sup>这个10月来信到达不久，中共中央便于1930年1月1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10月来信，通过了《接受国

<sup>①</sup>《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

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决议认为必须与一切动摇、犹豫、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以“使国际正确的路线，得以坚决的有保证的执行”。<sup>①</sup>从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便更加发展了。而标志李立三左倾路线登峰造极的1930年6月中央议决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基本要求与共产国际几乎同时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据此，我们认为，瞿秋白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乃实事求是的结论。因此，共产国际东方部于1930年12月起草的《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指责说“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也就不当。这份向共产国际执委的报告全盘否定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其批判和停止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重新布置党的战斗任务等功绩视而不见。而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讨论该报告时不仅完全同意报告内容而且集中地谴责三中全会主持人瞿秋白，说他“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米夫、王明等人为了正式否定三中全会，也是为了否定中共中央原有领导同志，他们策划召开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直接插手下召开了。四中全会名义上是为了进一步纠正李立三左倾路线，而实质上是为了让王明等人取代原中央领导，以实现共产国际通过王明等人对中共中央的完全控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米夫、王明等人在会前搞了一系列违反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是1930年11月16日收到共产国际1930年10月来信的，而在此之前，米夫就事先将该信的精神透

<sup>①</sup>1930年2月15日《红旗》。

露给王明等人。王明得知后，立即改变对三中全会的拥护态度，于11月13日写信给中央，指责中央犯了一系列错误。11月17日，王明、博古再次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为他们在同立三的无原则派别斗争中受到的处分平反，并要求中央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代表。中央于11月22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通过决议表示接受国际意见，承认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然而王明等人继续把斗争矛头对准中央。王明在《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中，攻击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是自觉的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王明还于12月14日发表《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一文，公然拥护“第三时期”的左倾路线，无原则的抢先把反对三中全会、反瞿秋白的党内斗争向全党公开，用以造成舆论压力。与此同时，12月16日，在米夫操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销原中央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于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2月22日，在米夫操纵下，中央发出《中央第96号通告》，声明全盘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一切指责，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错了，必须彻底推翻。至此，中央已在实际上无法工作，一切重大问题均得由米夫等人决策。四中全会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正常情况下召开的。

由于共产国际的上述态度，由于米夫、王明等人的夺权阴谋，四中全会在李立三缺席（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共产国际命去莫斯科）的情况下，瞿秋白便成为王明等人主要的攻击目标，受到严厉的批判。他们不仅要批判瞿秋白现实的“调和”错误，而且还要清算瞿秋白历史上的“错误”，妄图把瞿秋白说成一贯的不正确。王明等人于1931年2月20日发表了《中央政治局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

决议案》。该决议指责瞿秋白对王明等人的斗争是支持了“中大”的派别斗争，并说瞿秋白在三中全会上犯的调和错误不是偶然的，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犯错误的继续，说瞿秋白一贯不尊重国际等等，以此扫清他们夺权的障碍。于是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操纵下，通过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中央工作的全盘否定，产生了由米夫、王明等人内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就这样被迫离开党的领导岗位，直至生命的终结。

从客观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王明等人对瞿秋白的批判与处理是不恰当的。然而瞿秋白本人在当时却并不以为对他的处分错误，反而认为自己是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表示拥护四中全会的决定，接受四中全会对他的批评。这从他于会后写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载《党的建设》第3期，1931年2月15日出版）中可以看出。这封信是他真实思想的反映，并非违心之调。即便是在他被当时中央责令写的《瞿秋白同志声明书》（《党的建设》第3期）中，他说的也是真心话。《声明书》承认自己的这一错误是自己非布尔塞维克的整个立场之中的一部分。瞿秋白的这种认识态度，是他的严格的组织观念的表现。这一政治品质是瞿秋白同志一生都坚持的党性原则。这一基本品质是他拥护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当时他也可能认识不到米夫、王明等人的极左主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许反而认为他们的观点才是布尔塞维克的，是正确路线。严格地讲，我党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对“左”的识别能力是比较欠缺，少数同志对左的错误的抵制，实际上也只是在实际斗争中感到此路不通而产生的，而不是由于在理论上有一个明确的思想界线。至于对米夫、王



明等人所玩弄的一些阴谋诡计，由于瞿秋白向来坦诚待人，从不防范别人，从不考虑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并未认真计较。总之瞿秋白在四中全会以后，并无不平之气。能以平静的心情去开辟另一个战场，从事党的文化建设工作。

瞿秋白同志被排斥出党中央领导岗位之后，他一如既往，继续关心党的革命事业，并且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推动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从1931年到1933年，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党的建设》、《红旗周报》、《中国与世界》、《斗争》等党的刊物上发表了和写出了手稿近30万字的政治著作。然而，瞿秋白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反被误解、歪曲。王明等人还继续以中央名义对瞿秋白的“错误”做出决定，即1933年9月22日的《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该决定说：“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见《斗争》49、50及51几期，特别是关于庐山会议的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内容，主要的就是认为目前时局的中心，不是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伪政权——的尖锐对立，而是军阀混战，认为国民党‘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采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污蔑苏维埃与红军的实际力量，认为‘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因此根本否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着进行五次‘围剿’，这样来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器。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sup>①</sup>应该看到瞿秋白的《庐山会议的大阴

<sup>①</sup>《六大以来》。

谋》（《斗争》49期）一文是有认识上的错误的。这主要是过高估计了苏区的革命力量，认为国民党反动派自己的士兵群众已不大靠得住了，“他们不敢叫大队的士兵去打”。而实际情况是国民党不仅敢派兵打红军，而且从1930年12月开始到1932年6月，先后四次以重兵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仅1932年6月这次，就纠集白军63万之众。在瞿秋白这篇文章发表一个多月以后，蒋介石又调集了一百万军队并且自任总司令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总之，蒋介石用大兵进攻苏区已有二年多的历史，并且当时的形势发展仍然表明蒋介石必然还要大举进攻苏区，必欲全部消灭红军，否则绝不罢休。而瞿秋白却错误地分析国民党庐山会议的一些现象，得出这一错误的结论。这充分反映了他的书生气，轻易相信一些表面现象，同时也反映出他常常以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理解革命发展的理论，以为革命力量、革命形势总是在不断高涨，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他这一认识的确如《决定》指出的：“否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着进行五次‘围剿’”。但是，这只是他认识上的偏差，是“过分估量了革命形势”的结果，而不是《决定》所指责的“是有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责瞿秋白有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系统的，实在毫无根据。实际上，他的这些观点，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映。《决定》将瞿秋白本来属于“左”倾的错误认识说成是“右倾”，无非是为王明一伙一贯的左倾错误打掩护，证明他们的左是正确的。《决定》还指责瞿秋白在文章中否认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伪政权的对立，这一指责更无道理。因为这篇文章本来只在于揭露国民党庐山会议反共阴谋，并不是全面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没有揭到两种政权的对立并不等于没有看到它们的对立。《决

定，对瞿秋白的批判以及责令“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等决定，显然小题大做，借题发挥。王明一伙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他们左倾路线的逻辑发展，二方面是他们宗派集团打击、排斥异己的必然行径，再有，是他们从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事件以来一直不容瞿秋白的历史继续。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党内生活。瞿秋白成了他们这种卑劣手段的牺牲品。对这一次打击，瞿秋白简直不能理解：他已无权，已不是他们的障碍，而且，从四中全会以后，他事事小心，全力投入革命文学运动，在政治上，几乎不曾发表什么较为激烈的言论和独特的主张。尽管如此，王明等人仍不放过他。这种寻衅式的打击，近乎迫害。因此，对瞿秋白精神上的伤害是深重的，使他感到不知如何是好，阵阵茫然。一方面始终怀着一颗为党的革命事业尽心竭力的赤诚之心，而另一而又感到无所适从，动辄得咎。一个人再没有比这种处境更难的了。这使他本来内向、沉默、多忧的个性更加忧郁了。这时的忧郁心境在他后来写的《多余的话》中有明白的记载。他说：“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又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四中全会以后，他不仅无心去辩白个人的是非，而且在一些文章中开始过重地谴责自己过去的缺点、错误。例如他在1932年5月8日署名范亢的《中国大革命史应当是这样写的吗？》（《布尔塞维克》五卷一期）一文便严厉地批评华岗同志对中国大革命的分析论断，说他没有根

据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一贯的正确路线来分析中国的革命事变，使他自己陷落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他在指出华岗的严重错误之后，笔锋一转，把错误之源全揽在自己身上说：

“华岗同志的这种错误和瞿秋白同志以前的错误是很相像的，他的全部‘大革命史’之中有许多地方简直是直抄秋白同志以前的文章，完全没有经过坚决的清楚的批判”。“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完全只着重在民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之间的种种矛盾，而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做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等等。

瞿秋白同志虽然受到王明宗派集团的排斥和打击，但在党内仍有很高的声望。亦仍被国民党反动派悬赏侦缉，<sup>①</sup>但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仍有不少同志经常去看望他，或向他请教问题。党组织对瞿秋白同志的安全问题更是十分关心。当时党在“左联”中的负责人冯雪峰以及当时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同志等都曾受党组织的委派为秋白同志寻找住处乃至亲自护送转移。<sup>②</sup>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爱戴是瞿秋白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能较为安定地为党工作的一项重要保证。

## 二 建设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早在20年代初就已开始了。《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1921—1922年）、《劳农俄国的新文学家》（1923年8月）、《郑译〈灰色马〉序》

<sup>①</sup>见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第19126号公函》。

<sup>②</sup>参见茅盾回忆录十三，史平（陈云）《一个深晚》，载《忆秋白》。

(1923年8月)、《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1924年6月)等就是他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论述文学问题的最早的一批文章。但是这些文章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的运用，还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直接介绍，而且运用时引用的观点也不够准确。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直接而又较为系统的介绍，还是在1931年至1933年这一段时间内。在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一些重要观点都涉及到了。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革命文学从而阐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要义。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无论在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上，在观点的准确性上，都是当时无人可比拟的。他的有关著译，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下面就瞿秋白论述得比较全面又比较深入的几个问题分别作一些评介。

### 文学和生活的关系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瞿秋白早在1920年就已从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接触中认识到了。1920年3月写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就明确认为文学是社会的反映。在30年代，瞿秋白在认识到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文学同生活的辩证关系。他认为：①文学不仅反映生活而且要反作用于生活。他说：“一切阶级的文艺都不但反映着生活。并且还在影响着生活，文艺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他虽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之中最高的一层，他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他虽然结算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

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程度之内促使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幻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sup>①</sup>他由文学要影响生活进一步指出文学应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得力武器。他说：“艺术——不论是那一个时代，不论是那一个阶级，不论是那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sup>②</sup>根据这一观点，他对胡秋原等人鼓吹的虚伪的客观主义给予了有力的批驳。<sup>③</sup>作家要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就必须深入生活，全面体验、了解生活。他说，作家“须要深切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但是，现在革命的作家之中，许多还保存着那种浮薄式的男女青年的‘气派’。”<sup>④</sup>瞿秋白严厉地批评这些作家是“欧化的”无业游民，他们连从旁边去观察一下生活也不愿意，结果得到的只是些归结的笼统的结论，显然写不出好作品。<sup>⑤</sup>革命作家要用强大的艺术力量去反映现实，首先必须具备进步的世界观。他说，无产阶级作家“要创造新的艺术，他们的艺术要公开的号召斗争，要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要提出自己的理想和目的；他们要不怕现实，要认识现实，要强大的艺术力量去反映现实，同时要知道这都是为着改造现实的。”“然而运用艺术的力量，又必须要有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如果宇宙观和社会观是资产阶级的，那么，那所谓‘客观的描写’，所谓‘艺术的价值’就将要间接的替现有制度服务。”<sup>⑥</sup>如何才能具备进步的世界观呢？他认为作家获得进步世界观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深入工农生活，使已经学得的革命理

①《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集》第2卷。

②《非政治主义》，《瞿秋白文集》第1卷。

③《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2卷。

④《非政治主义》。

论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用无产阶级感情去感受一切，这样才算真正转变了立场。他说，作家“要有真正的机会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去感受。”<sup>①</sup>

瞿秋白同志关于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论述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反映论以及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学说的光辉运用。二是对“五四”以后20年代“到民间去”等革命文学主张的科学总结和深入发展，使这些主张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高度。可以说，后来四十年代由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定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那些原则，瞿秋白同志早在三十年代便已初步提出和论证了。只是毛泽东同志后来的论述更为系统，更为深刻。

#### 文学的党性与文学的特性

瞿秋白同志十分强调文学的党性。所谓文学的党性，是指作家要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事文学活动，让文学服从革命的功利性。瞿秋白同志所强调的文学的党性，具体地体现在他要求文学具有现实性和革命性。

瞿秋白一贯要求文学要有现实性。他认为一切文学活动，不论是翻译或著述，不论是理论或创作，都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从中国现状的实际出发，为中国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早在1920年写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就明确主张：“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学才介绍”。后来他进

<sup>①</sup>《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要求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去翻译介绍俄国文学，要让这些文学作品在革命的现实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他介绍苏联文学就是从这一目的来考虑的，他特别看重苏联革命文学对中国普洛文学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他说：

“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队伍——苏联无产阶级的文学斗争应当是我们的模范。读者对于苏联普洛文学运动之中的新任务，应当深刻的去了解，应当会应用他们所研究出来的原则到中国的普洛文学方面来。”<sup>①</sup>文学的现实意义，文学为现实服务的密切程度，是他评价文学的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他在《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一文中对十月革命前几百年间的俄罗斯文学的优劣长短的评论，充分体现了他这一观点，他甚至是以此作为俄罗斯文学发展规律去探讨的。他对鲁迅杂文、茅盾的《子夜》等革命文学的高度评价，更明显地体现了这一观点。瞿秋白自己的翻译、文艺论著和文学创作是他这一观点的成功实践。瞿秋白同志从不搞什么纯艺术的东西，也不搞什么远离现实的文学活动，他的一切文学活动都和现实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瞿秋白所要求的文学的革命性是指文学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武器。他认为，“马列主义无条件的肯定艺术的阶级性，承认艺术的党派性，认为艺术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sup>②</sup>因此，他明确要求，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艺术和文学评论，就不能抱什么客观主义态度，他们应当“为着自己的阶级利益，也就是为着全人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而去从事于艺

<sup>①</sup>《斯大林和文学》，《瞿秋白文集》第2卷。

<sup>②</sup>《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瞿秋白文集》第2卷。



术和文艺评论；他们要坚定的站在真正为着这种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党派方面。”<sup>①</sup>他多次指出文学要有鲜明的倾向性，对于革命作家来说，一定要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革命的思想内容，以此去影响现实，帮助人民改造现实。为了加强文学的革命性，他坚决反对文学与政治无关的错误观点。他反复论述文艺同政治的密切关系，阐明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文艺和政治是不会脱离的，即使作家主观上要脱离政治也是不行的，”“如果他不在政治上和一般宇宙观上努力去了解革命和阶级意识的意义，那么，他客观上也会走到出卖灵魂的烂泥坑里去，他的作品客观上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或者，客观上散布着麻醉群众的迷药。”<sup>②</sup>他认为，“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sup>③</sup>瞿秋白同志本人正是这样，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他从事的一切文学活动都是为着中国革命的需要。他的论文、创作和翻译都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他从事文学活动是在从事革命斗争。他把文学活动当作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对文学的上层建筑性质还不甚明了的时候，他明确指出文学同政治的密切联系，对于发挥革命文学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对于促进倾向进步的作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创作，对于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都是有着巨大作用的。不足之处是他在强调这一点时却走入极端，他认为“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sup>④</sup>这就等于说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完全是政治的工具。这仍未全面揭示文学的性质和作用。不过，我

①《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

②《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瞿秋白文集》第2卷。

③《非政治主义》。

④《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们认识到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提法不科学，是经过几十年的文学实践才总结出来的，瞿秋白在革命文学刚刚兴起的当时很难认识到这一点。

瞿秋白很强调文学的党性，但他又很重视文学的特性。他说：“如果仅仅几句抽象的理论，用说书的体裁写出来，就可以当做文艺作品。那就根本用不着普洛文学运动，因为这只是通俗的论文。文艺的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sup>①</sup>这就是说，文艺作品不同于政治论文，文艺的特点是通过个别的具体形象去反映一般，去揭示历史的必然性，揭示历史的发展趋势。由于他认识到文艺的这一特性，所以他很重视文艺作品的艺术性。他说：“单有革命的‘目的意识’是不能够写出革命的文学的，还必须有艺术的力量。”<sup>②</sup>又说：“艺术品是越能够感动人越好”。<sup>③</sup>他认为，“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sup>④</sup>在我国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般的进步文艺战士往往只强调文艺的阶级性、政治性、工具作用的情况下，瞿秋白还同时指出文艺首先应当具有自身特点，是可贵的。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时代特殊性，革命作家们将注意力都放到强调文学的革命性上去了，未能对文学的特性进行深入的研究，瞿秋白也未能对此作更多的论述。不仅当时，几十年来，我国的文艺理论界都一直存在这个

①《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②《非政治主义》。

③《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④《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偏向，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论述得多，文学的特性、文学的特殊规律讲得少，文学的艺术性也强调不够。应当说，这一偏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严重缺陷。

### “革命文艺必须向着大众”

文艺同人民大众的联系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文艺界进步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先后有不少人就此发表过许多意见。但到1930年那次大规模的讨论为止，一般都只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看作是文艺的形式问题，即如何用人民大众能够接受的形式（主要是语言方面）创作文艺，如何处理旧形式同新内容的关系等。甚至连鲁迅、郭沫若当时也只停留于语言形式问题。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1930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中说：“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郭沫若在《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同上刊）一文中也是说，“所以我所希望的新的文艺，就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通俗！通俗！通俗！我向你讲五百四十二万遍通俗！”而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问题既看作是形式问题也看作是内容问题，而且把文艺大众化还看作是文艺的方向问题。他认为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所利用，为人民大众所掌握，为人民大众所占有，使文艺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文艺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瞿秋白一开头便摘引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一段话作为他全文的出发点：“这将是自由的文艺，因为这种文艺并不是给吃饱了的姑娘小姐去服务的，并不是给胖得烦闷苦恼的几万高等人去服务的，而是给几百万

几千万劳动者去服务的，这些劳动者才是国家的精华，力量和将来呢。”

瞿秋白不仅将文艺大众化问题提高到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高度来认识，而且提出了如何实现这一方向的许多“大众化”的具体意见。他的具体意见是：

第一，要实现文艺的大众化，一个首要问题是解决作家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他认为，之所以几年的大众化讨论深入不下去，主要的障碍“是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sup>①</sup>这不行。而“必须立刻转脸来向着群众，向群众去学习，同着群众一块儿奋斗，才能胜利的进行。”<sup>②</sup>除了感情、立场之外，他认为在艺术创作上也要向工农大众学习。“有人说：不能够把艺术降低了去凑合大众的程度，只有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高攀艺术。这在现在的中国情形下，简直是荒谬绝伦的论调。现在的问题是：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sup>③</sup>瞿秋白的意思是说，革命作家在艺术创作上应从工农群众的实际出发，在工农群众文化水平尚低的现状下，我们的创作只能在吸收群众的思想艺术上的养分的基础上创作出群众现时能够接受的作品，而不能按照知识分子或其他什么人的标准创造出什么艺术作品，让工农群众去高攀这样的艺术。艺术应走向人民，而不是让人民去高攀艺术。瞿秋白这里虽然直接讲的是后来称之为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说当时的问题是普及而不是提高，而实质上讲的仍是作家的立场问题：革命作家创作艺术应当从工农群众的需要

① <“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第2卷。

②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③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和爱好出发。

第二，大众文艺在创作上要有鲜明的革命目的性。瞿秋白认为，大众文艺“要在情绪上去统一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意识上在思想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sup>①</sup>因此，他认为大众文艺的创作，“一，是鼓动作品”，“二，为着组织斗争而写的作品”，“三，为着理解阶级制度之下的人生而写的作品”。<sup>②</sup>写什么以及如何写呢？“当然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罢工，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当然是主要的题材。同时，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绅士地主阶级的一切丑态；一切残酷狡猾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一切没有出路的状态，一切崩溃腐化的现象，也应当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揭发他们，去暴露他们。”<sup>③</sup>这就是说，在题材上，重要题材与一般题材虽有主次之分，但都可以写，题材应当广泛；在创作态度上，歌颂和暴露也都需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立场，我们应当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歌颂和暴露，这就是如何写的问题。用什么写呢？“普洛大众文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读出来可以懂得的话来写。”<sup>④</sup>即“用现代的普通话来写”。

第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实质是进行一场文学革命。他说：“总之，革命的大众文艺问题，是在于发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sup>⑤</sup>又说：“文艺大众化的运动必须是劳动群众自己的运动，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一定

①《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②同上。

③同上。

④《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⑤《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第2卷。

要领导群众，使群众自己创造出革命的文艺。”<sup>①</sup>也就是说，文艺大众化运动是要在文化领域实现一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从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到文学活动的组织领导，从文学服务方向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从作家的世界观到文学的创作方法，都要来一个彻底的变革，让无产阶级文学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使革命文学直接为工农大众所利用，让工农大众自己能够创造出革命文学作品。他认为这个革命运动不仅要继续解决“五四”文学革命尚未解决的某些遗留问题，而且还要清理和革除新文学运动中一些并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瞿秋白这一思想的主要精神是正确的，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是需要进一步开展一个深刻而全面的彻底革命的，但是这个新的文学革命运动，必然是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而不是否定“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瞿秋白对“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巨大成绩估计不够，对“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的分析，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对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有些说法欠妥。瞿秋白主要是希望经过一个全面的彻底的变革，使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文艺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所产生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深刻变化，不正是十年前瞿秋白所希望的那样一种变化吗？

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论述，实则是对无产阶级文艺问题的论述，即建设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文艺以及如何建设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瞿秋白同志第一个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为人民大众所占有的原则问题。

<sup>①</sup> 《“我们”是谁？》。

## 关于现实主义问题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他翻译了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对这封信予以注解，还评介了哈克奈斯，作专论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这些文章全面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重视和对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评价，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精神和重要原则，批判了浪漫主义者雨果、自然主义者左拉以及第二国际的批评家对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的歪曲。除此，他在论述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文章中也探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系列问题。瞿秋白所有这些论著，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阐释，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方法的探讨和对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瞿秋白对现实主义问题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 一是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①他认为对现实要进行真实的反映。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文集》第2卷）一文中阐释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崇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对现实的阶级斗争进行真实描写的文学，通过真实的描写要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矛盾。他说这是一种“善于表现革命倾向的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瞿秋白在《斯大林和文学》（《瞿秋白文集》第2卷）一文中又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和以前的一切种种文学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能够各方面的最深刻的最充分的最高限度的去认识社会的现实，真正深入改造世界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之中所有的一切矛盾和困难。”瞿秋白还认为，现实主义文学还应当用无产阶级观点去反映生活，他对于那些既不真实了解生活又缺乏无产阶

级革命思想的作家所表现出的几种错误倾向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一种倾向是感情主义。他指出，有的作家“站在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地位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于工人，农民，冒充革命文学。“这种创作里的浅薄的人道主义，是普洛文艺所不需要的”。“在普洛大众文艺里，尤其要防止这种感情主义的诉苦，怜惜，悲天悯人的名士气”。一种倾向是个人主义。他指出有的创作所表现的革命，是“个人的英雄决定一切”这样一种公式。“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必须完全克服这种倾向。必须切实的理解群众的转变，群众的行动，群众的伟大的作用。”意思是说，革命的文学应当突出人民群众，应当写出群众如何起来革命，写出群众的革命行动和群众的斗争在革命事业中的伟大作用。一种倾向是团圆主义。他说：“才子中状元，佳人嫁大官，好人得好报，恶人得恶报，这固然是团圆主义。可是，一切一相情愿的关于群众斗争的描写，也是一种团圆主义。没有失败，只有胜利；没有错误，只有正确。这种写法，这种做法，也是一种团圆主义。这里，会发生更加简单的公式主义：工人痛苦，革命党宣传，工人觉悟，斗争，胜利；有困难一定有办法，有错误一定改正；一些百分之百的‘好人’打倒了一些百分之百的‘坏人’。”此种团圆主义、公式主义把复杂多样的生活简单化，用主观愿望代替艰难曲折的现实斗争。再一种倾向是脸谱主义。瞿秋白下面这段话讲的也很中肯，我们联系多年来创作上的沉痛教训，读起来颇多感想。他说：“京戏里面奸臣画白脸，忠臣画红脸，小丑画小花脸”，“同样，可以把帝国主义者，地主，绅士，资本家，工人，农民……一个个的规定出脸谱来。这不但可以，而且的确有人这样写！甚至于可以更详细的说：布尔塞维克，孟塞维克，盲动主义者，都可以有脸谱。反革命的一



一定是只野兽，只要升官发财，只要吃鸦片讨小老婆；而革命的一定是圣贤，刻苦，坚决等等”，“这种简单化的艺术，会发生很坏的影响。”①瞿秋白严肃地指出这种种倾向的荒谬性：

“生活不这么简单！工人，劳动群众所碰见的敌人，友人，同盟者，动摇的‘学生先生’，也都不是这样纸剪成的死花样，而是活人。工人农民自己也是活人！反革命的人，一样会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道德”。瞿秋白接着还指出创作上的脸谱主义有很大的危害：“假定在文艺之中尚且给群众一些公式化的笼统概念，那就不是帮助他们思想上武装起来，而是解除他们的武装。在这种简单化的概念之下，他们遇见巧妙一些的欺骗，立刻就会被迷惑，遇见复杂一些的现象，立刻就不会分析。关于工农自己，也是同样的。这里，也应当表现真正的生活，分化，转变，团结的过程，方才能够给以布尔塞维克的教育。”②瞿秋白最后总结说，这些倾向都是欺骗和虚伪的东西。他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最先进的阶级，他不需要虚伪，不需要任何理想化，不需要任何的自欺欺人的幻想。‘现实’用历史的必然性替无产阶级开辟最后胜利的道路。无产阶级需要认识现实，为着要去改变现实。无产阶级不需要矫揉做作的麻醉的浪漫谛克来鼓舞，他需要切实的了解现实，而在行动斗争之中去团结自己，武装自己，他有现实的将来的灯塔领导着最热烈最英勇的情绪，去为着光明而斗争。因此，普洛大众文艺，必须用普洛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③

②既要忠于现实，又要有热情和理想。他认为，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本身就在全人类社会底真正进步是一致的，他们

①② 均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③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的热情，理想，高尚情思底根源，就发生于赤裸裸的丑恶的现实；他们用不着虚矫的神圣化的情感上的麻醉和刺激才能去鼓舞群众的革命斗争”。所以，无产阶级文学不需要拉萨尔在剧本《冯·济金根》里表现的那种席勒式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用一些慷慨激昂淋漓尽致的空谈，来掩盖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糊涂观念。”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不要忘记现实主义的要素”，这种文学应当是对现实的切实认识，应当“正眼观看现实”。但是，另一方面，“说‘不要忘记现实主义的要素’，并不是要抛弃一切热情，理想，思想和‘最终目的。’只有庸俗的实际主义者，才会只管今天的饭碗或者明天的饭碗，只顾个人的‘衣食住行’——而不要一切理想和思想，不要热情和鼓励，不要‘理论’和‘幻想’，不要‘发议论’或所谓‘哲学化’。”无产阶级革命要为实现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无产阶级怎能没有理想呢？无产阶级是人类社会最有思想，最有理想，最有热情，最有前途的一个革命阶级，因此，它的文学当然也要有热情和理想，才能真实反映出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斗争。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现实主义所需要的情感和理想不同于主观主义的席勒式的浪漫主义的情感和理想，无产阶级文学的现实主义能正确处理理想同现实的关系：“他们的‘实际’，是按照现实的社会阶级关系，去改造整个的社会制度，他们这个革命的高尚理想不会是乌托邦；可也决不是饭碗主义，或者名利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做资产阶级‘科学’底俘虏的现实主义，应当反映到这现实世界之中的伟大的英勇的斗争，为着光明理想而牺牲的精神，革命战斗的热情，超越庸俗的尖锐的思想，以及这现实的丑恶所激发的要求改革，要求光明的‘幻想’，远大的目

的。问题是在于怎样把这些情感和理想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怎样表现意识转变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性。”即是说，理想必须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的理想体现了现实生活的必然发展，因此，理想和历史规律性是一致的。他基于这一认识，又强调说，无产阶级文学的现实主义“绝对不会是简单的照相机主义。这现实主义决不会说，只要‘绝对’客观地反映现实，‘自然而然’就是革命文艺。”<sup>①</sup>

这里，瞿秋白对后来称之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认识是很正确的，特别是对革命现实主义关于现实与理想的关系的看法，更为精辟，这一观点在本世纪30年代初，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1934年）召开之前，苏联的文艺理论界尚未将革命浪漫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的时候，瞿秋白就清楚地阐明这一点，应当说是一个创见。这是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贡献。

二是关于现实主义作家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

瞿秋白介绍说，雨果，左拉，一个是浪漫主义者，一个是自然主义者，“他们把思想家的巴勒扎克和艺术家的巴勒扎克之间的矛盾，解释作为纯粹主观上的内心冲突，或者说是‘偶然的不调和’。”而第二国际的批评家“通常总是把巴勒扎克当做‘革命家’，甚至于‘社会主义者’，说他的革命性是不自觉的，是和他的宇宙观不相干的。他们的解释是：照宇宙观来说，巴勒扎克是反动的，而照他的艺术创作来说，他是无意之中的‘革命家’，甚至于‘社会主义者’。这种解释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欧战之前就有一种很通行的艺术论，说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是下意识的，直觉的，不受自觉的宇宙

<sup>①</sup> 以上均见《马克思文艺论断篇后记》、《瞿秋白文集》第2卷。

观的监督的。”瞿秋白认为这些观点都是不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勒札克的宇宙观和艺术创作的估量，是整体的，一贯的。这在方法论上有极重要的意义，这正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元主义的方法，而不是多元主义的折衷论。他们并没有把思想家的巴勒札克和艺术家的巴勒札克对立起来，并没有把艺术家的主观的宇宙观和他的描写的客观性对立起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学家，就只看见表面上的矛盾和‘不可解的内心冲突。’其实，巴勒札克只有一个。”即是说，巴尔札克的政治思想和艺术创作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巴尔札克的世界观与创作并不矛盾。这是瞿秋白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尔札克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的观点的基本理解。他按照这一基本理解具体阐释了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一信中对巴尔札克的有关论述。第一，“恩格斯的估量是：巴勒札克的宇宙观，他的政治思想是属于保王主义的，他的同情大半是在贵族方面。但是，他的努力，实际上是代表‘先进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要求‘高贵的’资产阶级的理想，他正是深刻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代表。”瞿秋白介绍了巴尔札克的出身和生活经历，以此说明他的这种资产阶级意识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原因。第二，由于“巴勒札克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切的认识”，由于“他了解并且彻底的明白社会的发展趋势”，他对一般的资产阶级是抱肯定态度的，特别是在1830年金融交易所的资产阶级胜利之后，他对于工商业资产阶级之中的大多数受着“无数的，不可计算的痛苦”的处境是十分同情的，所以，实际上，“他是一般的资产阶级的意识代表，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第三，巴尔札克不仅对实际生活的态度不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而是非常之现实主义的，他的创作态度也是

如此。巴尔扎克曾明白讲过，他研究风尚的任务是表现整个社会的实际生活，他所描写的是到处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空想出来的故事。他只是法国社会的秘书，记录法国社会的历史。“可是，他决不限于‘旁观者的客观态度’，他是在发露这部‘历史’的原因，而写出‘典型化的个性’和‘个性化的典型’，他所以能够暴露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真相。”<sup>①</sup>瞿秋白如此阐释巴尔扎克政治立场和作品意义之间的矛盾现象，从而论证恩格斯的观点是：现实主义作家世界观同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我们认为，这一阐释是符合恩格斯的原意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的上层建筑性质的一般原理的，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的正确阐述。可是，瞿秋白的这一功绩，却未能引起理论界的注意。本来早已由瞿秋白清楚明白阐明了的世界观同创作的关系问题，后来从四十年代起又被提出来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而今所得出的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结论，与当年瞿秋白的观点又完全一致。

瞿秋白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也有不够正确的地方。他在强调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有新的创作方法时，看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应当比资产阶级文学的现实主义更好更优越，看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应当吸收资产阶级文学的现实主义的精神，都是正确的。但认为“资产阶级的作家在意识上抵抗着辩证法唯物论”，就不大确切了。一些倾向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并不反对辩证唯物论，恩格斯就曾赞扬巴尔扎克说：“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sup>②</sup>事实上，

<sup>①</sup> 以上引文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文集》第2卷。

<sup>②</sup> 恩格斯1883年12月13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6卷77页。

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萨克雷等等资产阶级作家在其作品里也都能以发展的眼光较全面地观察社会，看到社会内部各种关系之间的联系，都能较深刻地揭示出历史的发展动向。至于说资产阶级文学的现实主义不能描写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也不尽然，只是那些描写有不够深入的情况。此外，说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把文学上的创作方法与哲学上的认识论等同起来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包括但不能代替文学上的创作方法。瞿秋白这一提法显然是受苏联当时“拉普”派的影响。“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提法也不妥，容易使人认为同一个创作方法分成不同的阶级流派，从而否认了一种创作方法在理论上的完整性、统一性。后来，高尔基将资产阶级文学普遍使用的现实主义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就较为科学一些。

综观瞿秋白在文艺理论上的论著，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色：1.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他的所有论著和翻译都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是为着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因此，他公开地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上评价事物，或是赞扬，或是反对，决不含糊。2.强烈的现实性。瞿秋白的文艺论著都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文艺的现实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决不写纯理论的概念性的文章，总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解决一、二个具体的现实文艺问题，既给人以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又能予人以实际的具体的指导。因此，他的文艺论著使人读起来亲切，深受启发，绝无党八股气息，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文风。3.不单纯论述文艺问题，而将文艺问题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来分析研究，因此，总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认识论、方法论来论述文艺问题，这样

的论述，对文艺自身内部规律、特征的探讨略嫌不够，而对与文艺有关的一般问题就论述得相当充分。

瞿秋白的有关论述，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来看，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它的基本观点、基本精神却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而且，我们还看到，瞿秋白当年着重探讨的问题也是我国文艺理论界五、六十年来一直强调的问题。比如文学同生活的关系，文学同政治的关系、尤其是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作用，文学的党性，作家思想感情的革命化，文学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等等。由此可见，瞿秋白的文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说明，瞿秋白的若干文艺论述已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三 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党组织并没有交给瞿秋白同志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任务，瞿秋白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关心和领导，完全是出于他对革命文艺活动的热情，出于以此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新的贡献的愿望。

30年代初（1929年—1933年）党对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主要是通过中宣部直接领导的文委去实现的，而“左翼作家联盟”则又是左翼文艺运动的核心组织，因此，党对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对“左联”的领导上。瞿秋白同志既不是文委负责人（文委负责人先后有潘汉年、朱镜我、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等），也没有在“左联”担任任何职务。瞿秋白是以他的马列主义水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以他

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以他在党内外的崇高威信从思想路线上去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

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王明等人的打击排斥，将近半年没有安排瞿秋白在党内的的工作。他的肺病又复发了。当茅盾去看望他时，他即表示愿意投入革命文艺运动。不久，即1931年5月底或6月初，当他得知茅盾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之后，便正式约请茅盾商谈左翼文艺运动的有关问题。之前，4月底他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曾向他谈过“左联”像政党，“左联”的关门主义以及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等等。现在同茅盾交换意见，他表示大致上同意茅盾的看法，并提出要改进“左联”工作。他建议“左联”机关刊物《前哨》要坚持办下去，作为“左联”的理论指导刊物，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而鲁迅、冯雪峰、茅盾也有这样的打算，意见正好一致。他还提出，要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洛文学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以吸收经验教训，并建议茅盾带头写这样的文章。茅盾向鲁迅、冯雪峰转达了这些意见，并作了两次专门研究。决定出版《文学导报》代替已被查封的《前哨》，专登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在当时着重批判国民党鼓吹的民族主义文学。决定出版大型文学刊物《北斗》，专登文学作品，以发展文学创作，并以此刊物团结更多的进步作家，扩大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北斗》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非“左联”作家的作品，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茅盾本人遵照瞿秋白的建议，在7、8两月内写了《“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关于“创作”》两篇总结“五四”以来文学运动经验的论文。这两篇文章在写作之前，茅盾都与瞿秋白交换过意见，其



中有的观点就是瞿秋白的观点，如对“五四”文学运动的评价。不论是瞿秋白或是茅盾，总结“五四”以来文学运动的经验，旨在进一步发展进步文学运动，但由于受到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绩和意义均估计不足，贬谪过多，一些结论自然就不对，因而未能起到预想的作用。

当时党在“左联”的负责人同瞿秋白直接联系的主要是冯雪峰。冯雪峰常到瞿秋白的住处去，或向他汇报“左联”及革命文艺运动情况，或听取他的意见，同时取走瞿秋白写好的稿子。为了纠正“左联”在思想路线上的“左”的错误，使“左联”更好地发挥团结进步作家，发展左翼文艺运动的积极作用，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左联”执委于1931年11月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由冯雪峰起草，瞿秋白亲自指导修改。这个决议的意义和瞿秋白对形成这个决议以及他对“左联”指导的功绩，茅盾做了公正的评价：“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于一九三〇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决议分析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并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创作问题、理论斗争与批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特别是一反过去忽视创作的倾向，强调了创作问题的重要性，就题材、方法、形式等方而作了详细的论述。现在看来，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毒（如在形势分析中提出特别要反右倾以及组织上的关门主义），但决议提出的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我以为，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

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〇、三一年是更狂獗了），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sup>①</sup>为了指导左翼文艺运动，他还特地介绍苏联普洛文学运动所总结的经验。瞿秋白在《斯大林和文学》一文中对这些经验的重要之点作了介绍和阐发，并且指出：“读者对于苏联普洛文学运动之中的新的任务，应当深刻的去了解，应当会应用他们所研究出来的原则到中国的普洛文学方面来。”这些原则是什么呢？他归纳为：第一，“苏联现在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里面有许多现象”，“可以并且应当做文学的新的题材。”比如农业工人的出现，工人新的劳动态度和心理变化，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sup>①</sup> 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新文学史料》1981年3期。

等等。第二，“应当更加注意纠正那种忽视文艺组织的特殊任务的倾向，纠正那种抄袭非文艺组织的工作的办法”，“注意自己工作的特殊形式和方法”。第三，要求“艺术家极端地注意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事实，具体的人物，注意到各种各式的工厂，机关，集产农场。这就要反对那种空口的宣言和一般的歌颂。”而“真正列宁主义的艺术，他将要表现活的人物，具体的社会的个性，而不用那种假革命的‘一般的’赞叹和兴感来搪塞和敷衍。”对于社会中一切发展中的现象，对于一切实际生活中的弱点，“都要有文学上的反映，都要用强有力的艺术的言语来暴露，揭穿，鞭笞。”第四，“艺术家是个战士，而不是旁观者，他是个‘列宁派’，他要会抓住发展的倾向，而不是消极的照相机；他要会理解社会现象，而把它溶化到艺术的形象里去。”第五，“无产阶级的文学和以前的一切种种文学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能够各方面的最深刻的最充分的最高限度的去认识社会的现实，真正深入改造世界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之中所有的一切矛盾和困难。”

这里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电影事业是在瞿秋白同志的关心指导下开始起步的。1932年4、5月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老板周剑云迫于形势的发展，要找几位有名气的左翼作家做他们公司的剧本顾问。要不要去，大家的意见不统一。当瞿秋白听取了汇报之后，在会上明确表示：“我们自己真应该有电影，可是现在还有困难。将来一定要有。”而对明星公司的邀请，他对阿英说：电影公司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不容易打进去，这方面我们的力量最弱，而电影的社会影响很大，既然请上门来，我们为什么不去，要利用一切条件开展工作，打基础。于是做出决定，派夏衍、阿英和郑伯奇3人去明

星公司当编剧，并于第二年组成了党在电影界的第一个小组，小组由夏衍负责。瞿秋白嘱咐他们说：去到那里，“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他特别提醒他们：“你们要当心。”夏衍等同志根据瞿秋白这些指示，谨慎地开始了夺取电影阵地的工作，迈开了无产阶级电影事业发展的可喜的第一步。后来，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等人也参加了进去，使明星、联华、艺华等几家电影公司的编剧领导权在一段时间里被党所左右。<sup>①</sup>瞿秋白还支持石凌鹤去《申报》做《电影副刊》的编辑，王尘无去《晨报》做《每日电影》的编辑，赞同一些作家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扩大影响，占领文艺阵地，改变了“左联”不允许成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狭隘作法。正如夏衍同志后来指出的：“瞿秋白同志对于‘左联’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扩大统一战线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又说：“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sup>②</sup>

瞿秋白除了对左翼文艺运动作一些全局性的指导外，还尽可能的对一些进步作家的创作做一些具体指导。茅盾在1931年2月写了一部以中学生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路》，本想以此表明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下，青年的出路是革命。作品主人公火薪传就暗示革命火种正在蔓延，必将成燎原之势。而火薪传走上革命之路又由于受到一位共产党员画家的妻子杜若的指引和激励。因此，《路》的主旨在于歌颂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瞿秋白看了头几章之后，认为写成大学生更合适，建议改

<sup>①</sup> 以上引文见《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1期。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忆秋白》。

<sup>②</sup> 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册。

写，作者尊重这一建议作了修改。1932年此书由光华书局出版后，瞿秋白又看了全书，认为有些恋爱描写可以删去，作者在再版时按照这一意见删去三、四页。1931年茅盾创作长篇小说《子夜》得到瞿秋白更多更细致的指导和帮助。是年4月，当瞿秋白得知茅盾正在创作《子夜》时，便很关心地询问作者的构思情况。不久，又阅读作者已经写出的前几章和全书大纲，边看边说他对这几章以及整个大纲的意见，一口气谈了5个小时。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瞿秋白详细地向作者介绍了当时红军及各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何者成功何者失败，建议作者按照这一精神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也按此撰写后面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那时，瞿秋白夫妇正在茅盾家中避难，据茅盾回忆，他们几乎天天谈《子夜》。瞿秋白建议作者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民族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瞿秋白不仅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从阶级关系等方面去要求作品的真实性和思想性，而且要求作品在细节上也要真实。《子夜》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是福特牌轿车，因为那时上海通行的是福特牌，瞿秋白认为象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建议改为雪铁龙。并且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所有这些意见，作者都一一遵从做了修改。瞿秋白关于农民暴动的谈话引起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做了重新的构思，因为作者这时发觉若按瞿秋白的意见写下去，自己的生活经验很不够，可能写不好，因此决定压缩原定计划，并重新改写了分章大纲。总之，瞿秋白的意见对《子夜》全书的最后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可

以说，《子夜》之成功，凝结了瞿秋白的一份心血。《子夜》出版后，瞿秋白又于1933年3月和8月先后写了《子夜和国货年》、《读子夜》两篇评论文章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现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自然，它（《子夜》）有许多缺点，甚至于带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不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在第二篇文章里，瞿秋白再一次肯定《子夜》的社会价值：“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接着，瞿秋白不仅以社会学的观点评价了作品的内容和主要人物，而且从作品的社会效果和作品的艺术特点上评价了作品的得失，使作者明白自己在创作上的成败，对读者的文学欣赏又作了正确的引导。瞿秋白的文艺评论不是脱离作品实际内容的高谈阔论，也不是停留于具体情节的分析，而是从作品实际出发但又高屋建瓴，他基本上遵照了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那种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原则。这在文学批评方法上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瞿秋白还在《乱弹》的总题目下写了一组论述革命文学应当注意的一些共同性问题的文章。其中《乱弹》一文阐明一切文人艺术，官方艺术都来自民间艺术，告诫进步作家应重视向民间的文学艺术学习。《画狗吧》一文则通过批评张天翼的小说《鬼土日记》指出文学必须真实，说作家假如想把人类社会的许多公律机械地表现在文艺的形象里，就必然要走到庸俗的

简单化方面去。指出作者在反映生活时可以幻想，但幻想有限度，不能有太大的自由，不然，作品就不可信，失掉真实性。

《谈谈〈三人行〉》一文通过批评茅盾的中篇小说《三人行》指出无产阶级作家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还要重视艺术的表现。在艺术表现上，应当注意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而且要“构造一种假定的事变来代表社会的现实”，即应达到艺术的真实。还要写出人物的转变过程。《三人行》就没有做到这一点。主要人物惠，这个虚无主义者后来为什么发狂？在作品中，“这个从虚无主义走到‘光明在我们前面’的过程是找不着的。”又如主要人物云，他的革命性也是突然出现的。由于未写出事件的发展，人物的转变过程，就使作品的真实性不高。瞿秋白从《三人行》的得失中提醒进步作家说，要写出成功的作品，作家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创作方法。瞿秋白还曾批评蒋光慈写的《丽莎的哀怨》，他认为写得很不好，“同情白俄。”瞿秋白所有这些文艺批评，对于左翼作家创作既真实反映生活又有进步的思想倾向和较高艺术性的作品起到了切实的指导作用。

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瞿秋白在理论上的一项专题研究。他借评鲁迅杂感的内容和意义来论述革命作家同社会现实的关系，并进一步阐明革命作家应当遵循的正确道路。瞿秋白曾对杨之华说：“我和鲁迅谈了不少，又反复研究了他的作品，可以算是了解鲁迅了。我有必要选编他的杂感，不但因为这是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着现时的战斗。要知道，形势虽然会不大相同，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却总是那么多！”<sup>①</sup>这篇序言不仅对鲁迅、对当时的革命

<sup>①</sup> 杨之华《回忆秋白》136页。

文学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对此后的革命文学运动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序言〉中的许多真知灼见至今仍不失其研究鲁迅的指导意义，其中若干论断至今仍是鲁迅研究者一致遵循的基本观点。〈序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作家作品的典范作品。

〈序言〉首先科学地解释了鲁迅杂感产生的社会原因，阐明了鲁迅杂感的性质。瞿秋白指出：“革命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他认为鲁迅就是这样的革命作家。鲁迅杂感之产生，是将近20年来，“急剧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感情铭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要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其次，〈序言〉详尽而又深入地论述了鲁迅思想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九·一八”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鲁迅杂感在思想内容上的发展脉络，从而不仅深刻地阐明了鲁迅杂感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而且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中概括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应当遵循的正确道路。在



这一部分论述中，瞿秋白突出强调的是鲁迅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其一是他对传统与绅士阶级的反叛。“鲁迅和当时的早期革命家，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但是，他不但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他得他真他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的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其二是他争取自由，崇尚个性发展的民主精神。鲁迅同当时一般知识分子一样，有着资产阶级性的幻想——个性主义。但是，“为着要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说鲁迅之所以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那些恶魔诗人，“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他是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其三是他甘愿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志向。当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人都想做青年的导师的时候，鲁迅却愿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他“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魔‘坟’，埋葬他的过去，热烈的希望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过渡的时代也快些过去。他这种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穿着他的各个时期，一直到现在，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其四是他

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清醒认识。瞿秋白指出，“五卅”时期一般进步人士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忽略了国内阶级斗争问题，而鲁迅看到了这一问题。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一》质问说“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1927年的大屠杀促使鲁迅从进化论转到了阶级论。瞿秋白指出，“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如果在以前，鲁迅早就感觉到中国社会里的科举式的贵族阶级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农奴阶级之间的对抗，那么，现在他就更清楚的见到那种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之外，正在发展着资本和劳动的对抗。”这样，象鲁迅这样的“贫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阶层，终于发见了他们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才能在伟大的斗争的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其五，指出鲁迅的思想中也有局限的一面。瞿秋白说：“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

瞿秋白通过鲁迅在辛亥革命后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实际表现和思想特点向我们揭示了鲁迅的道路：最初是深刻地憎恶所出身的绅士阶级的卑劣、丑恶和虚伪，并竭力要肃清这个肮脏的

旧世界，他是这个阶级的带有“野性”的逆子贰臣。接着他要发展个性，要求思想自由，要打破传统，要号召反抗一切传统的国故僵尸。并且有为了将来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后来又在现实斗争中深切地感受到阶级的压迫，从而确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社会主义学说是正确的，坚信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从此决心同无产阶级一道战斗，成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序言》的主旨就在于论述鲁迅这一道路，因此，整篇《序言》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序言》最后总结出鲁迅思想和杂感中的几个基本方面，这是我们应当继承的非常宝贵的革命传统。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二是“韧的战斗”。三是“反对自由主义”。四是“反虚伪的精神。”

瞿秋白总结说：“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序言》以翔实的材料，以严密的逻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辛亥革命以来各个阶段上经济、政治、文化特点，将鲁迅的思想和杂感创作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分析，正确地深刻地论述了鲁迅杂感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正确深入地揭示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轨迹，从而无可辩驳地指出鲁迅的伟大和鲁迅杂感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瞿秋白的评论，既有颂扬也有批评，全面剖析，态度是严肃的，是诚恳的，是坦率的。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鲁迅本人也是心悦诚服的。冯雪峰回忆说，鲁迅曾用深刻的感激的情意说到：“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sup>①</sup>许广平回忆说：“鲁迅读了，心折不已。‘只是说得太好了，应该坏的

<sup>①</sup> 冯雪峰《回忆鲁迅》。

地方多提一些’。”<sup>①</sup>鲁迅十分重视这本选集和它的序言，亲自为它的出版计划安排。他在致编辑李小峰的信中说：“此书一出，单行本必当受若干影响也。”“编者似颇用心，故我拟送他三百元。”并提出〈序言〉“尚须在刊物上发表一次。”<sup>②</sup>

瞿秋白对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还体现在对文艺大众化等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建设上（如前节所述），体现在对资产阶级文艺观的批判，对反动文艺的斗争上。

20年代末，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无产阶级文学（“普罗列塔利亚的文学”）口号正式提出来了，无疑，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了更为自觉的更为广泛的新阶段。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股企图阻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便出笼了。他们宣称“文学家并不表现什么时代精神”，“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他们甚至断言“‘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的就不能成立。”等等。<sup>③</sup>他们还宣称“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sup>④</sup>有的人则以“第三种人”的口吻说阶级文学观念是对文学这个纯洁处女的玷污，使文学成了人尽可夫的卖淫妇。<sup>⑤</sup>对于这些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反对文学的政治性的理论，对所谓“自由的文艺”以及所谓“第三

① 许广平〈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时候〉，《语文学习》，1959年6期。

② 鲁迅1933年4月13日致李小峰信。

③ 见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

④ 胡秋原〈阿狗文艺论〉。同上。

⑤ 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同上。

种人”的主张，必须予以认真批判，这是左翼文艺运动当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瞿秋白同鲁迅等一道，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上述谬论进行了严肃的尖锐的批判。为此，瞿秋白写下了《‘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狗道主义》、《红萝卜》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瞿秋白深刻地揭露出这些理论的反动实质。他指出，胡秋原之流叫嚷不论那个阶级都不准侵略文艺，“说客气些，客观上是帮助统治阶级——用‘大家不准侵略文艺’的假面具，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胡秋原表面上也在痛骂反动的文艺派别，“可是，他只骂他们‘利用’文艺，‘污损文学家的人格’，”“他并不去暴露这些反动阶级的文艺怎么样企图捣乱群众的队伍，怎么样散布着蒙蔽群众的烟幕弹，怎么样鼓励着反动阶级的杀伐精神，把剥削和压迫制度神圣化起来。”因此，胡秋原的主张，“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而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对于苏汶等人的“第三种人”的言论，瞿秋白指出，“第三种人”与“自由文艺”论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不过，“第三种人”比“自由文艺”论者反对的更为彻底。“第三种人”干脆认为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瞿秋白从理论上和事实上驳斥了“革命与文学不能并存论”：“第一，真正

科学的文艺理论，还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新兴阶级建立起来的。只有这个阶级，在革命的行动之中，才真正能够建立，能够发展科学的文艺理论。”因为，主张文学为革命服务的科学的文艺理论，本身就是在革命之中产生的，文学又怎么能离开革命？“第二，新兴阶级为着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为着解放劳动者的广大群众而斗争；他们要改造这个世界，还要改造自己——改造广大的群众。他们要肃清统治阶级的思想上的影响，肃清统治阶级的意识上的影响。”为此，就要利用一些工具，“这些工具之中的一个，而且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就是文艺。所以新兴阶级要革命，——同时也就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第三，新兴阶级站在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立场上，所以能够真正估定艺术的价值，能够运用贵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遗产。他们决不是什么‘目前主义的功利论者’。他们在文艺战线上，一样是为着创造整个的新社会制度——整个的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斗争的。”“第四，新兴阶级固然运用文艺，来做煽动的一种工具，可是，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作者。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那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总之，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瞿秋白认为“第三种人”言论的实质是彻底否认左翼艺术的艺术价值，从而彻底否认左翼文学的存在。瞿秋白对这一反动实质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斗争”。而“作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

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嬛，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总之，苏汶先生还嫌胡秋原的自由主义不彻底，他主张把一切群众的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一概归到‘非文学’之中去，让文学脱离新兴阶级和群众而自由。”瞿秋白的批判虽然尖锐，但坚持以理服人，所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连胡秋原也表示心悦诚服。他说：“我赞美易嘉先生的态度，倘若左翼理论家都能这样平心静气地讨论真理，我想，大家一定愿意参加”，“易嘉先生毕竟曾经写过好些文章的人，尤其是文艺与革命问题，既革命，又艺术，有这双重资格，所以他的文章，也是一篇‘美丽的’、革命的散文——是一篇革命的‘艺术品’，不象有一些文章使人望而却步。”①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公开为国民党反动派摇旗呐喊的文学团体“民族主义文学”派。“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正式发布在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定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里，鉴于这个宣言措辞隐晦，要真正理解这个派别的主张，还必须结合他们实践其主张的文学作品来分析。“民族主义文学”认为新文艺运动陷入危机，“突破这个当前的危机底唯一方法，是在努力于新文艺演进进程中底中心意识底形成。”这个中心意识便是民族意识。他们说：“从历史的教训，我们须集中我们此后的努力于民族主义的文学与艺术底创造。我们此后的文艺活动，应以我们的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同时，为促进我们民族的繁荣，我们须促进民族的向上发展的意志，创造民族的新生

① 转引自杨之华《回忆秋白》132页。

命。”然而，他们所谓的民族意识，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他们所谓的“民族国家”——就是集中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所谓“向上发展的意志”就是尚武精神，所谓“创造民族的新生命”，就是侵略战争。因此，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便是法西斯主义文学，便是屠夫文学。不论是鲁迅还是瞿秋白，在他们的批判文章里，都一致指出“民族主义文学”的这一实质。瞿秋白有篇批判文章的标题便是《屠夫文学》（后改为《狗样的英雄》），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民族主义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和中国各地方各派各系的绅商需要战争，需要势力范围，也就是强夺民众膏血的剧烈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进行军阀之间的红白战争，一方面进行杀灭共产党的“剿匪”战争，再一方面就是反苏战争。为了适应这一政治需要，“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就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瞿秋白对“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陇海线上》（黄震遐作）、《国门之战》（万国安作）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象《陇海线上》这样的作品所歌颂的是把中国小百姓当做野兽来屠杀的战争，歌颂的是中世纪式的战争，因此，“民族主义文学”实质是反动派的杀人号筒。“你们的声音是多么雄壮，多么壮烈！中世纪式的战争是多么浪漫谛克呵！你们这些号筒想号召民众来帮助军阀混战，但是，他们却‘久欲得你们而甘心’。”《国门之战》描写的是1929年的中苏之战。“那时中国的绅商受了美国洋钱的谕旨，企图打进苏联。万国安却描写得仿佛是苏联军队来进攻中国，而且造了许多莫明其妙的谣言。”瞿秋白气愤地指出：“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技术已经纯熟到这种地步：没有什么可以描写了，只会高叫‘壮



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他们“涨着通红的脸，嘴里冒着白沫，慷慨激昂口中念念有词的说要吃人肉喝人血，说‘你们不要儒怯，不要顾惜！……你们打倒了赤俄，你们到了莫斯科，前进！……前进’！”瞿秋白将“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嘴脸暴露无遗。

#### 四 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

瞿秋白在少年时期就憧憬文学事业，以后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也不时流露出对文学事业的依恋情绪。虽然历史未能安排他从事专门的文学工作，他也利用一切机会从事力所能及的文学活动。因此，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他本人也因此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是我们十分尊敬的一位著名革命文学家。

瞿秋白的文学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五部分：一是散文创作，二是诗歌创作，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论著，四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五是对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组织领导。第三第五两部分前面已作了评介，这里扼要评述一下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瞿秋白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散文创作，他的散文基本上是两种样式：一是报告文学，代表作是《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二是杂文。瞿秋白究竟写作了多少杂文，现时很难认定。一般论者（包括现代文学史书）所列指的瞿秋白杂文，就是收录在《瞿秋白文集》第1卷中的《文艺杂著》和《乱弹》这两部著作中的大部分作品，我认为，瞿秋白的杂文比这多得多。瞿秋白的杂文，除了这两部作品的大部分文章以外，若干被列为一般政论和随笔的文章，也应包括在

内。后面这一部分，其数量可能是前者的二三倍。其中比如《新社会》第5期上在“杂感录”栏目中发表的《自杀》、《唉，还不如……》，《新社会》第18期上的《劳动底福音》，《热血日报》第10期上的《小吃齐心酒》、11期上的《可爱的梁启超》、12期上的《大家都卖力气了》、《蔡督办打扑克》，《向导》144期上的《两副面孔一个公式》、《大家谢了大家》；又如《斗争》51期上的《这回不“自动了”》、《狗抢骨头吃》、《国民党的“仁爱”》，等等。这些文章完全做到了鲁迅对杂文所要求的形象性、生动性、深刻性、战斗性以及娱乐性。即“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sup>①</sup>瞿秋白的上述文章，是一篇篇典型的文艺性政论，是战斗的“阜利通”，这些文章中饱含着对人民大众斗争的热烈同情，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理解，文章洋溢着作者非凡的智慧和幽默才能，文章不仅明理，而且给人启迪。它们对于敌人，“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而对于人民大众，又“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因此，上述等等文章是应当正名为杂文的。假如有机会编选一本较全面的瞿秋白杂文集，需要从他数百万字的著作中做一番仔细的检视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瞿秋白诗文选》在这方面已迈出可喜的一步，收录的杂文已突破了过去的视线，但由于这是一本兼收诗与文的选集，无法收录瞿秋白更多的杂文，因而无法显示瞿秋白杂文的全貌。

瞿秋白从1919年在《新社会》上开始发表杂文到1933年底去中央苏区以前为止，前后15年，虽然不是年年都有杂文的写作，却始终都在运用这一文艺形式。杂文写作贯穿在他整个写

<sup>①</sup>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作生涯中。瞿秋白有着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深厚基础，有着横溢的文学才华。他能诗，能画，还识乐理，更重要的是他有着锐敏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有着一个文学家最为宝贵的爱人民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他赤诚，坦率，感情丰富，他是完全能够创作出优秀的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来的。而他却将绝大部分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只能运用杂文这种自由灵活、短小、简便的文学形式参加无产阶级文学的建设行列。正如他在评论鲁迅时所说的：“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

若论杂文的成就和杂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首推鲁迅先生。除鲁迅杂文外，瞿秋白的杂文就十分突出了。因为第一，创作时间早，延续时间久。第二，数量大。第三，社会作用大，特别是他发表在党的报刊上的杂文，直接发挥了无产阶级的文艺工具的战斗作用。这几方面，除鲁迅外，其他杂文作家都是无可比拟的。因此，瞿秋白的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的杂文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党性与深刻性。除“五四”时期发表在《新社会》、《晨报》上的少量杂文外，从1923年起所发表的杂文都体现出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即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观察生活和评价生活，公开地为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揭露敌人和歌颂人民，歌颂革命。他的杂文，不论是有较详叙事的几千字长文或是画龙点睛式的三几百字的短文，都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总

是在揭露、鞭笞敌人的同时尽可能阐发一些无产阶级革命道理，杂文的理论色彩较浓，所谓文艺性政论的“论”，是突出的。此外，他的杂文在针砭时弊上，往往是开门见山，直辟肌里，很少迂回战术。这种手法虽有其缺点，正如鲁迅指出的，较一览无余，缺少回味，但又有其优点，便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加上辛辣的嘲讽，就使文章思想深刻，成为一支支投向敌人的梭枪，一把把刺向敌人的匕首。

第二，生动性与雄辩性。瞿秋白的杂文创作善于选取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性的事件来剖析鞭挞，这些事件一经形象化的描写，就使各种反动人物、各种荒唐事件形象地呈现在眼前，活灵活现，很生动。如在《世纪末的悲哀》一文中所描写的反动文人：“他们张大了吃人的血口，他们实在口渴得很，他们专门要吃奴隶牛马的血，他们想把黄河扬子江似的血都喝干净。他们正在哼哈着，叫喊着，要叫出古代的英雄，要叫出三代的道统，要叫出民族的精魂，来救命，……”

“他们兔子一样的‘聪明’：把自己的头和黄丽的血红的眼睛，躲在自己的脚爪底下，就自以为别人不看见它了，因为它看不见别人了。他们死也不肯走出‘象牙之塔’，也许‘走出了象牙之塔’，又走进了‘水晶之宫’。象牙塔和水晶宫还不是一样的建筑在血肉模糊的骷髅场上？但是你不知道，在象牙塔和水晶宫的里面，始终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这里有肉感，有爱神，有……这里是多么清闲，又多么孤寂，这里多么潇洒，又多么怅惘！即使不幸谪出了象牙塔和水晶宫，也还会吹箫吴市，做个风雅乞丐。一样可以有牢骚，有落拓”。又如在《乱弹》中对面似“细腻”、“深奥”而实则猥琐、低微的绅士的描写，在《一种云》中对国民党反动派围剿革命的“战

云”的描写，等等。在另一些杂文中，瞿秋白侧重选取那些既有典型性又有戏剧性、滑稽性的事件作为描写对象，这类作品篇幅不长，没有较细的叙述和描写，通过对生活中的事实进行适当的组接、剪裁，就使描写对象的面目栩栩如生，其荒唐性、反动性便由此明明白白地暴露出来。如发表在《热血日报》上的那些短小（一般均三、二百字）的杂文。瞿秋白的杂文，不论长短，都追求一种雄辩力量，使读者对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深信不疑。这种雄辩性是通过下列手法实现的，一是论点突出，批驳准确，不故作惊人之语，文质相副，使人确信。二是纵横关联，由一人一事生发开去，左联右挂，上下延展，将古与今，中与外，政治与文化，经济与军事，正面与反面等等溶为一体，而且做到行文自然，简洁，不枝蔓，不冗杂，既使他议论的事理严密周全，无懈可击，又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三是说理层层深入，步步进逼问题的核心，使论敌无可反驳。瞿秋白的杂文，不一定每篇都有论证的过程，但都能抓住要害，击破问题的几个关键所在，从而使所议之事具有不可辩驳的真实性。

第三，激扬乐观。瞿秋白的杂文贯穿着一种激扬奋进的精神，洋溢着革命乐观情绪。要说在他的抒情散文、诗歌里还时面流露出一些婉柔哀伤的话，他的杂文则总是表现出对敌人的切齿憎恨，对邪恶的万分鄙弃，对文明、对进步、对革命、对未来的热切追求，总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总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总表现出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乐观主义。使人读之震动而又振奋。

第四，笔锋犀利，语言晓畅。鲁迅曾评价瞿秋白的文章明白晓畅，这一评价自然包括瞿秋白的杂文在内。瞿秋白之所以

能做到这点，是他重视语言大众化的结果。从20年代初开始，他一直提倡用大众化的语言进行创作。他一方面对此进行理论研究，一方面躬身实践。他的作品在这一探索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他作品的语言自然——合乎人民大众的习惯表达方式，修饰而不着痕迹、有文采而不华丽，明白——不论是来自当今口语，或是来自古典词语、外国词语，略加修润，就使词义明确清晰，毫不晦涩，流畅——遣词造句，既遵从习俗又力求符合传统语法，使人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悦耳。此外，杂文作为打击敌人的一种文艺武器，瞿秋白同鲁迅一样，文笔都尖锐、泼辣，但瞿秋白也同鲁迅一样，从不漫骂，瞿秋白杂文的尖锐主要体现为高度的原则性，批得狠而透，在词语使用上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注重字词的力度感，使人觉得有一字千钧之势。

瞿秋白自幼便喜欢诗词，儿童时在母亲的启蒙下读了不少古诗，进入中学以后，与同学吴南柱、任乃闾、李子宽等人经常在一起读诗、写诗、研究诗。相传的《白菊花》一首便是这时写的：“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时年14岁。以后，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也时有诗词写作。瞿秋白在世时正式发表的诗词，包括在《赤都心史》等作品中夹录的诗词在内，不足20首。但实际写出的诗词是很多的。现今从手稿、从友人书信和有关文章中可查出的，不下40首。佚失的就无法统计。丁玲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记叙1924年她在上海大学时同瞿秋白的交往过程有这样一段文字：“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也写过一首给我，说我是安琪儿，赤子之心，大概是表示感谢我对他们恋爱的帮助。剑虹也天天写诗，一本又一本。他们还一

起读诗，中国历代的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他们每天讲的就是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渔洋、郑板桥……。秋白还会刻图章，他把他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小石块上。……”

瞿秋白生前正式发表的诗词大多写于1923年以后，这些诗有其共同特点：感情奋发，情绪乐观，政治性强。《赤潮曲》歌颂共产主义运动有如红色海潮，它惊醒了沉睡的中国。大家向着帝国主义猛攻，争取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整首诗音调激越，如号角，如战鼓，思想倾向鲜明而强烈。《铁花》一诗将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战士喻为洪炉中的铁花，它无需柔和细腻的自然，无需月光的抚慰，它需要的是融融的火腿，需要的是沉重的铁锤和金铁的声音，它需要工厂里不熄的火苗“照耀我这壮勇无畏的胸膛。”全诗语言简洁明白，意蕴也不复杂，但诗行韵律之中流动着一股坚强的力量，一种无坚不摧的深沉的力量。这种诗，虽无奇特瑰丽的意境，却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感召力。有的诗篇，系对人生一般问题的抒写，如《过去》就感时叹世，揭示人世的代谢规律；《飞来峰和冷泉亭》意在揭示人生意义在于热烈追求，奋勇前进；而《天语》则是对人间苦难的感叹。这些诗虽然不曾以革命为题，却不仅是对个人安危、一己喜怒、儿女情长的抒发，体现了作者从国家、从人民的角度对人生一般问题进行的沉思（《天语》）、探索（《过去》）和展望（《飞来峰和冷泉亭》）。他希望人们也象飞来峰下的瀑布一样，以热烈之心，“咆哮奔放”，向着前方飞去。这些诗，节奏轻快，画面明朗，流泻出一股清新、豪迈、自信的诗情画意。30年代初写的《东洋人出兵》和《上海打仗景致》等诗，实为歌词，语言通俗，形式大众化，

是他实践文艺大众化的实绩。

瞿秋白题赠亲属友人的诗词，基本思想仍是对革命的向往，对斗志的激励，对敌人的抨击。如1923年写给爱人王剑虹的《江南第一燕》：“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洋溢着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的积极自豪心情。1929年书赠女儿独伊的《小小的蓓蕾》，表现他一如既往的对革命斗争的颂扬：“着那沙场的血花灿烂，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1932年书赠鲁迅的《读〈自由谈〉有感》则表现出对反动文人为反动派涂脂抹粉的行径的辛辣讽刺：“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流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诗歌也是瞿秋白刺向敌人的匕首。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诗是写给亲属友人的抒发个人一时感慨之作，所以，感情更为袒露，不事加工，连感情中十分隐蔽的部分或某种短暂的一闪之念也都任其自然流露，唯其如此，我们在这些诗中可以见到瞿秋白思想感情中复杂的和细微的一面。如1932年录以赠鲁迅的写于1917年的《雪意》：“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这首诗，正如作者在跋语中说的有“颓唐气息”。它表现了作者在“五四”前夕在国事、身世迷茫之时产生的苦恼烦闷、无可奈何的心情。而在1932年重新写出赠送友人，也是此时某种心情的表露，即是说，《雪意》一诗也反映作者1932年感到无所作为的低沉情绪。1926年在上海书赠羊牧之的四首诗，有“重耳能报国，端在历艰辛”的坚韧毅力的表露，对羊牧之在诗中表露的“秋气”的批评，但同时也欣赏恬静、清淡的田园野趣。如《赠羊牧之》之四：“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道人煨槽枥，烟湿舞徘徊。此中有至境，一



一人寒杯。坐久不觉晚，瘦鹤竹边回。”所谓去常州东门外红梅阁赏红梅云云，是回忆儿时同羊牧之同游的情形，但此时仍觉得“此中有至境”，使作者“坐久不觉晚”，在那里欣赏“瘦鹤竹边回”的田园景色，不能不说是此时心境的流露。或许是在繁忙艰辛的斗争生活中希望得到休息，希望多病孱弱的身躯得到适当松弛的反映。

瞿秋白的文学作品翻译，早在“五四”运动前，即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时就已开始。当时，主要是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到30年代，则侧重介绍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他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等7个短篇，辑成《高尔基创作选集》出版，里面还收录了《高尔基自传》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家与政治家》。翻译了高尔基的《市侩颂》。翻译了别德纳衣的《没工夫唾骂》、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葛拉特柯夫的《新土地》（可惜译稿毁于日军炮火，未能出版）、帕甫伦珂的《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马尔赫维察的《爱森的袭击》等。

对于翻译，瞿秋白早在1920年就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如第一章所述，他是想借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苏联新文学的翻译介绍，唤醒中国人民，推动中国新文学、革命文学的发展。这与鲁迅在“五四”时期致力于俄罗斯、苏联文学、北欧和东欧民主主义文学的介绍是一样的目的。他们都做着普洛米修斯盗天火给人间的工作。事实上，瞿秋白对俄罗斯、苏联文学的翻译，对俄国文学史的介绍，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经验的介绍，辑成了我国第一批较为系统的俄罗斯苏联文学丛书。这一批丛书涉及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理论问题，相当广泛，

对建设中国革命文学有鲜明的针对性，因此，至今仍不失为一批极有参考研究价值的文学史料。而他在翻译上显示的才华，鲁迅早已有恳切的评价。鲁迅对瞿秋白的理论译文和作品译文，都十分钦佩。他谈到瞿秋白所译论文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说：“《现实》中的论文，有些已较旧，有些是公谟学院中的人员所作，因此不免有学者架子，原是属于‘难懂’这一类的。但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鲁按瞿秋白笔名）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为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sup>①</sup>他认为瞿秋白所译《高尔基小说选集》“文笔流畅可观”。<sup>②</sup>鲁迅再三感叹说：“中文俄文都好，象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sup>③</sup>后来，鲁迅在谈到《死魂灵》的翻译工作时又说：“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sup>④</sup>

## 五 关于语言文字的研究

瞿秋白十分重视中国语言的发展和中國文字的改革问题。早在1922年便在苏联开始研究适用于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并且制订了一个草案。1928年再次旅苏期间，又同吴玉章、林伯渠等同志一道研究中国文字的改革问题，并且约请去苏的各地同志座谈，调查研究方言中的问题，最后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小册子在莫斯科出版。1931年9月，中国工人在海參崴召开了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他的小册子草拟出了中

① 1936年10月15日致曹白信。

② 1933年8月20日致杜衡信。

③ 1935年6月27日致萧军信。

④ 1935年9月1日致萧军信。

国新文字的新方案。1931年、1932年间，他又撰写了《学阔万岁》、《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新中国文草案》等文，近10万字。瞿秋白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研究，可谓不遗余力。他之所以以如此巨大的心力去研究这一问题，根本原因是他想减少工农群众识字之苦。1929年3月他在给杨之华的信中说：“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识字之苦。这或许要到五十年或一百年后才能实行，但是发端是不怕困难的。”他为了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为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他志愿做这筚路蓝缕的工作。瞿秋白还以同样的精神从事语言问题的研究，他在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将语言的发展问题作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重点来研究，而且将语言问题看作有关文艺革命的原则问题来考察。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建设意见，对我国语言的发展、对我国革命文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的主要观点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他认为必须进行语言文字革命。

瞿秋白有个总的观点是，要进行彻底的文学革命，就必须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代替古代人说话的腔调，专用白话写而不用文言写，即必须进行“文腔革命”；而要彻底的用现代人的白话来写，就必须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这就要进行“文字革命”。瞿秋白用“文腔革命”表示语言方面的更新与发展，而用“文字革命”表示文字方面的改革，但在许多地方，他又将语言和文字合在一块作为一个问题来论述，讲语言也是在讲文字，讲文字也是在讲语言。鉴于他的这种论述方法，我们这里也就不必分别评述他的“文腔革命”和“文学革命”，而将他的语言、文字问题放在一块作一个综合评述。

为什么必须进行语言文字革命呢？他说这是文学革命的需要。“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的普通话，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而正在产生出来；文学的责任，就在于把这种新的言语，加以整理调节，而组织成功适合于一般社会的新生活的文腔。这样，方才能够有所谓‘文学的国语’；亦只有这样办法，才能建立和产生所谓‘国语的文学’。”<sup>①</sup>他认为，梁启超提出的“小说革命”不能算是文学革命，“五四”运动时代树起的“国语的文学”的旗帜以及推翻礼教主义的共同倾向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然而，“五四”运动所进行的第二次文学革命虽提出“国语的文学”却并没有实现“国语的文学”。他对“五四”以来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分析，严厉地批评运用这些文学形式的作家没有运用现代人说的白话进行创作，大多数是用的文言的词藻，用的“不象话”的白话，因此，非常需要进行“第三次文学革命”。第三次文学革命的任务就是“建立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谁都应当知道：没有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真正的‘新的文学’是不能再发展的了。”<sup>②</sup>他认为，建立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是文学革命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建立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关键又在于改革文字。其原因是：“社会生活一天天的复杂起来，言语一天天的进步，纯粹的象形制度的画符的办法，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了。而且文言的本身亦是要记载思想的，而思想实在是没有声音的言语，正确些说，是没有说出口的言语。”<sup>③</sup>“总而言之，要写

①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第2卷。

②、③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sup>①</sup> 瞿秋白还详细地驳斥了反对中国文字走拼音方向的观点。反对派主张以汉字去搞同文政策，即用汉字统一中国文化，甚至于用汉字同化异族。又认为中国文是单音节制度，不能用拼音方法。针对这些看法瞿秋白详细地论证了“同文政策是不应当有的”，“同文政策是不可能的”，以及“同文政策是不必要的”。瞿秋白对所谓“单音节制度”的“孤立语”不宜于拼音之说进行了具体分析，首先指出中国语言文字比拼音文字落后，其次，指出中国现代的语言文字已有相当的发展，已逐渐向多音节发展，拼音已完全可能实行。

第二，他提出了建立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原则和要求。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呢？他说：“首先，这应当是和言语一致的一种文字。”“使纸上字的言语，能够读出来而听得懂，就是能够‘朗诵’。”其次，“这种文字应当和言语一致”，“即和普通话一致。”而“普通话不一定是完全的北京话。”基于这个原则，他认为：1，“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是真正现代化的。这就是说，必须写现在人口头上讲的话。”“可以采取汉字做‘字根’，来制造许多新的字眼。这是言语一天天丰富起来所应当做的事情。但是，一定要遵照现代化的原则。例如：‘安定’，‘严重’，‘隔膜’”。2，“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即字法方面，“根据中国字法来采用欧洲‘印度日耳曼语族’的文法。”句法方面，“应当欧化——应当很自然的加上必须的辅助句子，去形容那个主要句

<sup>①</sup>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子。”<sup>3</sup>，“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因为“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又“不是表示声音的符号”，方块汉字“使‘新的言语’停滞在《康熙字典》的范围里面，顶多只能从《说文》里面去找‘古音古义’等来翻译现代的科学字眼，而不能够尽量发展——采取欧美科学技术的新名词”。<sup>①</sup>

第三，他重视翻译，以为翻译作品对于中国现代语言的建设负有重要责任。

瞿秋白认为，进行信而且顺的翻译能帮助中国现代语言发展。他说：“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sup>②</sup>这是由于“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sup>③</sup>

为了使翻译在建设中国现代语言上发挥重要作用，他强调翻译不仅要做到信，忠实原著，而且一定要做到顺。他严厉地批评那种“宁错务顺，毋拗而仅信”的主张，说这种“顺”，“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瞿秋白指出，翻译必须信——正确，保存原作的精神；必须顺——“真正的白话”。一句话：“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他认为，信与顺，应当统一起来，不能只顺及一面。在

① 以上引文均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② 《论翻译——给鲁迅的信》，《瞿秋白文集》第2卷。

③ 同上。

这一点上，他不同意鲁迅提出的“宁信而不顺”的看法。他说：“我觉得这是提出问题的方法上的错误。问题根本不在于‘顺不顺’，而在于‘翻译是否能够帮助现代中国文的发展。’第一，如果写的的确是现代中国文（嘴上说的中国普通话），那么，自然而然不会有不顺的事情，所以根本不成问题。第二，如果写的不是现代中国文，而是‘远东拉丁文’（汉文文言），或者是西崽式的半文言（例如赵老爷等的翻译），那么，即使顺得象严又陵那样的古文腔调，也和中国现在活着的三万万几千万的活人两不相干。说到‘信’也是一样。”总之，“翻译的时候，应当用这种绝对的白话文：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别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①

为了帮助中国现代语言的发展，瞿秋白认为，我们不仅在翻译的时候，就是在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也应当“大胆的运用新的表现方法，新的字眼，新的句法。”②他说，“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③瞿秋白不仅看到了这个历史的必然性，还强调创造新的字、词、句法和表现方法，但必须尊重中国白话原有的规律。因为“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④只有遵照中国白话原有公律，才能做到使新的字、句法、表现方法在口头上说得出来，“得到真实的生命”，“容

① 以上引文见《再论翻译——答鲁迅》，《瞿秋白文集》第2卷。

② 《再论翻译——答鲁迅》。

③④ 《论翻译——给鲁迅的信》。

纳到活的言语里去。”

瞿秋白还明白指出，创造新的语言，有两个来源，古代的和外国的：“我们可以运用文言的来源：文言的字根，成语，虚字眼等等，但是，必须要使这些字根，成语，虚字眼等等变成白话，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而且的确能够增加白话文的精密，清楚，丰富的程度。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根本就无所谓新的表现法。同样，我们应当用这样的态度去采取外国文的字眼和句法。”<sup>①</sup>

瞿秋白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和论述，对于中国语言的发展和汉字的改革有巨大贡献。第一，为着便于人民大众掌握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提出发展语言，改革文字，具有战略性的长远指导意义，方向正确。第二，在如何改革、如何发展的具体意见中，基本方面都是科学可行的，合乎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比如要求现代普通话的中国文应做到言、文一致，写出来的要能朗诵；要求现代普通话的中国文必须现代化，必须拼音化；要求翻译既信且顺，为中国语言的进一步精密、丰富做出贡献；发展语言必须尊重传统规律，特别是口头语言上的表达规律；指出古代语言和外国语言是发展现代语言的两大来源；又比如看到语言文字发展的必然性，等等。第三，在具体地研究了中国语言的特点和汉字的构成特点，研究了社会生活发展对语言文字的需要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文草案》。如何评价这个《草案》，需要专门研究。这里只想说的是，用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同瞿秋白的《草案》对照，发现在声母的构成、韵母的构成上，两个方案基本上一致，只有少数出入，在拼音规则上，也大体相同。只是现在的

<sup>①</sup> 《再论翻译——答鲁迅》。



方案，声母及韵母的构成对中国语言现实的反映上更为准确，在拼音上，既做到了科学性又简便易行，更合乎中国语言的特点和发音规律。瞿秋白的《草案》则较为繁复，他想从词形上表明词性，虽不无可取之处，但不易掌握。从这一简单比较就可看出，瞿秋白历经十余年研究出的《草案》，从总体构想到具体设计，都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奠定了基础。因此可说瞿秋白是汉语拼音化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当然瞿秋白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也有不尽正确的地方，比如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在语言上的成就几乎完全否定，还如过分强调言、文一致，忽略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差别，等等。但瑕不掩玉，这些不足与成就相比，微乎其微。当时，汉语拼音化问题，除了赵元任等个别学者在研究以外（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一文也提出以罗马字拼中国音的问题。此文1922年在美国写成，载于1923年的《国语月刊》上。基本上与瞿秋白的研究同时，瞿秋白1922年旅苏时也已形成草案），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瞿秋白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只身探索，其勇气，其智识都是超乎寻常的，真可说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叶圣陶先生说，“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字母是秋白先生选定的。”<sup>①</sup>胡愈之先生说，“秋白是拉丁化北方话方案的最早创造者，他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开山老祖。”<sup>②</sup>评价极为正确。

## 六 鲁迅的知己

瞿秋白同鲁迅的革命友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

<sup>①</sup> 叶圣陶《回忆瞿秋白先生》，《忆秋白》。

<sup>②</sup> 胡愈之《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同上。

话，也是后世革命文化人士团结战斗的楷模。他们是革命文化战线上两颗璀璨的巨星，相互辉映。他们的团结合作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合力，给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带来了新的光明，新的生气，极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壮大。1949年全国文代会后成立了“文协”，在文协开会的大礼堂中央，高悬两面巨幅油画，一面是鲁迅，一面是瞿秋白。这便是这两位前辈在全国文学艺术界人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这两位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革命家、文学家的友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见面以前（1931年5月——1932年初夏）、直接交往期（1932年初夏——1934年底）、分别以后（1935年——1936年）。

见面前。由于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著名人物，而且早在20年代初就有文学作品印行，一个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将，所以他们虽然未曾晤面，却是早已彼此熟悉的。只差一个正式接触的机缘。这个机缘由“左联”工作来提供了。当瞿秋白1931年4、5月间在茅盾家避难时，他们一同谈论“左联”，关心“左联”，其间，瞿秋白主动询问鲁迅情况。茅盾由此才得知这两位革命文学家迄今尚未见过面。于是茅盾建议说，在方便的时候，他陪同秋白一道去拜访鲁迅。正当他们计议去拜访鲁迅的时候，5月初的一天，冯雪峰到茅盾家送刚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1期来了，茅盾便将秋白介绍给冯雪峰。据冯雪峰回忆，瞿秋白很高兴地翻阅着《前哨》，对鲁迅先生为追悼当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作家而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十分赞赏，说：“写的好，究竟是鲁迅！”同时又指出文中“战叫”一词用得不够好，念起来不容易听懂。这一细节说明瞿秋白对鲁迅的道德文章有深刻了

解，而且很钦佩，也表明瞿秋白论人论事的真诚坦率。此后，茅盾、冯雪峰等同志经常听到秋白同志提到鲁迅，对鲁迅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瞿秋白对“左联”工作和其他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也由冯雪峰替代作口头转达，用便条的形式交换一些事务上的意见，亦由冯雪峰转交。此时，他们两人虽未见面（主要原因是双方行动都不自由，受到反动派的监视、通缉），但神交已很深了。正是在友情已深而且彼此真诚相待的基础上，瞿秋白才给鲁迅写了第一封讨论翻译的信，这信是1931年12月5日写的。当时，他读了鲁迅先生送给他的刚出版的《毁灭》，就以同志式的战友式的热情就一般的翻译问题谈谈他的看法。这既是对鲁迅翻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是对整个翻译工作的意义、对翻译的原则和要求的论述。这封信，鲁迅认为有公开发表的价值，就在鲁迅同冯雪峰合编的《十字街头》旬刊的第1、2期（1931年12月）上发表了。在这封信中，瞿秋白称赞鲁迅翻译《毁灭》是做了一件极可纪念的事情，说这项工作是革命文学战线上的一个胜利，值得祝贺，并且希望“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此外，信中还表达了他对鲁迅才华的钦佩，对鲁迅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的敬佩。他说：“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瞿秋白出于他对鲁迅的了解和认识，也出于他对人的真诚坦率，在这封信里，对鲁迅表示了完

全的信赖，将鲁迅视为知己，表达出一种亲密无间的亲切感情。他在坦率地谈了鲁迅译文不足之处后说：“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鲁迅对瞿秋白也是十分敬重的。当他从冯雪峰口中得知瞿秋白对从日本文译本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的意见时，他热情地而且是急迫地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基于这种了解和信任，鲁迅不久便托冯雪峰去约请瞿秋白翻译涅拉托夫的〈绥拉非摩维支〈铁流〉序言〉，瞿秋白闻讯慨然允诺，很快就将这篇长达二万字的论文赶译出来了。接着，鲁迅又让冯雪峰去请瞿秋白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唐·吉诃德〉。这剧本，鲁迅本来已从日文译本翻译了第一场，登在〈北斗〉第3期上，而当他同瞿秋白正式接触以后，认为由瞿秋白直接从俄文翻译更好，于是断然改变计划，请瞿秋白重新翻译。瞿秋白也欣然答应，不负鲁迅盛意。

总之，他们两人在未见面以前，彼此就已相当了解对方的思想，为人，就彼此钦佩对方的学问和才华，彼此之间都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亲切的感情。

瞿秋白同鲁迅第一次见面的具体时日已难确考。许广平回忆说是在1932年的春末或夏初。此说看来是可信的，因为她对当时的时令、天气记得十分清楚。她说，当时“气候宜人”，当日，“天气特别和煦”。是日清晨，瞿秋白夫妇在介绍人陪同下前往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座公寓的三楼拜会鲁迅先生。这

次会见，事先有约定，所以双方无疑都有思想准备。他们对于这次久盼的见面都感到特别高兴。许广平十分生动地记录下了这次会见。她写道：“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他们本来就欢喜新生一代的，又兼看到在旁才学会走路不久的婴儿，更加一时满室皆春，生气活泼，平添了会见时的斗趣场面。”“那天谈得很畅快。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为了庆贺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彼此也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要倾心交谈哩，但是夜幕催人，没办法只得分别了。”<sup>①</sup>他们一见面就如此亲热，一见如故，说明他们志同道合，是真正的知心朋友。从这时起到1934年1月瞿秋白离上海去苏区以前的两年时间里，他们过从甚密，友谊不断加深。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相互走访，特别是在瞿秋白夫妇住进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的那段时间，由于两家住得很近，来往更加频繁。秋白常常在晚间去鲁迅家里小坐，随意交谈。有时，鲁迅在晚间由许广平陪同也去秋白家小坐，有时还将附近面包店刚刚烤好的面包趁热送去，更增添了一种亲切的家庭气氛。同时也是借此机会探听瞿秋白夫妇的安全。许广平说，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他们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了。自从他们见面以

<sup>①</sup>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后，鲁迅时时为瞿秋白的安全担心，往往为之寝食不安。为了秋白的安全，鲁迅多方努力，想为他寻得一个比较安全又较为适宜的住所。此事在鲁迅的日记里都有记载。1933年3月1日：

“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3月3日：“午后往东照里看屋。”鲁迅终于选定了座落在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作为秋白的住所。而当敌人查觉瞿秋白新的住地，或者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鲁迅的家就成了瞿秋白避难的应急场所。据考，瞿秋白曾四次到鲁迅家避难。第1次是1932年11月24日左右到12月24日。第2次是1933年2月5日到3月4日或3月5日。第3次是1933年7月10日到8月14日前。第4次是1933年8月下旬到9月3日前。<sup>①</sup>

鲁迅和瞿秋白都十分珍视他们之间的友谊，除了工作（主要是“左联”和革命文学问题）上的配合默契以外，他们还在一块畅谈思想，交流感情，借以相互鼓舞，切磋砥砺。友谊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欢乐，增添了生气。鲁迅为了表明他特别看重他们的友谊，将清人何瓦琴语书写成轴赠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为了珍惜难得的相聚时光，他们还亲密合作，产生出一批丰硕的友谊之果。《铁流》的出版就是他们合作的产物。书由曹靖华译出后，由鲁迅请秋白补译涅拉托夫的《序言》，再由鲁迅亲自校阅，使这本书成为一个完善的本子。鲁迅对此感到很欣慰。他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说：“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托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又说，“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

<sup>①</sup> 见马蹄疾《瞿秋白四次到鲁迅家避难史实考》、《辽宁大学学报》86年1期。

书，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到上海，对中国文化界震动很大，但人们反映却各不相同。鲁迅同瞿秋白想通过此事反映中国现时的政治状况和文化思想状况，给人们提供一面镜子。他们决定辑录不同态度的文章编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他们说干就干，一天之内就编成了。为编这本书，先由许广平到街上搜罗当天的各种报纸，再由鲁迅、秋白共同圈定材料，杨之华同许广平负责剪贴，瞿秋白翻译外文资料并加写各处按语和短评，鲁迅则撰写序文，最后由鲁迅、秋白连夜编辑成册。他们还合作选编了一本介绍苏联版画的《引玉集》，瞿秋白节译了凯戈达耶夫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一文作为《引玉集》的《代序》，鲁迅则写《后记》。他们还合作创作杂文。《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内奸》、《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王道诗话》、《中国文与中国人》、《〈子夜〉的国货年》、《儿时》等14篇就是他们共同心血的结晶。这些文章是他们住在一起或住得很近的时候，在漫谈中相互启发并形成一致的看法之后再由瞿秋白执笔写成，成是由瞿秋白将他的初步构思讲给鲁迅听，两人交换意见后，瞿秋白再形成文字。写好之后，又由许广平抄誉一遍，用鲁迅的名义寄出发表。因为当时瞿秋白的文章几乎是无人敢发表的。由于这些文章是他们合作的产物，所以大都编入鲁迅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杂文集中。这些文章的观点、笔法、情趣等方面与鲁迅杂文都差不多，一般人很难区分出来。由此

可见他们二人不仅思想上一致，连文笔风格都达到交融难分的境地了。

瞿秋白同鲁迅之间，彼此十分尊重，相互非常支持。尽管他们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上，在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了解上，在对中国文化界的了解和认识上，在文学修养和文学爱好上，在各自的经历和气质上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可是他们都十分尊重对方的意见。鲁迅常对人说：“这问题，何苦（鲁按鲁迅习惯用何苦作瞿秋白的别名）是这样看的，……我以为他的看法是对的。”瞿秋白也一再赞赏说“鲁迅看问题实在深刻”。他们都给予对方极高的评价。鲁迅推崇瞿秋白的政论、杂文和译文，说瞿秋白“真有才华”、“真可佩服”。说他的政论“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则将鲁迅的杂文和鲁迅精神放在空前的高度上予以肯定和提倡。当鲁迅那篇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原则的杂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受到一些人的歪曲、鲁迅也由此受到攻击之时，瞿秋白挺身而出，支持鲁迅的正确观点。他在《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一文中通过严密的论述指出：“所以鲁迅说‘辱骂决不是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替这种辱骂来辩护，那才不知道是什么倾向的什么主义了。”“我们认为鲁迅那封‘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的信倒的确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这既是对鲁迅的支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的坚持。瞿秋白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政治上受打击，安全上受威胁，经济拮据（党组织当时给瞿秋白夫妇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身体病弱，连一个较为安定的住所都没有，更不要说进行翻译和写作。鲁迅给予秋白热情的援助，为他送去外



文书籍让他能够进行翻译，为他联系提前支付酬金，并争取较高稿酬，以接济他的生活，为他多方设法出版作品和发表文章，为他寻觅合适住所，等等。为了让瞿秋白的著述得到出版，鲁迅坚决要合众书店将秋白的译稿《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不平常的故事》等买下，不然，他的著作《二心集》就不卖给他们。

可是，他们相见太迟，相处太短，不然，他们的团结战斗，一定会给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苏区去了。在临行的前几天他向杨之华说，他一定要去向鲁迅、茅盾告别。为了能同鲁迅叙述惜别之情，决定在鲁迅家住一夜。是夜，鲁迅将睡床让给秋白使用，自己在地板上搭个临时铺睡觉。他们未曾想到这一分别就是永诀。瞿秋白在苏区瑞金生活了一年，不久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秋白走时，将他整理好的文字改革方案等著作交给鲁迅一份，他认为这是最可靠的措施。鲁迅将它们妥善地保存在离寓所不远的旧狄思威路专藏书籍的颇为秘密的一个书箱内。里面存放着一些鲁迅本人的书籍和柔石等同志的遗著。这些遗著历经沧桑而幸免劫难，解放后得以重见天日，成为国家的一笔珍贵文物。秋白走后，鲁迅时常想念，常向身边的亲人叨念道：

“不知何苦怎么样了？”他十分惦记秋白的健康，为他买药让杨之华邮去。秋白走后不到一月，即2月7日，曹靖华到了上海，去看望鲁迅。鲁迅把他引到三楼一间房里。房不大，但极整洁。靠窗有一张条桌，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放着削好了的铅笔、毛笔、墨盒、信封、拍纸簿等等。桌前放着一张靠椅。靠后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鲁迅以极其悲伤的低沉声音说：

“这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一切布置照旧，你就住在这里吧……”“他不断受猎犬追逐，缉捕，到处迁居。有时甚至一日数迁。有时被追逐到走投无路时，就跳上野鸡汽车，兜几个圈子，把猎犬甩掉，再下来步行。有时到最危险的关头，就逃到这里，住到这个房间里，……他等你等了好久，没有等着，你来了，他走了，到那边去了……”停了一会，鲁迅又重复说：“你来了，他走了……”<sup>①</sup>1935年4月，鲁迅接到瞿秋白化名林其祥从福建长汀监狱写来请他找铺保保释的信件，惊骇焦急，立即为营救战友多方奔走。他想到秋白在狱中衣食甚差，先交50元给杨之华让她转交秋白花用。而寻找合适铺保十分困难，想马上办一个店铺，钱可筹集，但还需一个能出面的经理，还需国民党批准，一时也难办到，保释看来是不可能的了。鲁迅预感到秋白凶多吉少。他在1935年5月14日给曹靖华的信中沉痛地写道：“闻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很难医好的了”。5月22日给曹靖华的信中又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在6月11日给曹靖华的信中他断定秋白必然牺牲，完全无望了：“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当鲁迅从报上正式得知秋白遇害之后，不胜悲痛，但他认为仅仅悲痛是无意义的。为了表示对一位著名的革命家、文学家的纪念，表示对他们友谊的怀念，也是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他决定做一点实事，便是搜集编辑秋白的遗著，让它流芳百世。这个意思在他6月24日给曹靖华的信中有明确的表示：“它兄文稿，很有几个人（鲁按郑振铎、茅盾等人）要把它集中起来，但我们尚未商量。现代有他的两部，须赎回，因为是预支过版税的，此事我在单独进行。中国事其实

<sup>①</sup> 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忆秋白》。

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象。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又悠悠然。”从秋白逝世后几天起到鲁迅逝世为止，鲁迅花了很多心血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秋白的遗稿，这就是上下两卷的《海上述林》。此书用“诸夏怀霜社”名义编印，充分见出鲁迅对秋白怀念之深情。霜，秋白小名。诸夏，隐含全国人名之意。鲁迅当时的健康已很差，病情日甚一日，他以重病之身亲自为《海上述林》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设计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过问印刷、装订等项具体工作，亲自拟定赠书名单。其中有两本托专人带到延安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看了《海上述林》，并在书上写了很多按语。此书后来交给杨之华保存，可惜后来丢失了。<sup>①</sup>鲁迅为了保证印刷质量，还决定运往日本印刷装订。鲁迅为编印亡友的遗著，可说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终于印成了当时堪称一流的印刷品。鲁迅见到上册样本后给曹靖华的信上说：“它兄集上卷已在装订，不久可成，曾见样本，颇好，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面今意已归土，哀哉。”上卷正式出版后他极为满意。他以沉疴之体抱病写了一则《介绍〈海上述林〉上卷》的广告：“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这，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遗憾的是鲁迅未能见到出版的下卷便辞世了。但他在逝世之前二天，即1936年10月17日给曹靖华的信中都还在考虑《海上述林》下一步的出版事宜，说“它兄译作，下卷亦已校定，准备付印，

<sup>①</sup> 见《回忆杨之华》117页。

……此次所印，本系纪念本，俟卖去大半后，便拟将纸版付与别的书店，用报纸印普及本，而删去上卷字样；因为下卷中物，有些系卖了稿子，不能印普及本的。这样，或者就以上卷算是《述林》全部，而事实，也惟上卷较为重要，下卷就较‘杂’了。”

鲁迅当时为什么没有首先考虑出版瞿秋白著述而决定先印他的翻译呢？这可能是考虑到瞿秋白的著作量大，不易搜集完备，而翻译作品就易于搜集。其次，还可能考虑到他的著作有不少是抨击揭露反动当局的政论，要印行恐难通过审查，而翻译作品就容易蒙骗反动派的眼睛。因此，为了急于表示对友人的纪念，先印译文是很恰当的。我认为，如若苍天再假以鲁迅年月，他一定是会继续编印秋白的著作的。以鲁迅的为人，以鲁迅的韧的战斗精神，以他们的手足般情谊，我想鲁迅完全会这样做的。有人说，鲁迅决定先印译文而不先印著作是出于他的谨慎云云，是无稽之谈。此说等于说鲁迅当时对瞿秋白的人格言论已有怀疑，或不够信任。事实上，鲁迅至最后一息对瞿秋白的经历，思想，为人都是极端信任而且极为尊敬的。鲁迅的品格决定他对他有所疑虑的人绝不表面周旋而是疏远、绝交乃至揭露。然而，他对秋白则是一往情深。他们肝胆相照，患难与共。而这种笃厚的情意又是建立在彼此的深刻了解和信任上面的。现在，半个世纪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他们都伟大，都有着永不磨灭的光辉，他们真诚的革命友谊与世长存。

我们在回顾两位前辈真挚深厚的友情的时候，很自然地对他们的身世产生一些联想，我们发现这两位革命家、两位文化名人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一、他们都出身在没落的士大夫家庭里，他们都是封建阶

级的逆子贰臣。

二、他们早年受到的思想影响都比较复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主自由思想，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反抗精神，东北欧各被压迫民族的文艺作品的进步意识，以及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对鲁迅的思想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国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鲁迅也有影响，但主要是儒家的人世、奋进思想。瞿秋白的思想观点也受到不同性质、不同流派的影响，如前所述，国外的斯多葛派，柏格森，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国内的老庄思想，禅宗学说，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痕印。而他们幼年在家庭所受到的启蒙教育，都有传统的封建思想和从母亲、奶妈等亲人那里得到的民主意识两个方面。

三、他们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都经历过追求、迷惘、苦闷的思想发展阶段。

四、他们的一生都严格地要求自己，严厉地解剖自己。

五、他们都有很高的古典文学修养，都很重视学习和介绍国外的革命文艺。都做着普洛米修斯盗天火给人间的工作。

六、一个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但始终不忘情文学；一个主要从事文学，但始终不脱离政治。

七、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学天才，在新文学发展史上都起过先导作用。他们都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小说的第一页，瞿秋白的《饿乡纪程》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

八、他们对一切敌人都十分憎恨，鄙视，厌恶；而对祖国，对人民，对革命，对人类一切进步事业，对同志，对亲人却都有着深沉的爱，挚着的爱。

九、周建人说的对：“两个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党内同志的误解与攻击，但两人对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①

十、他们的健康都欠佳，都患严重的肺病。鲁迅的肺病被美国医生判断为早无希望，而在1922年苏联医生就说瞿秋白顶多能支持二、三年。然而，他们都凭自己的精神力量从死神那里夺回了若干年时间，而且他们始终都不顾病体忘我地勤奋地工作，做出了难以想象的惊人业绩。

---

① 周建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1980年3月16日《解放军报》。

# 第七章 最后的斗争

## 一 在中央苏区

瞿秋白是1934年1月去中央苏区瑞金的。<sup>①</sup>瞿秋白为什么到苏区去呢？冯雪峰曾对此事作过明确的交代。他说：“一九三三年末，我担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党校校长是张闻天同志。有一次他和几位中央领导闲谈，谈到一些干部的人选，

<sup>①</sup> 瞿秋白去苏区时间有两说。一说是1933年12月或年底，杨之华《忆秋白》中如是说，庄晓东《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也持此说。另一说法是1934年1月，茅盾在《回忆录十六》、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丁景唐给郑乃斌等三人的信、陈铁健《瞿秋白传》等著作中都主此说。我认为后说可信，具体情况是这样：1934年1月4日晚，瞿秋白到鲁迅家告别，住了一夜。这有鲁迅的日记为证，鲁迅1934年1月4日记：“……晚宜宾来”。后因准备未绪，又盘桓了几天，大概于10日左右动身。鲁迅1月9日的日记上有“……夜得宜宾信”。可能是瞿秋白在临行前夕函告鲁迅他马上动身，再次表示惜别之情。又，1934年1月17日鲁迅致萧三的信上说“一星期前，听说它兄要到内地去，现恐已动身”。一星期前正是1月9日或10日，“听说”实指他接到秋白9日的告别信。“现恐已动身”实指已经动身。瞿秋白于1934年1月10日左右动身，在1月20日左右到达瑞金，而不是陈铁健《瞿秋白传》中说的2月5日到达瑞金。根据庄晓东、石联星、刘英等人的回忆，瞿秋白出席了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因此，瞿秋白到达瑞金必定是在1月22日以前，但由于路途不便，到达时间也不会很早，1月20日左右到达的可能性较大。

当时我也在场。他们谈到有人反映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问我他能不能来。我说他是党员，让他来一定会来的。后来由我起草了电报拍到上海，秋白就服从党的决定到苏区来了。”<sup>①</sup>

从1934年1月到1935年2月，在这年余的时间里，瞿秋白主要是负责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早在1931年11月7日至11月20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就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再次分工主管教育工作。瞿秋白虽然以往主要是从事党的政治斗争工作，但他对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也是相当熟悉的。20年代初旅苏时，就曾在“中大”做过助教工作，对苏联的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有所了解。1924年在上海又参与党的第一所干部学校——上海大学的领导工作，并亲自为学生开课。所以他现在来领导苏区的教育工作，可谓驾轻就熟。当时苏区不可能大规模地发展教育事业，他的聪明才智和教育经验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但他仍根据当时具体情况认真起草了《苏区文化教育工作计划》，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认真讨论，最后形成文件下发。他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为副部长），除了指导全区的一般文化工作之外，日常的重点工作是领导苏维埃大学（他为校长，徐特立为副校长）和隶属教育部的艺术局。他在苏维埃大学开学典礼上亲自作报告，指出苏维埃大学的任务是为了发

<sup>①</sup> 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辑。



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因此，每个学生都应深刻了解自己的伟大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要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开学后，他对政治教育的每一门课程都作出具体指示，甚至对每一次学习的讨论题目都予以原则指示。他还撰写文章阐述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关系。他指出：“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教育才能够真正赞助革命战争”。“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sup>①</sup>

这时期花去瞿秋白主要精力的是领导高尔基戏剧学校。在瞿秋白到苏区以前，苏区就已成立工农剧社。工农剧社发展很快，一些省、县和区都建立起分社。由于工作范围大，对文艺干部的需要也就相应增加，于是中央苏区就决定创办一所戏剧学校。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后，建议以高尔基来命名学校。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高尔基戏剧学校建立后，没有教员，没有教材，校舍十分简陋，困难很多。瞿秋白用鲁迅的话鼓励大家：“路是人走出来的。”又说：“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瞿秋白为办好这所学校花费了很多心血。他强调高尔基戏剧学校要附设剧团，剧团要到前线去巡回演出，以鼓励士气，直接鼓动革命战争。还要经常到集镇上流动演出，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在讨论剧本《无论如何要胜利》时指出：“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听。让群众

<sup>①</sup> 瞿秋白《阶级战争中的教育》，《斗争》62期。

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不可少的条件。”他再三强调“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在瞿秋白的亲自领导组织下，学校很快就成立了“蓝衫剧团”。由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兼任剧团团长。不久，“蓝衫剧团”与原工农剧社的部分同志以及“红军大学”的部分同志一块编为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分成三路到红军中进行慰问演出，反响强烈。当剧团出发去前方时，瞿秋白反复叮嘱大家：要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演出，要宣传工农政府的政策，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支援红军，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要增强群众对敌斗争的胜利信心。所有同志都牢记瞿秋白同志的教诲，认真做好这一革命工作。当时剧团负责人之一的石联星回忆说：“我们三个剧团的同志们带着秋白同志的叮嘱随军下到地方上去了。当时是冬天，地里没有活，我们帮助群众晒白薯干、晒其他的粮食和打柴等。同时就进行口头宣传。等群众去赶集（一般赶集总在有庙台的地方）我们就信了新的内容的话剧、歌舞剧和新的山歌、民歌歌词进行演出。”<sup>①</sup>瞿秋白领导的这所戏剧学校，在办校方针上不仅考虑到当前的需要，还考虑长远的文化建设。他提出学校除普通班外，还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他认为，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部队培养艺术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重要意义。他建议开设地方班，把瑞金云集区工农剧社的社长，长汀县工农剧社社长，中央印刷厂工农剧社社长以及各区的社长都调来训练，半年毕业。他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到什么工农戏剧运动。”瞿秋白这一远见卓识，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并在事实上为无

<sup>①</sup> 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新文学史料》1980年3期。

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为办好戏剧学校，他亲自物色选录教师。当时最困难的是缺乏教员。瞿秋白除了依靠革命队伍内部的较为懂行的同志以外，还确定在俘虏军官当中物色一些有艺术专业知识的人员，经过做工作，让他们当教员。他在《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一文中就明确主张：“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当作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的工作”。这样做，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困难，也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的学生借口听不懂俘虏军官的话，不愿听他们讲课，瞿秋白便动员说：“广东话听不懂可以慢慢听。目前你们需要美术的知识，舞台装置的知识。他们有这种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要他们教，你们就没有教员，没有教员的学校就只好散伙，散伙就只好请你们收拾包袱回家，学校关门”。“你天天在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没有？”学生被他说服了。瞿秋白还亲自为戏剧学校学生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由于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又能深入浅出，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课堂上常常发出一阵阵笑声。每当他讲完课，总被学生团团围住，舍不得他离去。

为了办好剧校，为了剧团的建设，也是为了整个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建设，瞿秋白在此期间十分重视文艺创作。他要求剧团每个同志都订出写作计划，并由总社综合成总的计划。为了鼓励大家创作，他带头写了很多故事，要大家将这些故事改

编成剧本。他要求大家也这样，先写故事，再改编成剧本。他说：“先写故事是写剧本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故事要有真实性和典型性。要搜集故事。”为了能写出好的故事，他要求大家深入生活。他说：“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在瞿秋白的具体指导和关怀下，剧校和剧团的同志以个人的形式和以集体的形式创作出了很多剧本，如《李保莲》、《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手枪》、《换哨》、《抢粮》、《埋伏》、《地雷》、《菜刀下的营长》、《收租粮》、《游击》、《我们的队伍来了》、《非人生活》、《牺牲》、《不要脸》等话剧。创作了我国革命戏剧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舞剧：《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台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等。此外，还创作了大量的歌词。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同志，也要求他们学习创作。他说：“你们会写字的要帮助那些不会写字的同志写歌，写戏。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但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好的东西记录下来……”当这部分同志将他们搜集到的山歌、民歌和自己写作的歌词寄给秋白同志后，秋白同志细心修改润色。瞿秋白为了让这些作品得到广泛的传播，他亲自选、编了一本《号炮集》，收录了5个剧本，写了通俗的序言，油印300份分送全区。他还准备将这些作品带到上海去出版，让它们发挥更大的影响，流传久远。

瞿秋白还为剧团规定了剧本审查与预演制度。他规定每个剧本都要经过他最后审查，以保证剧本质量。规定演出一出戏，必须经过预演。他认为：“凡剧本，没有经过预演，是不可以肯定好坏的，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

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能有好的剧本产生。”剧团的同志遵照瞿秋白的要求去做，效果很好，一些较差的剧本经过预演、修改，都改成了好的剧本。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当时，瞿秋白还指导扫盲工作。在他和徐特立的领导下，苏区因陋就简地创设了地方识字班，训练班，提倡丈夫教妻子，儿子教父亲，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瞿秋白还亲自编写通俗课本。收到很好的效果。他还负责《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由于他一贯的认真精神，当时有关文件都由他亲自起草，秘书只是抄誊一遍。他工作相当劳累，身体又差，不时咯血，三天两头发高烧，而物质生活又很艰苦，连盐都吃不上，食粮实行分配。可是，瞿秋白在这段时间里，却生活得十分愉快，充满乐观情绪。他以自己的勤奋工作、乐观精神教育和感染周围的同志，同他们团结战斗，使同志们感到亲切，和谐，有力量，有信心。他从不以领导自居，与同志们真诚相待。同志们对他真心爱戴与尊敬。当时剧团负责人之一石联星对秋白同志当时的精神面貌和他同大家的关系有过一段生动的记叙：

“一九三四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在我记忆里有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的同志，他们在那里交谈着什么。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

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sup>①</sup>当时苏区的困难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多。在瞿秋白的小办公室兼卧室里，经常挤满了一批又一批来请示工作和请求解决问题的人，瞿秋白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耐心地听取和认真的回答，常常连吃饭都顾不上。只要有人来见，他就立即会见。稍有空时，便约人来谈，了解情况，或者亲自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为了行动迅速，节省时间，他还以病弱之身学习骑马。他骑着马到基层去了解情况，骑着马到很远的地方去看望生病的同志。同志们见他风尘仆仆而又兴高采烈的活跃身影，都说“秋白同志变年轻了！”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留在苏区参加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任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瞿秋白曾向张闻天提出随红军长征，张闻天向博古反映了这一要求，被博古否决。当时高级干部的去留名单，一律由中央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决定。三人团留下瞿秋白的原因不得面知。有人认为这是丢掉包袱（瞿秋白病重），也不失为一种解释。红军主力北上，开始雄伟的长征以后，中央苏区的困难更大了。但瞿秋白同志仍然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红色中华》照常按期出版，剧团照样继续演出活动，并决定年底进行汇演。年底，按照瞿秋白的安排，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都从各战区的农村、火线上回到指定的鄂都县一个村庄。休息二三天之后便进行了汇报演出。话剧，歌剧，舞剧，活报剧，山歌，合唱，快板，以及各种舞蹈，形式多样，内容生动，表演严肃认真，深深地吸引着观众。尽管当时大雨淋漓，也没有人离去，打伞的，戴斗笠

<sup>①</sup>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

的。披蓑衣的，顶被单的，遮禾草的……直到鸡鸣晨晓，演出结束。瞿秋白陪同中央局的项英、陈毅、毛泽潭、陈潭秋、何叔衡、刘伯坚等同志站在群众中一道观看演出。演出后的第二天，瞿秋白亲自给演出评了奖，并为整个演出作了总结。这次汇演，既是成绩的大检阅，又是战斗的再动员。汇演后不久，由于形势的变化，剧团就分散到部队中去了。瞿秋白不久也离开苏区。苏区的戏剧运动便暂时告一段落。但这年余的戏剧大发展，为我党领导的戏剧运动，为革命文艺运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年余的戏剧运动，是瞿秋白为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作出的最后贡献。

## 二 被俘以后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趁苏区军事削弱之际以三个纵队计二、三十万之众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彻底的扫荡。到1935年1月，苏区形势已十分危急。在此情况下，负责中央分局工作的项英才不得不同意陈毅的建议，决定转移留驻苏区的负责干部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同志，责成福建省委护送出境，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于2月18日左右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在汤屋，这一行人又增加了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兼代内务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他们在汤屋稍事休息后，化装成香菇商人及眷属于2月20日左右继续前行，福建省委调派二百余人的武装护送。2月24日到

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由于张亮身怀有孕且是小脚，何叔衡年纪大，瞿秋白又身体衰弱，决定在此稍事休息，下午再上路。殊不知这一停留竟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这一行人很快被当地的地主武装“义勇队”查觉。福建省地方反动武装保安14团第二营营长李玉得到“义勇队”队长范连升报告之后，立即率部包围了小径村。枪声打响之后，护送队队长丁头脾临阵脱逃，致使护送队群龙无首。激战一个时辰也未能突围。当敌人逼近过来的时候，何叔衡知无法脱险，开枪自杀而未致命，坠落悬崖后被敌人发现遭枪击，英勇牺牲。邓子恢在组织突围的过程中，三番五次催促秋白同志冲出去，可是秋白同志已十分衰弱，实在无力冲锋陷阵。后来，邓子恢终于冲出重围，同剩下的几个战士边打边走，脱离了危险。”瞿秋白同志在邓子恢突围后被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范金桂、赖忠顺在半山的灌木丛中发现，同时被俘的还有张亮和周月林。匪兵押着他们回到水口镇时已是当天下午四点来钟。

李玉等匪徒对瞿秋白同志进行了初步的刑讯。瞿秋白自称叫“林琪祥”，江苏人，现年36岁，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后在医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恰逢红军攻打漳州而被红军俘获，送至瑞金充当医生。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走到上杭露潭地区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收押，直至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国民党地方保安14团团长钟绍葵当日由长汀赶回水口镇，李玉向他报告了战斗经过，并说明搜出港币、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手枪等情形，狡猾的钟绍葵据此怀疑“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于是第二天由他亲自将瞿秋白押送至上杭县城，将瞿秋白囚禁在县城监狱。一连几天，钟绍葵对瞿秋白进行严



刑逼供，而瞿秋白仍不改变原词，并在3月9日将上述内容笔录成文。李玉看了这篇供词之后对瞿秋白说，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并要瞿秋白写信到上海索取证明，或在当地寻找铺保，以证明与共产党确无关系。<sup>①</sup>于是，瞿秋白便用“林琪祥”之名给鲁迅和周建人分别去了信。给鲁迅的信与他的口供内容是一致的。内称：“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作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给周建人的信上说：他是一个生意人，到福建来做生意。现天气冷了，他在狱中衣被单薄，很冷，需要一些衣服或钱。最后讲到，只要上海有殷实的铺保，这里就可以释放。这两封信都由周建人转给杨之华看了。

鲁迅、杨之华等从来信得知瞿秋白被俘以后，立即寻找铺保，筹集款项，邮寄衣物等。就在这个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4月10日，伪第8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名不详），其人供认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在濯田地区被俘。第8师师长陶峙岳立即将这一重要线索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与此同时，伪36师所俘的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也供出瞿秋白等

<sup>①</sup>见陈铁健《最后的斗争——瞿秋白就义前后》，《瞿秋白研究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写本节时多处参考了此文和他的《瞿秋白传》中“最后的斗争”一章，特别是关于瞿秋白的狱中“供词”部分。后面不再注明。

已被俘。于是，保安第14团根据36师和第二绥靖区的电令，于4月25日将“林琪祥”押送长汀36师师部。同时，将已经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绥靖司令部驻地龙岩。张、周二人到达丰年桥时，在午饭中间，张亮主动出卖了瞿秋白同志。她对押送的保安14团团团长钟绍葵说：“我怀孕不能走，你们给我轿坐，我很感激。我现在报告你们，那个医生‘林琪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至此，瞿秋白同志的身份就暴露无遗。5月9日，瞿秋白被押抵长汀，囚禁于设在长汀中学里的36师师部。5月10日，36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光启、参谋彭厉、罗开甲等人对瞿秋白进行审问。在审讯过程中，吴匪突然诈控：“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我在民国16年曾在武汉见过你讲演，你不要冒混吧！”瞿秋白镇定地答道：“我确不是瞿秋白！”此时，匪徒将预先策划好的叛徒指认把戏端了出来。此人（一说姓陈，一说姓林，一说姓郑）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过，自然认识瞿秋白。在叛徒指认下，瞿秋白再也无法隐蔽真实身份。他坦然地对匪徒说：“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瞿秋白的身份得到确证，这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简直是天大的要闻。所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于第二日即1935年5月11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显著的版面发布了这则消息：“匪首瞿秋白就逮，化名‘林琪祥’与项英妻同时捕获，经指认确实已由长汀解往龙岩”。这条消息自然被鲁迅、杨之华看到了。此前，他们还存一线希望设法营救，而今已不能再存营救的幻想了。反动派绝不会放过瞿秋白的。杨之华见报后，一下就意识到秋白不能活了，她马上派人去见鲁迅先生。那人回去告诉她

说，鲁迅见报后木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抬不起来了。瞿秋白本人也清醒地认识到，敌人绝不会放过他，必死无疑。他给杨之华哥哥的信中已明白地谈到这一点。信上说：“我的事想你们在报上已看到了，我要和你们永别了。之华是我生平唯一的知己，或者她也被捕，我知道你们是不会知道她的下落的。但我要留最后一封信给她，想你们也没有办法转给她，那么，就请你们投寄给叶圣陶先生作为写小说的材料吧！望你们保重”。瞿秋白明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他仍在细心保护杨之华的安全。“我知道你们是不会知道她的下落的”，是暗示他们绝不要透露之华的活动及住所。瞿秋白同时写给杨之华的信，杨之华一直未看到。因为带信来的人坚持要面交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其人身份不明，杨之华又怎能贸然相见？而且，杨之华已相信秋白不能生还，见这个人又有何益？至多不过是损失一封秋白的遗墨。

一方面，瞿秋白认定必死，不存在任何徼倖心理；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上至最高当局下至36师有关人员，却幻想劝降瞿秋白。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对部属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基于他们这一可耻阴谋，他们对瞿秋白软硬兼施。当时主办瞿秋白一案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宋希濂为师长的敌36师。他们为了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对他的生活给予了一定的优待，宋希濂本人也假惺惺地以“瞿先生”相称，随员们仿效宋希濂，也以“瞿先生”称呼瞿秋白。他们还允许瞿秋白在囚禁室内刻刻图章、写写字。有着长期对敌斗争经验、深谙敌人心理的瞿秋白，经历过无数次重大斗争，有着无畏精神、从容气度的瞿秋白对敌人这一套阴谋是十分清楚的，他无动于衷，依旧平平静静，以软

对软，以牙还牙。既然允许刻章写字，就利用这一特殊形式自误，调养身心，还可利用这一特长改善同看守官兵的关系，让他们传书带信，并进一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出乎此，他对敌伪官兵请刻图章有求必应，对索要诗词者也勉力应付，还同36师参谋长向贤矩一块喝过酒。正是在瞿秋白的以软对软的办法的感召下，军医陈炎冰、参谋长向贤矩都为他转过信，保存过遗墨。<sup>①</sup>解放前几年向贤矩在长沙投奔李济深，并于解放前夕率部起义，这一转变同当年瞿秋白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

从5月10日瞿秋白身份被指认到6月上旬，宋希濂之流一面从饮食和其他生活方面去软化瞿秋白，另一面不断以各种方式审讯，企图从瞿秋白口中获取我党我军机密。但瞿秋白的“供词”令他们大失所望。瞿秋白在汀州狱中曾写过一篇较长的供词。反动派对它的评价是：“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sup>②</sup>现将这篇“供词”抄录几段于后，以见一般：

“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例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战争中死

<sup>①</sup>瞿秋白在狱中写给郭沫若的信就是由陈炎冰转寄给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柳亚子先生的女儿柳无垢的。同时寄去的还有瞿秋白在狱中写给陈炎冰的诗词手迹和赠他的题词半身照。

<sup>②</sup>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逸经》34期。

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集粮食（有借农民的谷子，有农民自己节省来捐助的谷子，有按时交纳土地税的谷子）也完成了。

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市和圩场，乡村中的生活就一天天的苦起来，因为有油的地方运不出，没油的地方买不到，……等等。生活一般的说，是很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地上的天堂’。这区域原来就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呵！”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慌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这种现象。……”

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中央的决定之中，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多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子都要杀’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绝对不是杀尽地主的意见。……我在苏区没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象，也许我的‘见闻不太广’。”

“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党，同以前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同的，工人干部也多了，工作方式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等等的能力也强多了。

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责任，可是，以我在苏区一年的感觉面论，觉得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没有什么错误。”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我不会随声附和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sup>①</sup>

这就是瞿秋白的供词：颂扬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的辉煌胜利，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驳斥反动派对共产党革命的污蔑！

面对瞿秋白的凛然正气，伪36师束手无策。本来，国民党

<sup>①</sup>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最后的斗争》。

最高当局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对瞿秋白恨之入骨，见他毫无动摇之心，便决定处死以绝后患。6月2日蒋介石从武昌行营给蒋鼎文发去密令：“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息字印。”但他们仍不放弃“说服”瞿秋白的幻想，他们以为如能使瞿秋白放弃共产主义，即便不归顺国民党，也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比杀掉他更为有利。同时，总想从瞿秋白口中多少捞得一点东西。因此，他们仍想作最后的努力。在陈立夫的安排下，王杰夫以“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的身份，偕同国民党中央另一策反专家陈建中以及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等一行于6月14日到达长汀。这伙自视有能耐有经验的反共行家以为很有把握，结果是惨败而归。下面抄录几次他们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以见瞿秋白对革命的坚贞。

王杰夫：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希望你好好的加以考虑。你可不能使他们失望。

瞿秋白：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戚友代劳。

王杰夫：瞿先生，我们从南京到长汀来，因为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你生存下去，可以作翻译工作，翻译些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

.....

瞿秋白打断他的话说：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一些，译一些高尔基等文学作品，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王杰夫：朋友、亲属关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哪料到同你谈了好几天，你无动于衷乎？

瞿秋白：王先生，钱先生，谢谢你们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王杰夫：我有一个假设，假设瞿先生不幸牺牲了，你瞿先生是否希望中共中央为你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呢？

瞿秋白：我死则死耳，你何必谈什么追悼会？！

陈建中：瞿先生，你是去香港再转往上海，你打算在香港住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关系？到上海又打算往什么地方？有什么关系？

瞿秋白对于这愚蠢的问题置之不理。

王杰夫：请你说明中共中央过去发动过几次大暴动，如南昌暴动，两湖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这个责任，你瞿先生要不要负责？

瞿秋白：这些大暴动，都是中共中央发动的。发动这些革



命运动的责任，在中央方面，我当然负责任！

王杰夫：中共中央和红军都西上了，江西等地的善后潜伏计划，你当然知道一些的，请谈一谈。

瞿秋白拒绝回答。

最后一次。

王杰夫：瞿先生，我们决定明天就离开长汀回到南京。你是不是在我们走以前，最后表示你的真正态度。我们同你的亲友一样诚心诚意挽救你，爱惜你的才学。

瞿秋白：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

钱永健：你要识大体。最近中共残部流窜西去，只余下几个小股，很快就要肃清，中国已经空前统一，中共穷途末路，大势已去。‘识时务为俊杰’，你为什么这样顽固迷信？我看瞿先生还是从速考虑吧！

王杰夫：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作公开的反共工作。你可以担任大学教授，也可以化名做编译工作，保证你不作公开反共。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所以，我们为国家爱惜你的生命。瞿先生，你不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的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瞿秋白：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作是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瞿秋白的回答虽非厉声怒斥，却也铿锵果决，掷地有声，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在36师为王杰夫等人饯行的晚宴上，王杰夫叹息道：“我们不能作到使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这就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宋希濂也说：“我们作了不知多少工作，南京军委会也派了专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无功而返。”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国民党所用，实在等于做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看法就不正确。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万一有个差错我将如何向委员长交代？”①

王杰夫之流动降瞿秋白的最后努力既然已经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就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处决命令。6月16日，宋希濂接到蒋鼎文转发来的蒋介石6月2日密电。6月17日中午，宋希濂派36师参谋长向贤矩到瞿秋白囚室，准备向瞿秋白宣布即将处决的决定。这时，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见状已有预感，他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向贤矩反问道：“瞿先生，你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瞿秋白立即明白他们就要杀害他，说：“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向贤矩答道：“是的。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最高当局来电报，可以成全你了。师部遵照委员长的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要办的后事，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为之。”瞿秋白饮了一口酒，镇静有力地回答说：“我早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

①以上讲话和劝降对话，均转引自陈铁健《最后的斗争——瞿秋白就义前后》。

前给我送行，干杯！”<sup>①</sup>是夜，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深。6月18日晨，瞿秋白起身换上新洗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认真漱洗，然后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唐诗。接着，他展纸挥毫，写道：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  
（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写至此，36师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讖，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写完掷笔整衣，随匪兵昂首走出牢门。到中山公园后，按照匪兵安排，先在亭前拍照。我们至今从这张遗照上仍可清楚地看出瞿秋白体态安祥，神情自若。几个月的囚禁生活使他面目浮

<sup>①</sup>见1987年2月28日《文汇报书周报》根据《宋希濂今昔录》摘编的“瞿秋白烈士的最后一天”。

<sup>②</sup>同上。又，1935年7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的《瞿秋白伏法记》，所载也大体一致。

肿，但他眉宇之间那股蔑视敌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凛然英气仍然清晰可见。拍过照，凉亭内已安排好酒菜，秋白自斟自饮，谈笑自若。自语道：“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餐毕，缓步走向刑场，手夹香烟，顾盼自如。沿途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刑场设在距公园二华里的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草坪上，到达刑场，瞿秋白环顾四周，然后说：“此地很好，就在这里。”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开枪吧！”一代英烈就这样为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享年36岁。下午四时左右，有人送棺木一具，秋白遗骸由职业抬棺人张仁福代为装殓，葬于罗汉岭盘龙岗。

### 三 关于《多余的话》

瞿秋白同志在身份暴露以后，从5月17日到5月22日在狱中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最早披露这一消息的是1935年7月8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12卷26期上刊登的李克长写的《瞿秋白访问记》。《访问记》开始部分交代说：“记者日前因事赴汀，乃就近至押所，与瞿作一度之谈话，时为二十四年六月四日上午八时。”《访问记》记叙说，当记者问瞿秋白“尚有何作品否？”时，瞿秋白答道：“我花了一星期的工夫，写了一本小册子，题名《多余的话》。（言时，从桌上检出该书与记者。系黑布面英文练习本，用钢笔蓝墨水书写者，封面上贴有白纸浮签）这不过记载我个人的零星感想，关于我之身世，亦间有叙述，后面有一‘记忆中的日期表’……”《访问记》最后写道：“谈至此，遂与辞，并携《多余的话》稿本出，即至

街上买纸一张及石章一颗，送与其写刻；傍晚时着人取来《多余的话》一稿（鲁按“携《多余的话》稿本出”是说从瞿秋白囚室出来，但他不可能将稿本直接带出监狱，而须交给36师主管人员，傍晚他又派人去主管人员处索取借阅），阅未及半，为主管禁押人员催索取去，云即另抄一副本与记者。次日匆匆离汀……”。对于《多余的话》的真伪，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我认为它是瞿秋白写的。这一判断的根据是它的内容。从内容上看，第一，所叙述瞿秋白一生中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若干细节，只有他本人和杨之华等少数几个亲属才可能知道，别人是无从知道的。如1917年初到北京，堂兄瞿纯白叫他去应普通文官考试而未考上；1921年到苏联后头几个月请了私人教授教俄语；1919年便得了吐血病；老家积欠了佣人几个月的工资，一直未还清；1929年底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斗争情形；1932年讹传他死去，有的地方还为他开了追悼会，等等。这些内容，当时的国民党有关组织不可能已记入瞿秋白的档案，也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调查到的。第二，整篇的语言格调、情趣心怀、行文逻辑与瞿秋白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与他的文学作品是一致的。正如丁玲谈到《多余的话》时所说的：“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sup>①</sup>第三，文章所述瞿秋白的思想历程十分真实，它绝不是别人、特别不是反动派所能了解所能理解的。文章说，“五四”运动前夕，他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经过“五四”运动，同时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

<sup>①</sup>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文汇报增刊》，1980年2期。

究的兴趣。到苏联，通过阅读共产党的报纸、文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通过实地调查，他对共产主义有了同情和相当的了解，但由于误会加入了共产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就没有想到入党，后来因工作关系，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马列主义上了，就参加了共产党。从1923年到1926年，接触文学的机会更少了，而对政治问题却有相当的兴趣。从1926年底开始，看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实质，看到他们已不能领导革命，就对他们进行批判，目的是想让陈独秀纠正错误观念，绝没想到要取独秀而代之。当他被推举出来主持党的工作时，他一开始便觉得非常之不合适，但又没有别的办法，要退出领导地位，就是拆台。于是他以十分矛盾的心情勉强地做着领导工作。而另一方面，革命形势又迫使他不能不尽心竭力地为党的革命事业忘我地工作。“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在“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阶级斗争更进一步的关口，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的时候，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组织领导贺、叶的南昌暴动、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当然，其间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而不论是1928年党的“六大”期间对他盲动主义错误的批判或是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由他主持的对李立三路线的纠正，他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错误都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只知错了，并且承担了责任。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对他和李立三作出进一步批判，作出组织处理，他才认识到上述问题。但也从此

产生了重大的转折，便是他说的“结束了”政治生命。就是说，从1931年1月以后，他的政治见解被完全否定，他的领导职务被彻底解除，再加之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他既不可能又无力再全面关心党的政治斗争、从事第一线的政治活动了。这便是他在文章中所说的“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的具体含义。他认为，尽管最后四年仍做了一些革命工作，并未完全不过问政治，但是，既然已离开第一线政治活动，对现领导的一切主张又不愿发表不同政见，那么，这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自责道：“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他严厉地诅咒自己，他不是革命烈士！甚至连无产阶级战士都配不上！瞿秋白回顾的这一思想历程，合乎实际情况（评价过低问题，这里暂时撇开不论），而且显得自然、朴实，这绝不是别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除了《多余的话》的内容的真实性外，当时对监狱中的瞿秋白最了解最接近的向贤矩在解放初期所作的交代上也有明确的肯定。这份交代材料上说：“瞿烈士在匪师部秘书室关押期间，着手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内容是叙述他历次领导广州、南昌、长沙各次暴动和起义的经过，约六、七十页。”<sup>①</sup>向贤矩在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镇压。倘若活着，会提供更详细的情况，也可能提供《多余的话》原稿的下落线索。此外，据考，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全文刊登《多余的话》的半月刊《逸经》社社长简又文（又名大华烈士）前些年在台北游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北从军记》内记叙说：那时在福建某军任政治工作人员的杨辛之参与剿共战役，抄得一份

<sup>①</sup>《中共中央组织部5292瞿秋白干部档案》，摘自常州博物馆抄件。

《多余的话》，改用雪华名录寄《宇宙锋》，该刊未用；简闻其事，争取到手，以“瞿秋白遗著，雪华录寄”的署名在《逸经》上分期发表云云。<sup>①</sup>以上三个见证人，以李克长、向贤矩的说法最值得重视，他们在当时同瞿秋白直接接触过。其中有两点很有注意的必要。一是李克长说的他见到的是黑布面英文练习本，这与瞿秋白1934年1月离开上海时杨之华为他购置的黑漆布面的本子情况相符。瞿秋白离开瑞金转移时，舍不得杨之华给他买的纪念品而随身携带是完全可能的。当时，杨之华给他买了10本他喜爱的这种本子，他将10本分成两半，对杨之华说：“这5本是你的，这5本是我的。我们离开以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重见时交换着看。”因此，他离开瑞金时，不管如何轻装，他也要带上这些本子的。在监狱里，用它写下“要说的话”也是很自然的。二是向贤矩在解放以后以罪犯身份作的交代，也没有任何必要编造这一史实。更何况他在解放前夕已率部起义，此时虽然身为罪犯，他也可能因起义有功尚存政府宽大处理的希望，这种心理使他感到必须老实交代而不能与政府作对。因此，他的交代是可信的。总之，我认为瞿秋白是写了《多余的话》的，但不排除它被反动派删改过的可能性，这一点许多文章已经指出。但我认为，若有篡改，也只是文字上的渲染和少量增删，整体结构和基本内容则是原来的。

对于《多余的话》的评价，也颇有分歧。我认为，为了正确地理解和评价《多余的话》，需要首先明白它的性质和写作特点。明白它的性质和写作特点就能较为准确地理解它的内容，真正理解了它的内容也就能正确地评价它。从性质上讲，

<sup>①</sup>《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载《〈多余的话〉讨论述评》。



《多余的话》不是写的供词，不是写给反动派看的，也不是反动派强迫他写的，而是出自本人内心的要求，是本人借以言志抒怀的产物。其目的是想借真实心迹的赤裸暴露，让党、让革命同志、让世人对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有一个准确的评价。他希望世人通过他的矛盾性，通过他的欢乐与痛苦，通过他的成功与失败，通过他的经验和教训，通过他的真切感受，庶几能获得一面镜子，从而明白一些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思想改造的艰巨性、乃至人生的复杂性。通观全文，他认为自己在革命生涯中有许多错误，而且在革命征途中是半途而废，对此感到非常沉痛。他觉得自己无颜要求得到党的谅解。他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同志们身上，寄托在未来的新一代身上。由于文章主要是言志抒怀，所以就有一定的文学性，即一定的抒情色彩和感情色彩。形式是自传，但不可视为简单的个人历史。概括言之，这是一篇以极其沉痛、极其惭愧的心情写的具有文学性的自传体散文。这里，我们不妨联系李克长写的《访问记》中的一个细节，李问的是“尚有何作品”，显然是指文学作品之类，瞿秋白在回答中也明确指出其中记载的是他的“零星感想”，即个人身世，只是“间有叙述”。并且希望能出版。若是单纯的材料、履历，他怎么会要求拿去发表呢？《多余的话》在写作上两个特点。一是重在解剖自己，批判自己，而不是对某个问题的全而回答，因此，全篇都几乎是在反躬自问，对自己责备过多而且过严，对自己的错误和不足，不少地方言过其实。二是感情胜过理智。与其说他在客观叙事和总结，不如说是在抒发感情，是在渲泄惭愧悲伤之情。感情的过量流泻淹没了理智。理智判断被感情冲击得偏斜。由于《多余的话》在写作表达上的这样的特点，我们不可简单地根据它的个别词语来评论

瞿秋白思想的是与非，而只能从它的总的思想倾向，从它的中心思想去评价瞿秋白的思想和感情。

〈多余的话〉共有7部分，其主要内容是：

〈何必说？——代序〉：表明写作目的。他说，在他“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走到生命的尽期”的时刻，他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以让世人，让革命同志明白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共产主义战士。

〈“历史的误会”〉：回忆革命经历。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如何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勉力担负党的主要领导工作而终于未做好这一工作被解除领导职务。他认为，象他那样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那样的性格、才能和健康状况是不适合担此重任的。由于当时的历史特殊性，他被推上了领导岗位，这算是“历史的误会”。

〈脆弱的二元人物〉：剖析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尽管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做着党的领导工作，但是，严重的肺病十多年来日甚一日，感到心力交瘁，以至脑神经麻木，极度的疲劳只渴望休息，再加之自己思想深处还潜伏着绅士意识，如仁慈礼让，避免斗争等等。因此，思想是矛盾的，感情是脆弱的。

〈我和马克思主义〉：回顾自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发生兴趣到研究它，运用它。但未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犯了政治路线错误，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但是，至今并不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检讨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功过。说明自己对革命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文人”〉：严厉谴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认为自

已不配做一个革命者，甚至没有一点真正的知识，做一个“文人”也不够格，是一个“半吊子文人”。

《告别》：希望革命同志充分看到他的缺点、弱点和错误，严格地否定他，同时希望同志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他羡慕他们，祝贺他们。最后，他深情地说：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综观全文，上述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真实地写出自己一生的简历和几次思想转折。第二，诚恳地检讨自己在党的革命斗争中的是非功过。第三，勇敢地揭露自己思想深处的矛盾，严厉谴责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但声明自己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第四，坦率地说明自己身体上、精神上、政治上的疲劳感。第五，表示自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希望同志们否定他，希望同志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

根据上述的基本内容，我认为，《多余的话》的总的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在于谴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工作错误，而不是鼓吹或暗示背离马克思主义或脱离共产党。而且，《多余的话》所叙述的有关革命的一些事件和他本人的主要经历，也是真实的，有文献价值。其次，《多余的话》将一个人最隐蔽、最深层的思想，将一个人性格的另外一面真实地坦率地显露出来，最严厉地解剖自己的不足

和错误，是十分可贵的。这一大胆的坦白精神是无私无畏的表现，单凭这一精神就堪称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一精神足以鞭策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足以使那些口是而心非、伪装、矫情的人自惭形秽。《多余的话》虽然充满自我谴责和自我否定，但以反而形式向人们表明，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必须经过艰苦的磨炼。《多余的话》明确讲到：“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这些方面无疑都是好的，积极的。但是，《多余的话》的确又表现出较浓厚的消沉情绪。由于自己被排挤出党的领导岗位后很少全面考虑党的政治工作，对党的重大方针未表示具体意见，接着又被俘，被抛出革命队伍，不能再为党工作，就认为自己事实上是对党的事业背叛了，自己简直就是叛徒当中的一种，完全否定了自己的革命性；由于病体沉重，连续十几年未得休息，身体近于崩溃，导致极度的疲劳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多地反复诉说要休息，要卸却千钧万担，说对一切都感到厌倦，甚至说“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就说得过份了，而且与他的实际行动也不一致。尽管这当中有着文学性的夸张，一任感情的奔泻，而不注意实际意思的准确性，但这种说法总是让人感到情绪低沉，心境上有一层灰暗的色调。这种言词只能使人沉思和叹息，而不能使人奋进。此外，《多余的话》自责有余，而对客观现象分析不足，更没有对敌人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因此，它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战斗性。尽

管在它的自我谴责中向人们呈现出一颗充满人情、正义、善良的赤诚之心，但同时又在客观上起到了宣扬调和、退让的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是相悖的。

说瞿秋白对自己谴责过重，否定太多，是以他的实际斗争、实际贡献来衡量的。他对中国革命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对中国新文学建设等方面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巨大贡献，已在前面分别评述过了。他在敌人监狱中也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尊严和坚贞，临死也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无畏精神。当然，我们在瞿秋白的狱中生活中看不见慷慨激烈、怒骂绝食这些形式。他运用的是适合他当时处境，符合他的气质，又是他力所能及的另一种斗争方式，即蔑视淫威、虚与周旋、驳斥、抗争、宁死不屈。这种斗争方式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胆识，需要顽强，更需要韧的战斗精神。对于瞿秋白的这种斗争方式，反动派亦有察觉，在瞿秋白牺牲后，反动派曾哀叹说：“瞿（秋白）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之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sup>①</sup>这一段话，从反面证明瞿秋白同志如何以他特有的方式同敌人进行了最后的斗争，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

<sup>①</sup> 1935年8月出版的《社会新闻》第12卷第6期选载《多余的话》时的接语。

# 第八章 秋白形象

## 一 才学与爱好

瞿秋白兴趣广泛，爱好多样。瞿秋白的爱好与他的家庭和周围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出身的士大夫家庭虽然已经破落，但这样的家庭在尚未变成一无所有，置身无产者行列以前，总是要维持“诗书传家”的体面的，所以，读书、写字、识礼，就是瞿秋白少年时代必不可少的人生功课。同时，这样的家庭，又往往诗书盈篋，往来多儒士，瞿秋白自幼便受到这样环境的熏陶。

秋白小时，本来先是遵命描摹颜真卿的庙碑，可是看到亲戚庄蕴宽的魏体写得很好之后，便学起魏体了。他先临北魏龙门二十品，后又揣摩学习南魏爨龙颜，这使他的书法颇有魏字功底。

瞿秋白的六伯父瞿世璜会篆刻，他在观赏之间便也渐渐学习起来。读中学时，又得国文老师史蛰夫对刻石的指点，更加深了兴趣，终成一大爱好。中学时，他将自己的小名、别名刻成图章，如双、霜、爽、秋白、铁梅、涂梅、梅影山人等，加

印在自己所读的书本上。瞿秋白一生究竟刻过多少石章，无从考证。他在长汀狱中不足两月的时间里，便刻了60多枚。秋白刻石，苍劲古朴，既重形，又重意境。小时曾为同伴羊牧之刻了一枚名章，他将篆体羊字的角“M”刻得特别大，羊牧之以为不好，他解释说：“角大能克敌，角大能摧坚，角大能自卫，怎能不大！”关于他的篆刻，还有一件轶事。当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仪式之前一日，郑振铎才发现他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而照当时文明结婚的规矩，结婚证书上必须盖上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以及介绍人、新郎新娘的图章的。为了应急，郑振铎只好找老朋友秋白赶刻一个。而瞿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草拟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知道秋白忙，不能刻，于是转请茅盾代刻。当第二天茅盾送去刻好的图章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称谢说：“何必送这样的重礼！”茅盾将纸包打开，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因郑、高二人都福建长乐县人），每章各占一字，用意双关。按照秋白讲的润格加倍，边款2元计，恰好50元。他们对秋白这个玩笑捧腹不已，更赞赏他精美的刻艺。茅盾自愧不如，将自己刻的收检起来了。

瞿秋白还喜欢绘画，这显然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瞿稚彬会画，秋白时常在一旁观摩欣赏，自然得到父亲的教诲。瞿秋白的绘画现今能见到的有两幅。一幅是1916年画送表妹金君怡的《江声云树图》。这是一帧横幅，滚滚江流，冲激巨石，浪花飞溅，云气蒸腾，一带林木，生气勃勃。上录谢灵运诗

《登池上楼》前四句：“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棲川怍渊沈”。下款是“丙辰孟秋临鹿村居士杂寓谢灵运诗为题以应纤哥雅属”。署名“秋白瞿爽”。盖“爽”及“秋白”图章。其画面其诗句都表现了生气、力量和对未来的追求热情。它反映了瞿秋白当时心境重要的一方面。另一幅是1919年画赠旧同窗李子宽的山水立轴。画面上，老松郁郁，幼树葱葱，小溪水阁，远方青山叠嶂，近地抚琴一人。题词是：“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胸中具此潇洒，腋下自有出尘之概，何必苦索介人耶”。下题“己未清明节，子宽学兄雅正”。署“秋白瞿爽”。这一幅较之上一幅，就有较为明显的冲淡意味了，题词已直抒超然之意。这也是他在“五四”前苦闷心境的反映。<sup>①</sup>此外，据羊牧之回忆，1926年在上海，羊牧之向秋白索画，他画了一幅《风竹图》，疾风中瘦竹数竿，虽弯仍犹刚劲。上题“腰可弯，节不折”，下署“秋白”。可惜此画已佚失。秋白小时为亲友画过若干扇面，也未能存留下来。

瞿秋白对戏曲、音乐也有兴趣。二三、二四年在上海时，他常常抽空到新世界去听小黑姑娘的京韵大鼓以及其他人的说唱，而且自备一架留声机，不时欣赏一下京剧的唱片，如谭鑫培的《李陵碑》，刘鸿声的《四郎探母》等。在上海大学时，还同王剑虹一道吹吹箫，唱唱昆曲。当时，丁玲同王剑虹关系密切，常同王在一起，于是丁玲也受到感染熏陶，在秋白的指点下，丁玲也能唱几句昆曲。瞿秋白的风琴演奏，达到自弹自唱的水平，为了译好《国际歌》，要译得准确又译得能唱，他便一边译一边弹唱，反复斟酌，“国际”一词采用音译，就是他这样斟酌确定下来的。

<sup>①</sup> 上述两幅画均存上海鲁迅纪念馆。



瞿秋白的多才多艺，在幼年时就奠定了基础。秋白中学同窗回忆读常州府中学时的秋白说：该校“下午三时后，学生课较差者补课一小时，如国文、英文等。其他学生则于此时间上游艺课一小时，游艺内容有书法、篆刻、军乐、雅歌等，由学生自由选择分组练习。秋白曾一度选雅歌（昆曲）学‘拾金’一出，继而弃去，以后彼于著作中曾批评唱曲行腔咬字尽符自然，其认识即基于此。后一年改习篆刻（治印），我亦与俱，其时发现秋白于小学（说文）有相当知识，于各种印谱早有研究，较诸我辈初作尝试者迥然不同。……秋白于音乐能吹洞箫，偶于月夜一次，音调婉转而凄楚，似惟此器适合于性情。于国画能作山水，但亦不常作，在校时只写过两三幅，后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时期曾画过两三幅，我乞得一幅。”①

瞿秋白最大的喜爱是文学，他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促进他喜爱文学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他的母亲金衡玉。金衡玉出身书宦之家，自幼在家塾中受到严格的诗书教育，颇具旧学根底，对旧诗词有相当修养。她亲自向秋白讲解诗词，要求他背诵名篇。瞿秋白在七、八岁时就能背诵一些古典诗词。进入中学以后，阅读面就更广了。文学、历史、哲学，中国古籍与现代报刊，还有国外译著，都做了广泛涉猎，不过仍以文学作品为主。瞿秋白在中学期间还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一块对古典诗词文章进行讨论研究，②这使他对文学的兴趣进一步得到加

① 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1959年第1辑。

② 一般著述都说他和同学任乃简、吴南如、李子宽等人组织诗社，据任半塘回忆，不是诗社，而是班会，班会取名“希坚”。见贺忠贤发表在1983年1月30日《常州报》上的《往事记忆新，生死各千秋——访秋白烈士同学任半塘教授》。

强。总之，中学阶段，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学基础，坚定了他有志于文学的志趣。所以他1917年到北京之后，便去报考北京大学文学系。后来虽然没有读上文学系，进了俄专，可是他对文学的爱好却一直没有减退，后来走上了他未曾想到的专职政治活动的道路，在繁忙艰苦的政治活动中也依然怀念着他心爱的文学，甚至常常因为从事政治不能专心从事文学而感到遗憾，产生思想上的矛盾。1926年夏天在上海，一天羊城之送一份文件去给瞿秋白，听见他正在吟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羊城之开玩笑说：“上海地方既没有东篱，更没有南山”。瞿秋白笑着说：“看着远处在烟雾里的高大建筑，未始不象南山，未始不好悠然啊！”接着又说：“我这个人始终摆脱不了文人习气。今后革命成功了，年纪大了，我一定选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整理整理中国古典作品，到那时你也来帮同搞吧！”1930年在上海一次同丁玲的谈话中，一面真诚地赞扬丁玲：“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一面深情地脱口而出：“田园将芜胡不归！”以感叹他多年对心爱文学的荒疏，流露出深深的惋惜。这种惋惜心情一直萦绕着他，折磨着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瞿秋白的知识积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小学阶段，主要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及一般自然科学知识，对于当时的新文学也有一定的阅读和了解。北京俄专阶段，主要是学习俄语、英语和法语，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主要是俄罗斯文学，还自修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旅苏阶段，主要是大量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深入了解和研究苏联文学。经过他长期的艰苦的学习，终于成为一个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文学家。鲁迅说过，象瞿秋

白那样的中文和外文都很好的人，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最合适的，在中国当时是“举世无两”。对于瞿秋白的政论和学术理论文章更是十分佩服，说“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文章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鲁迅赞誉说瞿秋白“真有才华！”鲁迅用这样强烈色彩的语言赞颂一个人是很少见的。瞿秋白的确有着过人的才华学识，凡是接触过瞿秋白的人，无不钦佩。郑振铎回忆他们1919年在一块办《新社会》时说，秋白常常咳嗽，脸色苍白，但他却常常熬夜。说“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丁玲也说过：“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我读过他写的稿纸，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动。”杨之华说得更为具体：“秋白写文章的习惯是不打草稿的，在思想成熟后，提笔就写，一动手写，就象瀑布一样地直泻下来，其势不可挡，是那样迅速和猛烈，非一口气把文章写完不可。《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就是在一天一夜内产生的。”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近2万字的论文，也只写了4个晚上，白天则用于读鲁迅杂感。许广平回忆瞿秋白写作《伸冤》、《曲的解放》等杂文时说：“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瞿秋白写文章还有一个习惯，用复写纸衬着写，一写便是二、三份。这种写法，一笔定型，不容涂抹，足见思路之清晰，文词之准确，逻辑之严密。

## 二 性格气质

瞿秋白性格气质中最突出的几个特点是：

一、认真负责。瞿秋白一生中对任何事情，大至政治问题小到生活琐事，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绝不马虎从事，绝不敷衍搪塞，而是负责尽职，言必信，行必果。凡是同瞿秋白打交道的人，都感到他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一个信得过的人，一个可以交予重任的人。

瞿秋白步入社会承担的第一个社会工作便是为《晨报》做访苏记者。他当时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身体又不大好，可是，他一经允诺，就全力以赴。一踏上旅途就开始向《晨报》写报道，他将别人用去玩乐吃喝的时间用来采访和调查研究，阅读必要的资料和书籍，终于在2年又2月的时间内写出高质量的通讯报道、专访专论50多篇，20余万字，还写出《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这样优秀的报告文学，近15万字，还写出《俄国文学史》这样的学术著作，近7万字。单就这一个数字就足以看出瞿秋白的踏实精神。当时他在苏联，还兼任“东大”的翻译和助教。为了上好课，还要认真备课，头天晚上总要将第二天要翻译的教材和可能涉及的内容准备得十分周全。据曹靖华说，他讲课有时累得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但还是诲人不倦。1924、1925年在上海时，为了发动、开展工人运动，也是为了了解工人生活状况，瞿秋白在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编辑党的刊物和在上海大学讲课之余，尽可能地抽出时间接触工人，同他们倾谈，仔细听取他们的意见，认真回答他们的问题。当时杨之华在做工人运动的工作，不论杨之华回到

家里多晚，秋白都一定要她讲述当天的工作情况，及时反映工人运动中的问题。“五卅”运动爆发后，瞿秋白在主编《热血日报》的过程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事事躬亲。组织稿件，修改文稿，写社论，写杂感，题报头，做校对。当时气候炎热，编辑室又狭小，简陋，灯光昏暗，但瞿秋白忘掉疲劳，保证了《热血日报》的及时出版，而且努力使这一张小报办得很出色。在他的精心编排下，这张小报设置了新闻、政论、文艺、来信等栏目，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深受工人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欢迎。

瞿秋白在政治问题上更是表现出十分认真的精神。当他看到国民党的戴季陶主义即将产生严重危害时，便以极大的愤慨对戴季陶主义进行尖锐的批判，当他认识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时，便责无旁贷地对他们的种种错误观点进行严肃的批判，尽管他对陈独秀本人一直很尊重，但在重大的革命原则问题上，绝不含糊，绝不退让。为了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不顾及私人情面，率先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批判。他对苏联派来的国际代表的明显错误，也敢于直接驳斥。瞿秋白对于一切文字工作也是极为严肃的，稿子写得整洁干净，翻译字斟句酌。他致力的文字改革研究，从1920年到1934年，毕其一生精力，孜孜不倦，反复修改增补，使之更趋成熟。一次同鲁迅、许广平见面，得知许广平是广东人，便趁此机会请许广平读音，以校正他的拼音草案。1929年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工作是很繁忙的，但为了使在苏的中国同志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革命经验，他将翻译的文章先读给工人同志听，问大家懂不懂，恳切地要大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进行认真的修改，力

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生活小事上也表现出瞿秋白的负责精神。他对人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尽力使人满意。1932年12月，秋白赠送鲁迅爱子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为了让海婴能正确使用这一玩具，秋白亲自用毛笔在盒盖上工整地写明零件的名称、件数。

二、献身精神。瞿秋白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倾注自己全部心血。从不顾及个人安危，为革命全心全意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从健康到生命。从不因为革命斗争中的困难挫折而退缩，从不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怨恨。瞿秋白有一句习惯口语：“服从组织决定。”他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安排。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和撤职处分，他并不怀疑党组织的正确性，毫无怨言。会议结束时李维汉关心地问他：今后怎么办？他回答说：听中央的分配。是年6月，中央决定派他去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而以他当时的健康来看，是不合适的，但他也真诚地表示：“我坚决服从”。只是因中央后来改变了这一决定而未成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长征时，决定他留在苏区工作，有同志劝他去请求一同出发，他也表示：“我服从组织的命令。”这样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他的党性表现，高度的党性建立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上。瞿秋白的身体一直很弱，但他在工作上却异常勤奋，刻苦，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过人精力，真正做到了忘我。

单从身体健康方面讲，瞿秋白走过的一生也是极其不易的。一方面，病魔时常将他击倒，发烧，吐血，卧床。另一方面，他扶病而起，强撑衰弱的身躯坚持工作，工作量大大超过健康人的限度。早在幼年时，从小学到中学期间就因病停学3次，

累计在2年时间以上。1916年冬天，他暂住湖北黄陂二姑母家时，肺病就已相当严重，不时咳嗽，姑母和堂姐也很关心，要他注意调养，不要深夜读书。但瞿秋白嗜书如命，如饥似渴，很想将姑母家的两间屋的藏书一气读完，根本不把病放在心上，白天读，夜里照旧读。等到大家睡下之后，他在窗上挂一张厚厚的帘子，遮住灯光，继续他的夜读。1919年在北京，他已开始吐血，见到他的朋友，无不为其健康担心，可是他自己毫不在意，他除了坚持一个俄专学生正常的学业之外，还在校外进修法语，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各种理论著作，还编辑《新社会》和《人道》杂志，撰写文章，翻译作品，参加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常同朋友们讨论社会问题。郑振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当他早上去秋白那里取稿子时，常常发现他刚刚才睡下。朋友去了，又得接待，于是拥被而坐，不断的抽烟，不时的咳嗽，脸色十分苍白。瞿秋白当时的生活十分清苦。堂兄瞿纯白虽做着差事，但收入不高，平添几个人（秋白去北京不久，他二弟云白、五弟尧白也去北京投靠堂兄纯白）的生活费用，自然就相当拮据。一次李子宽去看望秋白，见他的伙食是以白萝卜和干贝一两小块或虾米少许放在一起加水猛煮，以汤下饭，别无其他。当时不仅谈不上营养，就连衣衫都很单薄，他去北京的第一个冬天，穿着夹袄便过一个严冬。1921年12月，因肺病严重，不得不住进莫斯科附近的高山疗养院，在这里，苏联医生诊断说他的一叶肺已经烂了，顶多能支持三两年。可是他仍不在意，在疗养院里照样读书和写作。床边没有台灯，便将吊灯拉到床头，拴在床架上，俯在枕头上写文章。他说：“病是要养的，可是书更要读，工作更要做。”“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

工作，要工作。”有时实在支撑不住，他不禁悲愤地高呼：

“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1923年回国以后，工作更繁重忙碌了，而病状有增无减。有时，除了吸烟之外，还靠饮点酒提提精神。1924年他对曹靖华说，他完全是用药物维持着生命。然而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听他讲课、作报告的人，都见他精神饱满，充满生气，谈吐风趣，富于感染力和煽动力。1926年春天，秋白又吐血，杨之华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强迫他进医院休息。他进医院后，并没有认真休息，先是读书，后是写作。杨之华每天去看望一次，每次去都带回他开的书单，使得杨之华几乎隔一天上一回书铺或书摊，上海四马路一带的小书店成为她很熟悉的场所了。瞿秋白住院的第三星期，便动手写作。杨之华每天去医院，都要带回一部分手稿。他在两三个星期内便将俄国革命运动史的第一部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编译了三分之二。连张国焘也不能不承认瞿秋白有着惊人的勤奋精神和过人才华。在几十年以后写的回忆录中叙述当时的情况说，1926年他曾与瞿秋白同室居住过一段时间。

“瞿秋白是一个将夜作昼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涉猎甚广的学者。他久患肺病，又患有失眠症。每当我午夜就寝，正是他读书开始的时候；直到第二天早晨八时，早报业已送来，他的阅读工作才告一结束。接着，他看完报纸，和我共进早餐；他往往爱谈起前夜阅读过的精采著作；他一夜读完整本的书，是常有的事。我早餐后出外工作，他才解衣睡觉。下午二时以后，是他处理工作和写稿的时间。我们一同共进晚餐时，他总要喝几杯老酒；餐后，他常笑容可掬地和我闲谈”。<sup>①</sup>到1928年、1929年，瞿秋白的病已更加严重，几次进入疗养院

<sup>①</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95页。



治疗，他感到“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1930年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最近又因天气关系大病起来，简直差不多半个月晚上不能睡着了，因此，最近不能做什么工作。即日要去休养治病。真正烦闷死人。”<sup>①</sup>瞿秋白虽然说“不能做什么工作”，而实际上却不停地做着工作。第二次赴苏的两年时间里，身为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经常参加一系列会议，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工作，做报告。此外，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和近3万字的长文《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写出数十篇论述中国革命形势、革命性质、揭露反动派、批判党内错误思想的论文，这两年的政论、报告和起草的文件共40余万字。还继续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写出《中国拉丁化字母》，还参与编辑俄文刊物《中国问题》，还受命主持起草将在党的“七大”上讨论的党纲。他还校阅了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中文译本，还翻译不少文件，还研究了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等。单单看一看这些工作项目就可以看出瞿秋白是在怎样地忘我工作！他每天都工作10个小时以上，而夜间还经常失眠。这期间，还要对付米夫、王明等人在“中山大学”制造的宗派斗争。王明一伙曾用漫画形式将瞿秋白画成猴子贴在“中大”墙报上。这些不正常的斗争和无聊的人身攻击，给瞿秋白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无疑加重了他的病情，毁坏了他的心绪。但他却做了那样多的工作，这需要何等巨大的坚强的意志！这又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1931年四中全会后，他几乎被王明左倾路线全盘否定，但他仍以拳

<sup>①</sup> 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350页。

拳之心眷恋着党的革命事业，以重病之躯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并不时撰写政治斗争方面的文章，并非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从这时起就远离了政治斗争。到苏区以后，更焕发了革命青春，做了大量工作。瞿秋白在临死之时还决定将自己的遗体贡献给医学事业。他在《多余的话》中说：“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现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sup>①</sup>语气十分诚恳，表现出他毫无保留的彻底的献身精神。

三、真挚热情。真诚相见，宽厚待人，是瞿秋白对同志、对朋友的一个突出特点。表面看去，他显得严肃，沉默，寡言，甚至冷峻；一经接触，便发现他平易、热情；同他交往，更可发现他内心蕴藏着炽热的感情。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感受到他有一颗真诚而热烈的心，既感动于他火样的激情，又感动于他朴质的作风。他对同志绝不敷衍，绝不搞表面文章，不矫情，不浮饰，不要手段，不搞阴谋。一切问题都开诚布公，不以政治手段解决认识上的争端；他对事不对人，他严厉地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很尊重陈独秀的历史地位，高度评价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中的功绩。他不以“一错百错”的观点看待犯错误的人，在“八七”会议上，有人建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他坚决不同意。陈独秀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以

<sup>①</sup>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附录一。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瞿秋白对他仍然很尊敬。1927年9月下旬，瞿秋白从武汉回上海二、三天后，即去福生路陈独秀寓所访问他。那时，陈独秀在上海过着隐居生活。瞿秋白请陈独秀给中央机关报写文章，陈独秀当即答应。这一年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创刊以后，陈独秀署名“撒翁”在该刊《寸铁栏》发表了许多短文。瞿秋白奉命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他对李立三的处理留有余地，不一棍子打死，以致后来被米夫、王明等说成是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瞿秋白还不固执己见，一旦发现自己对某问题的看法有偏差便立即纠正。1932年6月他在《“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一文中认为“第三种人”是敌人，后来察觉看法不妥，就于11月10日写成《并非浪费的论争》，于11月26日写成《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两篇文章，纠正自己的偏颇。他郑重指出：“对于一般作家，我们要携手。”又说：“我们要承认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文学，章必都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学的苏汶先生的话是对的；而且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瞿秋白不仅勇于公开承认、检查自己的错误，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使有关同志解除思想包袱。比如他在“六大”上就将1927年下半年出现的盲动主义错误完全承担起来，解放了其他同志。而对其他同志的功劳则充分肯定。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序言》中对毛泽东同志发动农民运动的高度赞扬，在有关文章中对彭湃、张太雷……等等同志的高度评价，等等。瞿秋白从不揽功诿过。瞿秋白的胸襟是博大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瞿秋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甚至忍辱负重。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大骂瞿秋白，他则一言不发。会后有同志问他为什么不

话，他说：“我个人的问题算不得什么，这都是枝节问题。我倒是担心革命的前途！”他在《多余的话》中谴责自己有“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其实，这些道德用在处理同志关系上还是需要的，是正确的，这是他的长处，是他宽厚待人的表现。

四、抑郁多忧。瞿秋白的心情一直是相当忧郁的。小的时候就比较沉默，不爱讲话。他在小学和中学时留给同学们的印象也是文静，不多言说，更少狂欢大笑的时候。瞿秋白稚嫩的心灵从小就笼罩着一层凄凉的阴影。他后来在《饿乡纪程》中明白地说出：“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五四”以前甚至产生过一种厌世的悲观心理。瞿秋白这种忧郁心态一直伴随着他，即便在最紧张的时日里也未能消除。

1926年在上海他赠羊牧之的四首古体诗也反映出忧伤之情。羊牧之当时就说：“前天两首和今天的两首，也多辛酸之语。”瞿秋白也点头承认，说：“我们都有这种习气，旧文人的思想感情，总丢不掉，所以今后还是少作为宜。”<sup>①</sup>

1930年在上海，一天瞿秋白同他弟弟云白一道去看望丁玲。丁玲也明显地感到他“带点忧郁的神情”。<sup>②</sup>

1933年末，瞿秋白即将去苏区，向茅盾辞行。茅盾记叙说：“那次，他谈了很多话，但我总觉得他的心情有点郁悒；也许这是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又要走上新的征程。”<sup>③</sup>

这种抑郁心情在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写的《多余的话》和

①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②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③ 茅盾《回忆秋白烈士》，1980年第6期《红旗》。

《偶成》等诗作中反映得更为显明。总之，可以说瞿秋白一生都是忧郁的。

产生瞿秋白抑郁心情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境和社会的刺激。瞿秋白出生之时正是他的家庭完全破落之际，全家生活先是靠亲友资助，后靠借贷和典押。他母亲在极其困窘之中自杀身死。母亲死后，一家星散，各自求生，情形极为凄凉。他后来在《饿乡纪程》中回忆当年情况时说：“儿时的旧伴，都已星散了，谁还管得谁？”“生活困难，心绪恶劣”。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令人失望，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皇帝，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人民大众仍旧生活在水火之中。目睹社会依旧的黑暗，“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瞿秋白的厌世，不是表现为陷入“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而是寻觅一种“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那就是对“性灵”的崇尚。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谈到，他由于崇尚性灵，就希冀个人品性的完善。后来，瞿秋白一直用理想化的完善品性严格要求自己，解剖自己，严格到苛求的地步，而时时又感到自己缺点甚多，于是常常谴责自己，乃至诅咒自己，完全否定自己，否定之后便觉得空虚，于是又产生新的苦闷。当年由于崇尚性灵，又促进他进一步研读老庄，并且研究佛学，对老、庄、佛学的研究又促使他从厌世发展到避世。他在北京的头两年，即“五四”运动前，避世思想是较为明显的。“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后，当然从理论上、从理智上摈弃了这些消极观念，但在心理上却难以磨灭少年时代刻下的忧郁印痕。

二是受到生父瞿世玮的影响。瞿世玮是一个生性淡泊的

人，一生无心仕途，常年闲散在家。瞿世玮幼年曾习剑术，后来笃信道教，以绘画聊以度日，终生潦倒。秋白小时就经常到玄妙观后红梅阁古春轩壁上看他父亲所绘的玄妙观全图。耳濡目染之间，父亲的消沉情绪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秋白对他的父亲很有感情，很同情他的不幸。而对他父亲思想中的消极东西却一直未得机会予以必要的认识，他父亲思想中某些消沉的感情便在他身上一直潜伏下来了。他同他父亲在感情上的密切程度我们从他在《饿乡纪程》中的一段文字上便可看出。他以深情的笔墨记下他离国前夕告别父亲的情形：

“山东济南大明湖畔，黯黯的灯光，草棚底下，一张小圆桌旁，坐着三个人（鲁按秋白、阿尧和他们的父亲）残肴剩酒还觑着他们，似乎可惜他们已经兴致索然，不再动箸光顾光顾。

其中一个老者，风尘憔悴的容貌，越显着蔼然可亲，对着一位少年说道：‘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的肩很重啊！……，’那少年答应着站起来。其时新月初上，照着湖上水云相映，萧萧的芦柳，和着草棚边乱藤蔓葛，都颼颼作响。三人都已走过来；沿着湖边，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时，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种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叫人何以情呢？”

“我父亲只能一人住在山东知己朋友家里，教书糊口。在中国这样社会之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营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纪已近

半百，忧煎病迫，社会还要责备他尽什么他所能尽的责任呢？……”

三是病体的关系。瞿秋白自幼体弱多病，这对他的心理、精神有着明显影响，使他喜静不喜动，偏重于思索内省，性格内向，文静，乃至多愁善感。病状虽然时好时发，而整个健康状况却是愈来愈坏。瞿秋白以异乎寻常的意志战胜病魔，同死神搏斗，一而再，再而三地夺回了为党工作的时间。他在工作中从未叫过苦，从未为病痛呻吟悲戚，而当他结束工作，或夜阑人静时，就感到异常困乏。杨之华曾见他在半夜里停下笔，扶在墙壁上，嘴里流下清水的极端虚弱的情形。他时时为病痛的折磨而苦闷、忧心、难受。病魔给他造成难言的心理压力，使他有时兴味索然，似乎一切都无能为力，因而心境灰暗。早在1920年在俄专时，就因病而感到“心智不调”。1922年在苏联，就因病时常感到神志恍惚，心神不定。他在《赤都心史》第26节《归欤》中对此有明白的反映：“病体支离，要做的，应当做的，也都不能做。况且心理的病状，情感易动，感慨低徊，抛一滴无意的热泪；家园、故乡，人生的意趣，将来的责任都拚在泪花里，映着灯光，陆离万象，化作一‘宇宙外的宇宙’了”。这种心境在1931年遭王明路线打击以后，更加剧了。当时见到他的人都明显看出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差。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他一直硬撑着。当他被俘以后，他感到已不能再为革命工作了，因此也无需掩饰自己早已无力支撑、渴望休息的真实心情。所以他在《多余的话》中便以十分突出的语言表明他早就渴求得到休息。表面看去，似乎是他对政治斗争的厌倦，实际是对病魔折磨的心理反应。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

理智健全的人的真实心态。因病体难支而渴求休息与本质上厌倦政治斗争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加之1931年以后，他又在事实上被排斥到政治斗争的中心之外，所以他说从那时起，他已远离政治。他在长汀监狱中于1935年5月28日给郭沫若的信中就明确讲到病体早就影响他在政治斗争和文学活动上的积极性。他说：“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衰退甚至于湮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

四是觉得政治斗争力不从心因而产生苦恼。瞿秋白长时期以来总认为自己不适宜从事专业政治工作，特别是无力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工作，然而，在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的情况下只好承担起来；一面克尽全力做好党组织交付的工作，另一面又总觉得自己力不胜任，很勉强，由他来做这样重要的领导工作，简直是“历史的误会”，为此，内心相当矛盾和苦恼。他多次用“犬耕”一词来形容勉力为之的状况。最初用“犬耕”一词的不是瞿秋白，而是一同访苏的俞颂华。《饿乡纪程》之九记叙说，他们在去苏途中，瞿秋白谈到他担任新闻记者，实在缺乏这个能力。俞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后来，瞿秋白就习惯用“犬耕”表示自己力不胜任之意。这一词语的使用反映了瞿秋白的性格特



点：总是将自己估计得很低，总觉得自己很差，而将自己正在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矢志献身的事业看得很高很神圣，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于是无形之中不自觉地形成一种精神障碍和心理差距：一方是那样崇高，一方则是如此渺小；一方是那样神圣，一方却是如此卑微。由自谦到自卑，以致逐渐形成一种精神压力。虽然工作做了不少，有时做得相当出色，有杰出的贡献，但总觉得不行，没做好，甚至觉得完全没做对，全盘否定自己的工作和功绩。这种心理已近乎变态。他不单否定了自己的政治工作，连文学成就也否定了。他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真正知识的、一知半解的“半吊子文人”。从积极方面说，这是他的自谦，总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力不胜任，有负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1927年2月写的《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就坦率地说：“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随着政治上犯盲动主义错误，被批判，被撤职，同时健康日差，他的这种感觉就更突出了。所以1932年左右他给鲁迅、茅盾等人的信中也署名“犬耕”。茅盾问他这是何意，他解释说：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的。并进一步解释道：这并不是说我不做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终如一的，我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是要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诸如此类的领导全党的工作，那么，就是使犬耕田了。<sup>①</sup>总之，由于他的过分自谦，不自觉地发展到自责，由此背上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他的忧郁心情。瞿秋白抑郁忧愁的心绪在平时是没有机会暴露的，他也尽量克制自己，

<sup>①</sup> 茅盾《回忆秋白烈士》，1980年第6期《红旗》。

不让这种消极心态冒露出来妨碍自己正在进行的革命工作，即便在1931年以后的三四年时间里，他也尽量压制这种不良情绪，而全神贯注地从事革命文学事业的建设工作，只是偶尔有所流露。一旦觉得自己已被完全解除武装，不能再进行往常那样的革命工作时，他就再也无法控制住有生以来一直存在着的忧郁了。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写出了《多余的话》和狱中诗抄。所以，《多余的话》和《偶成》等诗的消沉情绪自然就很明显。

瞿秋白的性格气质除了以上几点以外，还有两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偏激，情绪上的偏激和思想方法上的偏激。在情绪上，瞿秋白在他整个一生中都有热情，有进取心，有干劲，有拚搏式的献身精神，但是却不够冷静。他容易冲动，容易急躁，急于求成。在思想方法上，易犯片面性，易走极端，往往顾此失彼，强调一点而忽略了另一点。即便是在解剖自己的缺点错误上也是如此。因此，在处理事件上，就容易失之偏颇，或者不足，或者过头。二是文人气息太重。传统观念中的文人气息，即书生气，或书卷气。这种文人气息在瞿秋白身上有较深的烙印，而且在主观上并不认为这种气息是什么不好的思想作风，这大概与他一直都渴望从事专业文学工作，欣赏文学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关。可是，历史又将他推上政治舞台，而且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斗争与文学工作是两种特性不同的工作，各需要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工作才能和心理习惯。然而，我们发现，瞿秋白虽然从事了十多年的职业政治斗争工作，却始终保持了一个文学家的感情方式、思想方式和工作方式。瞿秋白的文人气息具体表现为，对书本上的理论理解得很深，而对实际生活的错误复杂却有些认识不足，导致产

生一定的教条主义；只求情感的真实表达而不太重视表达方式是否恰当，不重视政治斗争特别需要的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只管主观愿望的良好而不太会预测实际效果。这样一种文人气息自然是不适合于政治斗争的，本该去掉而未能去掉，反而在它的影响下加深了他心里的政治与文学的矛盾。

### 三 感情生活

瞿秋白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有着强烈的感情需求。他的感情热烈而深沉，挚着，纤细，纤细到带点多愁善感的情调。

他爱他的父亲。离国时特地赶到济南向父亲辞行，同榻而眠，畅谈通宵，不忍离去。回京后在整装的百忙中还抽出时间整理过去的诗稿，留给父亲作纪念。当启程的火车开动时，他望见车外茅舍前的父子女女，便“不由得想起我与父亲远别，重逢的时节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家道又如此，真正叫人想起我们常州诗人黄仲则的名句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sup>①</sup>

他更爱他的母亲。母亲对他的哺育，慈爱，启蒙，使他终生不忘，特别是母亲为了抚养他们兄妹八人负债累累，终于被困窘吞噬去生命，更使他悲痛欲绝。他在母亲去世时写的《哭母》诗说：“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时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深责自己未能侍候母亲、孝敬母亲之过，同时为失去母爱而万分难过。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同亲友谈起母亲时，都流露出深情的怀念。他母亲死时无钱安

<sup>①</sup> 《饿乡纪程》第1节。

埋，只得将灵柩暂厝瞿氏祠堂东侧，直到1926年都还未营葬，所以瞿秋白在1926年写给羊牧之的诗中极其感伤地写道：“君母去年亡，我母早弃养。亡迟早已埋，死早犹未葬，茫茫宇宙侧，何处觅幽圻？荒祠湿冷烟，举头不堪望。”

他也爱他的弟妹。为了一同求生，也为了弟妹的长进，他先后将二弟云白、四弟景白、五弟阿尧带在身边，相依为命，一方面解决眼前的饥寒，另一方面又引导他们求知识，追求进步。除阿尧因自幼迟钝，后来去济南依傍父亲之外，云白和景白都先后参加革命。六弟坚白在秋白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于秋白牺牲后也参加革命，战死沙场。瞿秋白在他繁忙的工作中时时回想兄弟情谊，回忆父亲，母亲，以及他当年的“家”。1922年11月在苏联收到二弟云白的信后，感慨系之，他写道：

“前几天我得着北京来信，——是昀弟的手笔，还是今年三月间发的，音问梗塞直到现在方来。他写着中国家庭里都还‘好’。唉！我读这封信，又有何等感想！一家骨肉，同过一生活，共患难艰辛，然而不得不离别，离别之情反使他的友谊深爱更沁入心渊，感切肺腑。况且我已有六个月不得故乡只字。于今也和‘久待的期望一旦满足’相似，令人感动涕泣，热泪沾襟了。”“这一封信，真可宝贵；他始终又引起我另一方面的愁感，暗示我，令我回想旧时未决的问题；故梦重温未免伤怀呵。问题，问题！好几年前就萦绕我的脑际：为什么要‘家’？我的‘家’为了什么而存在的？”“我的母亲为贫所驱，出此宇宙。只有他的慈爱，永永留在我心灵中，——是他给我的唯一遗产。父亲一生经过万千痛苦，而今因‘不合时宜’，在外省当一小学教员，亦不能和自己的子女团聚。兄弟姐妹呢，有的在南，有的在北，劳燕分飞，寄人篱下，——我又只身来此

‘饿乡’。这就是我的家庭。这就是所谓‘家里还好’！”<sup>①</sup>

瞿秋白还深情依恋少年时代同伴之间的友情，那是一种天真无邪的童贞般的爱。其中，以他同大姑母家的表妹纤纤（学名金君怡）之间的情谊最为深厚。大姑母家住在离城20里地左右的贤庄，外祖父金心多后来也由附近的大岸上村迁来贤庄。于是，瞿秋白小时常随母亲到贤庄做客，既是看望大姑母家，又是看望外祖父家。贤庄有一溪流环绕，人称环溪。在这里，他同纤纤等姊妹一同游玩，一块背诵诗词，谈理想，谈未来，给秋白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愉快和温馨，给他灰濛濛的心田注入了阳光和生气，还似乎播下了一粒朦胧的爱情种子。这部分生活是瞿秋白少年时代最愉快最珍贵的一部分生活，这是他后来保存的少年时代最美好回忆之一。当他离别家乡前往湖北黄陂时，曾为纤纤画了一幅“江声云树图”相赠。当他踏上赴苏旅途时，又回想起当年他们甜蜜的友情，缱绻难忘。他后来说：

“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使我的奇思遐想。”但是，这一切都已成过去，此刻，连同亲人握别叙旧也办不到，心里不由得怅怅然若有所失。想当年，在环溪，“有耳鬓厮磨啾啾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成，温情厚董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sup>②</sup>

瞿秋白也以真挚的感情热爱革命同志和战友。1924年10月10日，党组织在上海天后宫召开的群众大会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捣乱破坏，不少人被打伤，其中伤势最重的是黄仁同志。瞿秋白同志当时也受到反动派的追捕，他却不顾个人安危，深

<sup>①</sup> 《赤都心史》，第32节《家书》。

<sup>②</sup> 《饿乡纪程》，第2节。

夜去医院探望，细细察看 he 受伤的身体，抚摸着黄仁同志的额头轻轻呼唤他的名字，但黄仁同志已不能回答这亲切的呼唤了。瞿秋白沉痛地站立许久，最后告诉守护在那里的杨之华说，他回去马上置办棺木和寿衣，天一亮就送来。瞿秋白在上海大学工作时，有一名半工半读的学徒出身的学生刘华，在做工人运动方面表现很出色，瞿秋白认为“他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不仅经常耐心指导他的工作，而且在生活上关心他，常常要杨之华给他送些钱资助他的生活费用。一次刘华感冒了，瞿秋白又嘱咐杨之华买些白松糖浆送去。瞿秋白对于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更是怀有深厚的感情。沈泽民1932年要去鄂豫皖时，瞿秋白同他长谈，依依难舍，他们相约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临别时，秋白将自己用的一只苏制钢怀表送给泽民，说：“这块表是苏联同志送我的，你到了苏区天天要打仗，这只表对你有用，你留作纪念要。”后来这只表又由沈泽民送给徐海东，抗日战争时，徐海东又将它送给彭德怀。解放后，彭德怀又将它送还给杨之华。至今这块表还存放在北京革命博物馆。当瞿秋白1928年在莫斯科闻讯苏兆征因病去世时，他为未挽留兆征在苏联治好病面十分痛心。他给杨之华的信上说：“昨天接到你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撼的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后来常常提到：“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接着不久，他又得到彭湃、杨殷等四同志被捕的消息，十分焦急，立即给中央写信，他说：“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说明。”过了几天又给中央去信，询

问道：“彭、杨如何，急死人了！”当他得知他们已经牺牲时，他万分悲痛，立即著文悼念。他在《纪念彭湃同志》的文章中对彭湃同志的革命功勋做了很高的评价，并以极大的愤慨怒斥反动派。“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现在正对着中国工农的领袖的尸体，欢呼祝贺呢！可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栽培出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sup>①</sup>瞿秋白对张太雷同志，对许许多多同志、战友的牺牲都表示无比悲痛。当他同任何一个同志相处共事时，都尽可能地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同他在中央苏区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回忆说，秋白同志与大家患难与共，情同朋友。秋白同志热爱同志、尊敬同志的高尚情怀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瞿秋白的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可以说是一组优美动人的诗。

瞿秋白经历过两次恋爱，结过两次婚。

他的第一个爱人是王剑虹。王剑虹原名王淑璠，四川酉阳人。王剑虹为人相当严肃，当学生时，给人的印象是目不旁视，昂首出入。她聪明、美丽，有一双智慧、犀利、坚定的眼睛，没有当时一般知识青年的俗气，因此引人注目。她思想进步，更引起人们注意。“五四”运动爆发时，她正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学校进步青年的领导人。在公开活动场合，特别是在有校长、教员参加的辩论会上，她沉着冷

<sup>①</sup> 《瞿秋白选集》。

静、随机应变、口若悬河的讲演常常激发起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常常将一些保守的教员诘问得瞠目结舌，获得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她在学生会的工作中，在游行中，在开会讲演和教夜校等活动中，都表现得很突出。她当时的同学丁玲回忆说：“她象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sup>①</sup>1921年10月，陈独秀、李达等为了培养妇女运动干部，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子学校。王剑虹成为这所学校二十多个学生中的一个，她同时参加了妇女工作，在党创办的《妇女声》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热衷于妇女解放，热衷于社会主义。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办得并不好，王剑虹和丁玲都不满意。于是她们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狱，都要去闯荡闯荡。钱用光了就去纱厂当女工，去当家庭教师，或者去做佣人，都不在乎。总之，她们决心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去奋斗。于是，1923年夏天到了南京。在南京她们的宿舍里，经常有一些熟人去看望她们，其中有在平民学校认识的柯庆施、施存统、王一知（施存统的爱人，原也是王剑虹丁玲她们的朋友）等人。当此之时，即1923年8月，瞿秋白到这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天，施存统将瞿秋白带上一道去看望王剑虹、丁玲她们。这是瞿秋白同王剑虹的第一次见面。他们认识之后，常在一块谈谈文学，谈谈苏联，她们听着秋白那么熟悉、那么清楚、那么流利地讲述苏联的革命故事，讲解托尔斯泰、高尔基和普希金的作品，就像小时候听大人讲一些动人的故事那样着迷。秋白也认真倾听她们讲述一年来东流西荡的生活，并不责

<sup>①</sup>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文汇报增刊》1980年2期。关于王剑虹的资料主要依据此文。



备她们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鼓励她们到上海去，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他解释说这是党领导的正式学校，它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并不勉强学生入党，到那里去，既可以学到文学知识，又可以学到社会主义理论，还可以受到文学界一些知名人士的熏陶。瞿秋白将她们说服了，当瞿秋白走后不几天，她们便也去到上海，并很快就进入上海大学学习。

在上海大学，丁玲喜欢听茅盾的西欧文学课，王剑虹则特别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因为她原来就喜欢旧诗词，常常一人低徊婉转地吟诵。但她们最喜欢的教员却是瞿秋白。瞿秋白也高兴同她们接触，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要到王剑虹同丁玲二人住的一间小亭子间里去。只要他去到那里，一间屋子顿时便热闹起来，大家在一块谈天说地。他为了帮助她们领会普希金诗文中的语言美，就教她们学俄文。他教俄文的方法很特别，刚刚教会她们字母拼音之后便教她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精妙。这种学习法，读一首诗就得学二百多个单词和许多文法。但是，通过这样的攻坚战，当她们读了三、四首诗之后，便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俄文了。在瞿秋白的精心辅导下，她们的学业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他们的友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爱神已将瞿秋白和王剑虹牢牢拴在一起了。最早发现秋白同剑虹之间已产生爱情的是同他们经常在一块的施存统。经施存统提醒，丁玲也察觉了，丁玲无意之间还发现王剑虹写给瞿秋白的但尚未交出的情诗。此时，虽然秋白同剑虹都彼此倾心爱慕，但各自又都深藏不露。他们都十分谨慎，都很尊重对方的感蓄，尊重对方的选择，不急于表白心迹。因此，虽然双方的内心都汹涌着爱的万丈波澜，表面上却都显得风平浪静，

他们都在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可是这样的平静是令人难以忍耐的，不免使他们的行动产生一些异样，无拘无束，活泼诙谐的谈笑少了，甚至，他们其中一人突然不明不白地离去，秋白和剑虹都变得沉默和忧郁了。此时，多么需要一个爱的安琪儿！丁玲主动地充当了这位天使。丁玲将剑虹写给秋白的情诗专程给秋白送去。瞿秋白细细地阅读了这些诗之后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丁玲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瞿秋白握住丁玲的手说：“我谢谢你。”当丁玲回到宿舍里的时候，只见满桌子散乱着他们写的字，他们是以笔代口的，气氛非常温柔和谐，两颗火热的爱心正面交融了。秋白要走时，丁玲替剑虹从墙上取下剑虹的一张全身像送给秋白，算是订情的信物。由于他们彼此真诚爱慕，爱的热烈，不足半年，即1924年1月，他们便结婚了。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他们不仅都有志于革命，而且都喜爱文学，都有着诗人的气质和诗人的才华。他们的爱情充满着诗情，诗情为他们的爱情增添了奇光异彩。他们天天写诗，或者，在一块欣赏诗词。吟诗诵词成为他们抒发感情的最好方式。他们在诗的海洋中长驱爱情的风帆。秋白还将他们共同喜爱的诗词雕刻在各色各式精致的石章上，以此作为爱情的永恒纪念。秋白在新婚燕尔之际还给丁玲写过一首诗，称她是安琪儿，说她有赤子之心。这既是对她表示感谢，也是表明他对婚姻的满意。这时期，瞿秋白的工作是很忙的，既要负责上海大学的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又要担负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事务，还有其他种种社会革命活动，但他将这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常常是在外面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回到家里又接着同剑虹谈诗，写诗。这时，丁

玲寄住在他们的新家里。他兴致极高地教剑虹、丁玲吹吹箫，唱唱昆曲，或者他先在棉、绸块料上面画上花鸟，题上词，再由她们挑花刺绣。有时，他同剑虹在晚上到了玲的房间内聊天。每当这时，他们将煤油烤火炉（本来是秋白的弟弟为秋白准备的，他又转送给丁玲）点燃，关了灯，只让炉盖上一圈小孔射出一朵花式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气氛变得分外柔和、温暖。在这种气氛中秋白缓缓地向她们谈文学，谈文坛轶事，谈他对沈雁冰、郑振铎的了解，谈他对徐志摩的诗的喜爱和对郁达夫作品的兴趣。这些娓娓动听的故事让剑虹、丁玲她们开始懂得文学上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文学为人生等等理论问题。有时瞿秋白从外面回到家里要赶写文章，便在夜间泡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埋头写作，乃至通宵。而剑虹总是坐在桌边一直陪着他。瞿秋白文思敏捷，一夜下来，便写出一篇篇字迹工整、秀丽、几乎一个字都未改动的优美文章。

瞿秋白对剑虹的爱，十分深沉热烈。他称剑虹为梦可。

“梦可”是法语“我的心”的音译。这一段生活，可以说是瞿秋白步入社会以来心情空前愉快的一段时期。新婚不久，他受党的派遣，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并且常常夹着诗章。这些信，是我们认识瞿秋白感情世界的重要资料，现摘引一则如下。

1924年1月13日的信上写道：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呵。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

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  
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  
他不是自由花魂。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瞿秋白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革命者，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的革命者。他真诚地表明他需要纯真的爱情，他认为纯真的爱情能够给他增添生气，增强活力，而且，推己及人，他还希望人们都应当珍惜这种爱，都应当产生这种爱。他认为有爱心的人才是自由的人，有了爱，才会有人类的未来。

可惜，这段甜蜜的生活未能持续多久。他们婚后不久，王剑虹就患上肺病，而且病情发展很快，急剧恶化。瞿秋白一方面积极护理她，另一方面又预感到不幸。他在剑虹给丁玲的信上附言道：“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后来，终于无治，正在炽热燃烧的年轻生命一下子熄灭了。距离他们结婚才7个月，距离他们认识、恋爱的开端也不过一年。太匆匆了！这对瞿秋白心情上的刺激是巨大的，是无法用言词表达的。瞿秋白只有将这段爱情和由它逝去所产生的创伤深深埋藏在心底。他将头年丁玲转交给他的那张剑虹相片用白绸巾包好又交给丁玲保存，他在相片背面题了一首诗。诗的开头说：“你的魂儿我的心”。平时，丁玲只称剑虹为“虹”，秋白曾笑说：她是你的“魂”。诗的大意是说：“他的心”死去了，他难过，他对不起剑虹，对不起他的心。这样的意思，在瞿秋白后来写给丁玲的十多封信中，一再重复

过。他后来在信中还责骂自己，他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后来，他便将这一段爱情生活封存起来，用意志，用忙碌的革命工作，用对生活新的追求战胜哀伤，让过去的情思转化成新的热情。瞿秋白虽然重感情，但又是一个善于用理智控制自己的人。他很快振作起来，投入到新的革命斗争中去。他处理完剑虹的丧事之后便又到广州去了。

瞿秋白的第二个爱人是杨之华。杨之华是浙江萧山县人，1900年出身在一个没落地主家庭。杨之华从小就有倔强的个性，家里在重男轻女思想的支配下，为她哥哥专门聘请了家塾教师却不准她也一同念书。她便在书房外偷听老师讲课。老师被她的好学精神感动了，让她同哥哥一块学习。父亲见她如此爱学，接着便将她送到杭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在那里，她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毕业时受到学校特别奖励。当此之时，正是“五四”运动时期，杨之华通过亲友、学校等各种渠道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时代洪流，进步思想启迪了她的民主意识，在少年时代便敢于向封建习俗挑战。有几件事，曾经轰动乡里，一是反对缠足。家里给她缠上，她就放开，放了又缠，几经波折，她终于获得胜利。二是剪掉长发。虽然被一些旧思想的人讥笑为“尼姑”，她也毫不退缩。三是下河游泳，上街骑车。这些举止，在当时可算是惊世骇俗。她在杭州学习时，不仅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还知道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她十分向往这样一个新的国度。杭州毕业后，她于1919年年底去到上海，找到《星期评论》社，想通过这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刊物到苏联去学习。当时这家杂志社正准备组织一批青年去苏联学习，而由于戴季陶的反对，

杨之华未能去苏联，后来被留在该社工作。这时，她得到李汉俊的很多帮助，他还带她到日本、朝鲜的进步朋友家里见见世面，听听革命道理，还介绍她到一位俄国朋友那里学过俄文。当1921年《星期评论》被查封之后，她便到一所教会举办的“女子青年体育师范”学校去，暂作避居。由于她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宣传进步思想，为校方所不容，不久便被开除了。于是又回到萧山，到“农村学校”教书。<sup>①</sup>这所学校的许多教员都是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出来的进步青年，浙江省中共创始人之一宣中华便是其中之一。因此，这所学校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一个重要据点。1922年年底发生的萧山农民抗租示威运动便是这所学校发起的。杨之华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从1922年7月到11月，杨之华还先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社交和恋爱》、《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离婚问题的我见》、《谈女子职业》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她热情地提倡妇女人格的独立，婚姻的自由，地位的平等，愤怒地谴责歧视妇女、侮辱妇女的陈腐观念和一切丑行。杨之华的这些经历和她所受到的环境影响，使她要求进步、有所作为的愿望与日俱增，她迫切地希望投身到广阔的火热斗争中去，她是一个活泼，热情，进取心极强的女青年，不是贪图个人舒适、享受的平庸之辈。

<sup>①</sup> 这所学校系萧山人沈玄庐创办。沈玄庐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同盟会，1920年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出身大地主，自信奉共产主义之后，便在家乡自动减租，并筹办“农村学校”，还于1921年9月成立农民协会。在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了土地归农民的要求。可是，沈玄庐后来脱党，并于1925年堕落为国民党右派，参加西山会议派，1927年发动浙江全省的“清党”运动，屠杀共产党员。后沈玄庐又因同蒋介石政见不合，1928年被暗杀。

这样一个聪颖、美貌、朝气蓬勃、活泼而又贤淑的有志青年，在婚姻上却遭到不幸。在杨之华年方20，正欲进一步求学的时候，便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同当地的沈剑龙结了婚。沈剑龙是杨之华哥哥的同学，当然她认识，但说不上了解。沈家在萧山是大户，沈剑龙的父亲沈玄庐又是著名的开明人士，在当地颇有名望，所以，沈剑龙颇为得意，然而却不思上进，只图安乐，打牌，抽鸦片，玩女人。杨之华同他，在思想、志趣等方面相差很远，简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婚后不久，双方都发觉彼此的感情不合。而沈剑龙还嫌农村生活单调枯燥，去上海闲游，在花红酒绿之中乐而忘返。杨之华对这桩婚事感到失望，更主要的是她虽然结了婚，面向往革命、想有所作为的心情有增无减。她决心走出狭小的天地，离开不愉快的家庭，去重新开辟人生新的途程。于是，1923年年底，她便又到上海，去投考上海大学。

1924年的春天到来了，杨之华此时也开始了她一生中真正的春天。她在上海大学，正式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也正是在这里，她才真正明白应该怎样进行革命斗争和怎样使一生过得更有意义。她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和帮助，如恽代英，萧楚女，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邓中夏等等，其中，听瞿秋白讲课，接触瞿秋白，是她一生转折的重要契机。瞿秋白渊博的知识，透彻的讲述，还有那潇洒的风度，使她和所有同学折服。凡是瞿秋白上课，教室就爆满，窗台上都坐了人，连恽代英、萧楚女这些受学生欢迎的教员都去听。杨之华对瞿秋白十分敬佩，但开始仅限于课堂上的印象。他们第一次接触是瞿秋白替她作翻译。有一天，杨之华被指定去向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汇报上海妇女运动的情

况，担任翻译的竟是瞿秋白。瞿秋白十分耐心地教她如何回答问题，十分细心地为她解释一些问题，启发她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在瞿秋白的协助下，整个座谈显得轻松随便，杨之华愈说愈有劲，她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任务。通过这次接触，她觉得瞿秋白很诚恳，乐于助人，他并不是有的同学说的“很骄傲”而是很谦虚，也不是有的人说的“冷酷”，而是很热情。在上海大学，瞿秋白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都把他当作导师，有什么不明白的理论问题或个人困难、不幸，都愿意找他谈，求得他的帮助和指导。瞿秋白也经常主动找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和工作，并通过他们了解和指导工人运动和其他革命活动。杨之华便是其中的一个。瞿秋白很关心杨之华的入党要求，多次找她谈话，鼓励她，并且请向警予同志对她进行具体培养。在瞿秋白和向警予的帮助下，杨之华入党了，瞿秋白亲自做她的入党介绍人。自此以后，他们的接触更多了，彼此在各方面都更为了解了。当王剑虹病逝，而且瞿秋白也从悲痛中振作起来以后，他们之间的感情便自然地有所发展。杨之华早已决心脱离原来的婚姻，现在又遇上她理想的、并对她很好的瞿秋白，所以，爱情之火一触即燃，他们真诚地相爱了。但杨之华必须解除原先的法律关系才能重新结婚。为了解除枷锁，瞿秋白同杨之华商量决定采取直接谈判的办法，他们一同去到萧山与沈剑龙见面。三人关在房间里，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整夜，终于达成离婚协议。他们分别时，彼此都和和气气，如同朋友一样。瞿秋白和杨之华回到上海后，在《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7日、28日、29日三天内连续登了三则广告。一则是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一则是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



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另一则是瞿秋白、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这样的谈判和这样的启事，在当时都传为美谈。由此也可见出瞿秋白为人的坦诚、气度和魄力。

瞿秋白同杨之华的结合也是幸福的，美满的。他们相互爱慕，志同道合。在他们婚后的整整十年生活中，他们彼此尊重，相互关心，感情不断加深。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互为慰藉，互为依傍，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都在内心深情的呼唤爱人的名字。

瞿秋白很尊重之华的感情，他理解她在婚姻上受过的伤害，所以当之华思念女儿时，他很同情，尽力安慰她，并且安排时间让她回乡下去探望孩子。他鼓励之华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瞿秋白还对她表示，他一定爱护她的孩子，一定会比她自己的生父更负责任的培养她，教育她。杨之华为秋白如此无私的受和高尚的人格深深感动。1925年春天，瞿秋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特地陪同杨之华去到萧山，想把孩子从沈家“偷”出来。可是刚接到孩子，沈家追上前来的两个大汉又把孩子抢回去了。杨之华自然十分悲伤，这时，秋白也掉下了眼泪。这是杨之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秋白流泪。后来，当独伊回到他们身边之后，瞿秋白完全视她为亲骨肉。1928年在苏联，因为忙，他们把独伊送进幼儿园，每逢周末，他们都

要去看她。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总不忘记去商店买一些带回来。有时，他们还带孩子到附近的森林中去游玩。夏天，他们一同去采蘑菇，他为孩子画画，折叠纸玩具。冬天，瞿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雪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住脸“哭”起来，这时，天真的独伊便叫喊起来：“妈妈，我跌一跤不哭，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秋白一听，放开手大笑起来，大家都大笑起来。每当此时，瞿秋白感到无限的乐趣，一身疲劳消失了。瞿秋白即便住进医院，也不忘给独伊写信，逗她快乐，教育她好好成长。其中一封信写道：

独伊：

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

因为你想着：

你是好爸爸和姆妈两人生出来的。

（画独伊牵着一只兔子）

瞿秋白一方面体贴杨之华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关心她的政治进步。瞿秋白一直是杨之华精神上的导师，他们的爱情始终充满革命的激情。瞿秋白总是细心地指导杨之华的革命工作，杨之华从工厂回到家里，他再忙，也要停下笔来要之华谈谈一天的工作情况，然后给予鼓励和必要的指点。1927年，瞿秋白先期到武汉，杨之华后去一个多月。一见面，瞿秋白就取出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革命》的小册子，对杨之华说：“人人应该读几次，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又说：“这是

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1934年1月，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的前夜，特地为杨之华清理了一部分书籍出来，提醒她说：

“这是你要读的书，我给你整理好了。我还给你订了个半年的读书计划。”瞿秋白一直很关心杨之华的学习，即便在他很疲劳的时候，他也一定要给她按计划讲完课才休息。瞿秋白经常鼓励杨之华到工人群众中去，他说他最喜欢杨之华穿上工人服装去做工运工作，并且说：“我们的爱就建筑在这里。”1931年四中全会后，杨之华也受到株连，他发觉她有委屈情绪和要求工作的愿望，开导她说：“你要求工作的热情是好的，共产党员当然要为党工作。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学会独立地工作，自觉地、主动地去做。”他还经常教育杨之华要认识革命的艰巨性，他说：“革命前途远大，但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他还提醒杨之华要有为革命作牺牲的精神准备。他说，进行革命工作，经常都可能会被捕，甚至可能会死。但是，他说：“我们的不自由是为了群众的自由，我们的死是为了群众的生。”“被捕在革命中是难免的，反真理的敌人不配审判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到那个时候真理要审判反真理的敌人！”<sup>①</sup>这些话，既是对杨之华的教育，也是对她的极大关怀。他热切地希望，他们夫妻双双都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而事实上，杨之华正是由于铭刻着瞿秋白的这些肺腑之言，所以当后来被新疆盛世才关禁起来的时候，当她被“四人帮”投进监牢的时候，她就以秋白的赠言激励自己，绝不向敌人低头，始终坚贞不屈。

瞿秋白还尽量培养她的文学才能。他鼓励杨之华试着写小说，当她写出《豆腐阿姐》之后，秋白帮助她仔细修改。还帮

<sup>①</sup> 以上引文，均见杨之华《忆秋白》一文和《回忆秋白》一书。

助她修改翻译，译一段，改一段，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她如何翻译好作品。

杨之华对于瞿秋白，除了崇敬之外，便是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尽量使秋白能专心工作，能够有充沛的精力工作，能够有愉快的心情去工作。她在工作上支持他，在生活上关心他，在感情上安慰他。瞿秋白要资料，要书籍，杨之华总是千方百计为他去找寻，使他能按计划完成任务。瞿秋白身体不好，杨之华就把一切家务承担起来，买菜，烧饭，洗衣，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节省开支，设法弄些好吃的为他补养身体，为他买药，而自己则吃得很简单。瞿秋白习惯上午睡觉，她总是设法使他睡得很安静，她依照秋白的生活节奏来处理家务，井井有条，连她们的女佣人董妈也觉得这是一个安静和睦的高贵家庭。杨之华性情温柔，任何一位客人去到她们家里，都有宾至如归之感，都在那里感受到和谐、宁静和温暖。当她发觉秋白工作得已很疲倦，需要休息时，就在一旁说几句诙谐风趣的话，为秋白解除疲劳，或者劝他休息一下。一次，庄晓东同潘家辰去看望他们，寒暄几句之后，瞿秋白又伏在桌子上奋笔书写，杨之华向庄晓东递个眼色，笑着说：“有个人连脸都懒得洗，洗手也只洗手心，连手背都不洗，这个人更不喜欢搞卫生，房子里有气味，他就洒点香水，你们猜这个人是谁？”大家听了哈哈大笑，秋白也只好放下笔，同大家谈笑，稍事休息一会。每当秋白赶写文章，彻夜工作时，她就置备一点秋白喜欢吃的茴香豆、豆腐干、花生米之类，放在秋白的案头，让他在深夜充充饥。有时，就坐在一旁陪着秋白。每当秋白有事外出，之华在家里总是焦急地等待他回来，见他平安归来才放心。秋白在这种时候总爱习惯地说：“感谢你，亲爱的。”

他们深深的情爱使他们感到须臾不可分离，一个短暂的分别都会产生感情上失落的惆怅。他们总希望天天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彼此已成为对方生活的一部分，生存的一部分。瞿秋白奉党组织之调，去中央苏区时，非常希望之华能一道去。当组织上来人通知这一调动时，他立即便问：“之华可以同去吗？”回答说要请示上级后才能决定。即将离别时，他望着之华深情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相见……”又说：

“我们能很快在一起工作就好了！”杨之华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安慰他说：“我们一定会很快在一起工作的！”分别之夜11时，之华将他送出门外，秋白还未走到里弄口，又在白雪纷飞之中走回到之华身边，说：“之华，我走了！……”之华回答说：“再见，我们一定会再见的。”一直望着他瘦弱的身躯慢慢消失在远方。杨之华回到屋里，看见他整洁的书桌和书桌上的笔墨铜尺，看见他为她准备的书籍和读书计划，却不见秋白弯腰伏在桌上写作的身影，才意识到秋白已经离开了……。瞿秋白到苏区后，不时向身边的同志叨念道：“之华要来了！”

“之华快来了！”瞿秋白在苏区，一直穿着之华特地为他亲手缝制的一身深米色的棉布中装衣裤，戴着之华为他编织的绒线帽，感到特别温暖。瞿秋白一直未中断对之华的怀念，直到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都还在思念着之华，感激着之华。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

“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瞿秋白走后，杨之华天天盼着秋白报平安的来信。过了半

个月，终于收到秋白托人捎来的纸条。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杨之华从这短短的字迹上又看到了秋白的音容笑貌，心头舒了一口气，庆幸他即将脱离险境，踏上自由的土地。但她仍然惦记着秋白的生活和健康，先后两次托人带去药品。杨之华急迫盼望自己能早日到苏区去。可是，形势发展，终未去成。当她得知秋白被俘的消息以后，焦急万分，一夜一夜不能入睡。她同鲁迅先生、周建人先生等多次商量如何营救秋白，经再三考虑，她找到一起工作过的杜延庆同志，想利用他们印刷厂存留下来的一架印刷机办一个印刷所，作为铺保去保释秋白。没有钱，找到鲁迅，鲁迅立即答应资助。但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经办人，此议只好作罢。后来，通过一个同志的关系，找到了以收师身份掩护工作的秦化人同志，他给杨之华找了一个旅馆老板，写好了铺保证明，杨之华马上将证明连同鲁迅给的50元钱寄往长汀。殊不知这个时候，瞿秋白在叛徒的出卖下真实身份暴露了。杨之华预感到秋白活不成了，反动派绝不会放过他们的死对头的。此时，杨之华认为还有最后一条路可以试试，便是诉诸进步人士，通过社会舆论声援营救秋白。她写了一封同时给宋庆龄、鲁迅、茅盾、柳亚子、陈望道、郑振铎、周建人等人的信，请他们出面设法营救。柳亚子给杨之华回了一信，说：“接来信，怅然。孙夫人被监视，我亦一样。心有余，力不足，事与愿违。千万保重身体。”营救已无望了，她在极度痛恨敌人和极度想念秋白的心情下，很想去长汀监狱，陪伴秋白，同他一起赴难。后来冷静下来，想到作这样的牺牲不如坚持斗争，为秋白报仇，为阶级雪恨。瞿秋白不幸牺牲的消息终于传来了，杨之华悲痛欲绝。后来，党组织将

她送到莫斯科，她在那里，也抑制不住悲伤，经常哭泣。光阴不断流逝，而杨之华对秋白的思念却未曾间断。有一次一个同志对她说：“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丧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些人重新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你为什么不再结婚呢？”她回答说：“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因为我感到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了。”瞿秋白同杨之华的爱情，真是坚贞的爱情，永恒的爱情，至死不渝。1955年，党中央决定将瞿秋白同志的遗骨从长汀请回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安葬前，秋白遗骨在北京南长街8号全国总工会宿舍杨之华的寝室里暂放了几个月。有那一段时间内，杨之华每隔几天就要买一束鲜花放在秋白的骨坛前，并向身边的人说：“今天，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正象鲜花一样芬芳，见到这些花，秋白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瞿秋白曾将他的名字同杨之华的名字合刻成一枚图章：“秋之白华”。秋之白华，这一短语恰好概括出他们爱情的特色：他们的爱情象秋天的白花一样，能够经受风霜的考验，始终是那样纯洁，坚贞，鲜艳！

## 简短结语

瞿秋白匆匆地走完了他36年的生命历程。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生命的价值却是巨大的。

瞿秋白的一生，是追求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为了探索人生意义，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了建设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化，他不断学习，认真思考，勇于进取，积极战斗。在他身上没有苟且，没有敷衍，没有怠惰，有的是勤奋，有的是认真，有的是忘我精神和献身精神，虽然有时战斗得十分艰苦，十分疲劳。他始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即便身处逆境，甚至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也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反动派的斗争是无情的，猛烈的，持续的；他对各种反动思潮的批判是犀利的，准确的；他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批判是尖锐的，深刻的。瞿秋白是一位有胆有识的马克思主义战斗者。

瞿秋白的一生还是坎坷的一生。经济上的拮据，病体的折磨，伴随了他整整一生。政治生活中的挫折，以及几次党内的无理打击，使他的精神受到严重创伤。

瞿秋白是伟大的。他伟大在：“在党还十分缺乏马克思



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经验准备的幼年时期，他担负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的重大责任。”<sup>①</sup>他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早期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为拨正革命航向，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奉献了毕生心血以至整个生命。他伟大在：他通过刻苦的学习、思考和探索，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革命文学的创作和评论等等方面都做了许多筚路蓝缕式的开创工作，卓有建树。他的许多观点和论述为后来毛泽东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若干基础，或者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伟大在：他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为人正直；他有很强的党性，不谋私利，没有野心；他光明磊落，心地坦荡；他表里一致，不搞阴谋，不弄权术；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他亲切平易，宽厚待人，团结同志；他严于律己，从不诿过他人，顾全大局。茅盾曾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和秋白相识多年，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一个能肝胆相照的挚友！”<sup>②</sup>这个评价是公允的。瞿秋白的这些崇高品质堪为后世楷模，足以教育和激励后人。

瞿秋白是伟大的，但他不是完人。在政治斗争中，在理论著述中有错误，有不当之处。在性格气质上也有弱点。尽管瞿秋白在党内外都有崇高的威信，水平也高，能力也强，而且才

<sup>①</sup> 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在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85年6月19日。

<sup>②</sup> 《红旗》1980年6期。

华横溢，但他始终将自己看成是革命队伍中普通的一员，因此从不掩饰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多次向周围同志表白自己的真实心迹，多次自我检讨。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对自己的弱点和错误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和鞭挞。这是何等坦诚的胸怀！

瞿秋白是伟大的，但在生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中又受到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人的诬陷和批判，甚至受到挖坟抛骨的凌辱。世事就是这样的曲折和奇特。但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这说明，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一个对人民、对国家做过许多重大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历史会记下他的丰功伟绩。

# 后 记

这本小书完稿于1986年。几年来，它周游了几家出版社，都由于大家可以想象的原因未能付梓。现在，能和读者见面，得力于面南民族学院院长领导、院学术委员会、院科研处杨明同志、邓孝廷同志以及四川文艺出版社领导、特别是文艺理论编辑室同志的关心与支持，在此，特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瞿秋白既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其思想，其著述，其事迹，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党史、文化思想史、翻译等众多领域，要评说他的一生，本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我所以不揣浅陋，知其难而又勉力为之，完全是出自我对瞿秋白同志的钦佩与敬仰。我觉得，瞿秋白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位相当重要的、具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单就他最早提出若干革命理论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而言，他的历史功绩也是十分巨大的。他的重要思想、重要建树、高尚人品需要更多的人理解和肯定，使之得到继承和发扬；此外，我们从瞿秋白一生幸与不幸之中还可以领悟到有关革命工作、有关人生意义的某些微妙道理，它对我们是有裨益的。初衷虽然如此，怎奈才疏学浅，力不从

心，许多问题看得不深，分析得不透，有的地方还可能存在谬误，加之将原稿的三十万字压缩到目前的二十来万字，难免有语焉不详之处。种种不当，祈望各位专家、读者指正。

晏云涛1991年2月于成都玉林村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瞿秋白评传 [ 鲁云涛 ]

作者 =

页数 = 3 3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